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九卷

目 录

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	3—10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1—35
给威·白拉克的信	13—14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15—35
一	15
二	26
三	28
四	30
弗·恩格斯。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36—38
弗·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39—40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	41—59
一	43—53
二	54—59
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	61—106
一	64—67
二	68—71
三	72—75
四	76—78
五	79—82

六	83—87
七	88—91
八	92—96
九	97—100
十	101—103
十一	104—106
弗·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	
给恩·比尼亚米的信	107—109
弗·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	110—114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115—125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26—131
弗·恩格斯。 [*] 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132—134
弗·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135—158
一	137—140
二	141—144
三	145—149
四	150—154
五	155—158
卡·马克思。布赫尔先生	159—160
卡·马克思。 [*] 答布赫尔的“说明”	161—162
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163—169
弗·恩格斯。 [*]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 状况	170—171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 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72—190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172
二、给报纸拟定的方针	178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182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191—200
一、关税率	191
二、国有铁路	196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01—247
一	205—218
二	219—227
三	228—247
卡·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	248—249
卡·马克思。工人调查表	250—258
一	250
二	252
三	253
四	256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	259—263
卡·马克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26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 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265—267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268—26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 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1881年3月21日)	270—27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	272
弗·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	273—276
弗·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	277—279
弗·恩格斯。工联	280—286
一	280
二	283
弗·恩格斯。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287—291
弗·恩格斯。两个模范地方议会	292—295
弗·恩格斯。美国的食物和土地问题	296—298
弗·恩格斯。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299—303
弗·恩格斯。工人党	304—307
弗·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308—310
弗·恩格斯。棉花和铁	311—314
弗·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315—318
弗·恩格斯。燕妮·马克思 (冯·威斯特华伦)	319—321
弗·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322—32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俄文第二版序言	325—326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327—336
弗·恩格斯。论美国资本的积聚	337—339
弗·恩格斯。布雷的牧师	340—344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本初版序言	345—347
弗·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	348—350
弗·恩格斯。马尔克	351—369

弗·恩格斯。燕妮·龙格（马克思）	370—371
弗·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	372—373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374—379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380—388
一	380
二	38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1870年10月30日 梯也尔先生的停战）	391—395
卡·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396—429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430—452
初稿	430—441
二稿	442—446
三稿	447—452
卡·马克思。* 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 发展的札记	453—477
I [准备改革的] 过程	453
II [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	456
III 地方自治机关	463
IV 俄国	471
弗·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478—538
凯撒和塔西佗	478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493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509
注释：各日耳曼部落	523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	539—599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539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	552
注释：法兰克方言·····	564
注释·····	603—66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664—696
人名索引·····	697—724
期刊索引·····	725—727
地名索引·····	728—740
度量衡和货币名称表·····	741
译后记·····	742—745

插 图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第一页·····	12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的第一页·····	173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 第一版的扉页·····	203
卡·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页·····	261
弗·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日耳曼人移住图·····	531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75年3月—1883年5月

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

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¹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

基本上接受 1869 年的爱森纳赫纲领² 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① 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³ 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呢？“人民国家报”⁴ 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⁵ 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 1 到 5 和 1 到 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⁶。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

①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

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⁷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 1869 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 1870 年至 1871 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

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⁸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⁹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¹⁰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

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¹¹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

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¹²。在人们的想像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①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同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 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写于 1875 年 3 月 18—28 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载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
第 2 卷（1911 年斯图加特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 1953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
德文版第 2 卷译出

卡·马克思
—
哥达纲领批判¹³

卡·马克思写于 1875 年 4 月—5 月初

载于 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 1 卷
第 18 期，并作了某些删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 1953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
德文版第 2 卷译出

给威·白拉克的信

给威·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

撇开这一点不谈，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

(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买卖,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全权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全权委托书有效,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此外,即使这个纲领没有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也是完全不适宜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已经收到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¹⁴去。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⁵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

1.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去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们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暧昧的字眼添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

所承认。首先要满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财产^①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②。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私有者。——译者注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历史祸害。——译者注

2.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在英国，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 (!)，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

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 and 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①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没有直接关系。——译者注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①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①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译者注

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¹⁶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等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¹⁷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5.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

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悦于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¹⁸。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以后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

那末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派已经获得胜利，“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都应当被废除掉，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①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¹⁹。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盖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

① 引自歌德的诗“神妙的”。——编者注

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详细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利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²⁰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那末它们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

四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A. “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①、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从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没有：陈旧的。——译者注

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①——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既然他们不能。”——译者注

1.通过国家去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项第5条所要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

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²¹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①,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部分在里面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 “正常的劳动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常的。

3. “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禁止童工”!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一样。”——译者注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出身。

5.“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该明白说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有效的责任法。”

应该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指什么东西。

顺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劳动日的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弗·恩格斯
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的信

1875年8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公民们：

6月4日和施佩耶尔一书记的信一起寄给我(21日收到)的通告²²，已根据指示发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做了下面这些事：

(1)此地的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²³已同拉萨尔派合并，并且在接受会员——约120名——方面表现出过多的自由主义，因而只有在希望**立即公布机密通知**的情况时，才适合把这些通告给它，——所以，我把通告转给了列斯纳和弗兰克尔。他们两人都同意我的意见：这个通告的内容不宜于在协会中正式宣布，只应当把它告诉有关的人，并且要秘密地进行，以利于通告中所说的事情。看来这里不会派德国工人去费拉得尔菲亚，因此，这对实际结果不会有丝毫影响。

(2)当我收到通告的时候，我们的马德里的朋友梅萨(现住巴黎)正好在这里。他热烈赞同这件事情；我把通告翻译给他听了，他

认识在巴黎掌管筹集的款项(为了派遣工人去费拉得尔菲亚)的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凭他那众所周知的毅力,他大概能够做出一些事情。他还要打通告转寄到西班牙去。

(3)我无法把通告寄到比利时去,因为整个比利时的国际是站在同盟分子一边的,而让**后者**知道我们的计划——这对我们不利。在葡萄牙和意大利,我没有任何人的通讯地址。洛迪的“人民报”²⁴几乎是参加了同盟,它会立刻把这全部经过公布出去的。

(4)指示中没有提到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总委员会在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直接的联系,所以我就没有在那里采取**任何**步骤,以免妨碍那里已经进行的工作。

(5)凡是看过通告的人,都对它表示完全赞同,一般的看法是,在所有的建议中,召开代表会议的建议是唯一切合实际的。但要对这一点进行表决,我们觉得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关于此地的协会,我已经谈过。英国所有其他的支部都已停止活动,其中的优秀人物多半都已离开。在丹麦、法国、西班牙,国际直接被禁止,根本谈不上表决。德国还从来没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过表决,而在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后,同国际保持的本来就很微弱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想要把这个建议变成决定,美国的票数就足以支持它了,况且,正如我们根据可靠材料知道的,同盟分子今年也不会(也许永远再也不会)召开代表大会。

(6)是不是可以在展览会快开幕的时候,在欧洲的党报上刊登一则简讯,内容大致这样:“打算参观费拉得尔菲亚的展览会的社会主义工人,请到某某地址去同费拉得尔菲亚的党内同志建立联系”;或者成立“给工人社会主义者安置住处和保护他们免受欺詐的委员会”并公布它的地址?特别是后一种办法看来不会有什么毛

病,但只要几封私人信件就足以使人对这样做的真正用意得到应有的了解。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 1875 年 8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载于“约·菲·贝克尔、
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
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
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
纪念会上的演说²⁵

公民们：

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都注定要失败。就拿 1848 年革命来说。这次革命席卷的地区，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阔得多。它吸引了奥地利、匈牙利、普鲁士。但是它在俄国军队所占领的波兰的边界停住了。当尼古拉皇帝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就对群臣说：“去备马吧，先生们！”他立即动员了军队，并在波兰集结了军队，以便在适当时机调遣军队过境对付叛乱的欧洲。革命者本身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波兰将是一个决战场。5 月 15 日，巴黎人民高呼着“波兰万岁！”的口号冲入国民议会，去迫使议会为波兰的独立而战。马克思和我当时在“**新莱茵报**”²⁶上要求普鲁士立即对俄国宣战以解放波兰，而且整个德国先进的民主派都支持我们。可见，在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则，革命就必定灭亡。但是，法国的拉马丁、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沙皇的内兄）以及他的资产阶级大臣康普豪森根本打算粉碎俄国的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力量看做他们抵御威胁

到自己头上的革命的最后堡垒。当匈牙利起义者的成功还没有威胁到战胜了维也纳起义的奥地利反动势力时，尼古拉还可以按兵不动，他的军队还可以暂时只限于扼守波兰和威胁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只有威胁到反动势力时，这些俄国军队才大举入侵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保证反动势力在整个西方取得胜利。欧洲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正是这一个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说来都具有莫大的意义，使我们现在也要高呼：**波兰万岁！**

弗·恩格斯发表于 1876 年 1 月 22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76 年 2 月 15 日“前进报”
(伦敦)第 27 号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前进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
普鲁士烧酒²⁷

弗·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2 月
载于 1876 年 2 月 25、27 日和
3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第 23、
24 和 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

2月4日,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就英国和意大利对德国“酒精”课以重税一事向帝国政府提出质问。他提请议员先生们注意(见“科伦日报”²⁸报道)以下一点:

“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几个省,广袤无垠的大片土地,数百平方英里相当贫瘠的土地,由于普遍栽种马铃薯,达到了较高的肥力和栽种水平,而栽种马铃薯又是由于这些地区分布着许多酿酒厂,它们以生产酒精作为农村副业。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1000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3000人,由于马铃薯的体积大,运输困难,在严冬季节则根本无法运输,酿酒厂就成为马铃薯的必要的销售市场。其次,酿酒厂使马铃薯变成价格昂贵而易于运输的酒精。最后,有了大量作饲料的残渣,土地变得更肥沃。每个人只要注意到,尽管德国的酒精税比起世界各国是最低的,例如比俄国低五分之四,但是我们国家每年从酒精税得到的收入大约为3600万马克,由此就会明白,从这项事业中得到的收入有多么大。”

近来,普鲁士的容克们想必是十分大胆的了,他们居然敢让全世界注意自己的“酒精工业”,或vulgo(俗称)酿酒业。

在上一世纪,德国只酿造少量的烧酒,而且都是用粮食酿造的。诚然,那时人们还不会分离出这种烧酒中含的杂醇油(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因为当时杂醇油这种东西还根本无人知晓;但是人们凭着经验知道,烧酒存放久了,质量会大大提高,烈性会消失,不那么样使人酒醉和损害健康。当时生产烧酒的小资生产者条件,以及更多注意质量而不大注意数量的尚未发展起来的需求,使

得几乎各地年复一年地将粮食酒藏于地窖，这样，烧酒中最有害的成分经过逐渐的化学变化，危害性较小了。例如，在上一世纪末，我们只在为数不多的城市——闵斯德、乌尔利希施坦、诺特豪森等地看到比较发达的酿酒业，而这些地方的产品通常总要注明是“陈酒”。

到本世纪初，农村中酿酒厂的数目增加了，酿酒业开始成为较大的土地占有主和租佃者的副业，特别是在汉诺威和不伦瑞克两地。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顾客，一方面是由于烧酒的消费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增加和经常作战的军队的需要，而军队又使喝烧酒的嗜好广为传播。于是，在1814年缔结和约以后，酿酒业越来越普遍，在下莱茵，在普鲁士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鲁日伊策深深地扎了根，并以上述完全不同于旧城市酿酒业的形式，即作为大农业主的副业出现了。

然而，成为酿酒业转折点的是，人们发现不仅可以用粮食而且可以用**马铃薯**来酿酒取利。于是，整个行业实行了革命。一方面，酿酒业的重心现已最终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而生产上等陈酒的小资产者日益被生产马铃薯劣等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另一方面（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更重要），酿造粮食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被酿造马铃薯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酿酒业日益从富饶的粮食产区转移到贫瘠的马铃薯产区，即从德国的西北部转移到东北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

这一转折点是在1816年发生歉收和饥荒时出现的。尽管以后连续两年取得了较大的丰收，然而由于粮食无法遏止地向英国和其他国家输出，粮价仍然很贵，以致几乎不可能用粮食来酿酒了。任1813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①烧酒只值39塔勒，而到1817年则

卖 70 塔勒。马铃薯代替粮食之后，到 1823 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烧酒只值 14 到 17 塔勒了！

但是那些曾经因战争和为国捐躯而似乎弄得倾家荡产的易北河以东的穷容克们，从哪里取得一笔资金使他们所负担的抵押债务变成有利可图的烧酒厂呢？诚然，1816—1819 年的有利行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笔收入，由于地价普遍提高，给他们的信贷增加了；但是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爱国的容克们得到的比这更多：首先，得到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援助，其次，这里还要补充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大家知道，1811 年在普鲁士，农民赋役的豁免以及农民和庄园主之间的各种纠纷，由法律作了这样的调节，即实物贡赋变成了货币贡赋，而货币贡赋又资本化了，豁免的办法或者是用现金分期支付，或者是把农民的部分土地割让给庄园主，或者是一部分支付现金，一部分割让土地。1816—1819 年的高昂的粮价使农民不能尽快地豁免，因此这项法律一直是一纸空文。从 1819 年起，办理豁免手续在勃兰登堡进展得很快，在波美拉尼亚进行得较慢，在波兹南和普鲁士则进行得更慢。用这种办法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诚然是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权利（因为赋役是违背权利而强加给农民的）——没有按照贵族的旧习惯立即挥霍掉，而主要用来建立酿酒企业。在上述其余三省中，酿酒业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农民缴的赎金有多少用于这项事业。可见，普鲁士容克们的烧酒工业完全是靠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建立的。烧酒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从 1825 年开始。过了两年，到 1827 年，普鲁士生产的烧酒为 12500 万夸脱，即平均每人 10.5 夸

① 德国的旧液量单位，平均等于 225 升。——编者注

脱,总值为 1500 万塔勒;相反地,15 年前曾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烧酒之邦的汉诺威,只生产了 1800 万夸脱。

显然,从那时以来,由于某些邦或某些邦的关税同盟没有用关税壁垒保护自己,整个德国简直淹没在普鲁士马铃薯的劣等烧酒的洪流之中。按照批发价格,一奥姆^①(180 夸脱)的售价为 14 塔勒,就是说,一夸脱为 2 格罗申 4 分尼!从前痛饮一次要花两三倍的钱,现在只要花 15 银格罗申就可以整整一个星期喝得酩酊大醉,这样一来,连最没有钱的人每天都可以酗酒了。

这种空前便宜的烧酒价格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间不同,但是在各地几乎都是迅如闪电,它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年代末,低廉的烧酒价格突然遍及下莱茵的工业区。例如在贝尔格区,特别是在爱北斐特—巴门,许多工人都耽于酗酒。“醉汉们”一群一群地,手挽着手,拥塞街头,吵吵嚷嚷,自晚上 9 时起,从这家酒馆逛到那家酒馆,最后各自蹒跚回家。从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来看,从他们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来看,这是毫不奇怪的,特别是在幸福之乡的乌培河谷,那里六十年来一直是一种生产排挤着另一种生产,因此,一部分工人经常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根本无法糊口,而另一部分工人(当时的染色工人)却得到在当时说来较高的报酬。既然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乌培河谷的工人们只能在酒馆里的尘世烧酒和虔诚的教士那里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选择,那末无论尘世烧酒多么糟糕,他们还是偏要选择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烧酒是很糟糕的。它一冷凝,就不再继续进行净化,带着它所

^① 德国的旧液量单位,平均等于 150 升。——编者注

含的全部杂醇油分送各地，并立即被喝掉。用葡萄渣、甜菜、粮食或马铃薯酿造的一切酒类都含有这种杂醇油，即由高级醇（一种成分与普通醇类似、但含有更多碳和氧的液体）所构成的混合物（如伯丙醇，异丁醇，而首先是戊醇）。所有这些醇类比普通酒精（乙醇）更有害，前者能引起中毒的饮用量比后者小得多。不久以前，波恩的宾茨教授经过多次试验后证明，我国酒精饮料的发酵作用，正如人所共知的醉后不舒服或较严重的症候和中毒现象等不良后果一样，与其说应当归咎于普通酒精，即乙醇，不如说主要应当归咎于高级醇，即杂醇油。这些高级醇不仅有较大的发酵作用和有害作用，而且决定发酵的特性。每个人即使不是根据经验，而是根据亲自的观察也会知道，葡萄酒（甚至不同品种的葡萄酒）、啤酒或烧酒对大脑的沉醉作用是多么不同。饮料中的杂醇油越多，这种杂醇油的成分越有害，使人醉得就越厉害，越猛烈。大家知道，同其他烈性饮料相比，新酿造的、未净化过的马铃薯烧酒含的杂醇油最多，有害的成分最大。不言而喻，这种饮料如果饮得非常多，它对于贝尔格区那样易于激动、血气刚盛的居民所起的作用，也就会异常大。发酵的特性完全变了。以往每逢过节，最后总是喜气洋洋的，只是偶尔发生一些冲突，诚然这时也常常动起《Kneif》（刀子，英语是knife），现在每逢过节，人们就纵酒狂饮，结果总是发生殴斗，闹得非动刀子不可，因刀伤致死的事件越来越多了。教士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日益流行的无神论，法学家和其他庸夫俗子把这种现象归咎于酒馆里的狂饮。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突然泛滥的普鲁士劣等烧酒，这种烧酒产生了自然的生理作用，并将成百上千的穷人驱入暗牢。

廉价烧酒的这种剧烈作用持续了许多年，以后或多或少地逐

渐缓和了一些。然而它对风尚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烧酒比起以往来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需要，而烧酒的质量虽然有所改进，仍然比过去用粮食酿造的陈酒差很多。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同贝尔格区一样。庸夫俗子们对工人中间日益发展的纵酒狂饮的现象发出的怨言，从来没有像 1825—1835 年那样普遍、一致和公开。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北部工人们在 1830 年事件期间也没有激发起积极性，这种冷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否由于烧酒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支配着他们。一些重大的、特别顺利的起义只发生在葡萄酒产地或德国那些用关税多多少少保护了自己免受普鲁士烧酒危害的邦内。这并不是烧酒拯救普鲁士邦的唯一事例。

唯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的一个部门，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

当时，烧酒生产急速发展，日益扩大到东部地区，使德国东北部荒漠的沙地和沼泽地—摩尔根—摩尔根^①地种起了马铃薯。这一生产部门不以造福祖国为满足，还力图使旧普鲁士的美好的劣等烧酒行销国外。普通烧酒经过再一次加工，去掉其中一部分水分，人们把用这种办法取得的含水的、未净化的酒精叫做《Sprit》，这是从拉丁语 Spiritus 译成的普鲁士语。高级醇具有比乙醇更高的沸点。乙醇到了百分温度计的 78.5°就沸腾，而伯丙醇的沸点相当于 97°，异丁醇的沸点相当于 109°，戊醇的沸点相当于 132°。所以应当说，即使经过细心的蒸馏，至少大部分戊醇，即杂醇油的主要成分，以及部分异丁醇，仍然保留下来，蒸馏时所去掉的，最多只

^① 普鲁士的旧面积单位，约等于澜盪顷。——译者注

是戊醇和异丁醇的一部分和伯丙醇的大部分，而后者在杂醇油中的含量是很少的。然而就是科学的化学也不能用蒸馏法把上述三种低级醇分离出来，而杂醇油中的戊醇只能用酿酒业中不适用的分馏法才能脱去。加之农村烧酒企业中的蒸馏法相当简陋。因此，毫不奇怪，四十年代初生产的酒精还有大量杂醇油，根据气味很容易判断出来，因为纯粹的或只含水份的酒精几乎没有气味。

这种酒精主要是运往汉堡。以后又怎么样呢？一部分运往那些没有进口税挡路的国家；连施特廷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出口；然而在汉堡和不来梅，绝大部分酒精用来伪造糖酒。这种烧酒在西印度有一部分是用含糖份量多的甘蔗酿造的，而绝大部分是用制糖时剩下的残渣酿造的，由于它的成本低廉，作为群众的一种上好的饮料，是当时能与马铃薯烧酒相竞争的唯一酒类。为了制造“精美”而又廉价的糖酒，人们把大约一桶真正精美的牙买加糖酒、三四桶廉价而粗劣的勃比斯糖酒和两三桶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掺和在一起，这样混合或按类似的比例混合，一般说来是能造出所需要的酒的。这种“毒药”——我亲自听到过伪造这种糖酒的商人们把这种混合酒称为“毒药”——经过海路运往丹麦、瑞典、挪威和俄国；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又沿着易北河南运或经过施特廷运回原来出产上等酒精的地区，一部分在那里被当做糖酒喝掉，一部分则用走私的办法从那里运到奥地利和波兰。

汉堡的商人不限于伪造糖酒。他们以其秉赋的天才立即发现普鲁士马铃薯烧酒有着十分惊人的前途。他们竭尽全力试制其他各种饮料，于是到了三十年代末，在非普鲁士的德国北部稍微懂得一些葡萄酒门径的人，都不愿从汉堡买法国的白葡萄酒，因为谁都知道，这种酒在那里是用铅糖加甜的，因而具有毒性。不管怎样，马

铃薯酒精成了日益发展的伪造各种饮料的基础。继糖酒之后又出现了白兰地，这种酒需要比较精细地加工。不久，葡萄酒里开始掺了酒精，最后甚至根本不用葡萄酒，而只用酒精、水和植物汁（植物汁又常常用化学制剂来代替）制成波尔特温酒和西班牙葡萄酒……在许多国家里，这类做法或者是根本禁止，或者是违犯刑法的，因而人们不敢问津，这就更加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汉堡却是无限自由的贸易巢穴，“为造福汉堡”而伪造酒类的做法极其风行。

然而伪造酒类的垄断权没有持续多久。1848年革命以后，当法国的大金融家和一小撮知名的大工业家的绝对统治被整个资产阶级的短暂统治取代时，法国的工业家和商人开始懂得，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的酒桶里潜藏着异常神奇的力量。他们开始在本国伪造白兰地，而不再把真货运往国外；尤其是人们用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的烈性混合物改善了专供国内消费的白兰地（为了简便起见，我把用葡萄渣做的各种酒都叫做白兰地）。因此，在法国广泛消费的唯一酒类——白兰地大为便宜了。第二帝国庇护这类做法，自然是为了苦难大众的利益，结果到拿破仑王朝崩溃时，我们看到，在法国早先几乎没有酗酒现象，由于普鲁士陈烧酒的德行，现在这种现象大为流行了。

几年来葡萄的收成空前不好，1860年的通商条约又为法国打开向英国输出葡萄酒的门户，这对事业的新进展起了推动作用。歉收年份的淡葡萄酒，即使加糖也去不掉酸味，需要加上酒精来提高浓度。因此，人们将这种酒同普鲁士酒精混合起来。此外，英国人习惯于喝浓葡萄酒，现在大量出口的纯真的法国葡萄酒，对于英国人说来太淡而无味了。世界上能不能找到比普鲁士酒精更好的一

种东西，来使法国葡萄酒变得既浓又烈呢？波尔多日益成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的伪造中心（这类葡萄酒在该地变成“精美的波尔多酒”），同时也成为利用普鲁士酒精……的中心。

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自从法国红葡萄酒的消费（任何一个资产者都不愿喝别的酒）在英国、南北美洲和各殖民地达到十分巨大的规模以后，甚至法国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葡萄酒资源都显得不够用了。西班牙北部几乎全部合格的葡萄，其中包括埃布罗河谷地盛产葡萄的里奥哈的全部收成，都送到波尔多。热那亚、利伏诺和那不勒斯也把整船整船的葡萄酒运往那里。这些葡萄酒因掺有普鲁士酒精而能够经受海上运输，另一方面，葡萄酒的输出又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葡萄酒价格大大提高，从前广大劳动居民每天都可以喝的葡萄酒，现在对于他们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现在他们不喝葡萄酒而喝烧酒，这种烧酒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然而，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在帝国国会中抱怨说，在意大利这种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

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鲁士酒精。普鲁士酒精比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手伸得还无比远。在我们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种酒精首先是用来……伪造。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海上运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创伤²⁹一样，普鲁士酒精使工人阶级失去了葡萄酒而得到伪造的烧酒！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品。因此，社会主义最时髦的信徒以及复兴者欧根·杜林先生赞扬酿酒业“首先是……（工业）同农业活动的自然联系”，并郑重其事地宣称：

“酒精生产的意义如此巨大，与其说对它可能估计过高，不如说可能估计不足！”³⁰

不言而喻，anch'io son' pittore (正如科累卓说的，我也是写生画家³¹)，普鲁士语的意思就是：“我也是酿酒者。”

然而，普鲁士马铃薯烧酒的奇妙功绩还远不止于此。

冯·卡尔多尔夫先生说：“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 1000 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 3000 人。”

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所说的每平方英里有居民 1000 人是指的什么时候。过去大概有过这样的时期。但是，如果不算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省（那里酿酒业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起的作用不甚显著），也不算波兹南（尽管政府百般努力，波兹南的大部分仍然一心想留归波兰），那末我国有三个省，即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这三个省占的面积为 2415 平方英里。1817 年总人口为 3479825 人，即每平方英里 1441 人；1871 年总人口为 7432407 人，即每平方英里 3078 人。我们完全同意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的说法：居民的这种增长主要是酿酒业的直接结果或间接结果。如果我们这里也算上阿耳特马尔克、经营农业的下西里西亚北部以及主要是德属波兹南的那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也同样增加了），那末我们面前呈现的是真正的烧酒区，同时也是普鲁士君主制的核心。而这里呈现的完全是另一个前景。目前，酿酒业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的姿态出现的。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容克们就会灭亡；他们的一部分领地就会被土地大王所收买，成为俄国式的少数贵族，另一部分就会被分散，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级的基础。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核心就会是每平方英里只有 2000 人的地区，在资产阶级工业发展到足以在这方面取得

社会领导权也许还有政治领导权以前，这个地区将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起任何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酿酒业提供了另一个发展方向。在只能大量生产马铃薯和土容克而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土地上，酿酒业居然能够经受得住世界的竞争。从日益增长的需求（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的普鲁士，竟能达到全世界中心烧酒厂的地步。在现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并不意味着：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容克们寿命的又一种延长；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大量“基干团队”。从冯·德·哥尔茨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劳动群众的状况，他们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大都完全遭受地主的年契、实物租、住宅条件以及领地上的警察权力（新的专区法颁布后，这种权力只是改变了形式³²）的奴役。简单说来，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1815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在1848年镇压柏林革命，在1849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在1866年对奥地利作战，在1871年使整个小德意志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酿酒业。

二

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帝国国会。参加讨论的主要有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冯·德尔布吕克先生以及汉堡联盟的代表克品格尔。这次讨论使人觉得，我们对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所持的态度是十分不公正的。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鲁士酒精，而在于俄国酒精。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抱怨说，汉堡工业家将俄国烧酒（正如克吕格尔先生明确强调指出的，这种烧酒不是用马铃薯而是用粮食酿造的）加工成酒精，“冒充德国酒精分运各地，从而使普鲁士酒精的声誉受到损害”。人们向德尔布吕克先生指出，“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会遇到很大困难，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像用德国烧酒那样，用俄国烧酒制造出**没有气味的酒精**”，然而他对此预先说明：“先生们，当然，这一点我是无从知道的。”

总之，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鲁士马铃薯酒精，而在于俄国粮食酒精。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没有气味”，即不含杂醇油；而俄国粮食酒精又无法做得没有气味，可见它含有杂醇油，当它冒充普鲁士酒精出卖的时候，就使普鲁士酒精不含杂醇油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由此看来，我们是以欺骗手法和对帝国明显的敌意来诽谤普鲁士的“不含杂醇油的”酒精。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的确，用灼烧的木炭加工可以使烧酒脱去杂醇油。因此，近来出卖的酒精一般说来含的杂醇油较少。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两种酒精之间的差别在于：用粮食酿造的酒精可以毫不费力地完全脱

去杂醇油,用马铃薯酿造的酒精要脱去杂醇油则困难得多,而在大规模生产中实际上根本办不到,就是用马铃薯烧酒做的最纯净的酒精涂在手上也总会留下一股杂醇油气味。由此形成一个通例,药房里用的和做精良甜酒用的酒精,往往是或者至少应当是(因为这方面也有伪制品!)粮食酒精,而决不是马铃薯酒精。

“科伦日报”公布了上述有关烧酒的讨论,几天以后,又在新闻栏里(2月8日第一版)引述了莱茵区一位爱喝酒的人的一段很刺耳的怨言:

“最好能有办法发现精美的葡萄酒里面也掺有的马铃薯酒精。诚然,酒后令人讨厌的头痛可以证明含有这种酒精,但这已经太晚了。马铃薯酒精含有杂醇油,它那种难闻的气味被葡萄酒的特殊气味盖住了。这是最流行的一种伪造。”

最后,为了安慰旧普鲁士的酿酒者,克吕格尔先生公布了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实,即俄国粮食酒精在汉堡市场上比普鲁士马铃薯酒精贵4个马克。2月7日,后者的价格在汉堡每100升为35马克;因此,俄国酒精的价格比似乎被它破坏了声誉的普鲁士酒精贵12%!

了解了所有这些事实,请再看一看这种被诽谤的、“没有气味的”、唯恐自己的声望被破坏的、“不含杂醇油的”、高贵的普鲁士酒精,这种在批发贸易中每升只值35分尼(比啤酒还便宜)的酒精所蒙受的清白之冤吧!如果把讨论和事实对照一下,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里把谁当成傻瓜呢?

普鲁士杂醇油的良好影响是包罗甚广的,因为它同马铃薯酒精一起掺入各种饮料。从摩塞尔和莱茵区的味酸而淡的劣等葡萄酒(这种酒加上马铃薯糖和马铃薯酒精就能奇妙地变成勃劳恩别

尔葡萄酒和尼尔施坦葡萄酒),从格莱斯顿通商条约签订以来充斥英国并在那里被称为“格莱斯顿”的劣等红葡萄酒,到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所喝的沙托—拉斐特酒和香槟酒、波尔特温酒和马德腊酒,没有一种饮料不掺有普鲁士的杂醇油。凡是栽种葡萄以及仓库里存有大量葡萄酒的地方,这些饮料的生产就日益繁荣,那里的生产者就对马铃薯酒精高唱赞歌。可是消费者呢?消费者根据“令人讨厌的头痛”知道普鲁士劣等烧酒的功德何在,并竭力避免领教。正如冯·卡尔多尔夫所说的,在意大利,通商条约是这样实施的:对普鲁士酒精课以过高的关税。由于关税高,就不可能向比利时、美国、英国输出酒精了。在法国,海关官员在酒精桶上贴上红色签条,以表明这是普鲁士出品的,——法国海关官员确实第一次做了一件有益于公众的事情!一句话,事态的发展竟使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绝望地大声疾呼:

“先生们,如果你们想像一下德国酒精工业的状况,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各国都在战战兢兢地规避我国的酒精!”

当然罗!全世界都已逐渐知道这种酒精的良好影响,而摆脱“令人讨厌的头痛”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本不让这种劣等烧酒进口。

此外,来自东方的令人沉重而郁悒的阴霾正在侵袭受到排挤的烧酒容克们。在俄国的伟大盟友,即维护一切旧制度反对现时的破坏要求的最后堡垒和最后屏障,现在也开始生产和出口烧酒,恰恰是粮食烧酒,而且他们的售价同普鲁士容克们的马铃薯烧酒一样便宜。这种俄国烧酒的生产 and 出口逐年增加,如果说在此以前,俄国烧酒在汉堡被酿成酒精,那末现在,正如德尔布吕克先生告诉我们的,“在俄国的许多港口……目前已在建设几个装备有最优越的机器、对俄国烧酒进行加工的企业”,于是他向容克先生们

提出警告：俄国的竞争将一年比一年厉害。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要求政府坚决禁止俄国酒精在德国过境。

然而，冯·卡尔多尔夫先生作为自由保守派的议员，本应更正确地确定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俄国的立场。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被兼并，以及 50 亿空前浩大的军事赔款，使法国变成了德国任何一个敌人的必然同盟者，加以所奉行的政策又是希望人家尊重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害怕自己，而不是爱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二者取其一：或者是也把俄国迅速击溃，或者是……充当俄国外交的忠顺奴仆，保证与俄国结成同盟（既然可以指望它）。由于不能下决心采取前一种做法，结果势必采取后一种做法。普鲁士，随之还有整个帝国，又像 1815 年和 1850 年以后那样依附于俄国，而神圣同盟正像 1815 年以后一样，只是这种依附关系的掩饰物。这些荣耀体面的胜利的结果是，德国依然是欧洲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而俾斯麦竟表示惊讶，德国公众怎么还像过去那样，更多地注意国外（那里是真正的决策中心所在地）发生的事件，而更少地注意帝国政府（它在欧洲是无足轻重的）做的事情或帝国国会（它在德国是无足轻重的）里的演说呢！禁止俄国酒精过境！我倒想看看帝国首相会不会口袋里没有对俄国的宣战书就敢于这样做！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向帝国政府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时，可以认为，不仅饮酒，而且连做酒都使他神志不清了。要知道，连那些比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更有名的酿酒者最近也开始作出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根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的事情了。

不过，十分明显，俄国的竞争使我国烧酒容克们万分恐惧。在俄罗斯中部有大片广袤无垠的土地，那里可以像普鲁士得到马铃薯一样廉价地得到粮食。加之俄国的燃料大都比我国酿酒区的燃

料便宜。一切物质前提都具备。因此,如果俄国一部分贵族也像普鲁士容克们一样,把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农民赎免徭役的钱投资于酿酒企业,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有不断增加的市场,既然粮食烧酒在同等价格或稍高价格的情况下总是比马铃薯烧酒优越,这些酿酒企业已经迅速普及起来,目前就可以预见到,总有一天这些企业的产品会从市场上把普鲁士马铃薯酒精完全排挤出去,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里任何抱怨,任何叫喊都无济于事。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它的规律对容克们来说,也像对犹太人一样,是铁面无情的。由于俄国的竞争,神圣同盟崩溃的日子,光荣的普鲁士烧酒工业从世界市场上消失的日子,以及在最好的情况下劣等烧酒充斥国内市场的日子即将到来。当普鲁士容克们失去烧酒盔,只剩下世系纹章盔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只剩下军盔的时候,普鲁士的末日就来临了。即便撇开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不谈,撇开新战争或变革的可能性、或然性或必然性不谈,单是俄国烧酒的竞争就必然使普鲁士破产,因为这种竞争会摧毁使东部各省农业得以维持在目前发展水平的工业。而那样一来,这种竞争也就会摧毁易北河以东每平方英里有 3000 个农奴的容克们的生存条件;也就会摧毁普鲁士国家的基础——招募军官、军士和绝对服从命令的士兵的材料以及形成官僚基本核心的材料,使现时的普鲁士具有特殊性质的材料。随着酿酒业的衰落,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制度也将崩溃,而没有军国主义制度,普鲁士就等于零。那时,东部各省由于人口稀少,由于工业隶属于农业,由于半封建状态以及城市文化和普及教育不发达,在德国将占其应有的地位。那时,德意志帝国的其余地区由于摆脱了这种半中世纪式国家的压迫,而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并由于它们的工业发展和教育水平较高,也将占其应有的地位。而东

部各省将为自己选择较少依赖农业和较少容许封建生产方式的其
他工业部门,到那时,就会将自己的军队不交给普鲁士邦,而交给
社会民主派。整个世界将欢庆普鲁士的杂醇毒一劳永逸地最终消
灭。而普鲁士容克们和“最终溶化在德国里面的”普鲁士邦只好用
一位诗人的诗句来聊以自慰:

歌曲里不朽的一切,
生活中必然毁灭^①。

^① 席勒“希腊之神”。——编者注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
威廉·沃尔弗³³

弗·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6—11 月

载于 1876 年 7 月 1、8、22 和 29 日，9 月 30 日，10 月 7、14、21 和 28 日，11 月 4 和 25 日“新世界”杂志第 27、28、30、31、40、41、42、43、44、45 和 47 各期以及“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威廉·沃尔弗著，并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1886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世界”杂志，并根据“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校对过

弗·恩格斯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大约是 1846 年 4 月底的事情。当时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郊区，我们正好一起在写一本书³⁴，有人告诉我说，一位德国来的先生想同我们谈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但很健壮的人；他的面容说明他既善良而又沉着坚定；一付德国东部农民的样子，穿着一身德国东部小城市市民的衣服。这就是威廉·沃尔弗。他由于违反出版法而被追缉，幸而没有关进普鲁士的监狱。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交结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

—

威廉·沃尔弗于1809年6月21日诞生在西里西亚弗兰肯施坦附近的塔尔瑙。他的父亲是一个世袭依附农民，同时兼营一家“法院科尔奇马”（即小饭店，波兰语叫做科尔奇马——karczma，乡村法院在这里进行审判），即使这样，他还得和妻子儿女一起为老爷服徭役。所以，威廉从小就不仅知道东普鲁士农奴的悲苦命运，而且还有切身的体验。然而，他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威廉谈起他的母亲来，总是特别亲切，他的母亲受过比周围的人更高的教育。她激发和培养了威廉对封建主老爷无耻剥削和虐待农民的愤恨。这种愤恨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汹涌澎湃地激荡，这在接触到他终于能把这种愤恨公开表现出来的那一段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农民孩子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和好学的精神。得把他送进中学去念书才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多少障碍啊！经济上的困难就不用说了，还有老爷及其管事的阻拦，然而没有他们又是什么也办不了的。固然，世袭依附关系于1810年就在口头上废除了，可是封建的苛捐杂税、徭役、领主裁判所和领地上的警察权仍然照旧保留下来，而世袭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同这些一起继续存在。老爷和他的管事们宁肯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猪倌，也不愿让他们成为大学生。但是，一切障碍都克服了。沃尔弗进了施魏德尼茨的中学，后来又进了布勒斯劳的大学。在这两个学校的时候，他都不得不靠做私人教师来谋取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费。在大学的时

候，他特别喜爱古典语文课，但他决不是旧学派的那种读死书的语文学者。他对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诗人和散文作家有透彻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读物。

当联邦议会³⁵和奥地利、普鲁士的政府重新恢复在二十年代曾经沉寂下去的对蛊惑者³⁶的迫害时，沃尔弗快要大学毕业了。由于参加大学生协会，他在1834年被捕；有好多年，他从一个监狱被提到另一个监狱受审，最后判了罪。为什么判罪呢？我认为他任何时候都不认为值得谈这一点。不管怎样，他被关进了季尔别尔堡要塞。在那里，他遇见了难友们，其中有弗里茨·罗伊特。——沃尔弗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读到罗伊特的“狱中生活”一书。当他知道作者就是自己的老难友时，立即通过出版社³⁷给他写了一封信。罗伊特立即回了一封很亲切的长信。这封信现在摆在我面前，它证明，至少在1864年1月12日，这位老蛊惑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恭顺的表示悔过的罪人。

他写道：“我关在这里已经整整30年了，我的头发已经变白，然而我还是期待着终究会强有力地表现出人民意志的真正的革命，但是有什么用呢？……要是普鲁士人民至少能够拒绝纳税，那就好了，因为这是摆脱俾斯麦这伙人和气死老国王的唯一办法。”

在季尔别尔堡，沃尔弗同囚禁在要塞的蛊惑者们一起经受了无数的患难，也分享了小小的欢乐，这些在弗里茨·罗伊特的这本书中有非常生动和十分幽默的描写。在潮湿的囚室和严厉的寒冬中差可慰借的是，看守古老的拷问室的是所谓卫戍部队的一些年老的残废人，这些人并不那么严厉，看到烧酒或者几文酒钱常常就不能自持。1839年，沃尔弗终于因健康十分恶化而得到赦免。

他到了布勒斯劳，打算在那里靠教书维持生活。可是他作这种

打算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主人就是普鲁士政府。他的大学学业由于被捕而中断了，因此，他没有学完规定的三年课程，更没有参加考试。而在普鲁士中国，只有按照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的人，才能加入学者公会。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尔弗那样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精通业务的人，也只能被拒于公会之外，并被剥夺正式运用自己知识的权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做私人教师来维持生活。但是这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当沃尔弗去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要是普鲁士没有波兰人，这位蛊惑者就只好饿死，或者重返故乡去服徭役了。一个波兹南地主留他做家庭教师；他在这个地主家里度过了几年，每提起这几年，他总是感到特别满意。

回到布勒斯劳以后，经过长期的磨难，他终于得到极可尊敬的王国政府的许可做私人教师，现在，他至少可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了。这位朴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同时，他又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参加反对现存压迫的斗争。他不得不只限于公布官吏、庄园主和厂主们横行霸道的一些事实，可是，就是这样做，也常常遇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当时刚刚建立的处理书报检查案件的高等法庭里，再也没有比布勒斯劳的教师沃尔弗更顽固、更经常光临的主顾了。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愚弄书报检查机关。在多数书报检查官都很愚蠢的情况下，这样做对于稍微知道一点书报检查官的弱点的人，是并不那么困难的。例如，他在西里西亚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首流行的悔罪者的“歌词”，使得笃信宗教的人极为难堪。这首歌词是他在当时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的旧赞美诗集中发现的，歌词如下：

“我的确是一头畜生，
我真是一个卑贱的罪人。”

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稣呀，请您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给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蠢驴
扔到您那仁慈的天国。”

这首歌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德国，使得不信神的人捧腹大笑，“虔诚的人”^①恼怒异常。书报检查官受到严厉的申斥，而政府从此又警惕地注意私人教师沃尔弗，注意这个在要塞里监禁了五年也没有制服的不安分的狂妄分子。

要想再次找寻对他起诉的借口，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因为旧普鲁士的法律就像精心安排的一套陷阱、圈套和罗网，布满全国，这些东西，连忠顺的臣民也并不总是能够逃避，而不忠顺的人就更容易掉进去了。

1845年底或1846年初，给沃尔弗加上了违反出版法的罪名，但违法的情节十分轻微，所以现在谁也想不起这件案子的确切情况³⁸。然而迫害十分严重，以致对普鲁士的监狱和要塞感到厌倦的沃尔弗，躲避了被捕的危险而前往梅克伦堡^②。他在梅克伦堡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并且一直住到在汉堡安排好可以顺利前往伦敦为止。在伦敦，他第一次加入了社会团体，即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在那里没住多久，很快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了布鲁塞尔。

① 即虔诚主义者。——编者注

② 根据维尔穆特—施梯伯的著作（“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2册第141页）³⁹，沃尔弗于1846年因“违犯出版法”，被布勒斯劳高等地方法庭判处在要塞中监禁三个月。（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注）

二

在布鲁塞尔，他很快就在那里办的一个通讯社找到了工作，这个通讯社是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把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消息加以编辑后供给德国各报纸的。当“德意志—布鲁塞尔报”⁴⁰由我们党掌握的时候，沃尔弗也给这个报写稿。在我们当时创办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⁴¹里，沃尔弗很快就成了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做时事评论。这些评论每次都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对德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渺小和卑鄙，进行了特别强烈的抨击。这些政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评论，而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广场上。广场四周的许多啤酒店和烧酒店挤满了人。人们高喊：《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表面上十分平静，然而它却在外省征集预备兵和休假人员。它私下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王准备退位，若特兰要是愿意，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列奥波特国王说，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只是希望一切都能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望领到

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传开,使人们安静了下来,连起义也不打算举行了。可是,当后备队刚一调集起来,大部分军队刚一集结在布鲁塞尔周围(一个小国只要三四天就行了),国王退位的传说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拔出马刀,突然冲向聚集在集市广场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静静地走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厅,在那里又遭到狂怒和醉熏熏的市民近卫队的殴打。在被捕几天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他在巴黎没有住多久。柏林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筹备,促使他首先前往西里西亚,争取激进派分子在竞选中获胜。他想在我们一开始办报纸的时候,无论是在科伦办还是在柏林办,就从西里西亚到我们这里来。由于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还由于他的演说通俗而有力,因此,特别是在乡村选区,他使得那些没有他就毫无成功希望的激进派候选人当选了。

这时候,“新莱茵报”从6月1日起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编。不久,沃尔弗也来科伦担任编辑部里的职务。他那孜孜不倦的勤恳态度,他那一贯的过分认真的负责态度对他颇为不利,因为编辑部里尽是些年轻人,他们往往因此多给自己腾出个把钟头的空闲时间,相信“鲁普斯^①一定会设法使报纸出版的”。在这方面我也不是没有过错。因此,在报纸出版初期,沃尔弗多半忙于日常工作而很少写指导性论文。然而,他很快就找到办法,把这项工作也变成了独立的活动。在标题为“国内新闻”的时事纪要栏里,他收集了德意志各小邦的消息,并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绘了统治者和被统

^① 鲁普斯——是对威·沃尔弗的戏称(Wolf——狼,拉丁语——lupus)。——编者注

治者的那种闭塞、不开化的狭隘和庸俗。同时，他每星期都到民主协会⁴²去做时事评论，因而在这里，也很快就成了最受人爱戴和最有影响的演讲人之一。

资产阶级在巴黎六月战斗之后愈来愈愚蠢胆怯，使反动派得以重新聚集力量。在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等地的宫廷权奸同高贵的帝国摄政王^①狼狈为奸，幕后则是俄国外交在拉线，指挥这班傀儡们跳动。于是在1848年9月，这些老爷们行动的时刻刻到了。在俄国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下（这些压力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关怀），第一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的结果是在马尔摩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停战协定⁴³。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卑躬屈膝到如此地步，竟批准了这个协定，从而公开地、毫不含糊地背弃了革命。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就是对这一点的回答；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柏林发生了制宪协商议会⁴⁴同国王之间的冲突。8月9日，这个会议在极其温和的、甚至是怯懦的决议中，请求政府采取某种措施，使反动军官的无耻行为不再表现得那样公开和蛮横。9月，制宪协商议会要求执行这个决议，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任命以一个将军为首的公开反动的普富尔内阁（9月19日），而臭名远扬的弗兰格则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队总司令。这是两个极明显的暗示：柏林的协商派要不悔罪，就只有等着解散了。群众普遍愤激起来。科伦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并派定了安全委员会。政府决定在科伦进行第一次打击。因此，在9月25日的早晨，许多民主党人被捕，其中有现任科伦市长，即当时人人皆知的“红色贝克尔”。群情更加激愤。下午又在原来的集市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

① 约翰大公。——编者注

大会由沃尔弗主持，周围站着市民自卫团，他们并不敌视民主运动，而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市民自卫团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人民。突然，人们冲进市场，喊着：“普鲁士人来了！”当时约瑟夫·莫尔——他也是早晨被捕的，但人民把他救了出来——正好在发表演说，他喊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见了普鲁士人就四散逃跑吗？”人们回答说：“不！不！”——“那我们就必须筑起街垒！”于是大家立即动手。科伦街垒事件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整个运动是一场虚惊引起的，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武装（市民自卫团很谨慎小心地各自回家了），一点也没有流血，什么也没有发生就结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伦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解除武装，“新莱茵报”停刊，编辑们被迫出境。

三

科伦的戒严没有继续多久，10月4日就告解除。11日，“新莱茵报”又出版了。沃尔弗来到普法尔茨的杜尔克海姆，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他。同编辑部其他一些人一样，他也是因为谋叛等等的案件而被追缉。可是我们的沃尔弗在普法尔茨呆了不久就忍不住了，在葡萄收完以后，又突然来到下制帽坊街17号的编辑部。他就近找了一个住处，不用上街，穿过院子就可以到编辑部。但是，这种坐牢式的生活，他很快就厌倦了。几乎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就穿上长大衣、戴上长沿帽，借口买烟出去了。他以为别人认不出他，虽然他那很特别的矮壮身材和坚定的步子很引人注目。但是不管怎样，谁也没有出卖他。他这样地度过了几个月，而这时候，对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追缉，都一一取消了。最后，在1849年3月1日，有人通知我们说，一切危险都已过去，于是沃尔弗去找侦查员，侦查员也说，整个案件是根据警察局的夸大的报告提出的，已经完全取消了。

这时候，柏林议会在12月初被解散了，开始了曼托伊费尔反动时期。新政府的最初措施之一，是使东普鲁士的封建主对他们占有农民无偿劳动的这种有争议的权利感到放心。三月事件以后，东普鲁士农民到处停止服徭役，有些地区，甚至迫使老爷立下字据，放弃占有这种劳动的权利。所以，只要把这种实际情况用法律肯定下来，长期受盘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会成为自由人了。然而，

自从 1789 年 8 月 4 日法国国民议会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赋役以来,已经过了整整 59 年,而柏林议会仍然不敢采取同类步骤。赎免徭役的条件是松了一些。可是,规定无偿废除的只是一些最无耻、最令人愤懑的封建权利。而在这个法案没有最后通过之前,议会就被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先生声称,政府不接受这样的法案作为法律。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徭役农民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必须影响他们,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处境。而沃尔弗则是做这一工作的最适合的人。这不仅因为按出身来说,他是农奴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没有谁像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有一整套不同的封建奴役形式的地区^①。

^① 在 1886 年版中接下去是:“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中达到了顶峰,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正是这个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都不去保卫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 2 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 1848 年 6 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甚至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像往常一样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要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赢得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全线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慌叫声。”

所以,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

沃尔弗在 1848 年 12 月 19 日的报上写了一篇评论上述内阁声明的文章,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12 月 29 日又登了第二篇更激烈的文章,抨击钦定的“西里西亚地主和农民关系临时调节法令”。

沃尔弗说,这个法令

“是号召邦君、贵族、伯爵、男爵等老爷们在法律的掩护下赶紧对农村居民进行‘临时的’抢劫和掠夺,以便在这种油水多的年头之后,可以较容易地度过清苦的年头。在 3 月以前,西里西亚是庄园主老爷们的乐土。1821 年颁布的徭役豁免法,把封建容克们安排得如此地舒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豁免的规定和实行,无论何时何地都对享有特权的人有利而使农村居民破产,因而西里西亚的容克们从农民手里得到了至少 8000 万的现金、耕地和地租。而赎金的支付是没有止境的。由此产生了对可恶的 1848 年革命的愤恨。农民拒绝继续像驯服的牛马一样给自己的老爷当家奴,拒绝继续支付这种不堪忍受的代役租、利息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因此,地主的钱柜变得可怕地空虚”。

柏林议会担负起了调整这些关系的工作。

“拖延是危险的。这一点波茨坦的权奸懂得,他们也善于不惜用农民的血汗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什么议会不议会,去它的吧!我们觉得怎样有利,就怎样修改法律!——结果正是这样。在‘国家通报’上出现了一道有关西里西亚的法令,这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布满陷阱等等的圈套,农村居民只要一陷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

接着,沃尔弗指出,这个法令实质上是恢复了 3 月以前的状

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满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们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

这一章的结尾以及从第四章到第九章的“5 月 19 日,‘新莱茵报’……被封闭了。”这句话(见本卷第 99 页)为止的各章节(除第四章的两句结束语以外,见本卷第 78 页),在 1886 年版中被删去。——编者注

况,并且在最后这样写道:

“但是,这难道会有帮助吗?老爷们需要的是钱。冬天快到了,他们就要举行冬季舞会、化装舞会,还有那令人神往的赌博等等。娱乐用的钱过去一向是由农民提供的,今后还要由农民来提供。容克们想至少再组织一次愉快的狂欢节,并且尽可能地利用专制制度十一月的胜利。他们带着一种挑衅的心情赶紧跳舞作乐,是做得对的,因为贵族们的极美好的纵情狂饮,可能很快就被可怕的加里西亚场面⁴⁵所打断。”

1月20日刊登了沃尔弗针对同一目的而写的一篇新文章。反动派强迫在科尔贝克附近的涅辛的一个村长克伦格耳同一些短工一起联名询问国王陛下是否真的打算**分配土地,并把土地分给无地的人。**

沃尔弗说:“涅辛的短工们听到这种打算,吓得要命,连觉也睡不着,这是可想而知的。怎么,国王想分配土地吗?我们这些短工耕种我们老爷的土地那样兴高采烈,每天挣得5个银格罗申,而现在却要不再当短工,而去耕种归自己所有的土地吗?我们的老爷有八九十处领地,总共只有几十万摩尔根的土地,他们难道还要给我们几摩尔根的土地吗?不,我们的短工们一想到这种可怕的灾难,就全身发抖。只要他们还没有确信,实际上没有谁使他们遭受这种暗无天日的灾难,那些威胁着他们的几摩尔根的土地离他们还远得很,仍然为老爷所有,他们是片刻也不能安心的。”

四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初次交锋。1849年年初，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原先产生的提案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赞同。这个提案要求索回政府在1825年赠给流亡回国的贵族作为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失去的田产的补偿的那10亿法郎，并把这笔钱用来为劳动群众谋福利。3月16日，“新莱茵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论，第二天沃尔弗就写了“普鲁士的十亿”一文。

“骑士施纳普汉斯基^①（利希诺夫斯基）^②是死了。但在我国，强盗还多得很。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的容克同普鲁士的其他容克联合了起来。他们穿上了德行高尚的资产者的圣衣，自称为‘各阶级居民财产保护联盟’——当然，是指封建主的财产……他们的打算无非是，除了别的省以外，还要从莱茵省掠夺约2000万塔勒，来塞进自己的腰包。计划倒不坏。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冯·塔敦—特利格拉弗，容克冯·阿尔宁和冯·曼托伊费尔同几千个土容克一起用莱茵省的钱来偿付自己的债务，莱茵省的居民得到这些容克赐给的这种荣誉，应当感到特别荣幸。”

的确，有一个冯·毕洛夫—库梅洛夫老爷，当时被人叫做毕洛夫—库梅尔富尔^③，他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被上述的容克联

① 绰号“施纳普汉斯基”（《Schnapphanski》）是来自《Schnapphahn》一词，即“强盗”，“贪脏者”，“骗子”。——编者注

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③ 俏皮话：库梅洛夫（《Cummerow》）是姓，库梅尔富尔（《Kummervoll》）是“发愁的”。——编者注

盟，即沃尔弗所谓的“容克议会”通过了，并作为请愿书送给政府和议院——这是一个调整普鲁士土地税的计划。一方面，占有土地的农民、特别是西部各省的，抱怨他们缴纳的土地税**太重**；另一方面，东部各省的大地主贵族**根本不缴**土地税，虽然 1810 年 10 月 27 日颁布的法令已经规定他们要同所有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缴纳这种税。容克议会找到了一个消除这**两种**灾祸的办法。我们来听听沃尔弗是怎样说的。

“容克们想‘作出牺牲，以便消除目前普遍的不满’。他们是这样说的。谁会料到他们竟是如此地慷慨呢！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牺牲呢？他们建议用大致的估计硬性确定每块土地的收入，然后在全国规定同这种收入成正比的土地税。这种高尚行为并不怎么高尚，因为他们现在打算做的不过是 38 年来他们依照法律应该做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往下谈吧。他们要求过去一直在违法逃税的容克和贵族领地占有者……也许是补缴税款吧？——根本不是！由于他们从此开恩纳税，他们就应当得到‘**一笔相当的款子作为补偿**’，即要求得到相当于今后应纳税款 25 倍的数额，作为补偿。‘而那些过去一直被不公正地索取了过高的土地税的人所应该做的……不是收回多缴的款子，而相反地是，为了**赎回免缴更多税款**的权利’，必须一次付清 18 倍到 20 倍（根据不同情况）的税款。‘现在，东部各省的农民，而且除此之外，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就要缴纳更重的税了。这样一来，旧普鲁士农民和莱茵省居民现在还要为此付出一大笔钱。而东部各省贵族领地占有者至今却什么也没有缴纳，或者只缴纳了为数很少的土地税……因而，莱茵省居民和农民必须缴纳的钱，就该他们得到了。’”

接着他对 1848 年各省缴纳的土地税和土地面积做了概述，并由此得出结论：

“莱茵省平均每平方英里所缴纳的土地税比普鲁士、波兹南和波美拉尼亚约高 4 倍，比勃兰登堡高 3 倍。”

诚然，那里的土壤好一些，但是，

“按最低的计算，莱茵省现在要缴纳的土地税比按平均计算它所应该缴纳的，几乎多了100万塔勒。根据容克议会提出的法案，莱茵省居民却因此要受罚，再要缴纳1800—2200万塔勒的现金，装进东部各省容克的腰包！而国家在这里不过是充当银行家而已。这就是土贵族容克老爷们所准备付出的巨大牺牲，这就是他们对财产的保护。每个扒手都是这样保护财产的……”

莱茵省的居民，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同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农民一样，应该同时想一想：他们究竟到哪里去弄到钱来付给容克。现在要拿出1亿塔勒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当法国农民向贵族索取10亿法郎的时候，普鲁士的贵族却向农民索取5亿法郎！

万岁！柏林三月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对普鲁士容克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要给以更有力的回击。“新莱茵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进攻中得到了这种力量。于是沃尔弗从1849年3月22日起发表了一组文章，题为“**西里西亚的十亿**”，文中计算了，自从开始赎免徭役以来，光是西里西亚的贵族就从农民那里非法地得到了多少收入，即得到了多少现款、财物和地产。“新莱茵报”刊登过许多令人激愤的文章，而像3月22日和4月25日之间所发表的8篇文章那样受人欢迎的，为数并不多。在西里西亚和东部其他各省订报的份数迅速增加；人们要求买个个别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没有莱茵省法律作为例外加以保障的那种出版自由，在高贵的地方法下面，要重印又根本办不到，因此，决定在西里西亚秘密地把这8天的报纸全部翻印出来，版面尽可能接近原版，并散发几千份，——这样做，编辑部自然是最不会有异议的。

五

在 1849 年 3 月 22 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就是这样开始对西里西亚的容克进攻的：

“当宫廷容克和土容克的议院刚一组成（1849 年 2 月 26 日根据钦定的宪法和选举法召开），立即提出了一个有关调整即赎免封建赋役的草案。高贵的老爷们忙了起来。他们想在会议闭幕之前就向农村居民大肆敲诈一番，以便储存一笔巨款，留到艰难的日子使用，并在他们本人出国以前，就先把这笔款子汇到国外。

他们在柏林三月‘误会’及其直接后果发生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十分惊慌，无法形容地恐惧，因此，他们现在就竭力从心爱的农村臣民的腰包中索取他们所倍觉可爱的定心丸。

对于过去一直是封建贵族和工业贵族的金窖的**西里西亚**，特别应该再次好好掠夺一番，使西里西亚地主骑士的荣耀得到加强和巩固，今后能继续闪烁光芒。

去年 12 月钦定的暂行赎免法颁布之后，我们就立即指出^①，这个法令只是为庄园主老爷的利益着想的，而所谓小百姓，则在仲裁法庭成立的时候，就被交给有权势的人任意宰割了。尽管如此，高贵的骑士们还是对这个法令不满意。他们所要求的是一个对骑士们的腰包更为惬意的法令。

1848 年 3、4 月间，西里西亚的许多地位显赫的老爷向农民立下字据，写明放弃一切从前的农奴制的赋役。为了使自己的城堡免于焚毁，使自己本人不致成为城堡中某株菩提树或庭院里某棵杨树的特殊装饰品，于是他们大笔一挥就放弃了他们的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幸而纸上是谁怎么写都可以

^① 见“新世界”第 30 期[本卷第 74 页。——编者注]。

的。

后来，革命没有前进，反而陷入市侩行为和安然等待的泥潭，老爷们便把放弃权利的字据拿了出来，但不是为了履行，而是把它们提交给刑事法庭，在进行审讯时作为无知农民暴动的物证。”

沃尔弗在这里叙述了：官僚怎样在总督品德尔的领导下和在流动队的协助下强迫农民履行原先的赋役；农民怎样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柏林协商会议上；而协商派先生们不是首先去宣布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赋役，却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调查那些美妙的封建赋役的性质和起源等等上面，等到反动势力大大加强，它就在议会还没来得及通过任何废除封建赋役的决定以前，把整个议会解散了；后来又怎样赏赐了一个新的赎免法，但是连这个反动透顶的法令也没有使老爷们满意，他们现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可是骑士老爷们却不问问主人，就在那里随意摆布，而这个主人——

“西里西亚的农民，并不是有三四胡菲以上的土地的农民资产者，而是大批的小农、给地主种菜的和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以及‘住在老爷家中的人’，他们至今一直是大地占有主的真正的牛马；而且按照后者的计划，他们今后也还应该是牛马，虽然形式稍有不同。

在 1848 年，这些群众对于无偿废除封建重担本来会感到满意的……经过 1848 年最后几个月和 1849 年已过去的几个月的沉痛经验之后，这些所谓‘小百姓’的西里西亚农民，就愈来愈经常地重新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占有贵族领地的老爷们不应该用狡猾地想出来的赎免法使自己获得新的财富，而按道理，应该至少交出他们利用先前的赎免法大量掠夺去的那部分财富……现在在农村，人们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近三十年来，强盗骑士老爷们从农民那里窃去的钱究竟有多少。”

计算这个数目并不像法国那样简单，在法国，向全国榨取了

10 亿法郎即约 3 亿塔勒的巨款作为补偿，因此，“法国农民就知道，他们应该收回的是多少本息”。而在普鲁士，剥削是年复一年地进行的，至今只有各个农民自己知道，他和他的村庄付了多少钱。

“于是立即对全省作了统计，这才知道农村居民部分地以土地、部分地以现金和地租付给老爷们作为赎金的钱，在 8000 万塔勒以上。此外还要加上至今尚未获得解放的农民每年的赋役。最近三十年来这笔款至少也有 16000 万塔勒；加上上面那个数目，共约 24000 万塔勒。

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些数字的农民，看到了亮光。在这些亮光的照耀下，封建集团……惊慌起来了。封建主侵吞了从农民腰包里勒索来的 24000 万，‘我们的 24000 万我们一有可能就应该收回’，——这就是从此以后在西里西亚农民头脑里经常盘旋的念头，这就是已经在几千个农村里公开提出的要求。

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这个事实：既然一定要谈到对封建赋役的补偿，那末，农民遭到骑士的掠夺，也应该得到补偿，——这一信念就是‘收获’，它很快就会开花结果。这种信念是任何的钦赐诡计也排除不了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使这种信念实际实现，那时候，西里西亚的农民想必会制定出这样一个‘补偿法’：不仅使被夺去的一大笔款子，而且使‘通常的收入’都回到人民的腰包。”

容克老爷们是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这在 1849 年 3 月 25 日报上刊载的第二篇文章中得到了说明。

“这些强盗骑士的‘权利’是怎样得来的，不仅中世纪的每一页历史、而且直到最近时期的每一年，都最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这一点。后来，中世纪骑士的剑同法学家和官僚奸党的鹅毛笔杆就结合得再好也没有了。他们的‘权利’，即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是利用骗子的方法从暴力中制造出来的。拿上一世纪的例子来说吧。八十年代在西里西亚，根据贵族的要求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土地清册，也就是规定庄园主和农民双方的义务……由贵族和他们的代理人组成的委员会工作得很出色……是为了贵族的利益。然而地位

显赫的老爷们远远没有能够到处都建立所谓‘认可的’（农民承认了的）土地清册。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地方都不过是靠使用暴力或欺骗……在这些字据中，有的在开头坦白地提到，农民不愿画押（当时只有很少人会写字），所以一部分是用威胁，一部分是直接使用武力来强迫他们在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极为不利的字据上签字。根据这些‘正当获得的权利’，骑士老爷们在最近三十年间，在西里西亚把从农民等级的血汗里榨取来的 24000 万塔勒的巨款装进了自己祖传的钱柜。”

六

沃尔弗从贵族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转到叙述各种形式的间接剥削。在间接剥削方面，国家的协助起了主要的作用。

首先是**土地税**，在 1849 年，西里西亚还是按照 1749 年确定的土地清册征税。列在这个清册中的贵族土地的摩尔根数，一开始就被缩小了，而农民的则一开始就被夸大了。每一摩尔根草地或耕地的收入定为 1 塔勒，土地税则据此征收。森林和牧场是免税的。从那时起，贵族砍光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森林，耕种大面积的荒地。而税款却仍旧根据 1749 年的土地清册上耕地的摩尔根数缴纳！因此，在双方税额不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荒地开垦的农民就负担了极其沉重的税款，vulgo（简单地说），就是受骗了。不仅如此，

“很大一部分骑士，即**拥有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领地的**那一部分骑士，以自己是作为世袭陪臣贵族而‘正当获得的权利’为借口，至今**未缴分文的土地税**。

据我们计算，近三十年来，骑士老爷们单是土地税一项，少缴或根本没有缴纳的，就约有 4000 万塔勒（而这还是真正客气的计算），因此，加上直接从西里西亚农民的腰包里抢去的那 24000 万，总共就是 28000 万。”（1849 年 3 月 25 日“新莱茵报”）

接着谈到等级税。沃尔弗从一般农民当中随便挑出的一个西里西亚的农民，他

“有 8 摩尔根的中等土地，每年要向‘仁慈的’老爷缴纳大量的贡赋，每年

要给老爷提供繁重的徭役，每月还要缴纳 7 银格罗申 8 分尼的等级税，全年总计为 3 塔勒。同这个农民对比的，是占有极广阔的土地、占有森林和草地、铁工厂、锌矿和煤矿等等的老爷，例如，头号抱怨派⁴⁶、亲俄派、疯狂地仇视民主派的第二议院议员伦纳德伯爵。这个人每年有 24 万塔勒的收入。他每年缴纳最高等级税 144 塔勒。同拥有 8 摩尔根的农民相比，他每年本来至少应该缴纳 7000 塔勒的等级税，20 年就应该缴纳 14 万塔勒。这就是说，这 20 年他少缴了 137120 塔勒”。

沃尔弗把这位伦纳德伯爵缴纳的等级税同一个雇农和一个女园丁所缴纳的税款作了比较。这个雇农每年的工钱为 10 塔勒，纳税 0.5 塔勒，即他的纯收入的 5%，这个女仆每年工钱为 6 塔勒，也要缴纳 0.5 塔勒，即她的纯收入的 8 厘，作为等级税。因此，这二十年里，高贵的伯爵同雇农相比，少缴了 237210 塔勒的等级税，而同女雇农相比，甚至少缴了 397120 塔勒。

“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艾希霍恩—拉登堡以及基督教德意志的其他的一伙人的慈父般的意旨，国民学校应该只限于（请与 1848 年初以前的艾希霍恩圣旨相对照）教读、写和最基本的算术。因此，还是准许乡下人学算术四则的。但是，要教农民学这些算法、特别是教减法，也就是教怎样减和扣，这根本不需要国民学校。至少在西里西亚，上帝赐福的强盗骑士从农民身上和从农民周围减去了那么多的东西，使得农民现在一旦有了好机会，就能够很出色地对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运用这种减法。”

沃尔弗还举了西里西亚贵族在减扣方面的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熟荒地。

“凡是在上世纪农村业主（即农民）因战争、瘟疫、火灾和其他灾难而死亡了的地方，领主老爷马上就在那里出现，把灾区耕地的全部或部分当做‘熟荒地’而算成自己的领地。可是，土地税、房屋税以及其他的重担子，你们这些老爷们当然是避免承担的。这些税今后还是要由整个公社或者由新的占有者来支付，而新的占有者往往只得到原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八

分之一，但要在得到地契的同时，负担起原来的各种捐税和赋役。你们对公社草地和公社耕地也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上述原因使农村在不同程度上荒无人烟的时候，你们就是如此。这两种情况，你们都利用来使自己的领地尽量扩大。而公社和农民就应该毫不减轻地承担起公社的、学校的、教会的、区的以及其他的赋役，好像公社和农民没有受到丝毫损失似的……我们也要用你们量我们的尺子来量你们——农民一定会这样回答你们的。

你们由于疯狂地渴求补偿而花了眼，碰上了人民要求补偿的真正的黄蜂窝。如果这些被激怒到了极点的黄蜂有朝一日飞了出来，那末，除了一定的补偿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损害^①会很容易地落到你们头上！”（3月27日“新莱茵报”）

沃尔弗在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3月29日）中描述了封建赋役的赎免程序。全省的这项工作由著名的总委员会领导，王国的地方专员和他们的助手、王国的土地丈量员和登记员都归这些委员会管辖。当庄园主或农民提出的赎免封建赋役的申请书刚一到达，这些官员就立即在乡村出现，而老爷们马上就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城堡里来，慷慨地款待他们和对他们做工作。

“做工作往往是早就进行的了。由于骑士老爷们在用香槟酒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是不会吝惜香槟酒的，所以，领主们的殷勤努力大都是有成效的。”

是的，间或也会遇到廉洁的官员，但是非常罕见，而且这对农民也没有什么帮助。

“即使地方专员严格遵守法律字句，然而只要是，比如说，领地占有者或其代理人把土地丈量员拉过去了，那也对农民没有什么好处。当地方专员、土地丈量员和领主老爷像通常那样亲密无间，农民就更加倒霉，而骑士们则可以称心如意了。

① 俏皮话：《Entschädigung》——“补偿”；《Beschädigung》——“损害”。——编者注

王国专员带着旧普鲁士官场善于为自己成员包揽的一切大权，出现在被召集在法院科尔奇马的农民中间。他正确地提醒农民说，他是‘以国王的名义’到这里来同他们交涉的。

‘以国王的名义!’农民一听到这句话，眼前立刻出现了各种阴森森的面孔：宪兵、执行官、领主的法官、县长等等。要知道，正是他们压迫他，榨取他的全部脂膏，而一直都是‘以国王的名义!’以国王的名义!这句话他听起来就是棍子或监狱，就是赋税、什一税、徭役和特别捐。要知道，这一切他也是为了国王的名义而不得不支付的。如果专员的这样一段开场白不大有效，如果公社或个别农民在某一点上坚持不同意地主和专员的计划，这个专员就变成奥林帕斯山的雷公，对这群受惊的农民来一千次神圣的诅咒，然后又比较温和地补充说：要是你们再这样愚蠢地拖下去，那就记住我的话：你们还得为此大大破费!对农民的钱包来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暗示，多半都解决了问题：现在很容易使赋役和义务适合庄园主的愿望了。”

接着就着手丈量土地，这时候，被收买的土地丈量员就为了庄园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为了估计收入、评定土质等等，请了区长来作鉴定人，而这些人所做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有利于庄园主的。办妥了这一切并在除去作为废除封建赋役的补偿而划归老爷的那部分土地以后，最后确定了留给农民的土地的摩尔根数，于是，骑士老爷们就和地方专员一起，在只要能办得到的地方，就竭力把小百姓的耕地换到最坏的地方。好地并入老爷的土地，而老爷们的那部分在多雨的年头常常涝的耕地则换给了农民。此外，土地丈量员还在最后丈量的时候就把农民的一部分耕地窃去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无力自卫的：谁要提出诉讼，谁就照例会因此而破产，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事情最后是，由总委员会起草和签署一切契约或证书，以及……计算费用的总数，而农民的真正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些计算除了用厚颜无耻这几个字以外，没有别的词可以说明。农民可以提出抗议，可以捶胸顿足，但一切都是枉然。他的钱包的情况如何，别人是根本不考虑的：国库先拿走了自己的那部分印花税，剩下的作为总委员会、地方专员等的薪俸。这帮官僚都过着阔绰作乐的生活。当了地方专员的穷小子，利用强盗骑士们的胡作非为，很快也一跃而进入贵族领地占有者之列。至于在总委员会里，事情的决定权操纵在贵族手里，就不用多说了。否则，骑士老爷们的事情是不会如此美妙的。”

按照旧普鲁士的好习惯，这些总委员会的一切开支账目是从来不公布的，因此，人民甚至还不知道，1848年以前实行的封建赋役赎免，究竟使他们花了多少钱。但是，每个公社和每个农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们是怎样“破费”的。

“例如，有一个小村庄，全村农民共有不到30摩尔根的土地，却不得不付出约137塔勒，作为契约费；在另一个村庄，一个拥有7摩尔根耕地的土地占有者，要付出不下29塔勒的费用……给强盗骑士们的补偿原来是这么一道精美的菜，这道加上了一些基督教德意志调料的菜，今后还会端到地位显赫的高贵的老爷们的餐桌上来。味谓可真不错！——西里西亚的强盗骑士们一面这样说，一面微笑地摸摸自己的胡须，嘴里啧啧地品味，就像土容克惯常做的那样。”

这是沃尔弗在27年以前写的，描写的事件发生在1820—1848年，但是现在读起来，觉得这是在描写1861年以后俄国的农奴是怎样变成所谓自由农民的。相似极了。两种情况都是处处为了老爷们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同样的欺骗。俄国的赎买在一切官方的和自由派的论述中，被描绘成是对农民的莫大恩赐，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与此相同，官方的和民族主义的奴颜婢膝的历史也把旧普鲁士对农民的敲诈勒索描绘成有世界意义的解放事件，连原来作为这一切赎免的原因的法国大革命，在它面前也要退居次要地位！

七

西里西亚贵族的罪恶还是没有列举完呢。沃尔弗在4月5日的“新莱茵报”上叙述了：普鲁士实行手工业自由怎样给强盗骑士们提供了掠夺农村居民的新的机会。

“在有行会约束的时候，农村手工业者或业主为了自己的手工业或作坊，每年向庄园主老爷缴纳通常都很高的税款。但同时，他享有这样的特权：庄园主不准别人从事手工业，以保护他不受竞争，此外，庄园主还得给他工作做。特别是磨坊主、酿酒厂老板、肉商、铁匠、面包师、小酒店老板或客栈老板、小贩等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实行手工业自由的时候，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者的保护就不存在了，他们到处都遇到竞争者。尽管这样，庄园主还是继续征收原来的捐税，借口说这不是同手工业有关，而是同土地有关；而法院也偏袒贵族的利益，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承认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不仅如此。老爷们自己也逐渐办起水力磨坊和风力磨坊，以后还办起蒸汽磨坊，因而自己对先前拥有特权的磨坊主造成了不可抗拒的竞争；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若无其事地迫使他继续为从前的专营权照旧纳税，他们借口说，这收的是地租，或者是庄园主在修排水沟等方面做了某些细微的改良所应得的补偿费。沃尔弗举了一个有两盘磨的水力磨坊为例，这个磨坊没有任何耕地，可是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40塔勒，而庄园主还开了一个磨坊同它竞争，因而，那个磨坊的磨坊主一个接着一个都破产了。

这对庄园主就更好了，因为这时磨坊主就不得不出卖磨坊，而在每次易主时，老爷都要从出售额中获得 10% 的过户税 [Laudemien]！—— 风力磨坊也完全一样，它只拥有它所在的那一块地，而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 53 塔勒。铁匠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得不缴纳或赎免先前的专营税，尽管不仅专营本身已经取消，而且就是这个征税的庄园主也有了自己的打铁坊，像同其他的手工业者和业主竞争那样，同他们竞争；尽管这样，这种税仍然是通过赎免才取消，或者就是继续支付下去，可是庄园主的相应的义务，即保护不受竞争的义务，早就不履行了。

到目前为止，只是考察了封建贵族对有产的农村居民，包括有两胡菲以上土地的农民、直到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自由村民和有房无地的放牧者 [Auenhäusler] 等等所采取的各种剥削形式；所有这些人不管叫做什么，他们至少有一所小茅屋，而且多半都有一个小菜园。剩下的是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他们没有为老爷服务，既没有一所小屋子也没有一寸土地。

“这就是那个房客 [Inlieger]、住户 [Zuhauseinwohner] 的阶级，一句话，就是**孤身无家的人** [Inwohner] 的阶级，他们一年支付 4—8 塔勒向农民、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租一间多半是狗窝似的小屋。这些人有的是出让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 [Auszügler]，即把田产转交给亲属或者出卖给别人，自己留下一份‘养老地’ [Ausgedinge]，或者一点不留、隐居到那里的小茅屋里的人；而大多数是贫苦的短工、农村手工业者、织布工、矿工等等。”

怎么对付他们呢？领主审判权应该为此提供借口，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制度，只是现在由于通过了专区法才予以废除，这种制度给予庄园主以审讯自己从前的臣民的权利。在这种审判权制度下，老爷把自己的某个被告监禁后，应该负担其生活费和侦讯费。而这

个老爷则得到领主裁判所收入的一切捐税。如果被捕的是农民，则老爷仍然向他收这些费用，使他在迫不得已时出卖房屋和田产。有些被捕者没有任何财产，庄园主为了补偿为他们花去的费用，每年向这个阶级中归他审判的一切人征收**保护金**，美其名曰“司法管辖费”。

沃尔弗说道（4月12日“新莱茵报”）：“在老爷们当中，有些人一年收1塔勒就满意了，另一些人征收1.5塔勒，而还有一些人则蛮横无礼到要求这部分农村无产阶级一年付2塔勒。拿农村工人的这些血汗钱在首都和休养地大吃大喝，嫖赌作乐，那就更惬意了。

在怎样也榨取不出现金的地方，老爷或他的管事把保护金变成了6、10、12个无偿的服役日（房客必须无偿地为老爷做满这些日子的工）。最好付现钱！如果房客付不起，那通常就是派执行吏去找他，拿走他最后的几件破衣烂衫，最后的一张床、桌子和椅子。只有少数的老爷没有采取这种野蛮手段，没有要求收保护金，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地攫取的权利，而只是出于他们自己传统的温和态度，不愿意行使这种所谓的权利。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房客年复一年地遭到无耻的掠夺，而肥了庄园主的腰包。例如，一个贫穷的织布工，一方面受厂主的剥削，另一方面，每天赚3—4银格罗申的工资，除去向国家缴纳**漉漉**的等级税，除去缴纳学校的、教会的、公社的各种费以外，还得向老爷缴纳1—2塔勒的保护金，这些钱真该叫做血汗钱。矿工和其他一切无地的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房客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当他为贫困、穷苦和残酷手段弄到偷窃或犯了别的罪而不得不服刑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去进监牢或感化院：他和他所属的那个房客阶级早就把相当于监狱费一百倍的钱装进了庄园主的腰包……一个房客缴了30年保护金（以平均每年1**漉漉**计算）而**没有**坐过监牢，那就是向庄园主的腰包缴了40塔勒的现款，单利和复利还不算在内。老爷就用这笔款子去支付向地方自治机关（贵族领地占有者的信用组织）借的1000多塔勒资本的利息。

这些强盗老爷借保护金之名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有利的财源，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农村里，房客和房主一样多，而且往往比房主还要

多。记得有一个最小的强盗骑士，拥有 3 块领地，每年向住在他的 3 个村里的房客榨取 240 塔勒的保护金，而用这笔钱支付地方自治机关的 6000 塔勒资本（以他的领地作抵押借的）的利息……

天真的人在看了这一切以后，也许会想，骑士老爷事实上不是已经从他们的由于预收而装得满满的腰包里“支付了一些诉讼费吗？这种天真的想法简直是在污辱骑士的投机行为。我们都知道二十年代和晚一些时候的许多情况，当时骑士的蛮横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仅向房客征收保护金，而且还迫使自己钟爱的农村臣民支付当时用的诉讼费和监狱费，有时付漉漉有时漉漉而在某些村里甚至达潞潞

八

在4月14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转而论述**狩猎权**，这种权利在1848年已经无偿地废除了；容克老爷们当时大叫大嚷要求把它恢复或者用“补偿损失”的办法来赎买。

“由于**野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打死一个贱骨头农民比打死一只兔子、一只沙鸡或者这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物还要简单。打猎的时候带上从钟爱的农村臣民中挑选出来的驱兽者，并不怎么感到难为情；如果某个驱兽者被打伤了或者被一枪打死了，那末，至多进行一下调查就完了。除此以外，我们知道这个光辉灿烂的封建时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就是高贵的骑士为了获得真正骑士的快乐，把霰弹打进某个驱兽者的脚里或屁股里。骑士老爷们除了真正打猎以外，还狂热地爱好这样取乐。关于这一点，我们始终记得有这么一位男爵老爷，他看见一个妇女不顾他的禁止，在老爷的已经收过的耕地里拾麦穗，就朝她的大腿上打了一枪，后来在那一伙上流的强盗骑士们的餐桌上，他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得意心情叙述自己的英雄业绩……然而，钟爱的农村臣民却有幸在老爷进行大规模打猎时履行驱兽者的职责。每一个业主，即每一个耕地占有者和每一个租房屋住的人都接到一道命令：‘明天拂晓’派一个驱兽者出去多少多少天，帮助老爷进行大规模的打猎。在10月和11月寒冷潮湿的日子里，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往往是光着脚、饿着肚子的农村居民，在骑士老爷旁边急急地跑着的时候，骑士老爷想必乐得心都跳了。猎袋上挂着一条教训猎狗和驱兽者的鞭子。而鞭子挨得最多的是驱兽者……

有一些骑士繁殖了大量的野鸡……妇女或者女仆由于不小心或者不灵敏，在割草时太接近野鸡窝而惊动了母鸡，那就要倒霉了……我们自己在童年时，曾亲眼见过一个农妇因为犯了这种罪过，被一个年轻的强盗骑士最残酷、最野蛮地凌辱而弄残废了，可是这件事谁也没有哨声。他们都是些穷人，

要进行控告,即提出诉讼,是需要钱的,而且还要对法庭有点信任,——但在大多数西里西亚农民中是少有的或者根本就没有。

农民虽然愤怒得咬牙切齿,也只好眼看着骑士老爷带上自己的猎手或者不带猎手,或者只有猎手,践踏和毁坏他用血汗灌溉的田地,眼看着他们毫不怜惜任何的幼苗,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密的还是稀的。他们带了自己的猎手和猎狗在田地里纵横奔驰。如果农民敢于反对,那末,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答之以轻蔑的一笑;最坏的情况怎样呢,——农民经常在身体遭到毒打时体验到了。上帝赐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兔子吃掉了农民菜园里的白菜,而农民种树是为了兔子能在冬季充饥……但是所有这种祸害同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培育的贵重野兽和非贵重野兽……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较起来,那真是微不足道的。野猪、鹿和驼鹿常常在一夜之间就把农民这些‘小百姓’全年要靠它吃、靠它缴纳各种捐税的庄稼拱掉、吞食、踩坏。不错,受害者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个别的人和整个公社都曾经试图这样做。凡是根据亲身经验对旧普鲁士的官僚、法官和诉讼程序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想像得出这些诉讼案的结果……在经过了无穷的函件和传讯以后,如果命运垂青,几年以后,这个农民收到一份宣判贵族官司打输了的判决书,但是在好好地研究了这种判决和全盘地计算了以后,他发现是受了更大的欺骗……三十年来,耕地遭到野猪、鹿和驼鹿一年比一年厉害地肆意糟蹋的村庄,在1000个以上。我们知道有许多决不算大的村庄,单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野兽年复一年地使它们遭受的损失就达200—300塔勒。”

既然现在贵族要求对这种打猎权的取消进行补偿,沃尔弗就反过来提出了另一种要求:

“野兽造成的全部损失,上帝赐福的驼鹿、鹿、野猪以及骑士老爷自己30年来使我们的田地遭受的一切毁坏,必须全部赔偿;说一个整数,这就是:至少赔偿2000万塔勒!”

这组文章的结尾(载1849年4月25日“新莱茵报”)是一篇谈这个省的波兰部分,即上西里西亚的文章,上西里西亚在1847年秋遭到了非常可怕的饥荒,正像那次使爱尔兰变得荒无人烟的饥

荒一样。上西里西亚也和爱尔兰一样，突然发生了斑疹伤寒传染病，像鼠疫一样到处流传。第二年冬天，它又在这里爆发，虽然既没有歉收，没有遭水淹，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灾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沃尔弗回答道：

“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土地占有主、国库（国家）和死手^①手里。只有五分二分的土地在农民手里，而庄园主的徭役、捐税以及国家、教会、学校、区和公社的税收都最不可思议地和最无耻地重重压在这些土地上，而和农民相比，老爷向国家缴纳的最多也不过是一点区区小数……到了交租的日子，如果农民不想自愿地缴租，那就靠皮鞭去向农民收租。资本和信贷的缺少、强盗骑士、国家和教会的捐税和赋役的繁多，逼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的魔掌，在他的桎梏下无力地挣扎、死去。

在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及其强盗骑士侮辱和奴役上西里西亚农民的长时期内，农民把烧酒看做是他唯一的慰借和支持，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食物。必须给老爷以应有的赞扬：他们把这种物品从自己的酿酒厂里拿出来，愈来愈便宜地、极其充分地供应给农民……在波兰农民的土房子里，斑疹伤寒已成了常客，人已失去人的样子，而同这些房子列在一起的上西里西亚的豪绅显贵们的富丽堂皇的宫廷、城堡和其他产业就显得更加瑰丽了……一方面是财富不可思议地迅速的积累，‘老爷们’每年的巨额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日益贫困。

农村工人的工资极其低微：男人 5—6 银格罗申、妇女 2.5—3 银格罗申就应当算是高工资了。贫困逼得许多人不得不为 4 个、2 个甚至更少的银格罗申而工作。食物几乎只是马铃薯和烧酒。如果工人哪怕就只有这两种食物，但只要数量足够，那末，上西里西亚也至少能避免饿死和斑疹伤寒。但是，由于马铃薯遭到病害，这种主要的食品愈来愈贵，得到它也愈来愈困难，而工资不仅没有提高，甚至还降低了，——人们都去吃他们在田野和森林里采集的野草，吃杂草和树根，用偷来的干草煮汤喝，吃兽尸。他们愈来愈没有气力。烧酒贵了，而且……比以前更坏了。所谓‘小酒馆老板’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为

① 即僧侣。——编者注

了获得向老百姓卖酒的权利，向老爷缴纳大量租金。为了增加烧酒的度数，小酒馆老板从前就已经习惯于在掺了适量水的烧酒里加进各种混合物，**矾油**在这里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有毒的混合物传播得一年比一年广，随着马铃薯的遭到病害而达到极点。农民的胃被干草和杂草做的汤、被生树根弄得很弱，已经不能消化这种药剂。如果再注意一下坏的衣着，肮脏而有害健康的住房，冬天的寒冷，不是没有工做、就是没有力气做工，——那就不难设想，这些挨饿的生活条件使得伤寒非常迅速地传播，就像在爱尔兰一样。‘人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这就说明了一切。国家和强盗骑士不断地剥削他们，榨取了他们的全部脂膏，以致他们的贫困状况稍有恶化就必定造成死亡……强盗骑士、官僚阶级和上帝赐福的普鲁士王国的整个当权集团，办妥了事情，得到了薪俸，分享了奖赏，而下面受饥饿和伤寒折磨的老百姓却开始成百成百地像牲口一样死去，而且不断地死去。

业主，即有房子，而且还多少有一点土地的人的情况也并不比短工好。他们的主要食物也是马铃薯和烧酒。为了向庄园主、国家等等缴纳赋税，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生产的东……而且还不得不履行家奴的义务（为老爷），在那里忍受老爷或他的管事的野蛮的鞭笞；一面干活、挨饿、挨打，而一面看到和忍受强盗骑士的奢侈和骄横、官僚阶级的呵叱，——这就是大部分波兰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命运……

老爷的家奴、雇农和女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从必须服劳役的农村居民和所谓的雇工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鞭子在这里也是骑士福音的全部……

强盗骑士为所欲为。任命他们中间的人当县长；他们执行领地的和地区的警察的职务，整个官僚制度都是为他们而工作。而且，波兰的农民遇到的并不是德意志的官吏（这也许是太仁慈了），而是旧普鲁士的官吏及其普鲁士的语言和地方法。忍受着各方面的剥削、侮辱、嘲笑、毒打和被戴上镣铐的上西里西亚农民，最终必然会达到他们现在已经达到的境地。饿死和鼠疫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在这种真正基督教德意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最后果实。谁还有能力偷的就偷。这是爱尔兰型的上西里西亚真正表示自己对基督教德意志强盗骑士的反抗的唯一形式。下一步就是求乞；瘦弱不堪的人们成群地从这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再下一步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既没有力气和能力去偷窃，也没有力气和能力去请求施舍的人。瘟疫的死神特别喜欢拜访他们的

烂草铺的床。这就是百年来上帝赐福的君主政体同强盗骑士和官僚一起进行的活动的结果。”

和先前一样，沃尔弗要求骑士对农民赔偿，要求无偿地废除一切徭役和货币租税，最后要求分上西里西亚豪绅显贵们的大地产。只要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还存在，这当然办不到，因而，“上西里西亚的居民也将和过去一样，大批地死于饥饿和斑疹伤寒”，而这也的确是如此，直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巨大高涨才使得这个地区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才愈来愈多地使文明的、但是更沉重的现代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粗暴的封建剥削。

九

我们有意从“西里西亚的十亿”中摘录大量的引文，这不仅是因为它最清楚地表现了沃尔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这里正确地描述了 1848 年以前除了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梅克伦堡、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小邦以及整个奥地利的农村的情况。在已经实行了赎免的地方，农民还是没有分得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半数和甚至三分之二（看在什么地方）的农村居民来说，对庄园主的封建赋役还继续存在，并且，只要 1848 年的风暴和在这以后的时期的工业发展没有或多或少地切实把这些中世纪的残余也消灭以前，是很少有希望加快赎免的速度的。我们所以说“或多或少”，是因为在梅克伦堡，封建主义还是毫不减弱地存在着，同时在北德意志的其他落后地区，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还没有实行赎免的地方。1849 年，在普鲁士无偿地废除了保护金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封建捐税；其他的赋役废除得比先前迅速，因为贵族经过 1848 年的教训，再加上愈来愈难于从固执的农民那里得到会带来利益的劳动，现在自己也坚持要赎免。最后，随着专区法的实行，庄园主的领主审判权也就终结，从而普鲁士至少是在形式上消灭了封建主义。

但仅仅是在形式上而已。在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方，仍保存着大土地占有主的半封建统治地位，甚至在其他一切经济中存在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种统治地位的

形式改变罢了。在爱尔兰,是另一种形式,那里是小租佃者耕种土地,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又是一种形式,那里拥有资本的租佃者雇佣工人耕种大片的租地。在北德意志,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占优势的贵族经济,也是属于这后一种形式。大田庄很少用大租佃者的资金,而大部分是用占有者的资金,利用家奴和短工来经营。家奴的地位是由1810年普鲁士颁布的奴仆规约规定的。这个规约对封建关系适应得如此地好,公开允许老爷对奴仆采取“不重的暴力行为”,然而却公开禁止奴仆对老爷的虐待(除了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情况以外)进行任何的暴力反抗,违者处以刑罚(“奴仆总规约”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短工部分地是通过契约、部分地是通过盛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住房也包括在内)实际上处在对庄园主依附的地位,这种依附丝毫也不下于奴仆对庄园主的依附;像沃尔弗描述的西里西亚的那种对农村工人和家奴的宗法式的态度,打嘴巴、棒打鞭抽,至今仍然盛行于易北河以东。可惜,普通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愈来愈强烈,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表现出不愿再继续领受这种慈父般的感化。

由于德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那里的居民群众靠农业生活,住在农村,所以工人党的最重要的、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状况。为此要作的第一步,是亲自去研究农村工人的这些利益和状况。党内的同志们,在情况许可这样做的条件下,如果把沃尔弗的描述同现在的情况进行比较,考虑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描述农村工人现在的状况,那末,对事业是会大有帮助的。除了真正的雇农以外,小农也同样不应该忽视。1848年以后封建赋役赎免的情况怎样?现在农民是否也像过去一样地受骗?读了“西里西亚的十亿”以后,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

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严肃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党的刊物上公布收集到的材料，这对工人事业来说，比刊登无论多少谈论未来社会组织的详细情节的文章，更加有帮助。

沃尔弗的文章的结尾还使人想到另一个问题。1849年以后，上西里西亚成了德国工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种工业，和整个西里西亚的工业一样，主要是在农村，在大的乡村或新兴的城市，远离大城市中心。如果任务是要在农村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末，西里西亚，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就是最合适的据点。但是，至少上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来说，看来还仍然是一块处女地。语言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已经很习惯于用德语，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说波兰话。

现在再来谈我们的沃尔弗。5月19日，“新莱茵报”在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号以后被封闭了。除了还没有结束的23件关于出版的案子以外，普鲁士警察局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理由来控告每一个编辑，以致他们全体都立刻离开了科伦和普鲁士。我们大多数人到了法兰克福，那里看来正在准备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匈牙利人的胜利引起了俄国军队的入侵；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在帝国宪法问题上的冲突，在各地引起了起义，其中德勒斯顿、伊塞隆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还在继续发展。沃尔弗的衣袋里装着一张布勒斯劳的旧委任状，委任他接替臭名昭彰的历史伪造者施滕策尔；人们仅仅是在接受“煽动者”⁴⁷沃尔弗作为接替人的条件下，才把“抱怨派”施滕策尔弄进议会的。施滕策尔也和所有善良的普鲁士人一样，当然服从普鲁士政府从法兰克福把他召回的命令。沃尔弗接替了他的位置。

法兰克福议会由于自己的迟钝和愚蠢而失去了在德国曾一度成为最强有力的议会的地位，而落到了极端软弱无力的境地，这种软弱无力在这时候，各邦政府、甚至连它自己任命的帝国政府以及它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它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集结了自己武装力量的政府和要求帝国宪法的起义人民之间。只要议会和南德意志运动的领袖有勇气和决心，一切都还可以挽救。只要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法兰克福保护议会，那就行了。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就会立刻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那就有把握期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军队参加运动，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参加运动；中德意志的小邦也就会卷入事件；普鲁士就会自顾不暇，而俄国面对着德国这样强大的运动，也会不得不把后来在匈牙利顺利地活动的军队调一部分回波兰。这样一来，匈牙利就有可能在法兰克福得救，另一方面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面临着德国胜利地发展的革命，在巴黎天天期待的爆发，结果就不会像 1849 年 6 月 13 日那样，是激进派市侩不战而败。

时机是极其有利的。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进行保卫的建议，是我们大家^①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要军队甚至不经号召就开进法兰克福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我^②在曼海姆提出的。但是，无论是巴登的领袖，或者是法兰克福议员，都是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没有才智和主动精神。

① “我们大家”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 1886 年版上加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我”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 1886 年版上加的。——编者注

十

议会不去采取行动，而又决定说话，仿佛它在此以前还说得不太多似的，而这一次——是通过“告德国人民书”说的。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两个草案，其中多数派的草案是由乌朗特起草的。两个草案都写得苍白无力、没有生气和软弱不堪，不过反映了议会本身的无能、胆怯和良心有亏。5月26日提交讨论的两个草案，使我们的沃尔弗有理由彻底地向议员先生们讲出自己的意见。这次发言的速记记录如下：

沃尔弗(代表布勒斯劳)：

“先生们！我报名发言，反对由多数派起草的、在这里宣读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无力，只适于作为一篇文章，登在写这种宣言的党的日报上，而不能作为告德国人民书。由于刚才还宣读了另一个宣言，所以我顺便指出一下，我对这个宣言反对得更强烈，至于为什么原因，我认为在这里不需要多谈。（大厅中央有人喊道：为什么不？）我只讲多数派的宣言；事实上，它写得如此的温和，甚至连布斯先生也不大会表示反对，这当然说明宣言写得很糟糕。不，先生们，如果你们毕竟还想对人民有一点影响的话，那末，你们不应该像在宣言中那样去同他们讲话；你们应该讲的不是什么合法性、合法的根据等等，而是非法性——就像各邦政府那样地讲，就像俄国人那样地讲，而所谓俄国人我指的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骚动和笑声）所有这些人我统称之为俄国人。（非常活跃）是的，先生们，在这个议会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应该对他们说：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持合法的观点。这就是暴力的观点，顺便你们应当说清楚，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以武力、以组织得很好的战斗队伍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一定需要发表宣言的话，那就应该发表这样的宣言：直截了当地

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遵守秩序！楼座上响起欢动的掌声)对所有的大臣也是一样！（骚动又起）噢，你们别打断我；他是人民的主要叛徒。”

主席雷：“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越出了和违反了一切可以允许的界限。他不能在这个议会面前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的叛徒，因此，我应该叫他遵守秩序。”

沃尔弗：“我自己也接受遵守秩序的呼吁，同时我宣布，我是想违反秩序的，我宣布，他和他的大臣们都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遵守秩序，真粗鲁！）

主席：“我只好停止您发言。”

沃尔弗：“好，我抗议；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说出人民所想的東西。我反对用这种精神写的任何宣言。”

这几句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受惊的议会。在这些老爷们面前清楚而公开地叙述实际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叛卖活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它是在每一个出席会议者的面前进行的；但是谁也不敢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而现在来了这么一位不客气的矮小的西里西亚人，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纸房子似的虚礼全部推翻了！甚至连“极左派”也都立即表示坚决抗议这种不可原谅的破坏一切议会礼节的行为，这种由于直截了当地说明真相而造成的破坏行为；它通过自己的可尊敬的代表——卡尔·福格特先生之口表示了这一点（关于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1870年公布的路易一拿破仑付给自己的代理人的款项的账单⁴⁸证明了这一点）。福格特先生用下面那种既是可怜地惊慌失措的、又是无耻地虚假的^①抗议，充实了争论的内容。

“先生们，我起来发言是为了维护从诗人的心灵流入这个宣言中的明彻

① 俏皮话：《verlegnen》——“惊慌失措的”，《verlognen》——“虚假的”。——编者注

的清流，而反对那种为了挡住它的去路而向它投去或(!)扔去(!)的可鄙的脏物，我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这些话，反对那些在最近这个运动中堆积起来的、使那里的一切有淹没和染污危险的垃圾。是的，先生们！这就是一些垃圾和脏物，有人用这种办法(!)把这些东西向着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扔去，这类的事情(!)居然能够发生，我表示极大的愤怒。”

既然沃尔弗根本没有谈乌朗特起草的宣言，而只是认为它的内容太软弱无力，那末，福格特自己的愤怒，自己的“脏物”和自己的“垃圾”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就完全不得而知了。不过，这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一方面是回想起“新莱茵报”始终对福格特式的虚伪的伙伴采取了无情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痛恨正是这个沃尔弗的发言使这些虚伪的伙伴不能继续耍这种虚伪的把戏。福格特先生在不得不对真正的革命和反动加以选择的时候，表示拥护后者，拥护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拥护“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遗憾的是，反动派对于福格特先生什么也不想知道。

就在当天，沃尔弗通过济克马林根的代表维尔特向福格特先生提出了决斗的挑战，而福格特先生拒绝决斗，沃尔弗就威胁说要揍他。虽然论体格，福格特先生同沃尔弗比起来，简直是个巨人，但他还是逃到他的姐妹那里去求保护，没有她在一起，他哪儿也不露面。沃尔弗放过了这个胆小的饶舌者。

大家知道，在这次争吵以后没有几天，议会自己也确认沃尔弗的话是正确的，由于害怕自己的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政府，而逃到斯图加特去了。

十一

我们快要结束了。在斯图加特，就是在维尔腾堡军队解散国民议会的时候，沃尔弗也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后来他到了巴登，最后，同其他流亡者一起到了瑞士。他选了苏黎世住下来，在那里，又立即开始做私人教师，但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流亡者，他当然就遇到了很厉害的竞争。尽管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困苦的处境，沃尔弗还是想呆在瑞士。但是，情况愈来愈清楚：俯首听命于欧洲反动派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要逐渐地把所有的流亡者，像沃尔弗所说的那样，“撵”出瑞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迁居美国，而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这样。如果流亡者到大洋彼岸去了，那就可以摆脱他们而得到安宁。

沃尔弗也常想到迁居美国，许多已经住在那里的朋友都请他到那里去。当 he 也被“撵”得忍受不了时，已一半打定了主意，于 1851 年 6 月来到伦敦，在这里，我们把他留了一个时候。私人教师中间的竞争在这里也很厉害。虽然沃尔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勉强糊口。同他往常在困苦的时候一样，他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的情况。然而到 1853 年底，他不得不欠下大约 37 英镑（750 马克）的债，这使他很苦恼；同年夏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1853 年 6 月 21 日，我不得不在极度 distress（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

在曼彻斯特的一位德国医生，也是一个流亡者，还在布勒斯劳时就同沃尔弗结识的，要不是他在曼彻斯特依靠自己的关系为沃尔弗找到了一定数量的私人教课，使他至少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那末，到美国去的打算这次就要付诸实现了。1854年1月初，他就搬到曼彻斯特去了⁴⁹。起初当然是相当困难。但毕竟生活有了保障，而后来，沃尔弗由于自己非常善于对待孩子并且赢得他们的爱戴，他可以指望，只要他在当地的德国人中为大家所知道了，他的活动范围就会逐渐扩大。而结果正是这样。过了几年，由于他要求不高，他对他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满意；学生们崇敬他；他为人直爽、忠于职守、和蔼可亲，所以无论老少，无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敬爱他。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的，因而在政治上多少是敌对的分子接触；虽然他从来丝毫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气质、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很少同他们发生冲突，并且结果都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当时我们大家都同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隔断了。反动的法律堵住了我们的嘴，日常的报刊绝口不提我们，出版者对于我们偶尔提出的请求连赐予拒绝都很勉强。看来，波拿巴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年内，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地准确的判断，这是不奇怪的。

沃尔弗是如何地认真负责——我只举一个例子。他给自己的一个学生出了一道一本教科书上的算术题。他把答数同所谓习题解答上的答数对了一下，说学生算得不对。但是，当这个孩子把这道题重算了许多次，得出来的还是同样的答数时，沃尔弗自己核对了一下答数，相信孩子是正确的，而习题解答上印错了。沃尔弗立即坐下来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重做了一遍，以便检查习题解答中是

否还有这样的错误：“这种情况我不应该再发生！”

就是因为这样认真负责，他还没有活到 55 岁就去世了。1864 年春，由于劳累过度，他犯了严重的头痛病，渐渐地引起了几乎是彻夜不眠的失眠症！这时候，他的医生正好不在；找别的医生他又不愿意。不管怎样请求，要他把课停止一些时候或加以限制，都没有用；他已经着手的事情，他就要把它做完。直到他绝对不能工作时，他才间或缺课。但是已经晚了。脑溢血引起的头痛病愈来愈厉害，失眠愈来愈经常。脑血管发生破裂，脑溢血复发以后，就在 1864 年 5 月 9 日去世了。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

弗·恩格斯
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
给恩·比尼亚米的信

亲爱的比尼亚米：

您的驻柏林通讯员大概已将德国选举的一切详细情况告诉您了。我们的胜利使德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胆战心惊：在伦敦这里，所有的报刊都在议论这件事。这里值得极大注意的，并不是我们争取到的新选区的数量，虽然值得指出，威廉皇帝、萨克森国王^①和最小的德国邦君（罗伊斯公爵）都居住在由工人社会党人当代表的选区内，因而代表他们本人的也就是社会党人了。最重要的是，除了那些我们取得多数的选区之外，我们虽是少数，但无论在大城市和乡村也都得到了数量极多的选票。在柏林得了 31500 票，在汉堡、巴门—爱北斐特、纽伦堡、德勒斯顿各得 11000 票；在乡村，不仅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萨克森、不伦瑞克，甚至在封建主义的堡垒——梅克伦堡，居于很少数的农业工人也投我们的票。1874 年 1 月 10 日我们得了 35 万票，而在 1877 年 1 月 10 日，得了至少 60 万票。选举的结果可以作为我们计算我们的力量的工具：根据营的数目，您现在就可以判断，德国社会主义大军有多少个军在选

^① 阿尔伯特。——编者注

举的日子受到了检阅。这一点无论对正在欢庆自己的胜利的社会党，或者对尚未卷入运动的工人，以及对我们的敌人，都有巨大的道义影响。极妙的是，人们每三年一次要在投票上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主张放弃选举的先生们是可以随便怎么说的，然而像1月10日选举这样一个事实，要比这些先生们的一切“革命”词句更有价值。我谈到营和军，并不是比喻的说法。投票拥护我们的那些25岁的男人（这是最低的年龄）中至少有一半，也许还要多，都曾在军队中服役过两年或三年，他们会很好地使用针发枪和线膛炮，现在编入了预备役。只要再有几年继续获得这样的成就，那末无论是预备役兵或是**后备军**⁵⁰（占战时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二）将会投票拥护我们，这样我们就能瓦解全部军事机构，并使任何进攻战都不可能发生。

有人会说，那末为什么你们不使用这些力量现在就来进行革命呢？因为，我们取得的不过是60万票对550万票，并且这些选票又分散在各个区域，我们显然会被打败的，举行考虑欠周的起义，采取轻率的行动，我们自己就会把运动葬送掉，而这个运动只要继续不长的时间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有把握的胜利。显然，我们不会很容易地取得胜利；普鲁士人不会让社会主义感染他的全部军队，不会不采取对策；但是，反动和镇压愈厉害，掀起的波浪就愈高，直到最后把所有的堤坝冲毁。您知道，柏林发生了什么事？上月10日傍晚，一大群人（警方自己估计约22000人）挤满了社会党委员会所在的大楼附近所有的街道。由于我们党的组织和纪律极好，委员会最先得到关于选举最后结果的消息。选举结果一宣布，整个人群齐声发出了欢呼，向谁？向当选的人？不是，向“我们的最积极的鼓动者王国检察官特森多尔夫”！这个人

在反对社会党人的诉讼中一向是出类拔萃的，而他的暴力行为却使支持我们的人加倍增长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对所有暴力手段的回答，他们不仅不顾这些，而且甚至向它们挑战，把它们当做最好的鼓动手段。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写于 1877 年 2 月 13 日

原文是意大利文

载于 1877 年 2 月 26 日
“人民报”第 7 号

俄文译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意大利的情况

社会主义运动在意大利终于也建立了巩固的基础，预期会迅速而胜利地发展起来。但是，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已经发生的转折，我们应当回顾一下意大利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

意大利的运动的产生同巴枯宁主义的影响有关。当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剥削者充满强烈的但极其模糊的阶级仇恨的时候，在一切有革命工人活动的地方，巴枯宁亲自指挥下的一小群年轻的律师、医生、作家、店员等等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都是不同程度了解内情的秘密的巴枯宁同盟的盟员，这个同盟的目的是要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服从它的领导，从而使巴枯宁的宗派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取得统治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比较确切的材料，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⁵¹（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这本小册子中，有详细的叙述。

当运动在工人中间还只是刚刚萌芽的时候，这样做是最顺利不过的了。巴枯宁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词句到处都博得了预期的掌声，连那些在过去革命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也随波逐流了。

意大利同西班牙一样,用巴枯宁自己的话来说,是“欧洲最革命的国家”⁵²。所谓的革命,就是大发空论而无实效。英国的、其次法国的、最后德国的工人运动都是通过实质上是政治的斗争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与此相反,在这里,任何政治活动都受到指责,因为进行政治活动,包含着承认“国家”,而“国家”是一切祸害的体现。于是,不准建立工人党;不准进行争取任何抵御剥削的保护措施,如争取正常的工作日、限制女工和童工劳动;而主要的是,不准参加任何**选举**。代替这一切的是要为了未来的革命而进行鼓动、组织和秘密工作,一旦革命从天上掉下来,就立刻应当在没有任何临时政府、完全消灭任何国家机构或类似国家的机构的情况下,单靠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同盟暗中指挥的)来进行……“但是请不要问怎么样!”^①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当运动还幼稚的时候,这一切都很顺利。意大利大多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处于世界交往以外,它们只知道外国人来访这种交往形式。这些城市供应四周农民手工业品,并作为向更大范围出售农产品的中介。此外,住在那里的还有靠自己地租生活的贵族地主。最后,很多外国人把钱送到那里去。在这些城市中,反对派人数不多,很不开展,而且还混杂着很多没有经常或固定职业的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外国人来往和温和的气候造成的。低声谈论匕首和毒药的极端的革命词句,在这里最先找到肥沃的土壤。但是在意大利,主要在北部,也有工业城市。只要运动在**这些城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扎了根,这种劣质的食粮就再也不能满足需要了,**这些工人**再也不要那些不得志的年轻资

① 引自海涅的组诗“青春的苦恼”中“抒情诗”篇第八首诗。——编者注

产者保护了，按照巴枯宁的说法，这种资产者是因为他们“升官发财的门路被堵塞”才投靠社会主义的。

结果正是这样。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对于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即禁止任何越出空谈和阴谋活动界限的真正的活动，日益强烈地表示不满。关于德国人在 1874 年选举中的胜利和他们所达到的把德国社会党人联合起来的结果，在意大利也并不是一无所闻。经历过旧的共和运动的、不得已服从了“无政府主义的”空喊的人们，开始愈来愈经常地利用各种机会来强调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在“人民报”上反映出已经觉醒的反对派立场。这家周报在创办后的头几年主张共和，不久便归附了社会主义运动，尽可能地同“无政府主义的”宗派主义疏远。正当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群众终于成长起来而超过了自己的惹人厌烦的领导人、创造了真正的运动以代替虚构的的运动的时候，他们发现“人民报”是愿意偶尔登载暗示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种异端邪说的报纸。

如果巴枯宁还活着的话，他就会采取他惯用的方法来同这种异端邪说斗争。他就会硬说那些替“人民报”撰稿的人具有“权威主义”、权力欲、虚荣心等等，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卑鄙的人身攻击，并通过该同盟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的机关报不断地重复这种攻击。然后他会说，所有这些罪过都只是那个致命的原罪的必然结果，这个原罪就是：荒谬地承认政治活动，因为进行政治活动就得承认国家，而国家则是权威主义和霸权的体现，因此谁力争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也就一定坚决地为自己力争政治权力，可见，他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因此，大家都来指责他吧！这种从已故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那里借来的方法，巴枯宁是精通的，但是被他用滥了，用得过于单调。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至少可以得到短时

间的成功的唯一方法。

但是巴枯宁死了，于是秘密地主宰世界的工作转到了瑞士纽沙特尔的詹姆斯·吉约姆先生的手里。死板的学究占据了那位饱经世故的世俗人物的位置，并且把瑞士加尔文教派的狂热带到了无政府主义学说中来。要不惜任何代价恪守真正的信仰，而纽沙特尔的那位眼光狭小的教员无论如何应被奉为这一信仰的教皇。“汝拉联合会简报”⁵³（该联合会显然连 200 个会员也不到，而瑞士工人联合会拥有 5000 名会员）被宣布为这一宗派的正式机关报并毫不客气地“谴责”起信念动摇的人来了。但是，组织在上意大利联合会中的伦巴第工人，已经不再喜欢听这种教训了。而去年秋天“汝拉简报”竟敢直接地命令“人民报”辞退不合吉约姆先生的心意的巴黎记者的时候，它们的友谊从此就结束了。简报继续指责“人民报”和意大利北部的人抱有异端邪说。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知道，在宣扬无政府状态和自治的背后，隐藏着一些阴谋家独断专行地指挥整个工人运动的野心。

“短短四行毫无恶意的注释引起了‘汝拉简报’的注意，它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我们对它大发雷霆，其实它只是使我们觉得好笑。有些人出于病态的妒忌心四处活动，大肆诽谤，乞求别人对我们和我们的朋友表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愤怒也好。谁要是上他们的当，那真是太幼稚了。这种久已采用的制造争吵和挑拨离间的手法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了，它的耶稣会教徒的（洛约拉的）诡计已不能再欺骗什么人了。”（1877 年 1 月 21 日“人民报”）

2 月 26 日的报纸把这些人叫做“某些狭隘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而同时（多么矛盾！）又是独裁分子”。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在米兰，这些老爷已经完全被人认清，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

德国 1 月 10 日的选举和与此有关的比利时运动的转折，即放弃旧的节制政策而代之以争取普选权和工厂法的鼓动，把剩下的

事情一并完成了。2月17日和18日在米兰举行了上意大利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没有对国际的意大利会员中的巴枯宁主义集团采取不必要和不恰当的敌视态度。决议甚至表示准备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试图把欧洲工人运动的各种派别联合起来的代表大会。但是，决议同时极其明确地提出了对意大利运动有决定意义的三点：

(1)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所以也要采取政治手段，来保证运动的成功；

(2)社会主义工人应当组织成为不依赖任何其他政治或宗教党派的社会主义政党，和

(3)上意大利联合会在自治的条件下和在国际的最初章程的基础上，认为自己是这个伟大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不依赖于其他一切意大利组织。但是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证明自己是讲团结的。

总之，提出了政治斗争、组织政党和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上意大利联合会作出了上述决议，从而彻底地脱离巴枯宁主义的宗派而同伟大的欧洲工人运动采取了共同的立场。这个联合会分布的地区是意大利工业最发达的部分——伦巴第、皮蒙特、威尼斯，所以不要多久它就会获得成就的。一旦采用了为所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检验过的那些明智的鼓动手段，相形之下，巴枯宁主义巫医的空谈很快就会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力，而意大利南部的无产阶级也很快就会摆脱那些由于自己破产的资产者的地位而产生领导人运动志向的人加在他们肩上的桎梏。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3月6日
和14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载于1877年3月16日“前进报”第32号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利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但不久就专门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已经准备当哲学副教授讲授哲学了，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却使他终生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等人，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⁵⁴，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检查机关对它也没有办法^①。“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再有十种像“莱茵报”那样有勇气的报纸，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末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无法进行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检查官

① 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察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伦日报”上关于斐拉雷特（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译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神圣的东西不可作戏曲”。

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对它规定了双重检查，在它受过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封闭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⁵⁵，他在该刊物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指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⁵⁶。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大概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这个同盟存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几乎所有的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

德国工人运动中尽的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并且在实际上证明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许多国际工人会议。

在 1847 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第一次发表在 1848 年二月革命前不久，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状况，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骚动，看来比利时就要发生革命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就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冒险。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事先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伦，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个报纸从 1848 年 6 月 1 日出版到 1849 年 5 月 19 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 1848 年 6 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

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⁵⁷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圣物——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当时有 8000 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的行为是“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①；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 年秋天科伦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了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要求科伦的检察官对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提出诉讼，——这一切都没有用，报纸在警察面前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1848 年 11 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付暴力。1849 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最后，1849 年德勒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 6 月 19 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或者是迁到布列塔尼，或者是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⁵⁸的尝试（1850 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 年 12 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年纽约出版；第 2 版于 1869 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

① 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译者注

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爾发行,其后在波士顿发行,最近又在莱比锡发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伦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十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⁵⁹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了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激烈论文,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人民报”⁶⁰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主张德国保持中立,甚至表示同情。福格特有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主义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所收买。整整十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相应的字母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⁶¹

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

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础。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 1872 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定稿修琢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在大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 1864 年的成立宣言至 1871 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而欧洲工人对协会仍然记忆犹新。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不能存在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要失败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他们不了解或不顾及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

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杜绝了任何想借国际名义进行无谓盲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而这样一个联合会的纽带在当时是会变成一种桎梏的。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做他的理论工作，因而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分繁多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

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公社差不多所有消费品都是自己生产而几乎没有交换关系，并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流转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种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而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个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

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⁶²——和工业受压抑的状况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

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说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

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强迫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七、第八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偿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究方面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方面,也会受到根本变革。愿马克思有可能不久就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中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8年不伦瑞克发行的
“人民历书”丛刊

俄文译自“人民历书”丛刊

卡·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⁶³

编辑先生：

“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①，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补遗⁶⁴里面的一个附注，即我对一个俄国“文学家”^②的论战性的意见。我在那里对这位俄国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⁶⁵里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并且说，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③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⁶⁶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② 亚·伊·赫尔岑。——编者注

③ 引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话，在马克思手稿中是用俄文转述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第一页

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①。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二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

^①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⁶⁷）。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77 年 11 月
左右

发表于 1886 年日内瓦出版的
“民意道报”杂志第 5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德国、法国、美国和 俄国的工人运动

伦 敦

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波澜壮阔地发展。现在那里共有 62 种社会主义期刊,其中 46 种是名副其实的报纸,1 种是杂志,15 种是工会机关刊物。此外,在瑞士用德文出版的有 4 种报纸和 1 种杂志;奥地利有 3 种;匈牙利有 1 种;美国有 6 种。用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期刊的总数如下:

德 国	—	62	}	= 75
奥 地 利	—	3		
匈 牙 利	—	1		
瑞 士	—	3		
美 国	—	6		

可见,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定期出版物以机关刊物来算,比用所有其他文字出版的社会主义期刊的总和还要多。在上述数字中,我还没有把多少带点社会主义色彩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报纸计算在内,而指的只是公认的党的机关刊物。

在谋刺俾斯麦⁶⁸一事发生以后,有一个资产者写信给我说:“整个(资产阶级的)德国都为俾斯麦没有被刺而感到高兴。”我回

答他说：我们对此也感到满意，因为他对我们很效劳，即使为了这一点也要报答他。你们知道，我是对的，因为要是没有迫害和苦难，要是没有军国主义和不断增加的捐税，我们就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

虽然法国的危机⁶⁹只产生了很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个危机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即使得法国社会主义者有可能通过报刊、会议和工会来进行活动以及组成工人党，——而这些就是我们在1871年大屠杀以后的今天所能争得的一切。此外，法国具有两大成就，即农民转向共和国方面以及共和国军队的组成，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杜克罗、巴特比及其同伙的政变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士兵坚决拒绝与人民为敌。

由于铁路干线全体人员的流血的罢工⁷⁰，美国的工人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这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因此，美国创立工人党的事业有了大踏步的发展。在这个国家里，事态发展得很快，我们应当注视这种发展进程，才不至于对不久将会出现的某些重大成就感到突然。

我认为，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起最重要的作用。由于所谓解放农奴而形成的状况，早在战争以前就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次大改革进行得如此巧妙，使贵族和农民最后都破产了。随后又实行了另一项改革，这一改革似乎是为了让省和县在中央政府不加干涉的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选举行政机关，但是改革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本来就不堪忍受的捐税。

由于各省径直负担自己的管理费用，国家现在的开支就比较少了，但是收的税还是那么多；因此就另设新的捐税来弥补省和地方的开支。后来还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又等于新设了一项比

其他捐税更重的捐税，这也意味着建立一支新的、人数更庞大的军队。

结果，财政崩溃的局面加速到来了。早在战争以前，国家就陷于破产的境地。俄国国库由于广泛参与了 1871—1873 年时期的骗人的投机勾当，使国家陷于财政危机。这一危机于 1874 年在维也纳和柏林爆发，并且长期地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和商业。当时的形势就是，在反对“土耳其人”的“神圣的”战争⁷¹爆发以后，由于到处借不到外债，而内债又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动用银行的数百万款子（准备金）和发行纸币；结果纸币日益贬值，它的比价很快地——只过了一两年——就跌到了最低限度。总的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俄国的 1789 年的种种因素，在这以后必然会有 1793 年。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并且将很快地爆发，也可能就在今年爆发。同巴枯宁的预言相反，革命将先从上层，从宫廷，从没落的和 frondeuse（因不满而反抗的）贵族中间开始。但是革命一爆发，就会吸引农民参加。那时你就会看到连 1793 年也要为之逊色的场面。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因为迄今为止，旧俄国一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后备军；它在 1798 年、1805 年、1815 年、1830 年、1848 年都起过这样的作用。这支后备军一旦被消灭，到那时再来看，事情将会怎样转变！

弗·恩格斯写于 1878 年 1 月 12 日

摘要载于 1878 年 1 月 22 日

“人民报”第 3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⁷²

弗·恩格斯写于 1878 年 2 月中—
3 月中

载于 1878 年 3 月 3、10、17、24 和
31 日“劳动旗帜”（纽约）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

弗·恩格斯

—

去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事件,是欧洲工人阶级收获很大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发展工人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度受到小小的但活动积极的宗派⁷³威胁的统一,实际上已经恢复。工人阶级运动日益走上目前政治的首要地位,而各种政治事件,不管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这是胜利日益临近的可靠征兆。

1877年一开始,就取得了一次胜利,这是工人曾经获得的多次最重大胜利中的一次胜利。1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1874年,工人候选人获得了40万票;1877年获得了60多万票。10名工人候选人在1月10日当选,还有24人在两周后举行的补选中进行选举。在这24人中,实际当选的只是少数,因为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在帝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阶级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这个事实并没有失去它的重大意义,在下次1880年的选举中,所有这些选区无疑都会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柏林、德勒斯顿、萨克森的整个整个的

工厂区和佐林根都争取到了。在汉堡、布勒斯劳、纽伦堡、莱比锡、不伦瑞克，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及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茵的工厂区，所有其他政党的联盟仅以简单的多数勉强地战胜了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国内其他一切的力量，无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今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次选举造成了惊人的影响。资产阶级真正感到惊惶失措，尤其是因为资产阶级报刊过去经常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社会民主党现在已不起任何作用。工人阶级为自己本身的胜利所鼓舞，更加振奋地在一切适宜的战场上继续战斗；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正如我们就要谈到的，不仅把德国人的胜利当做自己本身的胜利来庆祝，而且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作出了许多新的努力，使他们在争取劳动解放的竞赛中不致落后。

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政府的迫害、罚款、更经常的是监禁，纷纷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早就不得不作好在地狱中度过大半生的精神准备。虽然判刑多半是短期的，从两星期到三个月不等，但是，长期的监禁也决不是罕见的事。例如，为了保护萨尔布吕肯的重要工矿区免受社会民主主义毒素的传染，不久以前给两名鼓动者判处两年半徒刑，罪名都是胆敢进入这个禁地。帝国有伸缩性的法律可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提供许多理由，而在缺少这些理由的地方，法官多半都很乐意牵强附会地援引那种可以用来定罪的法文。

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

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促使他们也到其他选举中去碰碰运气。这样,他们使工人在帝国的两个较小的邦的议会选举时当选了,他们还进入了相当多的市政府;在萨克森的工厂区,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由于在这次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也就不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

但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在这里,也应当跨出俾斯麦“帝国”的疆界,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活动决不仅限于此。到1877年12月31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政党服务的定期报刊,总共不下75种。其中在德意志帝国出版的有62种(包括15个工会的15种报刊),在瑞士有3种,在奥地利有3种,在匈牙利有1种,在美国有6种;共75种,比用其他各种文字出版的工人报刊加在一起还要多。

色当会战⁷⁴以后,1870年9月,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民说,战争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877年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同时还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当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极其拜占

庭式地逢迎“常胜的威廉”，把手足捆起来向俾斯麦投降，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前程的时候，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出来的措施，反而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加快和加强了。

二

德国选举在国内的影响是十分大的，然而，它在国内外的影响还要巨大得多。首先，这种影响恢复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致，这种一致近六年来由于一个不大的但活动非常积极的宗派的狂妄企图而遭到了破坏。

我们那些考察过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读者都会记得，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伟大的工人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造成了公开分裂，后来更造成了瓦解。造成分歧的祸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力图在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们在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首先在瑞士生了根，以后便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有一个时期的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在“国际”内部，他们得到了比利时人的某种支持，比利时人也主张放弃政治活动，虽然是出于别的动机。分裂以后，巴枯宁派保持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组织，并且举行代表大会，而在各次大会上，老是那同样的二十来个妄图代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人，以欧洲工人阶级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信条。但是，1874 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最积极的活动家

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已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怀疑的因素。在西班牙，在政治事件的进程中，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在瑞士，主张进行政治斗争的并且是同德国人携手一起工作的那一派日益壮大，并且很快就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比例是 300：1。在意大利，作了一次实现“社会革命”的幼稚尝试（1874 年在博洛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举动中无论是在智谋方面或勇敢方面，都表现得不好。在此以后，真正的工人分子开始寻求比较合理的斗争方法。在比利时，由于领导者采取放弃政治活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失去了进行实际活动的任何地盘，因而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实际上，当德国人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在那些以放弃政治活动为当前口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对那种没有任何结果的运动厌烦起来；他们的组织被忘却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这种对比不可能不引起这些工人当中的那部分头脑比较清楚的工人的注意。意大利和比利时一样，爆发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的反抗，人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为什么他们恰恰要放弃运用那些结果证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而去迎合愚蠢的教条主义。这就是当德国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从而打消了各种怀疑，克服了一切动摇时的情况。在这种顽强的事实面前，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赞成进行政治活动。剩下的那些拥护放弃政治活动的意大利人，由于绝望而企图在那不勒斯附近再举行一次起义⁷⁵；三十来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社会革命”，但是警察很快就来照顾他们。他们所争得的，不过是他们本身在意大利的宗派运动完全破产而已。这样，妄图领导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

主义者组织，又回复到它原来的萌芽状态，回复到瑞士汝拉山区的二百来人，在那里的僻静的山区避难所里，继续反对世界上其余地方的战无不胜的邪说，而保持他们现在已故的皇帝巴枯宁所建树的真正正统信仰。而去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他们自己召集的）的时候，他们面对着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伟大组织的代表，在会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次大会在坚决拒绝他们可笑的学说和狂妄的要求，并肯定它所拒绝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宗派以后，最后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样经过四年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完全恢复了，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基础已经重新恢复，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在这种基础上一起坚决地行动，相互支援，这种支援就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①他们禁止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就可以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大发展，以致于这类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本身还成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的组织而继续存在于强大得多的统一团结的联盟之中，存在于行动和政策的一致之中，这种一致现在鼓舞着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且是欧洲工人阶级本身的极大成就。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要求树立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和

^① 本文的英文原文此处脱漏一两行。——编者注

学理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妄想了,而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它最初是由国际确定的,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是从各地的斗争中、运动的需要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史有关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但是，必须再谈一点。

西班牙在 1868 年和 1872 年间，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当时国际可以夸耀在那里有 3 万名以上缴纳会费的会员。但是，这一切多半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多半是国内政局不稳定所引起的一时情绪激昂的结果，而不是觉悟真正提高的结果。西班牙国际在卷入 1873 年联邦共和起义以后，就同起义一起被绞杀了。有一个时期，它以秘密团体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个团体的核心无疑一直保存到今天。然而，既然这个团体除了派过三个代表出席根特代表大会以外，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生机，我们也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这三个代表所能代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程度，就跟从前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代表英国人民⁷⁶差不多。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当某种政治上的震荡使西班牙的工人可能重新起积极作用的时候，新的斗争马上就会开始，但不是由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而是由有觉悟、有毅力的工人的不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些工人在 1872 年依然忠于国际⁷⁷，现在正在等待时机，而没有去搞密谋。

在葡萄牙，运动始终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传染，并且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发展。葡萄牙工人有数量很多的国际支部和工会。他们在 1877 年 1 月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代表

大会，并且开始出版一个出色的周报“抗议报”⁷⁸。但是，他们也受到针对他们而制定的那些限制出版自由、结社和公开集会权利的法律的束缚。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斗争，并且现在正在波尔图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将使他们能够向世界表明，葡萄牙的工人阶级正在对伟大的全世界争取劳动解放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意大利工人的活动也大大受到资产阶级立法的限制。借口镇压盗匪活动和分布广泛的秘密盗匪组织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别法律，赋予政府以极大的、无限制的权力，无限制地用来对付工人协会；工人协会中杰出的成员同匪徒一样地受到警察的监视，不经审判、侦讯就被放逐。然而，运动在向前发展，它具有生命力的最好标志，就是它的重心从罗马尼亚一些受人景仰的但死气沉沉的城市转移到北方生气勃勃的工业城市和工厂城市，这个转变保证了真正的工人分子取得对一小撮混入运动的、过去掌握着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优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经常被政府查封和解散，但又以新的名称出现。无产阶级的出版物虽然其中许多报刊因出版者受到迫害、罚款和判刑而办不长久，但在每次失败后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尽管有种种障碍，还是有一些报纸办得比较久。其中有几个刊物，多半是短期出版的，还在信奉“无政府主义”学说，但是这个派别放弃了任何领导运动的妄图，并且同马志尼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逐渐地消失了。而这两个集团失去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真正的和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赢得的每一寸土地。

在比利时，工人阶级活动的重心也转移了，因而活动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75年以前，这个重心是在国内讲法语的地区，

其中包括一半讲法语、一半讲佛来米语的布鲁塞尔。在这段期间，运动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强烈影响，这种学说也规定不干预政治，特别是不参加选举。因此，只举行了一些通常被军队的血腥干预镇压下去的罢工，以及经常重复老一套的空话的群众大会。工人对此感到厌烦，于是整个运动就渐渐停息了。但是，从 1875 年起，国内佛来米语地区的工厂城市参加了斗争，它们以较大的热情，并像后来很快就证明的那样，以新的精神进行斗争。在比利时，没有限制妇女或儿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因而根特及其郊区的工厂选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像奴隶一样每天在纱厂劳动 15 小时以上。蒲鲁东主义空论家认为这类小事情不值得忙于虚无缥缈的革命主义的人去注意，他们的反抗没有成功，并且逐渐被克服了。在法律上保护工厂童工的要求，成了比利时工人阶级纲领中的一项，而同时，一向把政治活动当做禁忌的那种魔法咒语也不灵了。事情由于德国人的例子而告完成，现在比利时的工人，同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工人一样，正在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并同它们相对立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的，是通过当前条件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来求得工人的解放。

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即讲德语的那部分，几年前联合成为“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到 1876 年年底拥有 5000 多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除它以外，还有另一个组织，即格留特利联盟，它最初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为了向工农传播激进主义而建立的；但是，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这个分布很广的联合会，最后控制了它。1877 年，这两个团体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几乎等于合并，目的是组织瑞士工人政党；它们采取了十分有力的行动，使新的瑞士工厂法

在全民投票中通过了,在所有现行的工厂法中,这个工厂法对工人最为有利。现在它们组织了警惕的监督,以保证这个工厂法很好地执行,而不管厂主有多么强烈的不满。“无政府主义者”抱着超革命观点,当然疯狂地反对这全部活动,说这是真正背叛了他们所谓的“革命”。但是,既然他们充其量不过二百来人,而且在这里和在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所以,他们出来反对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瑞士工人党的纲领同德国的几乎是一致的,甚至是过分地一致,把后者的某些不完备的和糊涂的论点也包括进去了。但是,如果在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纲领的措词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丹麦工人约在 1870 年参加斗争,起初很快就取得了成就。他们同小自耕农的政党结成同盟,在小自耕农中间顺利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取得的政治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以这个农民政党为核心的“联合左派”在议会中保持了好几年的多数。但是,运动的这种迅速发展,多半是表面现象,而没有实在的基础。有一天,竟发现两个领袖把向工人募集的党的经费私自花光以后失踪了。这件事出丑到了极点,使丹麦的运动至今还没有消除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但是,不管怎样,虽然丹麦工人政党现在的行动比过去审慎,然而,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所失去的那种短暂的和虚假的对群众的控制,定会逐步被更实际的和更持久的影响所代替。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政治自由,只要涉及出版、集会和结社时,在这里也就降到了同伪宪制的君主制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缩性,因此,甚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设

法给人定罪。然而运动在这里也和各地一样，正在不可遏制地发展。基本的中心是波希米亚的工厂区、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工人的报纸用德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出版。继匈牙利之后，运动也在塞尔维亚展开，战前这里有一家塞尔维亚文的周报⁷⁹；但是战争刚一爆发，该报就干脆被封闭了。

可见，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1864年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人们，在先是反对外部敌人、后来又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年代里，一直高举着它的旗帜，直到在较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性而不是由于内部纷争，造成了分裂和表面上的退却为止。现在这些人可以骄傲地高呼：“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达到了自己的伟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

四

我们的读者一定已经发觉，前三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欧洲最重要国家之一的法国。现在来谈谈是什么原因。在以前谈到过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活动（虽然它实质上是政治活动），同总的政治，即所谓官方政治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国家中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可望成为政治力量。如果说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国家的正式政党——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或激进派不得不重视它，这只是因为从它的迅速发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相当的强大，足以使人感觉到它的影响。但是，法国的情况不同。得到外省大城市工人支持的巴黎工人，自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国家中的一种力量。几乎九十年来，他们都是进步的战斗大军。在法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危机中，他们都走上街头，用一切可以武装的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筑起街垒，投入战斗。他们的胜利或失败决定了法国以后多年的命运。从 1789 年到 1830 年，资产阶级革命是由巴黎工人的斗争决定的；正是他们在 1848 年赢得了共和国，而同时他们却误以为这个共和国就意味着劳动解放，在当年的六月失败中，他们得到了严酷的教训；他们在街垒中反抗路易—拿破仑 1851 年的 coup d' tat (政变)，结果再次失败；1870 年 9 月，他们铲除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连碰也不敢碰的没落帝国。1871 年 3 月，梯也尔企图夺去他们用来保卫巴黎免受外国进犯的武器，使得他们被迫

进行巴黎公社革命和长期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他们遭到血腥的镇压。

可见，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将近一百年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的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锋，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过那种比较闭关自守的生活，而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工人目前实际上还是在这种生活范围内活动。像法国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有联系的，而且是由这种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同它得到公认的决定性战斗力量一样，是同国家总的政治发展分不开的。因此，不考察法国整个的政治，我们便无法评述法国工人阶级的活动。

不论法国工人阶级进行它本身的斗争也罢，进行自由派的、激进派的或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罢，——在它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而又长久。譬如，在 1848 年 6 月和 1851 年 12 月的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波拿巴帝国的 18 年统治，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必然的结果是：当 1870 年 9 月革命到来的时候，除了推举那些在帝国时期曾是议会中的正式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以外，工人推举不出任何别的人来，而这些人当然把工人和国家出卖了。在公社被镇压之后，许多年内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的工人阶级所直接关心的，仅仅是使这种长期的反动统治不再出现，而同时也就不必再去进行下面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争取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是为了争取那种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度。目前法国四大政治党派：三个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各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和一个共和派。不管这三

个人当中哪一个登上王位，他无论如何也只能得到人民中间区区少数的支持，因而就只能依靠武力了。因此，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以便创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进行斗争了。

因此，下面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法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本能的政治觉悟：当去年5月16日所有这三个保皇派集团联合起来进行大阴谋，向共和国宣战的时候，工人们万众一心，立即宣布支持共和国是他们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毫无疑问，他们在这里是跟着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激进派走的。但是，既没有报刊和集会，又没有俱乐部和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去充当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又能怎样呢？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独立，工人阶级如果不去支持那有义务保证全体人民因而也保证工人得到建立独立组织的自由的唯一政党，它又能做什么呢？有些人硬说，在上次选举中，工人本来应当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即使在工人有希望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哪里又有在他们本阶级内相当闻名、能够得到必要支持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呢？公社失败以后，政府特别操心的，是把每个即使因进行个人鼓动而在巴黎他的本区内闻名的工人都当做起义的参加者而加以逮捕。这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共和派在上次十一月的选举中的胜利是重大的。而在随后举行的省、市镇选举和补选中取得了更加重大的胜利。保皇派的阴谋

本来也许会破坏这一切；但是，军队十分明确的立场使阴谋家不能有所作为。这不仅因为在军官中，特别在下级军官中有许多共和派，而且还因为士兵群众拒绝反对共和国，后一种情况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改组军队的第一个结果——改组军队废除了雇人顶替的做法，而把军队变成了各个阶级的年轻人的真正代表⁸⁰。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用武力镇压阴谋，因为它已经自行破产了。而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工人阶级在1871年的血腥屠杀以后还过于虚弱，并且在没有完全恢复自己的力量以前，丝毫不愿再次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中，滥用自己的主要财富，滥用自己的战斗力，或者卷入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之中。

但是共和派的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次胜利表明，1870年以来，农村居民前进了一大步。巴黎工人阶级以前所取得的每次胜利，都由于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阶级的反动精神而很快就化为乌有。本世纪初以来，法国农民是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巴黎工人1848年2月建立的第二共和国，被当年12月农民投给路易一拿破仑的600万张选票废除了。但是，1870年的普鲁士入侵，动摇了农民对帝国的信念，而上次的十一月选举表明，农村居民群众成为拥护共和主义的了。这一转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从此以后，任何君主复辟在法国都是毫无希望的。它还说明，城市工人同农村农民的联盟正在接近。大革命造成的小自耕农，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已经抵押给高利贷者；他们的收成要拿去付利息和诉讼费；公证人、辩护士、法警、拍卖官吏是经常出现在他们门口的威胁。他们的处境和工人的处境一样地坏，生活几乎是同样地没有保障。如果说，这些农民现在正在离开波拿巴主义而转向共和国，那他们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把改善境

况的希望寄托于路易—拿破仑经常向他们许诺但从不予诸实现的帝国奇迹上面了。梯也尔对“农民皇帝”具有的神秘拯救力的信念，被第二帝国粗暴地破坏了。魔法已经失灵。法国农民终于有了充分的觉悟，要去寻找长期贫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了。而既然他们已开始思考，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同那个丝毫不希望农民处在目前这种悲惨境地的唯一阶级，即同城市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可见，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同以前敌视他们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将来的胜利由以前那种巴黎对法国的暂时胜利，变为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工人所领导的法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最后胜利。

五

剩下要考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俄国。不能说俄国有过什么值得提起的工人运动。但是，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实行了农奴解放，使极大多数俄国人民由束缚在土地上的、必须为他们的地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农奴，变成了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转变显然早就是必要的，而它的实行却无论是对从前的地主或从前的农奴都没有好处。农民公社得到了份地，这些份地今后应当归公社所有，而地主则因为把土地让给农民，部分地也因放弃在此以前属于他们的占有农民劳动的权利而应该得到赎金。由于农民显然找不到钱来付给地主，于是国家就来干预这件事情。一部分赎金的抵偿办法是把农民在此以前独自耕种的土地转交一部分给地主；其余部分的赎金则以政府的债券支付，债券先由国家垫付，而农民则应当每年一次地分期连利偿还。大多数地主都把这些债券卖光以后把钱花完了；这样一来，地主现在不仅比过去穷，而且还找不到雇工来耕种他们的领地，因为农民的确不肯去为他们工作而让自己的田地荒芜。至于说到农民，他们的份地不仅数量比从前少了，而且往往少到在俄国的条件下不足以养家活口的地步。这些份地多半是领地中最坏的土地，是沼泽地或其他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过去属于农民的和由于他

们的劳动而改良了的好地，却转归了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也比以前大大恶化了；但是除此以外，他们每年还必须向政府支付国家贷给他们作赎金的债款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另外，向他们征收的赋税也在年年增加。其次，在解放以前，农民拥有公社对地主土地的某些权利：放牧自己的牲畜的权利，砍伐林木用于建筑和其他目的的权利等等。新的办法蓄意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如果他们想重新享有这些权利，就得再同他们从前的地主讲讲价钱。

因此，当改革使得大多数地主比以前更加负债累累的时候，农民也被弄到既不能死又不能活的地步。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所极力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将来为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政府也尽了一切可能来加速这个革命。贪污之风渗透到官场各方面，并使任何可以设想的善良意图都失去作用，这种传统的贪污风气像往常一样可恶地保存了下来。而当土耳其战争爆发的时候，贪污之风在每个公共机关简直是盛极一时。在克里木战争快结束时就已混乱不堪的帝国财政，这时处于愈来愈悲惨的境地。借款一笔又一笔地签订，结果，除了签订新的借款以外，就没有别的钱来支付旧债的利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专制制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出版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建立了陪审法庭，而由贵族、城市资产者和农民按照规定选出的代议机关，准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地方和省的管理。甚至对波兰人也开始在政治上轻佻地献媚。但是，舆论对政府的善良意愿估计错了。报刊变得太直率。陪审员也开始真正替那些政府甚至想不用任何罪证就加以判罪的政治犯辩护。地方和省的会议^①一致声称：政府用它

^① 即县和省的地方自治会议。——编者注

的解放法令破坏了农村，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人们甚至传说要召开国民议会，认为这是结束几乎不堪忍受的混乱状态的唯一方法。此外，波兰人再也不愿让人用诺言来款待他们，他们举行了规模十分巨大的起义⁸¹，以致于只有拿出帝国的一切力量和俄国军官的全部凶残，才能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于是政府又向后转了。残酷的镇压重新提上日程。报刊的嘴被堵住；政治犯被转交给为此目的而挑选出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的会议不再理睬。但是已经晚了。由于一度表现出恐惧的样子，政府丧失了威信。对它的巩固和它有能力彻底摧毁国内任何反抗的信心已经消失。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现在已经不可能使这些力量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听从政府指使了。讨论社会问题，虽然是私下地讨论，但已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成为习惯。况且，政府尽管力图回到尼古拉统治时期的肆无忌惮的专制制度，但在欧洲面前，毕竟还是企图表面上保持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自由主义。结果是一连串的动摇和犹豫：今天作出让步，明天又收回，然后又循环反复，半准许，半收回——政策时时在变化，结果每个人都看清了这个政府的内部软弱，看清了它缺乏远见和意志，而政府如果没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办法，那它就一文不值了。人们早已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人们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政府现在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少也像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府，人们一天天地愈来愈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对俄国政府来说，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摆在任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民反抗的政府面前的道路——那就是对外战争。于是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他们向欧洲说，这次打仗是要把基督徒从土耳其人长期横行霸道

之下拯救出来，而对俄国人民则说，进行战争为的是使同族的斯拉夫兄弟挣脱土耳其的羁绊，回到神圣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经过好多个月的不光彩的失败以后，现在才把土耳其的抵抗同样不光彩地镇压下去，——这部分地是靠背叛，部分地是靠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而使这次战争结束了。但是，俄国人夺得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这本身不过是全欧战争的序幕。或者是在即将召开的欧洲会议（如果这次会议真的召开）上，俄国不得不从现在夺得的地盘上大大退却，以致巨大的牺牲和微不足道的成果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一定会使人民的不满发展成极其猛烈的革命爆发；或者是俄国要在欧战中保卫它新夺得的地盘。一个力量已经消耗一半以上的国家，如果不向人民作重大的让步，它的政府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不管这种战争的最终结局如何。而在上述形势之下，这样的让步就意味着革命的开始。俄国政府即使能够使这个革命推迟一两年爆发，也无力避免这个革命。但是，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鲁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俄国政府在它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

卡·马克思 布 赫 尔 先 生

致“每日新闻”⁸²编辑

先生,据路透社报道:

“大使馆参赞布赫尔先生被任命为会议的档案保管秘书。”

这位“布赫尔先生”莫非就是在长期亡命伦敦期间出色地充当了臭名昭彰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热烈拥护者,并在柏林“国民报”⁸³上每周都替后者的反俄理论鼓吹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莫非就是在回到柏林以后成为斐迪南·拉萨尔的狂热信徒,以致被后者当做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而将每年的收入遗留给他并将自己的著作版权遗赠给他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洛塔尔·布赫尔就到普鲁士外交部供职,被任命为大使馆的参赞,并成为俾斯麦所信赖的代办。

他曾天真地给我写过一封信,约我(自然是征得他的主子的同意)为普鲁士的官方报纸“国家通报”⁸⁴撰写有关金融问题的文章。

稿酬条件让我自己决定,同时明确地向我保证,我完全有自由对现时金融市场上的业务和搞这些业务的人按照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发表意见。这件怪事发生以后,当我在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名为“先驱”⁸⁵的国际机关刊物上不时看到关于

洛塔尔·布赫尔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缴纳会费的公告时，总觉得十分好笑。如果这里没有弄错人，如果俄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鉴于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刺案而想对会议提出对付社会主义传播的国际措施这一消息还有几分是真实的——那末，布赫尔先生的确是一个恰当的人物，他可以十分有权威地向会议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和学说同这些谋刺案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同“大选帝侯号”⁸⁶的沉没或同柏林会议的召开没有关系一样；在德国进行的搜捕所引起的恐慌，以及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掀起的一片尘埃，纯粹是为竞选鼓动服务的，以便使这届帝国国会最终通过俾斯麦公爵早已拟定的方案来解决一个离奇的问题，即如何把现代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分给德国政府，同时重新强使德国人民接受被 1848 年的风暴摧毁的旧的政治制度。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6 月 12 日于伦敦

载于 1878 年 6 月 13 日“每日新闻”
第 10030 号和 1878 年 6 月 21 日
“前进报”第 7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并
根据“前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答布赫尔的“说明”

洛塔尔·布赫尔先生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他在6月20日写的“说明”，其中首先指出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即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报纸都转载了我给“每日新闻”的信^①。布赫尔先生宣称，要纠正我所作的一大堆歪曲，必须写3000行文字。然而要一劳永逸地弄清布赫尔所作的“更正”和“补充”的真相，只要写30行文字就足够了。

1865年10月8日，布赫尔先生写了一封信企图诱使我给“国家通报”撰稿，这恰恰是普鲁士自由党和进步党资产阶级同冯·俾斯麦先生发生冲突的时期。信中有一段话说：

“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将只依照您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的圈子是 *haute finance*（金融贵族），而不是考虑编辑部，我建议来稿能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了内在的含意。”

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说，他

“问过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关于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谈过。”

同一封信接着说：

^① 见本卷第159页。——编者注

“‘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

可见,布赫尔先生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他是受别的什么人的委托同我“通信”的。但他在“更正”中反倒说:

“任何人,甚至连‘国家通报’的编辑,都丝毫不知道这次的通信。”

这就是布赫尔先生作更正的方法。下面再举一个典型例子看看他作补充的方法!

在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只说到布赫尔先生“天真地”写信给我,但是只字未提我给他的回答。而布赫尔竭力要把这件“怪事”说得平淡无奇,就来给我作“补充”,他捏造说:

“马克思先生回答说,他不会给反动报纸写文章。”

我哪会这样庸俗地回答他的信呢?因为在以下一段总结性的话里,他这封信的“内在的含意”“不仅”说得明白,而且十分突出:

“进步(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换好多次壳;所以,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

卡尔·马克思

6月27日于伦敦

载于1878年6月29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180号;1878年7月2日“福斯报”第152号;1878年7月5日“前进报”第7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 国际工人协会史⁸⁷

我认为,对于大量伪造国际的历史方面的一项最新贡献(见今年7月的“十九世纪”⁸⁸)应当做几点说明,因为人们可能会发生错觉,以为最近这位历史伪造者、曾经当过工人和协会总委员会委员的乔治·豪威耳先生,是从一般人不知道的资料中汲取了自己的智慧的。

豪威耳先生在“协会史”的开头避而不谈以下事实:1864年9月28日我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入临时总委员会,此后不久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①,这两个文件最初于1864年在伦敦发表,以后于1866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豪威耳先生知道这一切情况,然而他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宁愿让“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第一次出现在“1865年9月25日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⁸⁹。豪威耳硬说,在那次会议上,当时这位“博士”“因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瓦解的种子”。

首先,国际在1865年9月没有召开过任何“代表大会”。大陆上协会各主要分部的几个代表聚集在伦敦,唯一的目的是同总委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的临时章程。——编者注

员会一起商讨应于 1866 年 9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这次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而不是在这位精确的历史学家乔治·豪威耳先生所仅仅提到的阿德菲坊的半公开的大会上进行的。

跟总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一起，我曾坚持代表会议通过我们所提出的议程，当这个议程发表时，法国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给“世纪报”的一封信里⁹⁰作了如下说明：

“决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各项议程的那种远大的见解和高度的道德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将赢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由的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顺便说一下，我荣幸地向总委员会陈述的一项议程是这样写的：

“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①

昂利·马丁对这一条文是这样评述的：

“我们可以指出，‘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一语，对波兰来说，意思是很简单明了的，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也像政治制度一样需要改革，在那里，这种基础已经为 1863 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国各阶级所接受。总之，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相一致的社会进步，对俄国的公社专制制度的推进所作的回答。巴黎人的这个秘密今后将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秘密。”

不幸的是，“巴黎人”如此严守自己的“秘密”，以致出席代表会议的两位巴黎代表（一位是托伦，现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参议员，另

① 法文本的记录刊印的不是：“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而是：“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昂利·马丁在文章中也是这样引用的）。德文本是：“在社会—民主基础上”。英文本是：“在民主基础上”。——编者注

一位是弗里布尔，现在不过是个叛徒)由于对这个秘密一无所知，恰恰抨击了议程中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如此热烈评述的那一项。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

“各种宗教观念(而不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三个神话——1865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在会上“提出宗教观念”，因此在国际内部产生的疯狂的斗争，——以一个奇谈来结束。他说：

“在就废除奴隶制问题而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草稿中，‘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被删掉了”，等等。

总委员会的确发出过一封公开信，然而不是给美国人民的，而是给他们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他十分亲切地接受了这封信⁹¹。我起草的这封信根本没有作任何改动。既然这封信中从来没有“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因此也就无从“删”起。

以下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总委员会对“宗教观念”的态度。——米哈伊尔·巴枯宁所创建的**同盟**⁹²的一个瑞士支部(它自称为**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曾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然而它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总委员会曾经就‘基督教青年会’一事声明过，它不承认任何神学支部”（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总委员会通告”日内瓦版第13页⁹³）。

当时还没有因钻研“基督教读物”（《Christian Reader》）而改变信仰的乔治·豪威耳先生，他所以同国际断绝关系，并不是受“宗教观念”的驱使，而是出于纯粹世俗的理由。在创办总委员会的“专门机关报”——“共和国”⁹⁴时，他曾贪婪地追求编辑的“高位”。在这次“沽名钓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不满起来，劲头越来越小了，不久就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因此，在国际的多事之际，他就置身于运动之外。

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对国际的历史问题一窍不通，另一方面又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中点缀一些惊人的揭露性的事件，于是他附和所谓克吕泽烈将军在芬尼亚社社员起义时出现在伦敦的说法，并宣称，这位将军在牛津街拉脱本广场的“布莱克-霍斯”住所里会见了“几个人，幸而是英国人”，以便把自己的“总起义”“计划”告诉他们。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假定有这样的事情，这也不过证明：克吕泽烈没有笨到如此地步，以致把自己的身分或自己的“计划”报告给总委员会，而对豪威耳所熟悉的“几个英国人”却谨慎地保守秘密。豪威耳本人不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巧妙的”干涉居然拯救了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免于普遍震荡的穿硬麻布衣服的^①好汉吗？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叙述他与一伙坏蛋短兵相接的虚构故事时，每次重复总要增加对方的人数，他津津有味地虚构，把对方描绘成一会儿是穿硬麻布衣服的人，一会儿是穿肯达耳呢上衣的人）。——编者注

乔治·豪威耳还透露了一个阴暗的秘密。

1871年6月初，总委员会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⁹⁵，这篇宣言遭到了伦敦报界的同声咒骂。有一家周刊攻击“卑鄙的作者”怯懦地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总委员会的帷幕后面。为了答复这一点，我在“每日新闻”上声明，我就是宣言的作者⁹⁶。在1878年7月，乔治·豪威耳先生竟以幕后人十分自负的姿态来透露这件已经过时的秘密：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卡·马克思博士……在它（sic!）被通过时，总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乔治·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都反对把它发表。”

他忘了补充一句，到会的其余19位英国委员都欢迎“宣言”。

从那时以来，这篇宣言的论点被法国地主义议会⁹⁷的调查表、凡尔赛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茹尔·法夫尔的审判案以及那些对胜利者远非敌视的人们的回忆录完全证实了。

一个具有乔治·豪威耳先生的渊博学识的英国历史学家，傲慢地无视法国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材料，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承认，比如在赫德尔和诺比林谋刺案这样的事件中，我一看到伦敦的几家大报一再重复已被它们的目睹此事的记者所驳斥的那种卑鄙的诽谤，就感到厌恶。

豪威耳先生在谈论总委员会的财务时，简直成了势利眼。

总委员会在它公布的向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报告中嘲笑了欧洲警察的忙碌的喉舌和资本家的古怪幻想硬加在它头上的大量财富。报告中说：

“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⁹⁸

厄内斯特·勒南先生（他的观点诚然不像乔治·豪威耳先生

所要求的那样正统)甚至认为,那种曾经摧毁罗马帝国势力的早期基督教团体的性质在国际各支部的身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乔治·豪威耳先生这位著作家,是结晶学中称为“假晶”的人物。他那种笔法的外形,只是摹仿那种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钱袋满满的英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体。虽然豪威耳的有关总委员会收入的一系列“数字”是从总委员会每年向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抄来的,但是乔治·豪威耳先生毕竟没有减损自己的“摹仿”品格并卑微地回答了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即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陆欧洲的各国政府不是对总委员会的空预算感到安心,而是害怕“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的可怕的组织以及协会几年来的飞速发展”(见西班牙外交大臣给西班牙各驻外使节的通令)。请您合情合理地说一下,为什么罗马教皇和他的主教们诅咒国际,法国地主议会宣布它为非法,俾斯麦在奥、德两国皇帝在萨尔茨堡会见时用神圣同盟的十字军征讨威胁它⁹⁹,白色沙皇让当时由非常卖力气的舒瓦洛夫所主管的可怕的“第三厅”去照管它,而不用最简单的办法,在它面前挥动总委员会的可悲的预算,来驱散赤色幽灵呢?

乔治·豪威耳先生体谅地认为:“贫穷不是罪恶,但它使人万分困窘。”我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他本应怀着更大的自豪感回忆自己过去同国际工人协会的亲密关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博得世界声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地位,并不是由于钱袋的大小,而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

然而,乔治·豪威耳先生却从岛国“庸人”的高尚观点出发,告诉“十九世纪”月刊的“有教养的读者”说:国际已经“失败”并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

荷兰和美国或多或少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都是国际性的团体,这些团体已经不是少数分散在各国以及由独立存在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一些支部,而是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交往中,由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意愿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自己组成的团体。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整个组织无疑遭到了暂时的破坏,然而现在它又开始恢复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存在着种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波希米亚和俄国的斯拉夫人参加这一国际运动,目前居然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是在1872年连最乐观的人也预料不到的。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

卡·马克思写于1878年7月初

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
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第5
期(第10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俗纪事和自由
思想进步年鉴”杂志

弗·恩格斯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俄国的状况

3月21日于伦敦

德国社会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得到的结果证明，要想封住社会党人的嘴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反社会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

德国工人作了极大努力和重大牺牲，才取得了他们享有的这点起码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这是连续不断的斗争，但是归根到底，胜利总是属于工人的。他们能够组织起来，每一次国会选举，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

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好了的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怎么办的。

几年以来，我都要求欧洲的社会党人注意俄国的状况，在俄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在成熟。在那里，政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达到了再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地步。运动好像眼看就要爆发了。在那里，政府的走狗干着难于置信的暴行。对付这些嗜血的野兽，只要可能，就必须用火药和子弹来自卫。俄国的政治性谋杀就是聪明、勇敢和有自尊心的人们用来自卫和对付前所未闻的专制制度走狗的唯一手段。

军队、甚至宫廷人士中间出现大规模的阴谋活动，全国舆论由于战后外交失败而感到屈辱，国库空虚，信用紊乱，银行家不得到国民议会的保证就拒绝贷款，最后，还有贫困。这就是俄国的总结。

弗·恩格斯写于 1879 年 3 月 21 日

载于 1879 年 3 月 30 日“人民报”

第 12 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
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¹⁰⁰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 8 月 20 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的“年鉴”¹⁰¹来了，而后希尔施本人也来了。

我可以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给你看，而这一点我是明确地托付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创办的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这首先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两个来月就一命呜呼；其次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指导报纸的方针。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安排就绪，其余情况待由苏黎世再通知”（李卜克内西 7 月 28 日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的第一页

希尔施的信),可是他并没有接到。倒是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7月24日)告诉希尔施说:“代表权和**监督权**(对报纸的)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同**我们**”似乎开过会,会上认为:

“您担任‘灯笼’¹⁰²编辑时同某些同志发生的分歧,将使您的地位有些为难,但我认为这些疑虑是无关紧要的。”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物质状况。哪些同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根本不重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维持报纸一年的经费”。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关于他设想给报纸拟定方针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并接到一项**规定**:

“**监督委员会**应当特别坚持这一点,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是,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是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派商议。他8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该知道吧,他曾**坚决要求**把这封信转告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就是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意见,由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然而，李卜克内西 7 月 28 日向希尔施写道：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包括赫希柏格在内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细节，我不感兴趣。”

李卜克内西在最近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没有提，而是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卜克内西 8 月 14 日给我的信也提到这一点，并坚持要我们说服希尔施接受。直到 8 月 20 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您对我说：

“他（赫希柏格）在编辑部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更有影响。”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 8 月 11 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设于苏黎世的三人团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分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莱比锡三人团同意之下挑选编辑……据我所知，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项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根据这种情况，我觉得，……得不到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支持，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稍微**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同苏黎世派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任**；没有他们的支持，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不知道姓名的苏黎世三人团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给菲勒克的信里附了一段话，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像菲勒克所想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其实它是对党即对我们负报纸**财务责任**的**管理委员会**；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监督你**。”

苏黎世的三个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唯一**参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说，希尔施应当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对他提出了条件的上述决议，对这一点人们丝毫没有考虑过，甚至莱比锡派也根本没有想到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

即使莱比锡派在授予苏黎世派以全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苏黎世派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施拉姆 8 月 14 日向希尔施写道：

“假如当时您没有来信说，在类似的情况下（如凯泽尔事件）仍然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不会对此多费唇舌。但是鉴于您提出的声明，我们应当对新报纸如何刊载文章的问题保留决定权。”

7 月 26 日，也就是在苏黎世的一次会议确定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全权以后**很久**，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好像谈过这一点。但是，在苏黎世人们十分醉心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在后来答复希尔施的信中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

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由于莱比锡派方面和苏黎世派方面都坚决拒绝告诉他稍微确切的情况，没有说明报纸的经费基础如何，报纸能否至少维持一年。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

项。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和赫希柏格做后盾），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已经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现在还远没有排除。800 马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一数目正好等于这里的团体在上半年补助“自由周报”¹⁰³的经费（40 英镑）。

（2）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世派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部的权利，结果发生了一场意见不一的滑稽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派不仅要监督，而且要亲自检查报纸，给希尔施留下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对此只能表示同意。我们听说^①，莱比锡委员会由于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员而得到了加强，因此只要莱比锡的三人之间意见一致，就能很快地作出决定。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二、给报纸拟定的方针

伯恩施坦早在 7 月 24 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他担任“灯笼”编辑时同某些同志的分歧，可能使他的地位感到为难。

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方针，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

^① 在原稿旁边用铅笔注明：“从赫希柏格那里”。——编者注

的方针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诉讼,而在德国则不应该过于畏首畏尾。他问到底指的是哪些同志,他还说:

“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人,并且请您相信,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反纪律的事情,我将对他采取完全相同的态度。”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至于报纸的方针,在监督委员会看来,‘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报纸与其说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一切(!)同志斥责的事情,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反对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柏格说,类似凯泽尔事件的情况,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此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命令和善意的指示”。

菲勒克也写道:

“指示”新报纸“……采取不偏不倚的方针,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切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伯恩施坦的可指责之处至多是,他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在我们不能打着旗帜前进的时候,如果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好像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唯一在帝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纪律,因为他:

- (1) 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 (2) 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的策略的基本原

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希尔施无疑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曾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一条确定不移的、最基本的原则，竟投票赞成拨款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那末我们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分权利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怎么会对于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柏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动，这就使人认为他是正确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真的糟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侮辱，以前还可以完全归咎于凯泽尔，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侮辱更加重了，同时，希尔施的功绩也显得更加重大，因为他把凯泽尔的卑鄙言论以及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绝对正确的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违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议掩饰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那些比任何人更应当遵守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议员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党纪，因为他不顾这个决议——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和在以前实际产生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

不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报，特别是“前进报”¹⁰⁴宁愿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去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保护关税问题突然成了现实问题，对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看法，而没有一个人能为明确而正确的判断提供条件，如了解德国工业的情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某些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情绪还不可能绝迹，这一点也是要考虑到。摆脱这种混乱的唯一途径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讨论问题（像“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它没有被坚决地采取；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些讨论中一开始就表现出犹豫不决、态度不肯定不明确，以至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新的报纸决不应当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与其说应当热中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切忌偏激。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是最合适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打着旗帜前进”。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打着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出版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一般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公开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只是证明，他同德国的这些法律很相称，他实际上说不出在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不允许说的话。编辑

委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于这种可能性无须再作估计。谁不作好这种准备，谁就不能担任这样突出的光荣的岗位。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1830年以来，德国侨民在国外出版的所有刊物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灯笼”都算是偏激，那末新的报纸只会在国外的同志面前损害德国党的名誉。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¹⁰⁵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报纸的真正纲领，因为报纸的方针是由他们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

利益的片面斗争^①；其实他是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其次谴责他“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地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地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 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到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来说是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片面这一点，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根本不想了解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编者注

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 85 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统的态度，在可以谴责他们的东西中并不是最无足轻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以卵击石，不

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非常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¹⁰⁶，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 88 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静、客观和慎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就是利用这种步子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第 88 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必须清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又是什么呢？如果消灭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给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自愿地许下诺言，说它愿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需达到的目标，那末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定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但是真正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子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在这里，我真要颂扬“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了，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尽力促进 1873 年的崩溃，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作。

另一种违背良好的风度的情形，就是对于“只是时代产物”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也有一个害处：

“使那些否则会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并且无论如何是加强

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¹⁰⁷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从 1848 年起早就很熟悉所有这些言辞的人来说是如此。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 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当时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神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

人在 1848 年和 1849 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那末这些信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于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¹⁰⁸，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

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到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

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新的党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是事情也许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在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 5 名委员和白拉克写的
.....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派也看看这封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9 年 9 月 17—18 日
第一次发表于 1931 年 6 月 15 日
“共产国际”杂志第 12 年卷第 23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¹⁰⁹

一、关税率

在讨论那个把德国社会党人置于非法地位的臭名远扬的法律时，俾斯麦先生说，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争辩地存在的社会混乱现象，保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谋福利的这种“积极”措施的建议¹¹⁰。他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领导本国事务 17 年的人，有权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行。这很像一个人说，只要他吃了 17 年马铃薯，他就精通农学了。

不管怎样，俾斯麦先生这一次履行了诺言。他赐给了德国两大“社会措施”，而且还不止这些。

其中第一项措施是以关税率保证德国工业独霸国内市场。

在 1848 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蒸汽、机器很少见。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怯懦于 1848 年和 1849 年在政治舞台上遭受可耻的失败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业,从中求得安慰。德国很快就改变了面貌。1849 年以后没有到过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王国、西里西亚矿山、柏林和沿海城市的人,在 1864 年就认不出这些地方了。蒸汽和机器到处被采用。大工厂代替了大部分小作坊。轮船先是在沿海航行中,后来又在横渡大西洋的通商中,逐渐排挤了帆船。铁路增多了;在建筑工地、煤矿和铁矿上,到处都非常活跃,这是迟缓的德国人曾经认为自己做不到的。同英国的、甚至法国的大工业发展情况相比,这一切还不算特别突出,但是毕竟有了开端。而且在做这一切事情时,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没有津贴或出口奖励金,而当时的关税税率,同其他大陆国家比较起来,完全可以看做是自由贸易的税率。

顺便指出,这个工业运动也没有避免它在一切地方引起的那些社会后果。在此以前,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纪保持下来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一般说来,他们曾经还有某些机会变成小生产者、独立的工匠、几台手工织机的占有者等等。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工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因而也就开始组成一个固定的阶级,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谁说无产阶级,谁就是说社会主义。同时,工人在 1848 年街垒战中争得的自由还残存着一些。由于这两种情况,在 1848 年以前只限于秘密宣传和只有人数极少的秘密组织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就能公开活动和深入群众了。于是从 1863 年起,拉萨尔恢复了社会主义鼓动工作。

后来就是 1870 年的战争,1871 年的和约和几十亿赔款。如

果说法国绝没有因为偿付了这些赔款而破产，那末德国却由于得到了这些赔款而差一点毁灭。暴发户的政府毫不吝惜地在全帝国（这个帝国本身也是暴发户）乱花赔款，这几十亿就落到了大金融家的手中，他们急忙通过交易所从中取得利益。在柏林，Cr dit Mobilier¹¹¹的好日子又重现了。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所谓对贸易、交通线、消费资料等等的社会需要，无非是用来掩饰交易所强盗把手头的几十亿投入周转的不可遏止的需要而已。其实，巴黎还在贝列拉利富尔德之流的黄金时代就已见过这一切了；这也就是这些交易所赌棍在柏林以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等等名字重新出现。

1867年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和纽约常常发生的事情，1873年很快地就在柏林发生了：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终造成了普遍的崩溃。成百家公司破产了。维持下来的那些公司的股票卖不出去。这是彻底的全线崩溃。但是，为了能够进行投机，就必须制造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建造工厂和铁路等等，以它们的股票作为投机的对象。到了崩溃的时候才发现，作为进行这些活动的借口的社会需要，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在4年中修建的铁路、工厂、矿场等等，比在工业正常发展时期25年中修建的还要多。

除了铁路（关于铁路下面还要谈），主要是在制铁工业中进行投机活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甚至建立了几个胜过克列索的企业。不幸，在危机的时刻发现，这样大规模的生产没有消费者。一批巨大的工业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缘。作为善良的德国爱国者，公司的董事们就请求政府帮助：他们请求实行保护关税制

度,以便为自己保证国内市场,免受英国铁的竞争。但是,既然要求对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对其他工业部门以及农业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在整个德国,人们热烈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这就使俾斯麦先生有可能实行一种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关税税率。这一在 1879 年夏季取得法律效力的税率就是现行的税率。

但是,不管德国工业过去的情况如何,它一直都是在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里发展的。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得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提供大批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不要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这是官方意见的真正反映,欧洲科学界著名人士、德国政府的正式专员勒洛先生,对 1876 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展出的德国产品的见解¹¹²就是这样。

这种工业只有在国内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能在中立市场上维持下去。如果要使德国的织物、金属制品、机器在国外经得住竞争,那就必须使这些产品的一切原料如棉纱、亚麻或丝、未经加工的铁、金属丝能够用同外国竞争者购买它们相等的低价购买。所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继续输出织物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冒险实行自由贸易,让这个工业去利用进口原料。或者是依靠关税来保护德国的金属生产和纺织业,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可能再输出以纱和未经加工的金属为原料的商品了。

俾斯麦先生用他的著名的税率保护纺织工业和冶金业,从而消灭了德国历来具有的向国外销售德国织物、金属制品、针、机器的最后机会。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有剩余农产品出口的德国,目前

却不得不进口外国农产品以补不足。如果俾斯麦先生禁止本国工业生产出口商品，那末将用什么来支付进口上述商品以及其他商品(对这些商品的需要是世界上任何税率都取消不了的)所需的费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俾斯麦先生的天才同他的交易所朋友和顾问们的天才结合起来。请看是这样做的。

拿铁来说。投机和狂热生产的时期赏给了德国两个企业（多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劳拉冶金工厂），每个企业都能单独生产足够全国中等水平的需要的产品。此外在埃森还有克虏伯的规模巨大的企业，在波洪也有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和无数较小的企业。因此铁的产量超过全国需要量至少两倍或三倍。可以说，这种情况绝对要求实行最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这么多的过剩产品销售出去。可以这样说，有关人士的意见却不是这样。因为值得重视的、统治着其他企业的企业总共不过一打，所以就形成了美国人所说的瑞恩，即为了保持国内价格和调节输出而成立的联盟。

在通过投标订购它们工厂的钢轨或其他产品时，委员会就依次指定一个成员来接受订货，并规定该厂接受订货的价格。其他合伙人则提出较高的价格，这种价格也是预先规定的。这样一来，任何竞争都停止了，出现了绝对的垄断。在出口方面也这样做。为了保证完成这个计划，瑞恩的每一个成员都交给委员会一张125000法郎的凭票即付的票据，一旦开票人违背自己的义务，这张票据便会投入流通和要求支付。这样一来，从德国消费者那里敲诈来的垄断价格，使这些工厂能够在国外以甚至英国人也拒绝出售的那种价格推销自己的剩余产品，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德

国的市侩（其实他们也是活该如此）。就这样，由于实行了保护关税，德国的出口事业又重新成为可能了，虽然在普通公众看来这种关税似乎是要断送出口事业的。

还用举例吗？去年有一家意大利铁路公司（我们能够叫出它的名称）需要三四万吨（每吨 1000 公斤）钢轨。经过长期商谈以后，一家英国工厂承包了 1 万吨；其余部分由多特蒙特联合公司以英国所拒绝的价格接受了下来。有人问一位英国竞争者为什么不提出比德国企业更优惠的条件，他回答说：世界上谁能经得起破产者的竞争呢？

苏格兰打算在爱丁堡附近的海湾上建造一座铁路桥。这座桥需要 1 万吨贝氏钢。谁接受了最低的价格，谁击败了他所有的竞争者，而且这都是在大规模的炼铁工业的祖国英国？——是一个德国人，是在很多方面受俾斯麦庇护的“枪炮大王”、埃森的克虏伯先生。

铁的情况就是这样。不用说，这个美妙的制度只能把这些制造阴谋的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几年而已。一旦其他生产部门也仿效它们，它们就会使本国破产，而不是使外国竞争者破产。这好像是生活在疯人国里。但是上述一切事实都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报纸上引来的。在保护德国工业的名义下组织破坏这个工业——一些德国社会党人老早就一再地说，俾斯麦先生好像得到了报酬似地为社会主义效劳，他们不是说得很对吗？

二、国有铁路

从 1869 年到 1873 年，柏林的投机活动大肆泛滥的时候，两个

有时敌对有时联合的企业，即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银行，分掌了交易所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柏林的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投机活动的对象首先是铁路，而这两家银行就想间接地成为大多数现有的和还在建设的大铁路线的主人。只要购买和掌握每条铁路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就能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取得优势；而以这些股票作保证又可获得借款去购买新的股票，如此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简单地重复一个小小的巧妙勾当，这种勾当初给贝列拉兄弟带来了令人目眩的成就，而最终，大家知道，却是 Cr dit Mobilier 的破产。柏林的贝列拉之流起初也得到了这样的成就。

1873 年发生危机。我国这两家银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们积压着大批铁路股票，但再也不能从中抽回被这些股票吞掉的几百万了。控制铁路公司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改变方针，想把股票卖给国家。把全部铁路集中在帝国政府手中这一方案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而是为了拯救两家没有支付能力的银行。

实现这个方案不是太困难的。使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对新的公司“发生兴趣”，这样就完全支配了民族自由党和温和保守党，即大多数。帝国的大官们、普鲁士的大臣们曾经参与了这些公司赖以成立的诡计。要知道，布莱希勒德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俾斯麦先生的金融事务方面的经纪人。因此，钱是够多的。

同时，为了补偿向帝国出售铁路时所费的力气，必须提高股票价格。为此，于 1873 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局长是一个有名的投机者，他立刻把德国所有铁路的运费提高了 20%，这样就能增加纯收入，从而也使股票价格大约提高 35%。这是这位先生所采取的唯一措施，只是为了这一点他才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无怪乎他不

久就推掉了这个职务。

首先，这个方案迷住了俾斯麦。但是那些小王国却反对这个方案，联邦会议断然拒绝了方案。因此又改变方针：决定由普鲁士先购买所有的普鲁士铁路，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些铁路转让给帝国。

而帝国政府还有一个迫使它想购买铁路的秘密动机。这个动机是同法国的几十亿相联系的。

在这几十亿中留下了很大一个数目来建立三项“帝国基金”：一项用来修建帝国国会大厦，第二项用于要塞，最后，第三项用于最近三次战争中的残废者。三项基金共为 92600 万法郎。

在这三项基金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奇怪的一项是残废者基金。这项基金是预定要自行取消的。这就是说，随着这些残废者中间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基金本身，无论是资本或资本的收入，也就要消灭。这种自行消耗的基金，可以重说一次，是只有疯子才会想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发明这种基金的是贴现公司的那些投机者，——而且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难怪要花几乎一年的时间才说服政府接受这一主张。

但是我们的交易所赌棍们觉得基金的自行消灭还不够快。不仅如此，他们认为也需要赋予其他两项基金这种自行消灭的优点。办法很简单。在法律还没有确定这些基金所要投入的证券的性质以前，一个属于普鲁士政府管辖的商业企业奉命购买相当的有价证券。这一企业去找贴现公司，公司就为三项帝国基金出售了 3 亿法郎的铁路股票，这些股票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都是当时卖不出去的。

在这些股票中有马格德堡—哈耳伯施塔特铁路（以及与该铁

路联合的各线)的股票 12000 万,这条铁路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它预期要保证骗子们得到大量的利润,但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让股东们得到丝毫的收入。如果我们注意到下述事实,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事实就是,董事会发行了 1600 万股票来抵补建造三条铁路支线的开支,但是,这些支线的修建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这笔钱已经不知去向了。而残废者基金却以握有相当多的这种并不存在的铁路的股票而感到骄傲。

由普鲁士政府购买这几条铁路线,立刻就会使帝国购买这些铁路的股票合法化,并会使这些股票具有某些实际价值。这就是这件事情对帝国政府的好处。无怪乎这里谈到的购买这条铁路的交易,是普鲁士政府提出并为两院批准的首批交易之一。

国家付给股东们的价格,大大高于甚至好的铁路线的实际价值。购买这些铁路的决定为人们知道以后它们的股票不断上涨,而且特别是出售的条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两条大铁路线的股票在 1878 年 12 月是按 103 和 108 的行情出售的,后来这两条线被国家买下了。现在它们的股票的市价分别为 148 和 158。正因为这样,在出售的时候,股东们很难隐藏自己的高兴心情。

不言而喻,这一次涨价首先给那些获悉政府的秘密意图的柏林大交易所经纪人带来了好处。在 1879 年春天还是相当沉闷的交易所重新活跃起来了。投机者在最后放弃自己的宝贵的股票以前,利用它们又掀起一次投机热潮。

人们看到:德意志帝国和当年法兰西帝国同样地处于交易所的影响之下。正是交易所经纪人准备各种方案——对他们填满腰包有利的方案,政府则必须加以实行。但是德国还有一个为波拿巴帝国所缺少的长处:当帝国政府受到各小邦君主反对的时候,它便

变成普鲁士政府，这个政府当然不会遭到它的两院的反对，因为两院就是交易所的真正的分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国际总委员会在 1870 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不是就说过：俾斯麦先生，您推翻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只是为了在本国恢复这一制度！¹¹³

弗·恩格斯写于 1880 年 2 月底
载于 1880 年 3 月 3 日和 24 日
“平等报”第 2 种专刊第 7 号和
第 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弗·恩格斯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¹¹⁴

弗·恩格斯写于 1880 年 1—3 月
上半月

载于 1880 年 3 月 20 日、4 月 20 日
和 5 月 5 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
3、4 和 5 期，并于 1880 年在巴黎出
版法文单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
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 1953 年柏林狄茨出版
社德文版译出

弗·恩格斯

Bibliothèque de la REVUE SOCIALISTE

I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

FRÉDÉRIC ENGELS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PAUL LAFARGUE

Prix : 50 centimes



PARIS

DERVEAUX LIBRAIRE-ÉDITEUR

22, Rue d'Angoulême, 32

1890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书的法文第一版的扉页

—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最初,这句话的意

①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ú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

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¹¹⁶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其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

页¹¹⁵) 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

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¹¹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¹¹⁸，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

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现在，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 and 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就发现新制度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¹¹⁹，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主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

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¹²⁰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¹²¹。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

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 30 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

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期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

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¹²²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说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¹²³。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平的唯一保障¹²⁴。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¹²⁵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

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¹²⁶。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迄今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¹²⁷。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¹²⁸。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¹²⁹，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个 29 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 500 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 1800 到 1829 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

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 2500 人, 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 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 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 在这里, 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 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 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 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 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 13—14 小时, 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 10 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 4 个月的时候, 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 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 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但是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 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 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 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 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 这 2500 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 仅仅半世纪前还需要 60 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 这 2500 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 60 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 他们除了领取 5% 的股息以外, 还得到 30 万英镑 (600 万马克) 以上的利润, 新拉纳克尚且如此, 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 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

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①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只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来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¹³¹。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

① 摘自“头脑中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¹³⁰。

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¹³²。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巨大的工会联合会¹³³。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¹³⁴；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¹³⁵，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他

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理论和各学派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二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现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¹³⁶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

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¹³⁷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

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比以外，都是鬼话”¹³⁸。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有最惊人的遭遇。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现象，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另一种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

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

才能做到。现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自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的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¹³⁹。

这种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在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

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

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 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通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

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是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

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未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相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①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

①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①,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生产关系,并加了一个脚注:“在‘反杜林论’中是:生产力。”——译者注

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编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¹⁴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个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

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成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

形式^①。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

① 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当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生产费用，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

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①，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面：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¹⁴¹。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

^① 见书末的附录。[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他的著作“马尔克”。见本卷第351—369页。——编者注]

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 1845 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 109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69 页。——编者注]

了奴役工人的工具¹⁴²。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省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劳动力的最严重的浪费和对劳动机能的正常前提的掠夺¹⁴³；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¹⁴⁴。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和深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

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 1825 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 1825 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 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 *crise pl thorique* 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¹⁴⁵。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产生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甚至资本家也由于资本的猛烈集中而感觉到这一事实，因为在危机期间这种集中是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

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

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 1890 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 48 个大工厂合并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 12000 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①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

①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当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¹⁴⁶、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

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暴风雨时雷鸣闪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

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积极端行动都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¹⁴⁷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

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

以,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①。

① 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扩张力。根据吉芬的计算¹⁴⁸,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 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 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 1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

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⁴⁹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 45500 万马克。

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

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由自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卡·马克思 关于“哲学的贫困”¹⁵⁰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在1847年，即在蒲鲁东的“经济矛盾”¹⁵¹（副标题为“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后不久问世的。我们所以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因为像拉萨尔那样的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从上述著作中吸取来的。马克思同意把他的著作重新登载在我们的机关报上，这就是表示同情我们。

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还要说几句话。一方面，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¹⁵²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

然而，蒲鲁东逝世以后，马克思在一篇发表于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¹⁵³上的文章中，对这位战士的伟大品格、对他在 1848 年六月的日子以后的英勇行为以及对他这位政治作家的才华，作了应有的评价。

卡·马克思写于 1880 年 3 月底

载于 1880 年 4 月 7 日“平等报”
第 2 种专刊第 12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平等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工人调查表¹⁵⁴

—

- (1) 你在哪一个工业部门工作？
- (2) 你工作的企业属于谁，属于私人资本家，还是属于股份公司？私人企业主或公司经理姓什么。
- (3) 请说明有多少职工。
- (4) 请说明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 (5) 招收的童工(男孩和女孩)最小是几岁？
- (6) 请说明监工和不是一般雇员的其他职员有多少。
- (7) 有没有学徒？有多少？
- (8) 除了固定的和经常有工作的工人以外，是不是在一定季节还从外面招收另外的工人？
- (9) 你的老板的企业是全部或主要为当地定户生产的呢，还是为整个国内市场或为了向其他国家出口而生产的？
- (10)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 (11) 如果你工作的企业在农村，那末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生活的主要来源？还是作为从事农业的补充收入，还是两者相结合呢？
- (12) 干活是完全用手工方式，还是主要用手工方式，还是用机器？

(13)请讲一下你工作的企业的分工情况。

(14)用不用蒸汽作动力？

(15)请说明生产各个过程的工作场所的数目。谈谈你所从事的那部分生产过程，不仅从技术方面，而且从它所引起的肌肉和神经的紧张程度以及对工人健康的一般影响的观点来谈。

(16)请谈谈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面积大小（划给每个工人的地方），通风，温度，粉刷，厕所，一般卫生，机器噪音，尘埃，湿度等等。

(17)政府或地方机关对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有没有某种监督？

(18)在你的企业里有没有引起工人特殊疾病的特别有害的因素？

(19)工作场所是不是摆满了机器？

(20)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来防止工人的肉体受到发动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械的伤害？

(21)请讲讲在你工作以来发生过的造成工人残废或死亡的最严重的不幸事故。

(22)如果你在矿上工作，请说明你的企业主为保证通风、防止爆炸和其他危险事故，采取了怎样的防护措施？

(23)如果你在冶金或化学生产部门，在铁路或其他特别危险的生产部门工作，请说明你的企业主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

(24)你的工作场所使用的是煤气灯、煤油灯还是其他照明设备？

(25)在工作场所内外有没有足够的消防器材？

(26)企业主**根据法律**是不是必须付给不幸事故的受害者或他

的家庭以抚恤金？

(27) 如果不是，那末企业主是不是用某种方式给那些为他发财致富而在工作时受伤害的人以赔偿？

(28) 在你的企业里有没有某种医疗设施？

(29) 如果你在家中工作，请谈谈你的工作场所的状况；你用的只是一些普通工具呢，还是也有小机器？你是不是利用你妻子和孩子们的劳动以及其他辅助工人（成年工或童工，男工或女工）的劳动？你是为私人主顾干活，还是为“企业主”干活？你怎样同他们联系，是直接联系还是经过中间人？

二

(1) 请说明工作日一般有多长，一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

(2) 请说明一年有几个假日。

(3) 在一个工作日内有哪些休息时间？

(4) 有没有规定一定的吃饭时间，或吃饭是不定时的。^①

(5) 在吃饭时间干不干活？

(6) 如果用蒸汽，请说明实际的开关时间。

(7) 开不开夜工？

(8) 请说明童工和 16 岁以下的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

(9) 在一个工作日内，童工和少年工人是不是换班？

(10) 政府有没有通过控制童工劳动的法令？企业主是不是严格遵守这些法令？

(11) 有没有为在你的工业部门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学

^① 沙·龙格对调查表的这一项作了下述补充：“在哪里吃饭，室内还是室外？”——编者注

校?如果有,那末一天中哪些时间孩子们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学习些什么?

(12)在生产日夜进行的地方,采用怎样的换班制度,是不是由一班工人换另一班工人?

(13)在生产繁忙时期,工作日通常延长多久?

(14)机器是专门雇工人来擦拭的呢,还是由使用机器的工人在工作日内无报酬地擦拭的?

(15)采用哪些规划和处分来保证工人在工作日开始时和午休后准时上工?

(16)你每天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后回家要花多少时间?

三

(1)你的老板规定了怎样的雇佣制度?你是按日、按周、按月雇佣的呢,还是按其他办法雇佣的?

(2)规定解雇或离职要在多长时间以前通知?

(3)如果由于企业主的过错而违反了合同,是不是追究他的责任,什么责任?

(4)要是工人违反合同,会遭到怎样的处罚?

(5)要是使用学徒劳动,那末和他们订的合同有哪些条件?

(6)你的工作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7)你的企业主要是在一定的季节进行生产呢,还是通常相当均衡地全年进行生产?如果你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那末在其他时间你靠什么收入生活?

(8)你的工资是怎么计算的?是计时还是计件?

(9)如果是计时,那末怎样同你结算?是按钟点还是按整个工作日?

(10)加班是不是补发工资?

(11)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请说明是怎么计算的?如果你工作的生产部门里完成的工作是用尺量或过磅计算的(如煤矿),那末,你的老板或他的帮手是不是用欺诈手段剥夺你的部分工资?

(12)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那有没有拿产品质量作为欺诈的借口,来克扣工资呢?

(13)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你**过多长时间**领工资?换句话说,在你领取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工资以前,你给老板的贷款有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发工资:一星期以后,一个月以后,或还要长?

(14)你是不是感到:这样拖延发工资,就迫使你经常跑当铺,付出高额利息,同时使你失去你所需要的物品,或者迫使你向小铺老板借钱,变成他们的债户,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5)工资是由“老板”直接发给,还是经过中间人或“包工头”等等?

(16)如果工资是经过“包工头”或其他中间人付给的,请列举你的合同条件。

(17)请说明你一天或一周工资有多少。

(18)请说明和你在同一工场工作的女工和童工在上述时间内的规定工资。

(19)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日工资。

(20)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计件工资。

(21)请说明在上述时间内你的实际工资;如果你有家,也请说明你妻子和孩子的工资。

(22)工资是付给现金,还是一部分付给别的东西?

(23)如果你向你的企业主租房屋,请说明有哪些条件。企业主是不是从你的工资中扣除房租?

(24)请说明下列日用必需品的价格^①:

(a)房租和租房条件;有几个房间;多少人住;房屋修缮和保险;家具购置和修理;寄宿;取暖、照明和用水等等;

(b)食品:面包、肉类、蔬菜(马铃薯等);乳制品、鸡蛋、鱼;黄油、植物油、脂肪;糖、盐、调味香料;咖啡、茶叶、菊苣;啤酒、西得尔酒、葡萄酒等;烟草;

(c)衣服(父母和孩子的);洗衣;卫生用品,洗澡,肥皂等等;

(d)其他开支:如邮资,还债和付给当铺的保管费;孩子在学校学习的各种开支,学费,买报,买书等等。交给互助会、罢工基金会、各种联合会、工会等等的会费;

(e)和你从事的职业有关的开支(如有这种开支);

(f)捐税。

(25)请尽量算出你每周和一年的收入(如果你有家,也请算出家庭的收入)以及每周和一年的支出。

(26)根据你个人的经验,你是不是觉得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如房租、食品价格等等)比工资提高得更快?

(27)请说明你所记得的历次工资变动情况。

(28)请介绍一下在萧条或危机时期工资降低的情况。

^① 由此以下至第 25 项马克思是用法文写的,以后仍用英文。——编者注

(29)请提供在所谓繁荣时期工资提高的情况。

(30)请介绍一下产品式样改变以及局部或普遍的危机所造成的生产停顿的情况。

(31)请对照地谈谈你生产的产品价格或你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改变情况和工资同时改变或不变的情况。

(32)在你工作以来是不是有过由于采用机器或其他改进而解雇工人的情况？

(33)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34)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时候有过由于生产改进而提高工资的情况？

(35)你是不是知道,有哪个普通工人在年满 50 岁时可以脱离工作而靠他做雇佣工人时挣的钱过活？

(36)在你的生产部门里一个中等健康水平的工人可以工作多少年？

四

(1)在你的行业中有没有工会？它们是怎样活动的？

(2)在你工作以来你们行业的工人举行过几次罢工？

(3)这些罢工的时间有多长？

(4)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

(5)罢工的目的是不是提高工资,或是反对降低工资的做法？或是关于工作日的长短,或是由于其他原因？

(6)罢工的结果怎样？

(7)你们行业的工人是不是支持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

(8)请谈谈你的老板为了管理他的雇佣工人而规定的规章以及违反规章的处分。^①

(9)企业主有没有结成联合会,以便强迫工人接受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干涉罢工,总之,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

(10)在你工作以来,你是不是知道有政府方面滥用国家权力来帮助老板反对工人的情况?

(11)在你工作以来,这个政府是不是曾经帮助过工人反对企业主的勒索和非法的欺诈手段?

(12)这个政府是不是要求不顾老板的利益贯彻执行工厂法(如果有这样的工厂法)?工厂视察员(如果有这样的视察员)是不是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13)在你的企业或你的行业中有没有对不幸事故——疾病、死亡、短期丧失劳动力、年老等等进行互助的团体?

(14)加入这些团体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些团体的基金是不是完全受工人监督?

(15)如果缴纳会费是强迫的并且是受企业主监督的,企业主是不是从工资中扣除这些会费?他是不是支付这笔款项的利息?被解雇或辞职的工人,能不能收回自己所交的钱?

(16)在你的生产部门有没有工人合作企业?它们是怎样管理的?它们是不是也像资本家那样从外面雇用雇佣工人?

(17)在你的生产部门里有没有这样一种企业,在这种企业中,付给工人的报酬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则是所谓分红?请把这些工人的总收入和没有所谓分红的工人的收入作一比较。这种制度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自然,在他的工厂里,他把最高的立法权、审判权和行政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编者注

下的工人有些什么义务?是不是容许他们参加罢工等活动,还是只许他们做老板的忠实奴仆?

(18)在你的生产部门里的工人(男工和女工)一般的体力、智力和精神状况怎样?

卡·马克思起草了 1880 年 4 月上半月
载于 1880 年 4 月 20 日“社会主义评论”
杂志第 4 期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
*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法文版导言¹⁵⁵

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几页早先曾作为三篇论文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¹⁵⁶上,它们是从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¹⁵⁷中抽出来译成法文的^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在他首先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

①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导言的正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它们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做了一些补充。”——编者注

报的撰稿人¹⁵⁸。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国工人共产主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佛来米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应正义者同盟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不得不从法国逃出以后所创立的组织。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组织的普通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盟还必需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一切文字^①。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工人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在科伦创办的，于1849年5月被普鲁士政府禁止。恩格斯参加爱北斐特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完成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进军¹⁵⁹（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伦敦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

①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de la question des paysans allemands, qui font, 40 ans après, venir à Leipzig
une loi et passe par deux étapes.

Après la guerre de mouvement socialiste en Allemagne, les paysans ont
régressé et les bourgeois régressés les plus importants. Tout le peuple
a été réimprimé sous forme de particules, alors que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France, l'Allemagne dans le Reichstag allemand, la question des
habitations, l'immigration customisée en langage etc.

En 1870, quel usage qu'il avait pour les uns, les autres dans
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 on a fait usage de correspondance
avec l'Espagne, le Portugal et l'Italie.

Les séries de données, articles qui ont contribué au bourgeois, avec le libre
bourgeoisement internationale de la science, etc.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Historie nouvelle de l'Édit internationale en les sciences en général et la science
en particulier français inter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 quel est le peuple les
socialistes allemands. Vous donnez dans la présente brochure l'état
de plus tard de la sci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science, qui forme ce qu'on
peut appeler une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e.

Cher Lefort

Voilà le fruit de ma conclusion (d'ici 1870)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e les
phases, les phases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e.

Tout à vous

Karl Marx.

卡·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页

卡·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页

“德国农民战争”，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出版并连续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做了“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联系。

他寄给“前进报”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杜林先生关于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驳斥。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党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5月4—5日左右

载于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1880年版本校对过

卡·马克思
*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¹⁶⁰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1) 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 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卡·马克思起草于 1880 年 5 月初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80 年 6 月 30 日“平等报”

俄文译自“平等报”

第 2 种专刊第 24 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
五十周年纪念大会¹⁶¹

公民们：

波兰人在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涉大西洋，去保卫刚刚成立的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考斯丘什科和华盛顿并肩战斗。1794年，当法国革命好不容易地抵抗同盟的武力时，光荣的波兰起义使它摆脱了威胁。波兰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法国革命却得到了拯救。起义失败的波兰人加入了“长裤汉”军队，帮助他们去粉碎封建的欧洲。最后在1830年，当尼古拉皇帝和普鲁士国王^①蓄意重新进攻法国以实现其复兴正统王朝的计划时，你们今天所纪念的波兰革命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秩序笼罩了华沙”。

“波兰万岁！”这个在当时响彻整个西欧的口号，不仅表达了对遭受暴力摧残的爱国战士们的同情和钦佩，人们还用这句口号向这个民族表示敬意，这个民族所举行的各次起义——对其本身说来是多么不幸的起义——经常是制止了反革命的进攻，这个民族的优秀儿子在各地的人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时候，从未停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止过以武力回击敌人。另一方面,波兰的被瓜分,加强了目的在于掩饰沙皇对欧洲各国政府的霸权的神圣同盟。因此,“波兰万岁!”这个口号本身就意味着消灭神圣同盟,消灭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专制,消灭蒙古人对现代社会的统治!

从1830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掌握政权以来,无产阶级运动就开始显露出来。早在1840年,英国的有产阶级不得不乞灵于武力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组织宪章派。与此同时,在独立的波兰的最后一个角落,即在克拉柯夫,于1846年爆发了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革命¹⁶²。从那时起,波兰就失去了有产者欧洲的任何虚伪的同情。

1847年,在伦敦秘密地召开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¹⁶³,根据大会的决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结尾提出一个新的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波兰有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公众集会上,著名的列列韦尔和他的同志们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1848年和1849年,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的革命大军都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指挥官,都表现得类拔萃。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趋向被淹没在六月日子的血泊中,然而1848年革命——决不可以忘记这一点——的熊熊火焰几乎燃遍了整个欧洲,有个时期曾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共同体,从而为国际工人协会奠定了基础。1868年的波兰起义曾引起英法工人对本国政府的国际暴行一致表示抗议,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最后,在波兰流亡者中间也有巴黎公社的忠实保卫者。公社失败以后,只要是波兰人,就会被凡尔赛军事法庭下令枪杀。

总之,在自己的祖国以外,波兰人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大都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战士。

现在,当这一斗争正在波兰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的时候,愿它得到宣传界、革命报刊的支持,愿它和我们俄国兄弟的趋向联合起来;这将是重提“波兰万岁!”这一老口号的又一理由。

敬礼和兄弟情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前委员

签名: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弗·列斯纳

1880年11月27日于伦敦

载于“纪念十一月起义五十周年
国际大会的报告文集”1881年
日内瓦版

原文是波兰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¹⁶⁴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¹⁶⁵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¹⁶⁶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¹⁶⁷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

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81 年 3 月 8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1924 年俄文版第 1 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
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

(1881年3月21日)

公民：

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通知您，我们无法出席你们的大会¹⁶⁸。

当巴黎公社遭到“秩序”的捍卫者所策划的残酷的大屠杀而陷于失败的时候，胜利者决没有想到，为时还不到十年，在遥远的彼得堡居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¹⁶⁹，它经过斗争，也许是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他们也没有想到，在普鲁士国王^①由于包围巴黎而迫使当权的资产阶级去武装人民、从而给公社的建立作了准备以后过了十年，这同一个普鲁士国王竟在他自己的首都被社会党人包围起来，只有在他的首都柏林宣布戒严才能保住他的王位¹⁷⁰。

另一方面，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公社失败以后采取了迫害手段来迫使国际工人协会放弃它的正式的、外在的组织，它们以为它们能够用法令和非常法来摧毁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可是它们决没有想到，过了十年，这同一个国际工人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为强大,它不但席卷了欧洲的工人阶级,而且席卷了美洲的工人阶级;为了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将把工人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自发的国际,这个国际将愈来愈超过协会的任何外在形式。

总之,旧世界的当权者们认为已经彻底消灭的公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高呼:公社万岁!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1881年3月21日

第一次载于1933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30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

阁下：

在今天的“每日新闻”上，一篇题为“追问‘自由’周报”的文章写道，刊载关于俄国皇帝^①之死的文章的那一期周报，“还有几处暗示了秘密袭击市长官邸的罪犯”。虽然上面提到的文章同那篇关于彼得堡事件的文章毫无关系，可是因为这种看法可以从同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去解释，而且由于该报编辑莫斯特先生目前不能亲自在报刊上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请求您把下面一段逐字逐句按上述那期“自由”周报译出的全部有关“秘密袭击市长官邸”的话刊登出来。

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

“星期三晚上，不知‘何许人’把一只装有约十五磅重火药的箱子放在西蒂区市长官邸前面。它的一端已点燃，但是有个警察‘偶然’发觉了这东西，他十分勇敢，一下就把火扑灭了。我们不明白，这种爆炸可以达到什么目的。看去，国际警察无论如何都知道怎样在这件事上捞一笔资本。第二天晚上，有人在议会中向政府提出质问，问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在伦敦长住下来的一帮社会主义分子。但是，内务大臣并不认为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只是以耸耸肩来回答。这就是国际警察的一切努力所能得到的全部奖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1881年3月31日
载于1881年4月1日“每日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每日新闻”校对过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弗·恩格斯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¹⁷¹

这句话，成了近 50 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 1824 年废除臭名昭彰的结社法¹⁷²以后工联兴起的时期，这个口号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在光荣的宪章运动时期，当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工人阶级前列的时候，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更大的贡献。但是时间在继续前进，有许多 50 年前甚至 30 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渴望的和必要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推崇的老口号是不是也在此列呢？

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吗？可是什么是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当应用道德学或法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那末，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做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额和一天工作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末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天公平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工人按照他的地位和所在国家的生活程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以保持他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所需要的金额。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工资额可能有时高于这个数额,有时低于这个数额;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数额应当是一切变动的平均数。

一天公平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日长度和工作强度,它消耗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损害他在第二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劳动的能力。

因此,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给资本家,也就是说,只要使这种交易的进行不致中断,工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交易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工人拿出来的这么多,资本家给的这么少,交易的本质只允许这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末,似乎公平所要求的,应该是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人谈妥,他能够等待,靠他的资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但是,这还是小事。新行业开始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愈来愈多的“帮手”^①从工

^① 英文原文为《hands》(指的是“劳动力”,“工人”)。——编者注

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帮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帮手”，形成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供资本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如果营业好，他们可以随时被用来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到工作（这只有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加强资本在与劳动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的竞赛中，劳动不仅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但是我们要问，资本用来支付这笔极其公平的工资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资本中来的。但是资本并不产生价值。除土地以外，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资本本身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产品而已。所以劳动工资是由劳动支付的，工人的报酬是从他自己的产品中支取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工人的工资应该相当于他的劳动产品。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工人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不平常的“公平”的竞赛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手中最有利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资的公平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很清楚，这个老口号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既然忠实地表述了支配目前社会的规律，那就是完全偏在一边的、偏在资本一

边的公平。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
归工人自己所有!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5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5 月 7 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1 号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弗·恩格斯 雇佣劳动制度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我们考察了“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个历来推崇的口号，并得出结论说：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最公平的工资必然相当于对工人的产品的最不公平的分配，这种产品大部分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工人只好满足于仅够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的那一部分。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这是目前社会经济组织的规律，它比英国所有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加在一起，包括大法官法庭¹⁷³在内，还更有力量。只要社会还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一方面是资本家，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的垄断者，另一方面是工人，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要这种社会组织存在，工资规律就依然是万能的，并且每天要重新锻造锁链，把工人变成他自己所生产的、却被资本家所垄断的产品的奴隶。

英国工联为了反对这一规律已经斗争了将近六十年——而结果怎样呢？他们有没有把工人阶级从资本——工人阶级亲手生产的东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呢？他们有没有使哪怕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上升到高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们在生产中需要的原料、工具和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

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呢?大家很清楚,他们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

我们决不是说,工联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没有用处了。相反,工联在英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工业国一样,都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所必需的。平均工资额等于在某一国家内按照该国一般的生活水平足以使工人一代一代维持下去的生活必需品的金额。对于不同阶层的工人来说,这种生活水平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工联在保持一定的工资额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伦敦东头,有许多行业,它们的劳动同瓦工及其下手的劳动一样熟练和繁重,但是挣的工资还不到后者的一半。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使一部分工人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他们的工资的尺度,而另一部分工人由于没有组织和力量薄弱,不但必须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勒索,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勒索,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降低,他们学会了怎样靠愈来愈少的工资生活,于是他们的工资就自然而然地降低到他们自己不得不认为够用的那个水平。

因此,工资规律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在一定限度内并不是毫无伸缩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萧条时期除外),每一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资额可以因斗争双方的斗争结果而变动。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由讨价还价确定的,而在讨价还价中,谁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最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那他很容易失败,而且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工人中间募集基金,使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同他们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种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

谈判,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他们才有可能获得那点微薄的收入;这些收入,按照目前社会的经济制度来说,可以说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来的一天公平的工资。

工资规律并没有被工联的斗争推翻。相反,它是在这些斗争的压力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工联的抵抗手段,工人甚至连按照雇佣劳动制度规则应得的也得不到。资本家只是由于害怕他眼前的工联,才会不得已而付出他的工人的劳动力的全部市场价值。这要证据吗?请看看付给大工联会员的工资,再看看伦敦东头这个永久贫困的深渊中的无数小行业所付的工资吧。

所以,工联攻击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下降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5 月 15—1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5 月 21 日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3 号

弗·恩格斯 工 联

—

在本报上一号，我们考察了工联的活动，只谈到它怎样在同雇主作斗争中促使工资经济规律的实现。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因为它有极重要的意义，整个工人阶级都应当彻底了解它。

我们认为，目前英国每一个工人不用解释都懂得，不论个别资本家或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尽量减少工资。大卫·李嘉图曾经无可反驳地证明，劳动产品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润。既然，在每个个别场合下这种劳动净产品的量是一定的，那就很明显，如果不减少叫做工资的那一部分，叫做利润的那一部分就不会增加。否认资本家想减少工资，就等于说资本家不想增加自己的利润。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暂时增加利润，但它们并不改变一般规律，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谈了。

既然工资额是由一个特殊的和十分确定的社会经济规律支配的，资本家怎么能够减少工资呢？工资的经济规律是存在的，而且是推翻不了的。但是，我们看到，它是有伸缩性的，这种伸缩性表现为两种形式。在某一个行业中，工资水平或者直接降低，使该行业的工人逐渐习惯于更低的生活水平，或者可以间接降低，即

增加每天的劳动时间(或同一时间内的劳动强度)而不增加工资。

每个个别资本家对减少自己工人工资以增加自己利润的利己心,由于同一行业中资本家的相互竞争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每人都竭力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些,而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利润,他就得竭力减少工资。这样一来,为了每个资本家的利益而对工资额施加的压力,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增加了十倍。以前不过是利润多少的问题,现在却成为必要的事情了。

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经常不断的压力,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手段的。所以,在那些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工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工作时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个过程缓慢地然而确实是地发展着。繁荣时期有时会打断这个过程,后来,营业不景气的时期又更加加速这个过程。工人们逐渐习惯于愈来愈低的生活水平。工作日的长度愈来愈接近可能的最高限度,而工资愈来愈接近绝对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个数目,工人就绝对不可能生活和延续他的后代了。

大约在本世纪初,曾经暂时出现过例外的情形。蒸汽和机器的迅速增加跟不上增加得更快的对蒸汽和机器产品的需求。在这些行业中的工资,除去习艺所卖给工业家的儿童的工资以外,通常都是高的。那些不可缺少的熟练手工工人的工资非常高,当时一个染匠、工匠、剪绒工、手摇纺纱机工人通常的收入,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同时,在那些工人被机器所排挤的行业中,工人却要慢慢饿死。但是新发明的机器渐渐又排挤了那些工资优厚的工人,人们发明了制造机器的机器,而且数量很多,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供应不仅跟上而且超过了需求。1815年普遍和约的缔结,恢复了经常的贸易,十年一次从繁荣、生产过剩到商业恐慌的循环开

始了。工人从过去的繁荣时期保留下来的、或者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甚至还增加了的利益，现在在商业不景气和恐慌的时期都被剥夺了。很快，英国的工业生产者就屈服于这条一般规律：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资经常趋于绝对的最低限度。

这时，1824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工联也登上了舞台，这是非常适时的。资本家是一向有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正式的公会、章程、专职人员等等。他们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就代替了一切。只有在后来，某一产业部门占据了整个地区，例如棉纺织业占据了郎卡郡，资本家的正式的同业公会才有必要。相反，工人一开始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明确规定的章程，并把全权交给它的专职人员和委员会。1824年的法令使这些组织有了合法地位。从那时起，工人在英国成了一种力量。他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彼此隔绝的孤立无援的群众了。除了联合和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以外，并且很快又增添了相当充足的财力——我们的法国兄弟们意味深长地把它叫做“抵抗基金”。现在形势完全改变了。对于资本家来说，任意减低工资和增加工作时间成了一件冒险的事情了。

因此，资本家阶级当时激烈地反对工联。这个阶级一向认为他们长期以来压榨工人阶级的做法是既得的权利和合法的特权。现在，要制止他们这样做了。难怪他们要大叫大嚷，认为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至少和现在爱尔兰的大地主一样¹⁷⁴。

六十年的斗争经验使资本家多少学乖了一些。工联现在已经成了公认的机构，它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的作用，被认为同工厂法作为工作时间的调节者的作用完全一样。不仅如此，郎卡郡的

棉纺厂主们最近甚至模仿起工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怎样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组织罢工，而且组织得不比任何工联差，甚至还要好。

这样，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被雇主雇佣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不过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劳动力过早地耗尽。但是，这是工联在目前的组织情形下能够希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达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营业波动，可以一下子把已经争取到的一切破坏，于是斗争又得重新开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人阶级还是照旧，还是我们的先辈宪章派直言不讳的雇佣奴隶阶级。难道这一切努力、自我牺牲和苦难的最后结局应该是这样的吗？难道这将永远是不列颠工人的最高目的吗？还是英国工人阶级最后应当努力突破这个恶性循环，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运动中找出路呢？

下一星期我们将考察工联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作用。

二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就工联在帮助调节工资额并保证工人在和资本作斗争时至少有一些抵抗手段方面，考察了它的作用。但是我们的论题不只限于这一方面。

我们谈到了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不管资本的辩护士怎样加以否认，这种斗争确实是存在的。只要减少工资仍旧是增加利润的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而且，只要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仍旧存在，

这个斗争也将存在。工联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如果成立工联不是为了反对资本的侵害,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掩饰事实是没有用的。任何甜言蜜语都遮不住一个丑恶的事实,即当前的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一方面是拥有雇佣劳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料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后一个阶级的劳动产品必须在两个阶级中间分配,而为了这种分配经常进行斗争。每个阶级都想尽量多分到一些。在这个斗争中,最奇怪的是,工人阶级尽管只是争取得到自己产品的一部分,却经常被指责为简直是在掠夺资本家!

但是,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等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就是这样,工人阶级同上述这些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所以,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多年来激烈地甚至采用暴力为了会给它这种政治权力的人民宪章¹⁷⁵而斗争。它失败了,但是斗争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起,它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

目前,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随着纯政治的、或宪章派的组织的瓦解,工联组织日益壮大起来,到现在,它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其他国家的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相比的程度。有几个大工联包括 100 万到 200 万工人,得到较小的或地方的工联的支持。它们代表着一种力量,统治阶级的任何政府,

不论辉格党或托利党的政府，都必须加以重视。

这些强有力的组织，按照它在这个国家里产生和发展时形成的传统，直到现在还把自己的活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参加调节工资、工作时间以及要求废除公开敌视工人的法律这种职能上。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它们这样做所获得的效果，完全和它们能够希望的一样。但是它们得到的比这还多，因为统治阶级对它们的力量比它们自己了解得更清楚，自愿地向它们作了更多的让步。迪斯累里的户主选举法¹⁷⁶至少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获得了选举权。如果他没有预料到这些新选民将表示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再听命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那他会提出这样的法案吗？如果工人没有在管理他们的规模巨大的工联组织方面证明他们有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的能力，那他能使这项法案通过吗？

这项措施为工人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前途。它使工人阶级在伦敦和所有的工业城市中取得多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用新的武器去同资本斗争，即把本阶级的人派到议会里去。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工联忘记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责任。这个新武器在它们手里已经有十年多了，但是它们几乎从来也没有拔出鞘来用过它。它们不应当忘记，如果它们不能真正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列，它们就不能保持它们现在所占的地位。英国工人阶级有力量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参加议会，却还是永远满足于让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办事员如律师、编辑等等来代表它，这是违背常理的事情。

不仅如此，有许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意识到，它有一个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意识到当前这个专门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使它置身于毫无出路的恶性循环，意识到祸

根不是工资低,而是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一旦这种认识在工人阶级中普遍地传播开来,工联的地位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它们将不再享有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组织的特权。同各行业联合会并列或在它们之上,一定会产生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所以,有组织的工联必须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二,工人阶级也很快就会了解,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工人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以及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组织,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件事做得愈快愈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5 月 20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5 月 28 日
和 6 月 4 日“劳动旗帜报”(伦敦)
第 4 号和第 5 号

弗·恩格斯 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6月9日,星期四,在下院里,蒙克先生(格罗斯特)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说:

“同法国签订的任何通商条约,如果不是以进一步减低关税来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那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接着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辩论。查·迪耳克爵士代表政府用外交礼节所要求的方式表示了温和的抗拒。詹·阿·巴尔福先生(塔姆沃思)主张用报复关税来迫使外国采用较低的关税。斯拉格先生(曼彻斯特)主张甚至不用任何条约,让法国人自己去发现我们同他们的贸易对于双方有什么价值。伊林沃思先生(布莱得弗德)对于通过通商条约达到自由贸易表示失望。麦基佛先生(柏肯海德)声称:现在的自由贸易制度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它只是由自由的进口和有限制的出口构成的。决议案以77票对49票通过了。这一失败既不会伤害格莱斯顿先生的感情,也不会损害他的地位。

这次辩论是一连串翻来复去的抱怨的鲜明例子,抱怨愚蠢的外国人以及同样愚蠢的殖民地臣民顽固不化,拒不承认自由贸易的普遍好处及其去除一切经济弊病的能力。从来没有一种预言遭到过像曼彻斯特学派¹⁷⁷的预言那样彻底的破产。这种预言说:自

由贸易一旦在英国建立起来,就会使国家得益非浅,以致其他国家也必然会照样仿效,并向英国的商品开放自己的港口。然而,这些自由贸易信徒们的甜言蜜语依然是旷野里的呼叫。不仅欧洲大陆和美洲整个说来都提高了它们的保护关税,甚至不列颠的殖民地,一旦获得了自治,就跟着仿效;印度刚被置于国王管辖之下¹⁷⁸,那里就规定对棉纺织品抽5%的关税,以鼓励本地工业。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对曼彻斯特学派来说,是一个无法知道的秘密。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

约在上一世纪中叶,英国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要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他纺织业的革命。大不列颠大片的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了蒸汽,现在已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伸延很广的铁矿紧挨着煤田,便于制铁业的发展,而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业获得了一种新的刺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约有25年,战争几乎把所有竞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了出去,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上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

但是和平的恢复,很快地促使其他国家也走英国的道路。法国靠保护关税这道万里长城的庇护,也采用蒸汽进行生产。德国也这样做了,虽然它的关税在当时远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公平。别的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同时,不列颠的土地贵族为

了提高地租,实施了谷物法¹⁷⁹,因而提高了粮食价格,同时也提高了工资金额。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业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大约到1830年,英国竭力想成为“世界工厂”。反谷物法同盟¹⁸⁰所抱的目的就是使英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

在当时,并不隐讳取消谷物法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减低粮食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能使不列颠的厂主们抵抗那些邪恶的或愚昧的外国人用以威胁他们的一切竞争。英国由于在机器方面的巨大进步、由于有庞大的商船队、有煤和铁,应当以工业品供应全世界,而外国应当供应英国农产品:谷物、酒类、亚麻、棉花、咖啡、茶叶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这是天意,你若反对,就是完全违反天意。最多可以让法国供应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地一些不能用机器制造的、而且是开明的厂主根本不加理会的嗜好品和时髦品。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地球上才会有和平,人类才会和睦。那时,所有国家就会由贸易和互惠的亲密纽带联结起来,和平与丰裕的时代将永远长存,他们对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帮手们”说:“伙计们,好日子就要来到了,再稍等一会儿吧。”当然,“帮手们”一直就这样等待着。

然而,当“帮手们”等待的时候,那些邪恶而愚昧的外国人却没有等待。他们看不出这种制度的美好,在这种制度下,英国所保持的工业上的暂时优势,会成为使它能永远垄断全世界工业的手段,并且使其他各国都降为英国的单纯的农业附庸,换句话说,就是降到爱尔兰的那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因此他们使私人的商业利益服从于民族的迫切需要,并用高额的关税来保护他们新生的工业,这在

他们看来好像是保障自己不沦于爱尔兰所处的那种经济地位的唯一手段。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这样做都是对的。相反地,法国如果大踏步地走向自由贸易,就会得到巨大的利益。德国这样的工业是在自由贸易之下达到今天的状况的,而俾斯麦的新的保护关税法不会损害别人,只会损害德国的工业家本身。但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

美国正处在推广工业已成为全国的需要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这一点可以由下列事实充分证明:在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方面,走在前列的已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美国的发明每天都在代替英国的专利品和英国的机器。美国的机器输入英国,而且几乎是所有的工业部门。此外,美国拥有世界上精力最旺盛的人民,它的煤田和英国相比,英国的煤田就显得几乎等于零,它的铁和其他金属也很丰富。这样一个国家,经过二十年左右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就能使它的工业马上达到任何一个竞争者的水平,那末能否设想它会让自己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工业去同早就建立的英国工业进行长期的持久的竞争呢?但是,曼彻斯特学派说,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度只会害它自己。正如一个人多出车费坐一小时行驶 50 英里的特别快车,而不坐一小时行驶 12 英里的旧的减价列车,只是害了自己一样。

毫无疑问,当前这一代人会看到美国的棉织品在印度和中国跟英国的棉织品竞争,并逐渐在这两个主要市场上争得地盘;美国的机器和五金在世界各处(包括英国在内)和英国货展开竞争。使佛来米的工场手工业转移到荷兰,又从荷兰转移到英国的这种无

法改变的必然性,不久就会使世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而且,在剩给英国的有限的活动范围里,英国还会在几个大陆国家中遇到强大的竞争者。

英国工业垄断迅速衰落的事实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如果“开明的”资产阶级以为隐瞒这点对它有利的话,就让工人阶级大胆地正视这一事实吧!因为这件事对他们的利害关系甚至超过那些“上等人”。这些人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许依然是世界的银行家和放债人,正如在他们以前的威尼斯人和荷兰人在没落的时期那样。但是,当英国巨大的对外贸易开始每年缩减而不是增长时,“帮手们”将会怎样呢?如果把铁船制造业从太晤士河移到克莱德河,就足以使伦敦东头陷于长期的贫困。那末,当英国所有的主要行业都真正移到大西洋彼岸时,对英国将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结果将会作出一件大事,即粉碎那条仍然把英国工人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链条的最后一环。这一环就是他们为该国的垄断所进行的共同工作。这一垄断一旦被消灭,英国工人阶级将被迫谋求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解放,并且结束雇佣劳动制度。我们希望他们不会一直等到那个时候。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6 月中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6 月 18 日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7 号

弗·恩格斯 两个模范地方议会

我们答应过我们的读者介绍英国工人运动和外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有时我们有机会报道了某些关于美国的新事物。目前有可能向读者介绍法国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很重要，值得在我们报纸的社论中加以讨论。

在法国，公开投票的方法没有像英国仍然采用的那么繁多。在那里，议会选举和地方机关选举的投票方法没有什么区别，通常都采用投小球的办法进行公开普遍的表决。法国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后，该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不仅在议会选举时提出工人候选人，而且在一切地方机关选举时也提出工人候选人。这样，今年1月9日在法国举行的最近一次地方议会选举中，年轻的工人党在很多的工业城市和一系列的村镇里，特别是在那些有矿场的地区获得了胜利。它不仅使某些候选人当选，而且在有些地区争取到了议会中的多数，并且还有一个议会（下面就会看到）完全是由工人组成的。

在“劳动旗帜报”创办前不久，在和比利时交界的鲁贝城发生了一次工厂工人罢工。政府立刻把军队开到了该城，同时借口维持秩序（其实秩序丝毫没有受到威胁），试图挑起罢工者采取一些好让军队的干涉找到借口的行动。但是工人们却沉住了气，这里

主要是工人占多数的地方议会的活动帮助他们顶住了一切挑衅。引起罢工的原因曾在议会中报告过，并且经过了详细的讨论。结果，议会不仅承认罢工者的行为合理，而且还采取了实际措施，**决定拨款 50000 法郎或 2000 英镑支援罢工者**。后来只是由于省长反对，这笔款项才没有支付。因为根据法国的法律，只要省长认为市议会超出了它的权限，他就有权停止市议会的任何决定的执行。然而城市自治机关的这项决定给予罢工者道义上的重大支持，对工人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6 月 8 日，法国中部（阿利埃省）科芒特里的采矿公司解雇了 152 名拒绝服从新实行的令人愤慨的作息制度的工人。于是全体矿工约 1600 人就宣布罢工，对最近逐渐实行不利于工人的作息制度的做法表示抗议。这时市议会也立刻站在工人方面。在 6 月 12 日（这天还是星期天）的会议上做出了几项决议，内容如下：

一、鉴于社会有责任保证那些以自己的劳动保证整个社会生存的人的生活，又鉴于国家当局拒绝履行这项职责，——市镇承担这项职责；本议会决定：提供由富有公民担保的借款 25000 法郎（1000 英镑）；此款系用来支援由于自己的 152 名伙伴被不公道地解雇而不得不停止工作的矿工。

一致通过，只有地方长官反对。

二、鉴于国家把宝贵的国民财富——科芒特里的矿场卖给股份公司，从而也把在那里就业的工人交给这个公司任意处置；因而国家应当注意使公司对矿工们的压迫至少不要达到威胁他们生存的地步；国家提供军队供公司在罢工期间使用，这样就不但没有保持中立，而且还站在公司方面；

本议会有责任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为此特向专区区长提出如下要求：

(1) 迅速召回军队，因为毫无理由地把军队派遣来此，是一种直接的挑衅行为；

(2) 要求并责成公司经理取消引起罢工的措施。

一致通过。

在第三项决议中(也是一致通过的),议会考虑到市镇的经费有限,对发放债款可能不够,因此宣布为罢工工人在社会上募捐,并请求法国所有的城市自治机关也来资助罢工工人。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人不仅参加议会,而且还参加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的惊人的效果。如果英国工人也能得到自己的市议会的支持,那末英国罢工的结局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然而现在充斥于英国市议会和其他地方自治机关(主要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的全是企业主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代理人(律师等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些小店主而已。

一旦发生罢工或同盟歇业,地方当局立刻用自己的全部道义权力和物质权力来维护业主,反对工人;由工人掏钱供养的警察也被用来干法国军队所干的事,即挑拨工人采取非法行动,以便加以陷害。

以执行济贫法为己任的当局,对那些在它们看来不论怎样都得做工的人,照例拒绝给予任何帮助。这也是应当预料到的事。在工人们容忍其代表参加地方管理机关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看来,罢工简直就是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暴动,是对神圣的所有权的践踏。因此,只要工人阶级还同意把企业主及其代表选入地方自治机关,那末每当发生罢工和同盟歇业时,地方机关总是会用它全部的巨大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支持企业主。

我们希望,法国这两个市议会的活动能使许多人睁开眼睛。难道要永远让人说,而且也对英国工人说,“这些事在法国进行得比较好”吗?英国工人阶级有其历史悠久和力量强大的组织,长期以来享有政治自由,又有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因此它比之大陆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具有很多优越条件。可是德国人在国会中已有了 12 个工人代表,而且像法国那样,工人在许多市议会中占多数。的确,在英国,工人的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然而工人阶级却占大城市和工业区人口的多数。因此只要愿意,这个潜在的多数就会变成国家中的现实力量,变成工人人口集中的一切地区中的力量。如果工人能在议会中、在市议会中、在地方济贫委员会中得到应有的席位,那末不久就会有工人出身的国家活动家,他们将给那些经常欺压人民群众的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带来种种障碍。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6 月下半月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6 月 25 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8 号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美国的食物和土地问题

从 1837 年秋天以来，我们对于金融恐慌和商业危机从纽约输入到英国来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十年重复一次的工业危机，每两次中至少有一次是在美国爆发的。但是，美国还是能够推翻英国农业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彻底改变大地主同租佃者之间的古老的封建关系，消灭英国的地租，并使英国的农田荒芜——这就是对十九世纪最后 25 年的展望。

现在还是这样。美国西部大草原的处女地——目前正在开垦，不是一小片、一小片，而是几千、几千平方英里地开垦——现在正在开始决定小麦的价格，并进而决定麦田的地租。没有任何旧土地能和它竞争。那是一种极好的土地，地势平坦，或者稍有起伏，没有陡峭的岗峦阻隔，完全和第三纪海底慢慢淤积起来的状况一样，没有石块、岩石和树木，适合于直接耕种而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工作。用不着清理和排水，你只要犁一犁就可以播种，可以连续收获二三十次小麦而不用施肥。这是适合于最大规模耕作的土地，并且也正在以最大的规模来耕种。英国的农业家往往拿他们的大农场来和大陆上自耕农的小农户对比而感到自豪。但是，美国大草原上那些占地 4 万英亩甚至更大的农场，是由训练、指挥和组织得像兵士一样的人、马和工具的正规军来耕作的，比起这样的

农场来，联合王国最大的农场又算得了什么呢？

美国在农业上的这种革命，加上美国人所发明的革新的运输工具，使他们运往欧洲的小麦价格非常低廉，以致任何欧洲的农场主都不能和它竞争，至少在他必须缴纳地租的时候是不行的。请看 1879 年，那时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情形。那一年西欧各地收成都不好，在英国年景也很坏。然而，由于美国的谷物，谷物价格差不多没有变动。年成坏而同时小麦价格又很低，这种情况英国农场主还是第一次遇到。于是农场主开始骚动起来，大地主感到恐慌了。第二年，收成好了些，价格跌得更厉害。谷物的价格，现在是由在美国的生产费用加上运费决定的。而且，随着大草原上新耕地的开垦，这种情况将一年比一年更明显。而开垦所需要的农业工人的大军，是我们自己从欧洲送去的移民。

以前，农场主和大地主总还能得到一种安慰：如果谷物无利可图，肉类会有利可图的。耕地变成了牧场，万事又如如意了。但是，现在那条出路也被截断了。美国肉类和美国家畜的输出量在日益增加。不仅如此。至少还有两个大的出产家畜的国家，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它们的大量过剩的、现在无法销售的肉类运往欧洲，特别是运往英国。从科学的现状和它实际应用上的突飞猛进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最晚再过几年，澳洲和南美的牛肉和羊肉，就会保藏得很妥善地大量运过来。英国农场主的兴旺，英国大地主长卷的地租清单，那时将怎样呢？种植鹅莓、草莓这一类东西倒很不错，不过，市场上已经充满这一类东西了。没有疑问，英国工人还能更多地消费这样可口的食品——但是，要先增加他们的工资。

几乎不需要说明，这种新的美国农业竞争的影响在欧洲大陆上也感受到了。那些大多是负债累累的小自耕农也受到同样深重

的影响，他们不像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农场主那样缴纳地租，而是支付利息和诉讼费。这是美国这种竞争的特殊影响，它不仅使大地产成为无用，而且也使小地产成为无用，因为它使两者都无利可图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耗尽地力的制度，如像目前在美国西部所实行的那样，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事情一定还会好转的。当然，不能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未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足以使这一过程继续到下一世纪。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具有类似的有利条件。有整个南俄的大草原，商人实际上已经在那里买了土地，并作了同样的事情。有阿根廷共和国广大的草原，还有其他地方。所有这些土地，都同样适合于这种现代大农业和廉价生产的制度。因此，这种制度，在它灭亡以前，还将存在很长一个时期，至少足以把欧洲所有的大小地主扼杀两次。

那末，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将怎样呢？结局将是而且一定是：我们就只好实行土地国有，并在国家监督下把土地交给合作社耕种。到了那时，而且也只有到了那时，才会使耕种者和国家从农业经营中获得利益，不管美国的或别的国家的谷物和肉类价格怎样。如果那时大地主真要到美国去的话（他们似乎有这种倾向），我们就祝他们一路平安。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6 月底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2 日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9 号

弗·恩格斯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在另一栏里,我们发表了约·诺布尔先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指责我们在6月18日“劳动旗帜报”社论^①中的一些论点的。当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社论栏变成争论历史事实或经济理论问题的场所,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对这个人作一次答复,因为他虽然站在官方政党的立场上,但显然还是真诚的。

我们说,废除谷物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粮食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诺布尔先生反驳说,这是反谷物法同盟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的“保护关税论者的谬论”,并引了理查·科布顿的演说和同盟总会一篇宣言中的一些话作证明。

我们所讨论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是一个厂主。他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同盟的正式理论的内容。把它归结为最简短和最一般公认的说法(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这样:取消谷物的关税将增加我国同外国的贸易,将直接增加我国的输入,外国主顾将购买我国的工业品作为向我国输入的交流,从而也将增加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因此,对我国工业劳动人口的劳动的

^① 见本卷第287—291页。——编者注

需求也将增加，那末工资也一定会提高。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理论，这个同盟的正式代表们，这些浅薄的经济学家，最后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奇的论断：工资的涨落不是和利润成反比，而是和食物的价格成反比；粮食贵工资就低，粮食贱工资就高。这样，在谷物关税取消以前和以后都存在的十年一次的营业危机，就被该同盟的代言人宣布为纯粹是谷物法的影响，只要废除这些可恨的法规，它就必然会消失。他们宣称，谷物法是不列颠厂主和那些渴望他们的产品的、因缺乏不列颠布匹而衣不蔽体、冻得发抖的可怜的外国人之间的唯一巨大障碍。所以，在诺布尔先生所引证的一段话里，科布顿真的提出，1839年到1842年的营业萧条和工资下降，是这几年来粮食过于昂贵的结果，其实那不过是至今极有规则地每十年重复一次的营业萧条的一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由于歉收，由于贪婪的地主制定法律来进行愚蠢的干涉而更延长并加剧了。

这就是科布顿的正式理论，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的才智，但毕竟是一个拙劣的实业家和浅薄的经济学家，他当时无疑是笃信他的理论的，就像诺布尔先生直到今天还相信它一样。但是，同盟的大部分人是老练的实业家，他们比科布顿更加关心做生意，并且一般说来在这方面比他更成功。对这些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然，在外人面前以及在公开集会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帮手们”面前，这种正式理论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是当实业家一心想做生意时，通常是不会对顾客说真话的，如果诺布尔先生抱有不同的看法，那他最好避开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只要稍微追问一下，工资因谷物自由贸易的结果而必然提高意味着什么，就足以看出，这种提高是指表现为消费品的工资的提高，很可能工资金

额并不会提高。然而这实际上不是提高了工资吗？当你进一步追究一下这个问题时就往往会发现：工资金额甚至可能下降，而这个减少了的金额却能使工人生活得比未减少时更舒适。如果你对于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所期望的贸易大发展再提出几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马上会有人告诉你，那主要是指望上述后一种可能：工资金额随着粮食等等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后者的下降足以抵偿工资的这种降低并有剩余。不仅如此，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掩饰他们的意见，他们说，要求廉价的粮食，只是为了降低工资金额，从而给外国竞争以迎头痛击。这实际上就是占同盟多数的大部分厂主和商人的目的和宗旨。任何惯于同商人打交道，因而也惯于不总是把他们的话当做真话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这是我们过去讲过的话，现在再把它重复一遍。关于同盟的正式理论，我们过去只字未提过。从经济学来说，那是一种“谬论”，而实际上无非是一种达到其自私目的的借口，虽然同盟的某些领袖由于老是重复这种理论而最后自己也相信了。

很有趣的是，诺贝尔先生引证了科布顿的话，说工人阶级因看到小麦价格有跌到 25 先令一夸特的希望而“满意地搓手”。工人阶级当时并不小看廉价的粮食；但是，他们对于科布顿及其同伙的办法是太“满意了”，以致过去几年中，他们使同盟在整个北方连召集一次真正公开的大会都不可能。在 1843 年，作者曾经“满意地”参加过同盟最后一次企图在索尔福市政厅召开的这样的大会，并看到只是由于提出了一项赞成人民宪章的修正案而几乎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在这以后，规定了同盟的一切会议都要“凭票入场”，而这个票就决不是每人都能得到的。从那时起，“宪章派的捣乱”停止了。工人群众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证明同盟并不像他们所假装

的那样是代表工人的。

未了，再简单谈一谈同盟的工资理论。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商品的生产费用，供求的作用在于使它回到它所围绕着摆动的那个标准。如果一切商品都是这样，那末劳动（或者更确切些说，劳动力）这种商品也是这样。因此工资额是由工人日常必需消费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其他一切情况保持不变，工资是随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涨落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规律，所有的培伦涅特·汤普逊、科布顿和布莱特之流，都永远反对不了这个规律。但其他一切情况并不是始终不变的，所以这个规律的作用，实际上因其他经济规律同时发生的作用而变更；因此它看来是模糊不清的，有时甚至必须费一些力气才能探索到。反谷物法同盟时期以来的那些走向庸俗化的和庸俗的经济学家以此为借口，说什么首先是劳动，其次是一切其他的商品，都没有真正确定的价值，只有一个上下波动的价格，这种价格或多或少地受供求的调节，而同生产费用无关；并且说，要提高价格，包括提高工资在内，除增加需求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一来，就排除了工资额和食品价格之间的令人不愉快的联系，并且可以按照肤浅而可笑的理论去大胆地宣布：粮食贵工资就低；粮食贱工资就高。

也许诺布尔先生要问，在今天粮食贱的时候，工资是否一般地与1847年以前粮食因重税而昂贵时一样高，或者甚至更高呢？这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多少可以肯定的：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兴隆，同时工人有坚强的组织保卫自己，那里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没有下降，有时或许还提高了。这不过是证明从前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低了。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惨淡，或者那

里的工人没有在工联中坚强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工资就一定下降，往往降到挨饿的地步。你们亲自到伦敦东头去看看吧！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9 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10 号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弗·恩格斯 工 人 党

朋友和同情者多么经常地警告我们：“要远远躲开政党政治啊！”就目前英国的政党政治来说，他们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工人的机关，按政党的当前意义来说，必须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既不是保守党，也不是自由党，或者甚至不是激进党。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党人，都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在大地主、资本家和小商人中占优势的各式各样的意见。如果他们代表工人阶级，那他们肯定是不正确的代表。工人阶级有它本身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他们怎样维护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东西，可以从工联和缩短工作日的运动的历史中看到。但是，他们把政治利益几乎完全交给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这些上层阶级的人物。差不多有 25 年，英国工人阶级好像是甘愿充当“伟大的自由党”的尾巴。

这种政治地位，是和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不相称的。在其他国家，工人要活跃得多。在德国，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已经存在十多年了，它在国会中占有 10 个席位，它的成长吓得俾斯麦采取了臭名昭彰的镇压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另一栏里谈到^①。

^① 见本卷第 308—310 页。——编者注

但是,不管俾斯麦怎样,工人党不断地向前发展。就在上星期,它在曼海姆市议会选举中取得了16席,在萨克森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一席。在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也都仿效德国人的榜样。在这些国家里,都有工人党,虽然这些国家的选举资格太高,它们目前还没有派遣代表参加立法机关的机会。在法国,工人党目前正在大力组织中。在最近的选举中,它已经在几个地方议会里取得了多数,在今年10月的普选中无疑地将在众议院得到几席。甚至在美国,虽然从工人阶级转变成农场主、商人或者资本家还比较容易,工人也认为需要把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工人到处都在为取得政治权力、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斗争,到处都是这样,只有大不列颠是例外。

然而,在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感到,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但是在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那末,就让英国工人阶级自己准备去担负它所面临的任務,去统治这个大帝国吧,让他们了解必然要落到他们肩上的责任吧。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帝国各大城市中实际拥有的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按照目前的户主选举法,要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到圣斯提芬^①去是很容易的,在那里,输入新鲜的血液确实是极其必要的。只要有这样一个数目的工人参加议会,就不可能

^① 指英国议会,因为有一个时期下院在圣斯提芬教堂召开。——译者注

让爱尔兰土地法案¹⁸¹像目前这样愈来愈变成爱尔兰土地笑话^①，即赔偿爱尔兰大地主的法案；也不可能抗拒如重新分配议席、使行贿真正受到惩罚、使选举费用由国库支付（像英国以外其他各国的情形那样）等等的要求了。

此外，在英国只有工人党才可能是真正民主的政党。其他阶级的开明人士（他们在英国不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多）可以加入这个党，甚至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以后，可以在议会里代表这个党。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场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可是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

这在英国比在外国甚至更符合实际。自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即宪章派的政党瓦解以来，激进党人的欺骗不幸是够多了。是的，但是宪章派毕竟瓦解了，而且毫无成就。真是这样吗？在人民宪章的六点中，有两点，即秘密投票和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律了。第三点即普选权，在户主选举法的形式下至少是已经接近实现了；第四点即平等的选区，显然即将见诸实现，因为这是现政府答应的一项改革。所以，宪章运动瓦解的结果却足足实现了宪章派纲领的一半。既然，仅仅对于一个过去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回忆，就能导致这些政治改革，而且除此以外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那末，一个有四五十个议会代表支持的工人党的实际存在，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来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必须照顾他自己的世界里。但是英国工人阶级却让大地主、资本

① 俏皮话：《bill》，《bul》。——译者注

家、小商人等阶级及其走狗——律师、新闻记者等等来照顾它的利益。难怪有利于工人的改革，是这样缓慢、这样可怜地一点点地实现。英国工人只要愿意，它是有力量实现他们的处境所要求的各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那末，为什么不作这种努力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中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23 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12 号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弗·恩格斯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最近对于俾斯麦及其爪牙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残暴行为，保持极端的沉默。只有“每日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是唯一的例外。从前，每当外国的专制政府对自己的臣民敢于这样滥施暴行时，英国的日报和周刊就大声疾呼，真是激烈得很。但是这一次被迫害的是工人，而且是以这一名称自豪的工人，所以“上流社会”、“贵族社会”的新闻界代表就隐瞒真相，并且从他们那么顽固地保持沉默来看，他们好像几乎是赞成这种暴行的。的确，工人能过问政治吗？让比他们“地位高的人”去管好了！英国报纸的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要攻击俾斯麦的非常法及其执行的方式，同时又要拥护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高压手段¹⁸²，那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非常痛的地方，它是碰不得的。我们很难期望资产阶级报纸会自己指出，由于现政府在爱尔兰的行动，英国在欧洲和美洲的道义上的威望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在每次普选中，德国工人党得的票数都在迅速增加。在前一次普选中，它得到了 50 多万张选票，而在上一次普选中，它的候选人得到了 60 多万张选票。柏林选出了两名代表，爱北斐特—巴门选出了一名，布勒斯劳、德勒斯顿各选出一名；尽管政府同自由的、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政党都结成了同盟，尽管两次谋刺皇帝事件掀

起了一片叫嚣声,其他政党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应该由工人党负责,工人党还是赢得了10个席位。然后俾斯麦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工人的报纸有50多家被查封,他们的团体和俱乐部被解散,他们的基金被没收,他们的集会警察驱散,而达到顶点的是下令规定可以“宣布”整个城市和地区“戒严”,正如在爱尔兰一样。但是,甚至英国的高压法¹⁸³在爱尔兰从来不敢做的事情,俾斯麦在德国也做出来了。在每个“宣布戒严的”地区,警察有权把他认为有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相当嫌疑”的任何人驱逐出境。柏林自然马上就宣布戒严,于是有成百人(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就有成千入)被驱逐出境。因为普鲁士警察总是驱逐有家眷的人,而对未婚的青年一般是不去管的。对于未婚的青年,驱逐不是什么严重的处罚,但是对于当家的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形下,即使不是家破人亡,也是长期受折磨。汉堡选了一个工人当国会议员,于是马上就宣布那里戒严。第一批从汉堡被驱逐的大约有100人,另外还有他们的家属300多人。工人党在两天以内筹妥了他们的旅费和其他急需。现在,莱比锡也宣布了戒严,唯一的借口是,政府不这样做,就不能摧毁党的组织。第一天被驱逐的就有33人,大部分是有家眷的已婚男子。名单上的前3名都是德国国会议员。也许狄龙先生会给他们去一封贺信,因为他们的处境还不像他自己的那样坏¹⁸⁴。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工人党一旦被正式宣布为非法,并被剥夺了其他德国人表面上可以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警察就可以对该党的每个党员为所欲为了。在搜查违禁出版物的借口下,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受到最无礼和野蛮的对待。至于他们本身,警察可以随时加以逮捕,一星期一星期地拘押,非要在监狱里呆上几个月才

被释放。警察发明了刑法典中所没有的新罪名，而滥用刑法典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警察经常可以找到受贿的或狂妄透顶的长官和审判官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升官晋级就是以这种代价得来的！下列的惊人数字可以表明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怎样的结果。从1879年10月到1880年10月一年内，单单在普鲁士，因叛国罪、叛逆罪、侮辱皇帝罪等而被捕入狱的就不下1108人，因政治诽谤罪、侮辱俾斯麦或诬蔑政府等罪而被捕入狱的不下10094人。11202个政治犯，这甚至超过了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丰功伟绩哩！

俾斯麦用他的这一切高压手段得到了什么呢？正如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所得到的一样。社会民主党也像爱尔兰土地同盟¹⁸⁵那样蓬勃发展，拥有坚强的组织。几天以前举行了曼海姆市议会选举。工人阶级的政党提出了16名候选人，他们以几乎是三比一的多数全体当选。此外，代表德勒斯顿的德国国会议员倍倍尔，作为莱比锡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参加了萨克森议会竞选。倍倍尔本人是一个工人（旋工），如果不能说他是德国最优秀的演说家，那也是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为了阻挠他当选，政府驱逐了他的整个竞选委员会。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虽然选举权受到了限制，倍倍尔还是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了。可见，俾斯麦的高压手段对他丝毫没有用处，相反，却激怒了人民。那些被剥夺了自卫的一切合法手段的人，总有一天会采取非法手段的，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格莱斯顿先生和福斯特先生不是经常宣扬这种学说的吗？而他们现在在爱尔兰又是怎样做的呢？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7月中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23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2号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弗·恩格斯 棉花和铁

棉花和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最重要的原料。哪个国家在棉织品和铁制品生产方面占首位，一般也就在工业国中居于首位。由于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只要情况不改变，英国总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

这样，人们满可以认为英国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工人的生活一定非常好，以为英国在市场上占了统治地位，生产这两类商品的行业该总是很兴旺的，至少在这两个工业部门，在鼓吹自由贸易的时期所许诺的千年王国一定是实现了。不幸！我们都知道，实际情况远不是如此。在这里，也同在其他行业中一样，如果工人的状况没有变得更坏，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好些，那完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由于坚强的组织和艰苦的罢工斗争。我们知道，在1874年前后短暂的几年繁荣时期以后，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完全衰落了。工厂关闭，炼铁炉停火，继续生产的，一般也是缩短了开工时间。这种衰落时期以前也有过，平均每十年重复一次；它们延续下去，直到被新的繁荣时期所接替，如此不断地循环。

但是，目前这个萧条时期，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制铁业中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它持续的时间比一般的延长了几年。曾经有过几次复苏的尝试，有过几次向上的突进，但是全都无效。即使真正破

产的时期已经度过，营业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市场依旧不能吸收全部产品。

这里的原因是，在我们目前这种不仅利用机器生产工业品，而且生产机器本身的制度下，生产能够极其迅速地增加。如果工厂主想在一个繁荣时期内增加棉织品的纺织机械和漂白、印染设备，以便多生产 50% 的商品，并把生铁和各种铁制品的全部产量增加一倍，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实际的增长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已经比过去扩大生产的时期大大增加了，其结果就是持续的生产过剩、持续的营业萧条。企业主有条件等待，至少能够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工人却只得忍受痛苦，因为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长期贫困，随时有进习艺所的可能。

这就是无限制竞争的光辉制度的结果，这就是科布顿、布莱特之流许诺的千年王国的实现！这就是劳动人民的遭遇，只要他们像在过去 25 年所做的那样，把帝国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他们的“天然领袖”，交给托马斯·卡莱尔所谓的那些负有指挥本国工业大军¹⁸⁶的命运的“工业将领”。确实是工业将领！同他们相比，1870 年路易·拿破仑的将军们都是天才了。所有这些所谓的工业将领都相互斗争，各人只顾自己的私利，增加自己的机器设备而不管他们的邻居在做什么，最后他们都大吃一惊地发现造成了生产过剩的后果。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调节生产，他们只能为了一个目的而联合起来，那就是降低他们的工人的工资。这样，由于不顾一切地把本国的生产力扩大得远远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他们就剥夺了他们的工人比较好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般的繁荣的时期所给予他们的，也是工人经过长期的衰落之后，为了把自己的收入提高到平均的水平所应该享受的。工厂主作为一个阶级，再也没有

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经济事业，甚至连生产过程本身都没有能力管理，这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英国工人的最大敌人是他们亲手造成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这虽然是事实，但岂不是很荒唐的吗？

但是，还有另一个事实应当考虑。不只是英国的工厂主在扩大自己的生产力。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现有的统计材料还不允许我们把各先进国家的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分别地加以比较。但是在整个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恩格尔博士在他的《Das Zeitalter des Dampfs》（“蒸汽时代”1881年柏林版）¹⁸⁷一书中提供的材料来作一个比较表，根据他的计算，这些工业部门在下列国家中使用的蒸汽机的总马力（1马力等于在1秒钟内将75公斤重量提到1公尺高所需的力）：

	纺织工业	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
英国 1871年	515800	1077000马力
德国 1875年	128125	456436 " "
法国	约 100000	185000 " "
美国	" 93000	370000 " "

由此可见，英国的三个主要竞争国所使用的总的蒸汽动力，在纺织工业方面是英国的五分之三，而在采矿和金属工业方面几乎同它相等。既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英国，它们的产量加在一起，不久就会超过英国，这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再看下面这个表格，它表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蒸汽马力（机车和轮机除外）：

大不列颠.....	约 2000000 马力
美国.....	" 1987000 " "
德国.....	" 1321000 " "
法国.....	" 492000 " "

这个表格更清楚地表明，英国在使用蒸汽的工业方面所保留的垄断是多么微不足道，自由贸易对于保持英国工业的优势是多么不顶用。请不要说，外国工业的这种进展是人为的，是保护关税政策造成的。德国工业的巨大扩展，全部是在最自由的自由贸易制度下完成的。如果美国主要由于极端不合理的国内消费税制而被迫采取一种与其说是真正的、不如说是表面的保护关税政策，那末，废除这些消费税法令就足以让它在自由市场上竞争了。

这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 25 年的绝对统治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处境。我们认为，其结果就是要求曼彻斯特和北明翰的绅士们迅速让位，让工人阶级在以后的 25 年中来干。他们一定不会管理得更差。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底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30 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13 号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弗·恩格斯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是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们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那末现在，这三个阶级的存在，都有什么必要呢？

土地贵族在英格兰至少是经济上无用的，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由于它那种灭绝居民的倾向，简直已经成为祸害了。把人民驱往大洋彼岸或置于饥饿的境地，而以羊或鹿来代替他们，这就是爱

尔兰和苏格兰的大地主们可以自夸的全部功德。只要美国蔬菜和肉食的竞争稍微再加强一些，英格兰的土地贵族也会这样做，至少那些能够这样做的人即在城市里有大地产可以退守的土地贵族将这样做。至于其余的人，美国食品的竞争将会很快地替我们清除掉。这很好，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在上院或下院，都纯粹是国家的祸害。

但是，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这个建立了不列颠殖民帝国、树立了不列颠自由的开明自由主义阶级怎样呢？这个曾在1831年改革了议会¹⁸⁸、废除了谷物法并且减低了一种又一种捐税的阶级怎样呢？这个创立了而且仍然指挥着英国的大工厂、大商船队和日益扩大的铁路网的阶级怎样呢？当然，这个阶级至少同它指挥并领导着不断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样必要的。

资本主义中等阶级的经济职能的确在于，它创立了现代蒸汽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并打破了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还执行着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的造福于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都不属于那些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属于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愈少，则对企业就愈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事实上，是留给企业所有者的唯一职能。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大

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工作，只有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罢了。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了，但是资本家还是继续以股息的形式，把这些社会职能的报酬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已经不执行那些职能了。

资本家由于上述大企业的规模而被迫从业务管理中“引退”，但是另一个职能仍然留给了他们。这个职能就是拿他们的股票到交易所去投机。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那些“引退了的”或者实际上被接替了的资本家们，便到这个玛门^①庙里赌个痛快。他们到那里是存心去捞钱的，可是却假装说钱是挣来的。可是他们说，一切财产的来源都是劳动和俭省，说来源也许可以，但决不是结果。强行封门小赌场，而在同时，我们的资本家社会却不能没有一个输赢以几百万、几百万计的巨大赌场作为它的真正中心，这是何等的虚伪啊！在这里，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在，确实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十足的祸害。

在铁路和轮船运输业中存在的这种真实情况，也在一切大工商企业中日益成为愈来愈真实的情况了。成立公司即变大的私人企业为有限公司，是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现象。从西蒂区的曼彻斯特大货栈起，到威尔士和北英格兰的铁工厂和煤矿以及郎卡郡的工厂，全都已经或正在变成公司。在奥尔丹全城，差不多已经没有一个棉纺织厂留在私人手里了，而且连零售商人也日益为“合作商店”所代替，不过，其中大多数也只是名义上的合作商店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另外再谈。由此可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的发展，资本家也完全和手织机工人一样被代替了。不过有一

^① 财神之意。——译者注

点不一样：手织机工人注定会慢慢饿死，而被代替的资本家却会慢慢胀死。但有一点他们一般说来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对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因此，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导致积聚，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所有关于“老板的眼光”及其创造的奇迹的废话，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就成了纯粹的胡说。想像一下伦敦和西北铁路的“老板的眼光”吧！但是老板不能做的事情，工人、公司中领工资的雇员却能够做而且做得很成功。

因此，资本家再也不能要求取得他的利润作为“进行领导的工资”了，因为他什么也没有领导。当资本的辩护人向我们大放厥词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的前一号周报^①里，我们已经试图说明：资本家阶级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他们一方面扩大生产，以便周期地以产品充斥一切市场，而另一方面，却愈来愈无力抵御外国的竞争。由此，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能够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而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愈来愈成为一种祸害了。

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说：“走开！给工人阶级来干的机会吧！”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8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8 月 6 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 14 号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① 见本卷第 311—314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

死神又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队伍中夺去了一个生命。

今年 12 月 2 日,卡尔·马克思的夫人受疾病长期折磨以后在伦敦逝世了。

她出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在她出生以后不久,她的父亲便调到特利尔城任政府顾问,在那里和马克思一家有了亲密的交往。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这样,两个天赋很高的孩子日益亲近起来。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人已经决定把未来的命运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1843 年,在马克思主编过一段时期的旧“莱茵报”被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燕妮·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在中间。

这对新婚夫妇好像自愿出境一样前往巴黎,但是很快自愿出境就变成真正的驱逐出境了。甚至在那里,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亚历山大·冯·洪堡竟卑鄙地为驱逐马克思的命令而奔走。马克思一家不得不搬到布鲁塞尔。

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无耻地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

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重加干涉，便搬到伦敦。这一次对于燕妮·马克思说来是真正的驱逐出境，她经受了重重苦难。物质上的困苦，她还可以忍受，虽然由于这种困苦，她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死去了。但是，政府勾结着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对他的丈夫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他们用最卑鄙最下流的诽谤来诬蔑马克思，所有报纸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失去了自卫的一切手段，他在敌人面前突然陷于手无寸铁的境地，他和他的夫人唯一可以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使她蒙受了很深的创伤。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并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独立活动的生存条件。国际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她的丈夫便是先进战士中间的最先进者。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已经烟消云散了，他那曾经遭受封建派和民主派等反动党派百般扼杀的学说，现在已经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广为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与她毕生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从根本上震撼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旧世界，并摧毁着一切阻力，越来越充满胜利的信心，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德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选举¹⁸⁹中光辉地显示了源源不竭的生命力。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

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

1881年12月4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 1814 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1843 年，在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的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的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力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 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

历尽了重重苦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卑鄙的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

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

弗·恩格斯发表于 1881 年 12 月 5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81 年 12 月 11 日“平等报”

俄文译自“平等报”

第 3 种专刊第 1 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¹⁹⁰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¹⁹¹，由“钟声”¹⁹²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无产阶级运动所包括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征服下去；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¹⁹³，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①，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 年 1 月 21 日于伦敦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82 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19 卷译出

① 在原稿中，公社一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语。——编者注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¹⁹⁴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被人遗忘，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默然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¹⁹⁵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¹⁹⁶时所指出的，从一开始就

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肯定了一般现象，却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而好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认为接受这种妄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系¹⁹⁷，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从1849年起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¹⁹⁸，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那就可以说明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成问题，这样，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

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凯撒·奥古斯都圣者(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¹⁹⁹!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最后一块石头: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最后一块石头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葛—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根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最后一块石头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葛派砌上的。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而烦琐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流传。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而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外族人及半犹太人的

混合和交往中唯理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①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唯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修改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并且一经创立,能够博取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信奉。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初期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²⁰¹,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相反地,幻觉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行传已经写成。这里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葛派哲学,即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行传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在同逐渐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教基督徒和多神教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① 艾瓦德已经证明²⁰⁰,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标点的手稿中,在雅赫维(Jahweh)这个名字的不发音的辅音底下,写上了代替它发音的阿特乃(A donai)一字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華(Jehovah)。可见,这个字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这在希伯来语中简直是不可能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末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和罗马法制不相符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民族达一、二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民族中间，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被征服后的战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佩特罗尼乌斯²⁰²）、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人，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

利。特别从提比利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它很像后来的德国雇佣兵,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人,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他们也许还同公社所有制有联系),或者如在高卢则是大地主的债务奴仆。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①。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自由,而斯巴达克的失败,也证明他们不可能解放自己,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人或自由人的后裔。所以在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很多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加先生表明,如果他

^① 按照法耳梅赖耶尔²⁰³的研究,直到九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

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答他们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了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主义（我简直想说伏尔泰主义）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其办法是罗马帝国的奴役，是用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来代替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下流肉体上的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人是如此，可是这只

是极少数人。除此以外,就只好俯首贴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葛学派,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是哲学,而哲学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籍。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到十七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放任的,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

分。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Mea culpa*（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末，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出人类罪孽的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基督教就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

在同多神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4 月下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2 年 5 月 4 日和 11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号和
第 20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19 卷译出

署名: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论美国资本的积聚

不久以前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的**资本积聚**是以多么惊人的速度在进行。根据这项统计资料,纽约的**万德比尔特**先生是富翁中最大的富翁。这位铁路、土地、工厂等等的大王的财产约有**3亿美元**(1美元等于4马克25分尼)。按美国人的说法,他“值”3亿。他握有美国公债券(Bonds)6500万美元,纽约中央铁路—哈德逊河运公司股票5000万美元,以及其他铁路公司股票5000万美元。此外,他在纽约和国内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地产。英国报纸还十分赞赏地说,万德比尔特先生能够买下任何路特希尔德这样的家族的产业,而仍旧不失为世界上最富的人。

万德比尔特一家积攒这份巨大产业……大约才花了三十年!“白厅评论”²⁰⁴写道,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认为也是这样。

在大富翁名单上,继万德比尔特以后的是:

杰伊·古耳德,他也是一个出名的铁路骗子,拥有1亿美元;**麦凯**,银矿主,争取“协议的复本位制”鼓动的组织者,拥有5000万;**克罗克**,拥有5000万;**约翰·洛克菲勒**,煤油冒险家,但不是煤油纵火犯^①,拥有4000万;**科·波·欣丁顿**,拥有2000万;**达·奥**

^① 俏皮话:《Petroleumritter》,《Petroleur》。——编者注。

·米尔斯,拥有2000万;参议员费尔,拥有3000万;前州长斯坦福,拥有4000万;拉塞尔·赛治,拥有1500万;詹·罗·基恩,拥有1500万;赛·琼·提耳登,拥有1500万;爱·丹·摩尔根,拥有1000万;赛米尔·斯隆,拥有1000万;加里逊,拥有1000万;赛勒斯·威·菲尔德,拥有1000万;休·贾奇·朱厄特,拥有500万;悉尼·狄龙,拥有500万;戴维·道斯,拥有500万;霍赛·德·纳瓦罗,拥有500万;约翰·约·加勒特,拥有500万;威·巴·阿斯特,拥有500万。

其实这个名单还很不完全。美国金融巨头的人数还要多得多。而且,由于向美国大量移民,财富的这种惊人积累与日俱增。这种移民直接和间接都首先有利于资本巨头。所以说直接有利,是因为移民促使地价迅速上涨。说间接有利,是因为大量的移民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现在,任我们美国的兄弟报纸登载的关于罢工的无数报道中,我们发现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的百分比愈来愈高,而大多数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实质上也具有这种性质,因为这种罢工不是由于物价狂涨,就是由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春季提高工资而引起的。

因此,现在欧洲每年向美国移民的潮流,只是促使那里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一切后果发展到极点,因而那里早晚势必发生严重的破产。那时移民的潮流就会停止,甚至可能倒流,也就是说,会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工人将面临抉择:饿死或者革命!而一旦出现这种抉择,那末,别了,你们这些神圣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宠臣们!

这个时刻比大多数人所能想像的更近。移民在那里已难于找到工作,快要到来的营业危机的征兆已看得愈来愈清楚,在决定性

的时刻只要有最微小的事情做导火线,就会**发生破产!**

所以,尽管我们和“纽约人民报”²⁰⁵一起为德国的侨民们悲伤,尽管我们相信德国的侨民首先引起美国工人境况的大大恶化,尽管我们和上述报纸一起希望德国工人集中全部注意力来专门改善自己在德国的境况,我们仍旧不能同意该报的悲观主义。我们毕竟应当重视环境,而由于我们的反对者的近视和贪婪,环境愈来愈排除采取真正改革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当看到自己的任务就是不顾任何懦夫而使人们对事变的革命进程做好精神准备。

这一冲突的证明就是:一方面资本大规模积聚,另一方面群众日益贫困。结局只有一个,这就是**社会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5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2 年 5 月 1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1 号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弗·恩格斯 布雷的牧师

查理国王掌当朝，
忠贞之士能找到，
我为教会去卖命，
俸银填满我腰包。
我开导我的羊群：
当皇上由老天排定，
谁敢违命欺国君，
打入地狱受苦刑。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詹姆斯南坐称王，
罗马教备受荣光，
必须要一反过去，
停止对天主教的诽谤。
什么罗马教会和教派，

我和他们也都合得来，
如果不会闹革命，
我要加入耶稣会。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威廉跑来当国王，
拯救自由英名扬，
我赶紧扯起帆篷，
顺着那新的风向。
我这样进行鼓动：
快去同暴政交锋，
现在得赶快结束，
过去奴隶般的服从。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安登基做了女王，
国教又受到荣光，
这件事情不寻常，
我成了一个托利党。

为了教会的完整，
我要大家去斗争，
我把软弱和容忍，
看做是一种罪证。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乔治上台当国王，
温和政治他标榜，
我又摇身变一变，
变成一个辉格党。
变来变去大沾光，
又能得宠于摄政王，
我几乎天天发誓，
反对窥位者和教皇。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
除了信教皇的人妖，
我为它尽忠效劳，

只要它王座不倒。
我的忠诚不再动摇，
除非又得换代改朝，
乔治永远是我明主，
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①

上面举出的这首民歌，也许是一百六十多年来在英国一直受人欢迎的唯一的一首政治民歌。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它那出色的调子，这个调子直到今天还到处为人传唱。其实，对今天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民歌也丝毫没有过时。不过，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照例前进了。这位威风凛凛的独特的牧师，只是在每次更换帝王的时候才改换自己的假面具。可是在我们德国人这里，有一位真正的布雷的教皇^②，骑在我国许多政治上的布雷牧师头上，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他越来越频繁地把全部政治信条彻底翻转过来。昨天主张贸易自由，今天主张保护关税；昨天主张经营自由，今天主张强制统一；昨天主张文化斗争，今天却打着飘扬的旗帜向卡诺萨^③行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Omnia

① 弗·恩格斯自英文译成德文。——编者注

② 指俾斯麦。——编者注

③ 1077年1月，被开除教籍和黜位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堡卡诺萨向他的敌人罗马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屈膝投降，哀求恕罪。此处即投降的意思。——编者注

in majorem Dei gloriam(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用德国话来说,这就是:一切为了收更多的税,拉更多的壮丁。而可怜的小牧师们则应该唯命是从,应该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每次重新“跳过障碍”,而且往往得不到半点补偿。我们那位坚强的老牧师,以何等的轻蔑神气俯视着自己这些渺小的继承人,——他毕竟是以那种帮助他经过一切政治风浪保住了自己阵地的勇敢精神而大大自豪的呵!

弗·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9 月初

载于 1882 年 9 月 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7 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19 卷译出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本初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来自 1878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的三章。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 1880 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²⁰⁶。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 1882 年在日内瓦“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²⁰⁷。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²⁰⁸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粹科学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国字这一点可以引起怀疑。但是

拉萨尔已经根本不在他的演说和宣传小册子中避免使用外国字，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诉苦。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国字。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国字。对于必要的外国字，我没有附上所谓解释性的译文。这些必要的外国字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上通用的术语，它们如果可以翻译，那就不是必要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术语的意义；它不能说明，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内容却刚刚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人，较之“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末我实际上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先生冯·艾内恩、枢密顾问先生亨利希·冯·济贝耳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抑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如果唐·吉珂德挺着长矛同风车搏斗，那末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科·判扎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

^① “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需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需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

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师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2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²⁰⁹）。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弗·恩格斯 品特是怎样造谣的²¹⁰

俾斯麦公爵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仅无视一切礼节，而且无视逻辑、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它享有谩骂、诽谤、撒谎、发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除了一些穿制服的和穿制服的奴仆（他们称达赖喇嘛的粪便和其他排泄物为天赐的甘露，并在需要的时候，准备把它吞下去），大家都知道，这家报纸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东西的庇护者。

如果需要给对方脸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弥天大谎，进行真正有声有色的诽谤，或者需要真正致力于卑鄙龌龊的勾当，那末人们就会选择“北德总汇报”去担任这个光荣的使命。而“北德总汇报”也非常乐意去执行这一使命。

这家由于名声太坏和只会胡说八道、甚至在议会选举运动中都不能利用的“正直的”报纸，最近特别热中于诬蔑社会民主党，散布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卑鄙的谎言。

它用最荒诞的方式歪曲报道法国著名的事件²¹¹，用最触目惊心的色彩涂抹画面，叫人看了毛骨悚然。而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向战栗的人类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强盗、杀人犯、纵火犯，天知道还是些什么人；法兰西共和国法定要灭亡，因为它没有力量保卫自己免受上述恶魔的侵扰，——要知道，只有以俾斯麦之流为首的官相

的君主国才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正是“北德报”，最无耻地把**维也纳**“谋财害命”的案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并给社会民主党捏造罪名，进行最卑鄙的告密²¹²。

两个星期以前，当**奥地利**检察机关以真正蠢货的厚颜无耻把蹂躏匈牙利犹太人的暴行说成是社会民主党的秘密诡计的时候，“北德总汇报”是为这种多么愚蠢又多么卑鄙的举动而欢呼的唯一报纸，并随声附和这个白痴检察官，虽然“北德总汇报”从它最接近的人那里，或者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都很清楚地知道，所谓“反犹太人的运动”遭到社会民主党人最坚决的反对，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尽管这个运动受到“北德总汇报”老板最热心的支持，但是，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它还是垮台了。

我们在“北德报”的一篇相当长的述评里发现了撒谎的最新成就，该述评报道说，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延长有效期的问题似乎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热烈的争论”²¹³。

似乎“李卜克内西派”认为，反社会党人法继续有效，对党是有利的，而其他（派别？）认为这只是“说大话”的政策，因而加以反对，“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争论自然是采取最粗暴的斗争手段”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知道，这些谎话究竟值几文钱。在社会民主党内既没有“北德报”所理解的“派别”，也没有对任何问题，尤其是对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不延长有效期问题发生“争论”。

我们是一些出色的“现实政治家”，不会为还没有生下的鸡蛋而操心，我们对这个问题抱绝对“无所谓”的态度。如果反社会党人法要废除，那末，我们知道，这绝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仍然和现在一样；如果这个法令不废除，我们更会和现在一样。但

是，反社会党人法给了党不可估量的帮助，它巩固了党，教会了党很多东西，总之，在教育的意义对党起了极好的影响，而顺便说说，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是一致的。

确实，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不延长有效期的可能性问题，在党的机关报上，也只有在那里讨论过。但是，这是纯理论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实质决定了这一点。试问，采取“如此粗暴的手段”的那种“争论”到底在哪里呢？没有说过一句话可以为“北德报”的声明作辩护的。显然，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还不懂得撒谎家的职业必须遵守的规则，撒谎也应当近乎情理，就是说谎话也需要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真理，不然，它就无法存在。

顺便说说，“北德报”现在不得不倾听“自由通讯”的话了，它说“北德报”发表那篇述评是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希望保存反社会党人法，这就是废除这一法令的理由，要想出比这更好的理由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了解这一点，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的智力是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够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10 月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2 年 11 月 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5 号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
马尔克²¹⁴

弗·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9 月中—12 月
上半月

作为附录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2 年
霍廷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19 卷译出

弗·恩格斯

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他们当时的真正“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当前短工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这种土地制度，今天虽然只剩下了很少的遗迹，但在整个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它浸透了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可是，它完全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格·路·毛勒才重新发现了它的真正意义²¹⁵。

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民族的古代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日耳曼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从亚洲带来了这种按部落、亲族和氏族的划分，他们在罗马时代编制战斗队时就使有近亲关系的人总是并肩作战，所以，当他们占领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这一带新领土的时候，也受到了这种划分的支配。各个部落在这个新地区里定居下来，但这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像凯撒²¹⁶所明白指出的那样，以部落成员的亲属关系为依据的。亲属关系较近的较大集团，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面，一些包括若干家庭的氏族，又按村的形式定居下来。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村，构成一个百户（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为 *huntari*，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为 *heradh*），几个百户构

成一个区[Gau]。区的总和便是民族自身了。村没有留用的土地，都归百户支配。没有分配给百户的土地，都归区管辖。如果还有可以使用的土地(大多面积极大)，则归全民族直接掌管。例如，我们在瑞典，就可以看到上述各种层次的公社占有制同时并存着。每一个村都有村公有地(bys almänningar)。此外，还有百户公有地(härads)、区公有地或州(lands)公有地；最后，还有归全民族的代表者国王支配的民族公有地，在这里叫做 konungs almänningar(王有地)。不过，所有这些，连王有地在内，都可以统称为 almänningar 或 Allmenden，即公有地。

古代瑞典的这种公有地制度，就其精确的划分来看，无论如何是属于较晚的发展阶段的。如果它曾经以这种形态在德国存在过，那也是很快就消灭了的。由于人口的激增，在划归每一个村的极其广阔的土地上，也就是在马尔克里面，产生了一批女儿村，它们作为权利平等或者权利较小的村，跟母村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马尔克公社。因此，我们在德国，在史料所能追溯的范围内，到处可以看到，有或多或少的村联合成一个马尔克公社。但在这种团体之上，至少在初期，还有百户或区这种较大的马尔克团体。最后，为了管理归民族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监督在它领土以内的下级马尔克，整个民族在最初阶段构成一个统一的大马尔克公社。

一直到法兰克王国征服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的时候，马尔克公社的重心似乎在区里，而区的范围就是马尔克公社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明，在法兰克王国划分行政区域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古老的大马尔克作为司法区重新出现。不过，此后不久，古老的大马尔克就开始分裂。但是，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帝国法”²¹⁷里还规定，一个马尔克通常包括6个到12个村。

在凯撒时代,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日耳曼人,即苏维汇部落,还没有定居下来,他们的田地还是共同耕作的。我们按同其他民族的类比可以推测,这种共同耕作是这样进行的:一些包括若干具有近亲关系的家庭的氏族,一起耕种分配给他们的、年年更换的土地,并把产品分配给各个家庭。但苏维汇人在公元初年在新的住所安居下来以后,这种办法很快就停止了。至少,塔西佗(在凯撒之后 150 年)就只知道由各个家庭耕种土地。但是,分配给这些家庭的耕地,期限也只有一年;每隔一年,又要重新进行分配和更换。

这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今天还可以在摩塞尔河畔和霍赫瓦尔特山脉的所谓农户公社[Gehöferschaften]中看得出来。在那里,虽然不再一年分配一次,但是每隔 3 年、6 年、9 年或 12 年,总要把全部开垦的土地(耕地和草地)合在一起,按照位置和土质,分成若干“大块”[《Gewanne》]。每一大块,再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狭长带状地块,块数多少,根据公社中有权分地者的人数而定;这些地块,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有权分地的人。所以,每一个社员,在每一个大块中,也就是说,在每一块位置与土质各不相同的土地上,当初都分到了同样大的一块土地。现在,这块土地,由于分遗产、出卖种种原因,已经大小不等了,但旧有的整块土地,仍旧是一个单位,根据这个单位,才能决定这块土地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等等的大小。没有开垦的土地、森林和牧场,仍然共同占有,共同利用。

这种最古老的制度,直到本世纪初,还保存在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的所谓抽签分地制中。此后,它的耕地变成了各个社员的私有财产。农户公社也越来越感觉到,停止周期分配,变交替的占有为私有,对它们是有利的。因此,在过去 40 年内,大多数的甚

至是全部的农户公社都消失了，变成了小农的普通村落，不过森林和牧场还是共同利用。

变成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块土地是住宅地。住所的不可侵犯性——一切个人自由的基础，开始于游牧民族的篷车，经过定居农民的小木屋，然后逐渐变为一种对于家宅和园地的完全所有权。这在塔西佗时代早已发生。自由的日耳曼人的住处，大概在那时就已经从马尔克中分离出来，因而成了马尔克公职人员不能进去的地方，成了逃亡者的安全避难所，我们看到，这在后世的马尔克章程里，部分在五到八世纪制定的“民族法”²¹⁸里，就已有了记载。因为，住所的神圣不可侵犯，不是它转变为私有财产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

在塔西佗以后四五百年，我们也在“民族法”中看到，耕地是世袭的，它虽然还不是个别农民绝对的自由地产，但农民有权加以处理，出卖或者用其他方式加以转让。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我们找到了两条线索。

第一，从最早的时候起，在日耳曼尼亚本土除了上述耕地完全共有的闭塞的村以外，还有另一种村，在这种村里，不单是宅地，就是耕地，也从公有财产中，从马尔克中划分了出来，作为世袭财产分配给各个农民。不过这只是发生在由于地形的限制可以说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例如在贝尔格区的狭谷里，或者在威斯特伐里亚那样的窄狭、平坦、两边都是沼泽地的山背上。以后，也发生在奥登林山和几乎全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谷里。这些地方的村，现在还是这样，是由分散的孤立的庭院构成的，每个庭院的四周是归它所有的耕地。耕地的重分，在这里不太可能进行。所以留给马尔克的，只有周围还没有开垦的土地。后来，当可以处理家宅和园地、

把它们转让给第三者的权利获得重要意义的时候，这类园地的所有者便占了便宜。想同样得到这种便宜的愿望，可能使许多实行耕地公社占有制的村停止了通常的定期分配办法，因而使社员的各种份地同样成为可以继承和转让的产业。

第二，征服的战争将日耳曼人带进了罗马的领土，在那里，几百年以来，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还是罗马式的、无限制的私有财产），在那里，少数的征服者，不可能把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占有形式完全废除。至少在旧日的罗马领土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说明耕地和草地的世袭私人占有制同罗马法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一直保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耕地公社所有制残余，恰恰存在于莱茵河左岸，即存在于被征服的但是**彻底日耳曼化**了的地区。当法兰克人五世纪在这里住下的时候，耕地公社所有制大概还保留在他们中间，否则我们今天在那里就无从找到农户公社和抽签分地制了。不过在这里，私有制也很快就不可阻挡地渗进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六世纪“里普利安法”²¹⁹在谈论耕地的时候，只提到这种私有制。在日耳曼尼亚内地，我已经说过，耕地不久也变成了私产。

如果日耳曼的征服者实行了耕地和草地的私有制，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分配土地的时候，或者其后不久，就放弃了重新分配的办法（如此而已），那末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到处推行他们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连同森林和牧场的公共占有制，以及马尔克对已分土地的最高统治权。这样做的，不仅有法兰西北部的法兰克人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还有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法兰西南部 and 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及伦巴德人。不过，在最后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里，据悉差不多只有在高山地区，马尔克制度的痕迹才保存到今天。

马尔克制度放弃重新分配耕地的办法以后所采取的形态，我们不仅在五到八世纪的古代“民族法”里，而且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中世纪的法律书籍里，在十三到十七世纪的许多日耳曼的马尔克章程（即所谓判例）里和法兰西北部的习惯法（*coutumes*）里都可以碰到。

马尔克公社虽然放弃了在各个社员中间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的权利，但对于它在这些土地上的其他权利，却一条也没有放弃。这些权利都是很重要的。公社把它的田地转交给个人，只是为了把它用作耕地和草地，而并无其他目的。除此以外，单个的占有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地下发现的财宝，如果埋藏的地方深到犁头所不及，那就不属于他，而首先属于公社。关于采矿等权利，情形也是一样。所有这些权利，以后都被地主和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抢夺去了。

但是耕地和草地的利用，还是要受到公社的监督和调整，其形式如下。凡是实行三圃制的地方（差不多到处都实行这种制度），村的全部耕地被分成相等的三大块，其中每一块轮换地第一年用于秋播，第二年用于春播，第三年休耕。所以，一个村每年都有它的秋播地、春播地和休耕地。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使每一个社员在这三块土地上都能得到同样大小的一份，以使每个人都能不受损失地适应公社的强制轮作制；按照这种制度，他必须在他自己这块秋播地里进行秋播等等。

每一块休耕地，在休耕期间又成为公共财产，供整个公社当牧场使用。而其他两块土地，在收获以后直到下次播种以前，同样又成为公共财产，被当做公共牧场使用。草地在秋天割草以后，也是如此。在所有用作放牧的田地上，占有者必须把篱笆拆去。这种所

谓强制放牧办法,当然要求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不由个人决定,而要求它成为大家共同的时间并由公社或习惯作出规定。

其他一切土地,即除去家宅和园地或已经分配的村有地以外的一切土地,和古代一样,仍然是公共所有、共同利用。这里有森林、牧场、荒地、沼泽、河流、池塘、湖泊、道路、猎场和渔场。每一个社员从被分配的马尔克耕地中分到的一份,当初都是大小相等的,与此相类似,他们利用“公共马尔克”的权利也是相等的。这种利用方法,由全体社员决定。当一向耕种的土地不够使用,需要从公共马尔克中划出一块土地来耕种的时候,耕地的分配方法也是如此。公共马尔克的主要用途,是放牧牲畜和采摘橡实来喂猪。此外,森林提供木料和燃料、厩舍的垫草、浆果和蘑菇;如果有沼地,它就提供泥炭。关于牧场、木材的利用等等的规定,构成了从各个不同时代留传下来的许多马尔克章程的主要内容。这些章程都是在那古老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开始成为争论对象的时候写下来的。仍然保留下来的公有森林,是这些古老的、没有被分割的马尔克的可怜残余。还有另一种残余至少存在于德国西部和南部,这就是在人民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森林是公有的财产,在森林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采集花卉、浆果、蘑菇、山毛榉实等等,并且一般地说,只要他不做有害的事,他便可以在里面随意行动。可是,就是在这里,俾斯麦也要打主意,用他那臭名昭彰的关于采集浆果的法令²²⁰使西部各省符合于旧普鲁士容克的标准。

马尔克社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以外,当初他们在马尔克内部在参加立法、管理和裁判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机会。他们定期地或经常地(如有必要)举行露天集会,商定马尔克的事务,审判马尔克中的不法行为和纷争。这是古老的但是

小规模の日耳曼人的民众大会，而所谓民众大会，当初也不过是一个大规模的马尔克集会罢了。也制定法律（虽然只是在少有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推举公职人员，也检查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形，但主要还是宣判。主席只能提出问题，判决由到会的全体社员决定。

马尔克制度，在古代，在那些没有酋长的日耳曼部落里，几乎是唯一的制度。旧日的部落贵族（他们在民族大迁徙时代，或在其后不久，没落下去了）以及一切随马尔克制度自然产生的东西，很容易适应于这种制度，正如凯尔特人的氏族贵族，在十七世纪还适应于爱尔兰的土地公社一样。这种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里已经扎下了深根，我们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脚印。古代，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只限于司法权力，这种权力由百户、区和全部落的民众大会掌握。但是，民众法庭不过是一个民众的马尔克法庭，它所处理的不单是马尔克的事务，而且还有属于公共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在行政区制度形成以后，国家的区法庭和普通的马尔克法庭划分开了，但这两种法庭里面的司法权，仍保留在人民手里。只有当古老的人民自由已经大部丧失，为法庭服务和服兵役已成为贫穷了的自由人民的重担的时候，查理大帝才能在大多数地方的区法庭里，用陪审员法庭^①来代替民众法庭。但这丝毫也没有触动马尔克法庭。恰恰相反，它们仍然是中世纪领地法庭的典范。就是在这种法庭里，领主也仅仅是

① 这种陪审员法庭，不能跟俾斯麦—莱昂哈特的陪审员法庭²²¹混为一谈。在后一种陪审员法庭里，判决是由陪审员和律师共同做出的。在古代的陪审员法庭里，根本没有律师，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没有表决权，判决是由陪审员独立做出的。

个提问题的人,判决者则是臣仆自己。村制度,无非是一个独立的村马尔克的马尔克制度;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濠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后来的一切城市制度,都是从这种最初的城市马尔克制度中发展起来的。最后,中世纪无数并不以地产共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社团的规章,尤其是自由行会的规章,都是模仿马尔克制度的。人们把赋予行会经营某一行业的特权,和一个公共的马尔克完全同等看待。在行会里,也跟在马克里一样,总是用同样的热心,甚至往往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力求每一社员完全同等地或者尽可能同等地享用公共的收益。

马尔克制度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极不同领域和对各种各样要求所表现的近乎神奇的适应能力,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在同日益发展的大土地所有制度的斗争中也表现了出来。马尔克制度是在日耳曼人定居日耳曼尼亚时候产生的,那时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亚洲带来的、几乎被遗忘了的农艺刚开始复苏。马尔克制度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是在和土地贵族的不断的艰苦斗争中生存下来的。但是马尔克制度当时还是非常需要的,在贵族把农民土地攫为己有的地方,受奴役的村的制度依然是马尔克制度(虽然由于地主的侵犯已大为削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到下面还要举一个例子。只要公共马尔克仍然存在,马尔克制度就能适应千变万化的耕地占有关系;在马尔克不再是自由的马尔克以后,马尔克制度同样能适应公共马尔克中各种极不同的所有权。马尔克制度所以没落,是因为贵族和僧侣在地方当局的乐意支持下,差不多夺去了全部农民土地(不管是分配了的或没有分配的)。但是,马尔克制度在经济上显得落伍,作为农业经营方式已失去了生命力,这事实

上是由于近百年来农业的巨大进步使农艺成为一门科学,并采用了全新的经营方式。

马尔克制度的崩溃,在民族大迁徙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法兰克的国王们,作为民族的代表,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辽阔土地,尤其是森林,占为己有,并把它们当作礼物,慷慨地赠送给他们的廷臣、将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就构成了后世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的基础。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有法兰西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在中世纪,几乎整个天主教西欧都保持着这样的比例。

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其通常结果是土地被没收,这就使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所以,早在墨洛温时代,就有很多自由人没有土地。查理大帝永无休止的战争,摧毁了自由农民的主力。当初,每一个自由的土地占有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不但要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在6个月之内,自己维持军中的生活。毫不奇怪,早在查理时代,在5个人中间,事实上连一个真正能服兵役的人也不大能找到了。在他的后继者的混乱统治下,农民的自由更加急速地趋于消亡。一方面,诺曼人的侵扰、国王们的永无穷期的战争和豪族巨室之间的私斗,逼迫自由农民一个跟着一个地去寻找保护主。另一方面,这些豪族和教堂的贪得无厌,也加速了这种过程。他们用欺诈、诺言、威胁、暴力,把愈来愈多的农民和农民土地,置于自己权力控制之下。不论在前一种场合或后一种场合,农民的土地总是变成了地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要叫农民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才归还给农民使用。可是,农民却从自由的土地占有者变成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的依附农民,甚至农奴。在西法兰克王国²²²,一般说,在莱茵河西岸,这是通常现象。反之,在

莱茵河东岸，却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自由农民，他们大多数是散居的，只有少数集聚成一些自由的村。但是，即使在这里，在十到十二世纪，贵族和教会的强大势力，也使愈来愈多的农民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一个庄园主（不论是教会的或者世俗的）得到了一块农民土地，他同时也就在马尔克内取得了与这块土地有关的种种权利。这些新的地主，因此就变成了马尔克社员。他们同其他自由的和依附的社员，甚至同他们自己的农奴，原先在马尔克内只是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不管农民的顽强抵抗，在马尔克中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特权，甚至往往迫使整个马尔克服从他们地主的统治。不管怎样，旧的马尔克公社仍然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是在地主监护之下。

弗里西安人、尼德兰人、萨克森人和莱茵—法兰克尼亚人向勃兰登堡及西里西亚的移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那时马尔克制度对于耕作，甚至对于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还是多么必要。这些人从十二世纪起就在地主的土地上，以村的形式定居下来，而且正是按照日耳曼的法律，即古代的马尔克法律进行的，——既然在地主的庄园上还保留着这种法律。每个人都分到了家宅和园地，分到了一块同样大小的、用古代抽签方法决定的村有土地。每个人都有利用森林和牧场的权利，这多半是地主的森林，专用的马尔克比较少。所有这些都是世袭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移民必须世代代向地主付一定的代役租，为地主服一定的徭役。但这种赋役很轻，这一带农民的境遇，比德国任何地方都要好些。因此，当农民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仍很安静。他们这种对切身事业的背弃行为，使他们后来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一般说来，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发生了一种有利于农民的决定性的转变。十字军远征为此作好了准备。许多出征的地主，干脆让他们的农民获得了自由。其他一些地主不在人世了，数以百计的贵族世家消灭了，他们的农民也往往得到了自由。还有一层，随着地主需要的增加，支配农民的赋役远比支配他们的人身重要得多。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的中世纪初期的农奴制，它给予地主的权利，逐渐失去了价值。农奴制慢慢衰弱下去，农奴的地位日益接近于普通依附农民的地位。农业的经营完全墨守旧法，所以庄园主要想增加他们的收入，只有开垦新土地和建立新村。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同移民好好商量，不管他们是庄园里的依附农民还是外来农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农民的赋役多半很轻，并且到处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们也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僧侣的领地里。最后，新吸引来的移民的优越地位，又影响到附近依附农民的处境，他们在整个德国北部，尽管还继续为庄园主提供赋役，但却获得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只有斯拉夫和立陶宛—普鲁士农民还是不自由的。但是这一切不能保持多久。

到了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城市迅速勃兴和富裕起来。尤其是在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城市美术工艺和奢侈品得到了繁荣发展。城市贵族的豪华生活，使粗食粗衣、陈设简陋的土容克不能安眠。但是，从哪儿去弄到这些好东西呢？拦路行劫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劳而无功。可是要去购买，就要有钱。钱却只有农民能够供给。于是，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代役租和徭役，越来越热衷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地主的土地。在这些事情上面，君主和贵族

得到了罗马法学家的助力。这些法学家把罗马法的条文,应用到大半他们不了解的日耳曼关系中去,制造了极度的混乱,但是他们善于这样制造混乱,就是使地主永远从中得到便宜,农民总是吃亏。教会中的大主教做法更加简单:他们伪造文件,从中缩小农民的权利,扩大农民的义务。为了抵抗君主、贵族和教士们的这种掠夺行为,从十五世纪末叶起,农民经常发动单独的起义,到了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席卷了士瓦本、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一直泛滥到阿尔萨斯、普法尔茨、莱茵高和绍林吉亚。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农民遭受了失败。从那时起,在日耳曼农民中间,农奴制度重新又取得了普遍的优势。在爆发战争的地方,一切还保留着的农民权利,现在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他们的公有地变成了地主的土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农奴。德国北部处境较优的农民,保持了安静,为了对他们这样一种行为表示奖励,就使他们受到了同样的压迫,不过做得比较慢一点罢了。日耳曼农民的农奴制,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开始实行于十六世纪中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开始实行于十六世纪末叶,并且日益普遍地强加到农民身上。

这种新的暴力行动,也还有它的经济原因。在宗教改革时代的战争中,只有德意志的邦君扩大了权力。贵族们进行抢劫这一高贵行业,已经过时了。如果他们不甘心没落,就必须从他们的地产里榨取更多的收益。不过,唯一的方法是仿效大一点的地主、特别是寺院的榜样,自己至少负责经营一部分土地。过去这只是一例,现在却成为一种必要。但是,这种新的经营方法遇到了障碍,几乎所有地方的土地都分给了纳租的农民。只有在自由的或依附的纳租农民变成十足的农奴以后,老爷们才能获得行动的自

由。一部分农民,正如专门术语所说的被“肃清”(《gelegt》),这就是说,不是被撵走,便是沦为只有一间草屋和一小块园地的无地农民(Kotsassen),他们的份地,合并成一个大规模的地主田庄,由新的无地农民和留下来的农民以徭役劳动进行耕种。这样,不仅有大批农民干脆被赶走,而且留下来的农民所负担的徭役也日益大量地增加。资本主义时期,在农村中是作为以农奴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时期,宣告开始的。

不过这种转变,在开头的时候是进行得相当缓慢的。开始了三十年战争²²³。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做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但是受苦最深的,又是农民。

占有土地的贵族,这时成了农村中唯一的主人。邦君们恰巧在那时候取消了贵族在等级会议中的政治权利,因此使他们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农民。而农民最后的抵抗力,已经为战争所摧毁。这样,贵族就可以把全部土地关系安排得最有利于恢复他们已经破产的财政。不但把那已经抛弃的农民田宅,直接跟地主的庄园合并起来,而且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大规模地、有系统地驱逐农民。地主的田庄越大,农民的徭役劳动自然也越重。“无限制的徭役”时代又来到了。老爷可以任意命令农民、农民的家属、农民的耕畜出多少次工,干多长的时间。农奴制度现在成了普遍的制度。自由农民正如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老爷为了将农民的任何抵

抗，即便是极微弱的抵抗，也能在萌芽状态中加以扑灭，他们从邦君那里取得了领主审判权，也就是说，他们被任命为审判农民任何小过失和小纠纷的唯一法官，甚至在农民和地主本人争讼的时候，也是一样。于是，地主就成了他自己案件的法官！从此以后，棍子和鞭子统治着农村。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这时受到最大的屈辱。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也精疲力尽，失去任何自救的能力，只有依靠外援才能得救。

这种外援终于来了。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在德国和德国农民头上也出现了美好时代的曙光。革命军一占领莱茵河左岸，那里的徭役劳动、代役租、对老爷的各种贡赋等一大堆陈腐废物，连同老爷本身，就像被魔杖点了一下似地立即消失了。莱茵河左岸的农民从此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一部在革命时期起草的、被拿破仑篡改了的 Code civil²²⁴。这部法典很适合他们的新情况，他们不但看得懂，而且还可以很方便地带在口袋里。

不过，莱茵河右岸的农民还需要长期等待。不错，普鲁士在耶拿²²⁵遭到应有的失败以后，若干极端可耻的贵族特权业已废除，而且根据法律，所谓豁免农民的其他赋役也有了可能。不过，这大部分在很长时间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其他的邦中做得更少。直到1830年的法国第二次革命，才开始至少在巴登和靠近法国的其他几个小国里实行这种豁免。当1848年法国第三次革命终于也带动了德国的时候，普鲁士的豁免还远没有完成，在巴伐利亚境内，还根本没有开始！现在，事情自然进行得快一些。这一次亲身谋反的农民的徭役劳动，当然丧失了一切价值。

豁免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老爷向农民收取一笔钱或一块地以后，就应该承认农民剩余下来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

不担负赋役的产业，—— 尽管过去属于老爷的全部土地，都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不仅如此。在清算的时候，派来办理此事的官吏，当然差不多总是站在老爷一边，他们在老爷那里居住和吃喝，所以农民所吃的亏，甚至大大超过了法律条文的规定。

由于三次法国革命和一次德国革命，我们终于又有了自由的农民。但是，我们今天的自由农民，和古代的自由马尔克社员相比，差得多远啊！他们的土地，一般都小得多。除了少数大大缩小了的、荒芜的公有森林以外，没有分割的马尔克已经消失了。但对小农来说，不利用马尔克就不能养家畜，没有家畜就没有粪肥，没有粪肥就没有合理的耕作。收税官和紧跟在他后面的吓人的法警，这些今日农民最熟悉不过的人物，都是古代马尔克社员没有听说过的。还有那些从事抵押放款的高利贷者，他们也是没有听说过的，而现在农民的田产，却一块块地落到他们的魔爪中去。但最妙的是：这批新的自由农民（他们的份地和活动能力被大大缩小），正好出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太晚的德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正同机械的纺织业排斥了手纺车与手织机一样，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 只要它们有这样做的必要时间。

因为，处在目前经营形式下的全欧洲农业，已经受到了美洲大规模谷物生产这个占有优势的敌手的威胁。美洲的土地天然适于耕种，天然具有长期的肥力，购买它又花不了几文钱，同这样的土地，不管是我国负债的小农，或者是我国同样债台高筑的大土地占有主，都是无法进行竞争的。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美洲的竞

争下失败了。欧洲农业只有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存在。

这就是我国农民的前景。一个尽管是衰落的自由农民阶级的复兴,却有这样的好处:使农民处于这样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他们在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工人的协助下,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只要他们愿意懂得怎样做^①。

但是怎么办呢?采用恢复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陈旧的过时的形式,而用新的形式;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经营大工业。

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营,才能对他们有利。

这究竟怎样组织呢?德国农民们,好好地想一想吧。能够帮助你们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

^① 下面几段文字是弗·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马尔克”的单行本时所做的补充,该书题为:“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编者注

弗·恩格斯 燕妮·龙格(马克思)

1月11日,卡尔·马克思的长女、约八年前同前巴黎公社委员、现任“正义报”²²⁶编委沙尔·龙格结婚的燕妮,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去世了。

她生于1844年5月1日。她是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同这个运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她拘谨得几乎可以被看成胆小,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一个男子也会羡慕的沉着和刚毅。

当爱尔兰的报刊揭露了1866年和后来被判罪的芬尼亚社委员在监狱中所受到的虐待,而英国报刊闭口不谈这些卑鄙行为的时候,当格莱斯顿内阁违背在选举时所作的诺言,拒绝赦免犯人而且丝毫不改善他们的处境的时候,燕妮·马克思就设法触痛一下笃信宗教的格莱斯顿先生。她在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²²⁷上刊登了两篇文章,以鲜明的笔调描述了自由的英国是怎样对待政治犯的。她的文章发生了作用。巴黎大报的揭露是难以忍受的。几个星期以后,奥顿诺凡-罗萨和其他大多数人都被释放并启程到美国去了。

1871年夏天,她同最小的妹妹到波尔多看望妹夫拉法格。拉法格、他的妻子、他的有病的孩子和这两位姑娘从那里前往比利牛

斯山脉巴涅尔—德—吕雄矿泉。一天清晨,有一位先生来见拉法格,对他说:“我是警官,但我是共和派;我奉命要逮捕你。已经查明,你是负责波尔多同巴黎公社的联络的。你现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越过国境。”

拉法格和妻子及孩子顺利地翻越山路到了西班牙。警察局为此向两位姑娘进行报复,逮捕了她们。燕妮的口袋里有一封在巴黎附近牺牲的公社领袖古斯达夫·弗路朗斯的信。如果这封信被搜出,它将成为她们二人到新喀里多尼亚岛²²⁸旅行的一份最有效的护照。在单独留在室内的瞬间,她打开了一本旧的、复盖着灰尘的登记簿,把这封信夹在中间,再把它合上。这封信可能现在还在那里。两位姑娘被带进省长办公室,这位省长,高贵的凯腊特里伯爵、老波拿巴主义者,对她们严加审问。但是这位前外交官的狡猾和前骑兵军官的粗暴,碰到燕妮的镇静的理智都失败了。凯腊特里对于“这一家的妇女们显然都具有的毅力”说了些狠毒的话,就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在同巴黎通了无数次电报以后,他终于只好释放了这两位姑娘,她们在拘押时受到了真正普鲁士式的待遇。

燕妮一生中的这两件事情充分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人。无产阶级失去了她这样一个英勇的战士。但是,她的悲痛万分的父亲至少还有这样一种安慰,这就是欧美千百万工人分担着他的悲痛。

1883年1月1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3年1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署名: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

就在 15 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坟墓周围，当时，这里将是一位高贵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又掘开这座坟墓，把她丈夫的遗体放在里面。

卡尔·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规律，几乎只要略加说明就能保证它得到承认。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造成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及其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巨大阶级划分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这个社会形成和成长起来，暂时大致还没有衰亡下去；由于这一规律，这个社会最终必将像所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一样灭亡。看到这些成果，特别沉痛地感到，正当他的工作高度展开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他，不管他做了多么多的工作，他还留下了更多没有完成的工作。

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

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

因为,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者。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积极的战士。他这部分活动的最杰出的成就是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他从1864年到1872年一直被公认为该协会的领袖。从表面迹象来看,这个协会已不再存在;但是欧美一切文明国家工人同盟的兄弟联系永久地确立了,并且没有任何表面的形式上的同盟联系,它也会一直继续存在下去。

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但是他对诬蔑几乎并不在意。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忍受诬蔑,这个人就是他,在他死的时候,他可以骄傲地看到,在西伯利亚矿井、在欧洲和美洲的工厂里,他有千百万追随者;他看到,他的经济理论已被全世界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无可争辩的基础,他还有许多敌人,但是个人的敌人恐怕连一个也没有^①。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17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83年3月20日“正义报”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正义报”校对过

① 在“正义报”(1883年3月20日)上,这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讲话”的法译文,末尾还有下面一段话:“马克思在私生活方面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现在我无法来说明,也用不着说明,因为你们所有到这里来向他最后告别的人,都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永别了,马克思!你的事业和你的英名将永垂不朽。”——编者注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3月17日,星期六,在海格特公墓,马克思被安葬在15个月以前安葬他的夫人的同一个墓穴里。

在墓地上,哥·雷姆克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发行部,代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向马克思的灵柩献了两只系着红带的花圈。

随后,弗·恩格斯用英语发表了一篇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²²⁹,‘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接着，马克思的女婿龙格宣读了收到的以下几篇法文挽词。

一、俄国社会主义者给 卡尔·马克思的挽词

“谨代表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向当代最杰出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致最后的永别的敬意。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反抗最坚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俄国社会主义者正在进行曲折变化的残酷的斗争，而且在社会革命原则取得最后胜利以前决不终止这一斗争，现在，我们在这位热烈同情我们斗争愿望的人物的墓前，表示深切的哀悼。俄罗斯语言是最先翻译‘资本论’这部现代社会主义福音书的语言。俄国大学生最先听到伟大思想家（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的理论以赞许的口吻所做的介绍。甚至那些在具体组织问题上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奠基者有分歧意见的人，也总是不得不敬佩他那包罗万象的知识，敬佩他那深刻揭示现代资本的本质、揭示社会各经济形态的进化过程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同这种进化的依赖关系的高度洞察能力。甚至那些厕身

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最凶恶的反对者，也不能不听从马克思和他的终生的友人弗·恩格斯^① 35年前共同提出的伟大革命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将使一切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和估价他对当代的影响的人感到悲痛。

请允许我补充一句，他的逝世将使那些在他的个人生活方面了解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像爱戴挚友一样爱戴他的人感到更大的悲痛。

彼·拉甫罗夫

1883年3月15日于巴黎”

二、唁 电

“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对思想家的逝世表示哀悼。他的唯物史观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现代共产主义运动。巴黎联合会对马克思的为人深表尊敬，对他的学说表示完全赞同。

书记 莱 宾

1883年3月16日于巴黎”

三、唁 电

“惊悉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共同的导师不幸逝世，我谨以个人和西班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向马克思的友人和女儿致以深切的哀悼。

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1883年3月16日于巴黎”

接着，李卜克内西用德语发表了演说：

^① 恩格斯在把挽词译成德文时去掉了自己的姓。——编者注

“为了表达对难忘的导师和忠实的朋友的爱戴和感激，我从德国来到这里。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他的最老的朋友和战友刚才说，卡尔·马克思是本世纪最遭嫉恨的人。不错，他是最遭嫉恨的人，但他也是最受爱戴的人。最嫉恨他的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最受戴他的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因为他们已经觉悟到本身的地位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爱戴他，因为他热爱他们。我们对马克思的逝世感到不胜悲痛。他的爱同他的恨是一样地伟大。他的恨是由爱产生的。他不仅具有伟大的智慧，而且还有伟大的心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在这里，我不仅是他的学生和朋友，而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党委托我表达它对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因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缔造）的感情。

说漂亮话在这里是不适宜的。卡尔·马克思最讨厌空话。他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党从空话下面解放出来，并给了党一个坚实的牢固的科学基础。他是科学上的革命家，是运用科学的革命家，他登上了科学的最高峰，是为了从那里走向人民，使科学成为人民的共同财富。

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

自然科学把我们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天上的神尽管被科学消灭了，但它仍然存在。

马克思向人民揭示的社会科学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同时也能消灭人间的偶像和权贵，只要这些人活着，他们就不会让神死去。

科学不仅属于德国。科学没有任何界限，尤其没有民族界限。因此，‘资本论’的作者自然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

我们把科学基础的奠定归功于马克思，这种科学基础使我们能反抗敌人的任何进攻，使我们能以日益壮大的力量不断地进行我们已经开始的斗争。

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宗派、从流派变成政党，即变成正在胜利地进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的政党。

而且，不仅对我们德国人是如此。马克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一生都献给全世界无产者了。全世界能够思考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都将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

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决不会耽于悲痛。他并没有死。他活在无产阶级的心里，他活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里。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他的

学说将日益发扬光大！

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会照着已故的伟大战士那样去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

除上述几个人之外，参加葬仪的还有马克思的另一个女婿保尔·拉法格、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格·罗赫纳。此外，代表自然科学界的是两个第一流的著名人士：动物学教授雷伊·朗凯斯特和化学教授肖莱马；他们俩人都是伦敦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的会员。

弗·恩格斯写于 1883 年 3 月 18 日
左右

载于 1883 年 3 月 2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 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

在这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接到一些表示哀悼的函电，这说明它引起了何等广泛的反响，而报道这些情况是我的责任。

3月20日，爱琳娜·马克思女士接到“每日新闻”编辑部转来的一份法文电报，电文如下：

“莫斯科3月18日。伦敦‘每日新闻’编辑部。敬请转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已故的卡尔·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先生，请他代购花圈一个献给‘资本论’的不朽作者的灵柩前。题词如下：

‘献给劳动权利理论的维护者及实际的争取者。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敬挽’

请恩格斯先生惠示地址及花圈价格，垫款即还。

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电报当然没有赶上3月17日举行的葬礼。

其次，3月31日，我们的朋友彼·拉甫罗夫从巴黎汇来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寄给他的124法郎50生丁（相当于4英镑18先令9辨士）。这笔钱也是用来购买献给卡尔·马克思墓前的花圈的。

再次，“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周报道说，敖德萨的大学生也要求以他们的名义买花圈献给马克思的墓前。

因为彼得堡大学生寄来的钱足够买三个花圈，我就冒昧地用这笔钱给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大学生也各买了一个花圈²³⁰。制作题签在这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这几个花圈在下星期初总是可以献的，那时我就可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告我收到的这笔钱的花费情况。

我们还收到通过这里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自佐林根寄来的一个美丽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给卡尔·马克思。佐林根刀剪业工人敬挽。”当我们于3月24日去献这个花圈时，我们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献的花圈上的长条红绸带，不知被哪个渎神的人剪下偷走了。向管理处申诉也无济于事，但也许可以保证将来看管得好一些。

瑞士的一个斯拉夫协会²³¹

“希望为纪念卡尔·马克思筹集一笔以马克思命名的国际特别基金，以便帮助伟大解放斗争中的受害者，并支援这一斗争”；

同时还寄来他们的第一批捐款。这笔钱现在保存在我这里。当然，这个倡议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它能否博得赞同，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

为了用事实来驳斥报纸上的谣言，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们伟大的理论家和领袖患病和逝世的经过。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经过三个疗程的治疗之后，他的慢性肝脏病已经几乎痊愈，只是慢性胃病和神经衰弱仍然使他感到痛苦，他常常头痛，而特别厉害的是接连不断的失眠。在夏季洗海水浴和避暑以后，这两种病没有怎么犯，只是过了年以后，又更严重地复发了。一般说来，慢性喉头炎，影响睡眠的咳嗽和慢性支气管炎已略略好些，但正是这些病症使他体力异常衰弱。在他妻子逝世

前四五个星期，他突然患了由于支气管炎和刚得的肺炎所引起的严重的肋膜炎。当时病势非常危险，但是也顺利地过去了。随后，让他先到威特岛（1882年初），再到阿尔及尔去。一路上天气寒冷，他到阿尔及尔时，又患了肋膜炎。在通常的情况下，肋膜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那年阿尔及尔的冬季和春季反常地寒冷多雨，4月，餐厅里还得不断地生火！这样一来，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恶化了。

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后就上蒙特卡罗（摩纳哥）去，由于途中气候寒冷潮湿，到那里的时候，他第三次得了肋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的天气也老是很坏，好像坏天气是他从非洲带去似的。这样，他在那里不仅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又得同新的疾病作斗争。初夏，他去阿尔让台他女儿龙格夫人那里，用附近恩吉安硫矿泉水浴来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尽管夏季多雨，治疗还是有进展，虽然进展较慢，医生对此颇感满意。后来医生又要他到日内瓦湖畔的斐维去疗养；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大有起色，医生虽然没有允许他回伦敦，不过还是允许他到英国南部海滨去过冬。马克思终于又决定在这里恢复自己的工作。9月他回到伦敦，那时他看来是健康的，常常同我一起爬上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他的住宅大约高300英尺）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11月浓雾降临的时候，大家让他到威特岛南部的文特诺尔去。但是，那里的气候又是多雨多雾，结果又难免伤风咳嗽等等，总之，不能在新鲜空气中作健身运动，整日蜷居室内，反而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那时，龙格夫人去世了，次日（1月12日），马克思回到伦敦，他的支气管炎发作了。不久，又并发了喉头炎，使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下咽。他以坚忍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

某些硬的食物。2月间又发现了肺脓肿。15个月来他已经服用过各种药品，现在，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经失去效用，只能使他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眼看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可是病一般说来还是比较顺利地好转。支气管炎已几乎痊愈，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医生表示大有希望。但是那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最适宜于探望他的时间），我意外地发现他全家人都在掉眼泪：他很不好，看来要完了。他们告诉我，那天早晨他胃口还很好，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在马克思家40年、从小抚育他所有孩子的忠实的老琳蕻·德穆特，上楼到他的房间去，但立刻转回来说：“快去看一看，他快睡着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卡尔·马克思是坐在安乐椅上去世的，没有比这样的死再安详的了。

现在，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谈一个好消息：

“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全部保存下来了。目前这样的手稿是否适宜于发表，我还不能断定，——手稿有大开纸1000多页。但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形式”，已在1867—1870年整理完毕。稍后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并有大量评论性的摘录材料，特别是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材料；这些摘录大概有很多可以利用。

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

1883年4月28日于伦敦

二

收到阿尔让台爱尔福特社会民主党人赠送的、题词写在红色

绸带上的美丽的花圈。碰巧找到了一个人，就顺便把花圈带来了。向墓地献这个花圈时，发现佐林根送来的花圈上的红色绸带又被人偷走了。

当时莫斯科、彼得堡和敖德萨赠送的三个花圈已经做好。为了不使绸带被偷，我们不得已把绸带的两边稍微剪破一点，使这些绸带不能再作别的用处。昨天献了这些花圈。一场大雨把爱尔福特的花结淋得不能再作其他用处了，因此没有被人偷走。

这三个花圈每个价值 1 英镑 1 先令 8 辨士，共值 3 英镑 5 先令。因此，汇给我的 4 英镑 18 先令 9 辨士，剩下了 1 英镑 13 先令 9 辨士，我把这些钱寄给了彼·拉甫罗夫，让他按照赠送者的意见处理。

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无耻之徒得到了一个替自己拼凑政治资本、著作资本甚至金钱的好机会。我在这里只举几个应当让大家知道的例子。其他很多属于私人通信的材料也就不必谈了。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²³²书记菲利浦·范一派顿写给我的信（今年 4 月 2 日）说：

“不久以前举行了纪念卡尔·马克思的游行，一切派别在这次游行中都联合起来，向已故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这时，约翰·莫斯特和他的朋友们当着大庭广众宣布，他，莫斯特个人同卡尔·马克思交往密切，他在德国进行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而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我们对马克思的天才和活动评价很高，我们不能相信，他会支持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思想和活动方式。所以，能否谈谈你的看法：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抱怎样的态度？莫斯特不合时宜的荒唐胡言已经引起一片混乱，听到像马克思这样具有极高威信的人竟会赞同这种策略，我们是很不愉快的。”

我在4月18日回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把这封回信译成德文²³³：

“你在4月2日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²³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渐消亡。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的消失，用来进行压迫的武装力量、国家政权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我们同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束部分²³⁵就可以读到。

无政府主义者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的确，这个国家首先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候破坏国家，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主义敌人和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一定会变成新的失败，结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杀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从巴枯宁搬出目前这种无政府主义谬论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不断与之作斗争。这一点还要我专门说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全部内部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从186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就竭

力采取各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是他们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 1872 年 9 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历时五年的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而告结束。最主张开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霍布根代表**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现在谈一下**约翰·莫斯特**。

谁断定,莫斯特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后,似乎同马克思有过任何联系或得到过马克思的某种支持,那他或者是受骗了,或者是自己分明在撒谎。在伦敦‘自由’周报第一号出版以后,莫斯特不过到马克思或我那里去弯过一两次。我们没有到他那里去过,也从来没有在哪里偶然遇见过他。最后我们甚至干脆不订他的报纸,因为上面‘简直毫无内容’。我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像对他曾经求教过的那些人一样地蔑视。

莫斯特在德国的時候,就发表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通俗’说明²³⁶。当时曾请马克思审阅一下这本书,以便出第二版。我同马克思一起做了这项工作。我们确信,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头到尾改写该书,那末只有删掉莫斯特最荒唐的谬论,没有任何别的更好的办法。马克思容许只有在下述不容改变的条件才可以把他的修改加进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名字永远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同**约翰·莫斯特**的拙劣著作,即使是它的修订本联系在一起。

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发表这封信。”

上面谈了美国,下面谈意大利。

大约两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即曼都亚的**阿基尔·洛里亚**先生,把他的一本关于地租的书²³⁷寄给了马克思,并且附了

一封德文信，在信中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他同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还通过信。1882年夏天他来到伦敦，到我那里去了两次。他第二次到我那里时，我曾经就他在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²³⁸中责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这件事，郑重地向他提出了意见。

现在，这个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智慧的人，在“新文选”²³⁹上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并且恬不知耻地把文章的清样寄给我，称我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他无耻在哪里，下面我的复信的译文可以表明(我的信是用他的祖国语言写的，因为他的德文比我的意大利文还差)：

“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您当然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说进行您的最苛刻的批评，而完全不懂这个学说。您可以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略。但是，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就指责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马克思读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著，他对我说，他的引文是正确的，如果说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现在您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您多么无耻地要他在说‘**剩余价值**’的地方说‘**利润**’——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误认为是同样的东西(穆尔先生和我又在这里即伦敦向您口头解释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谁，是谁有意篡改引文。

但是这些还远远比不上您的‘**坚决而深刻的信念……认为自觉的诡辩支配着整个学说**’(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不惜作出虚假的结论，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些结论是虚假的**’；他‘**常常是一个愿意以牺牲真理来否定现存制度的诡辩者**’，用拉马丁的话来说，他

‘玩弄谎言和真理就像小孩子玩拐子一样’。

在意大利这个古代文明的国家里，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赞扬。就在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间，这一类话也可能认为是很高的赞语，因为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我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对事情有另外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损名誉的指责，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捏造的，因此我们把它奉还给那些说这种话的人，他们臆造这种说法只能败坏自己的名声。

我觉得，您的责任是告诉读者，支配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这个所谓的‘自觉的诡辩’，究竟表现在哪里。但是我的寻找是徒劳的。Nagott!（很有力的伦巴第用语：根本没有。）

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会设想，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似乎‘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这个第二卷；似乎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狡猾诡计’。这个第二卷现在在我手里，不久就要发表。那时，您大概终于会懂得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

这封信的德译文将发表在最近一号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我荣幸地怀着您所配享的种种感情向您致意”。

暂时就写这些。

1883年5月12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3年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1号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对一页“公社史”²⁴⁰的意见

(1870年10月30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²⁴¹)

除非参加九月四日事件的人极端愚蠢和虚伪透顶，才会把这一停战消息称为“好消息”。对于普鲁士人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

麦茨的投降刚刚使普鲁士军队的6个军(12万人)恢复了行动自由。只有像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人才看不到：这支新军队必然抵达法国中部以后，任何想使巴黎解围的试图都几乎不可能实现；当时不是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刻，而是在军事上作最大努力的时刻。要做到这一点，总共只剩下15天的时间，但这是极其宝贵的15天，是战争的紧要关头。

情况就是如此。

为了封锁巴黎，除3个步兵师以外，德国人必须动用全部军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后备队，因为这3个师占领奥尔良和夏龙以后，就受到卢瓦尔军团的牵制，而不能起后备队的作用了。在西部、北部和东部，只有一支骑兵部队担负这一地区的警戒和巡逻，但是没有能力抵挡步兵的进攻，守住这一地区。

到10月底，包围巴黎的德军战线，在对付城市的这一边已经大大巩固了。但是任何从外部发动的进攻，都可能在开阔地打得

普鲁士人措手不及。只要出现 5 万人，即使像当时法国所拥有的那样年轻的军队，也能突破封锁并恢复巴黎同全国的联系。这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本来应当迅速采取行动，可是却出现了如下情况。

巴黎政府同意了停战（10 月 30 日），这次停战尽管时间很短，仍然给为了封锁而疲于种种作业和夜间值勤的德军以喘息时机。

从自己方面来说，奥雷耳·德·帕拉丹于 11 月 2 日把自己的军团集结在维埃尔宗，打算开往博让西，在那里横渡卢瓦尔河，插入占据夏托登的普鲁士人（第二十二师）和驻在奥尔良的巴伐利亚人的中间。从维埃尔宗到博让西约 45 公里，两天之内完全可以到达。但是，据德国的资料（“……军事思想和见解”²⁴²等等）所载，甘必大天真地以为，用火车运送 4 万人的军团可以像运送普通旅客一样迅速。于是他命令将军：不得步行，而用火车把他的军团从维埃尔宗调往图尔，再从图尔调往博让西。将军提出异议，甘必大则坚持己见。结果，卢瓦尔军团不是走了两天，也不是走了 45 公里，而是沿着铁路旅行了 180 公里，费了五天时间，并且不能避开敌人的侦察。该军团一直到 7 日才在博让西重新集结，准备行动。但是已经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敌人已经对这次调动有了戒备。

这是怎样的日子啊！11 月 3 日，在这最紧要的一天里，普鲁士整整一个旅的骑兵在十支人数众多的自由射手²⁴³队伍的进攻下，不得不放弃曼特，退往韦尔。另一方面，法国各兵种的大量兵力从库尔维耳朝沙特方方向调动时暴露了目标。如果卢瓦尔军团不是坐火车游逛，而是在 4 日就发动进攻（它完全可以做得到）；如果它

插入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第二十二师的中间(这是容易做到的);如果它能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将敌人各个击破,然后向巴黎推进,那末,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巴黎是会解围的。

毛奇无疑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危险,因此他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拿破仑在曼都亚所采取的行动²⁴⁴,即取消封锁,放弃配置在维拉库布勒的围城炮兵纵列,集结自己的军队以便在开阔地行动,直到取得胜利以后,即从麦茨调来军队以后,再恢复封锁。凡尔赛大本营已经把行李装上车子,整装待发,只待套马启程了(据目击者瑞士上校埃尔拉赫²⁴⁵所说)。

如果普鲁士人被迫取消对巴黎的封锁,这就可能引起欧洲方面的压力,并导致光荣的和平。无论如何,这一事实一定会首先对欧洲、其次特别是对法国产生巨大的道义影响,最后也会对德国人产生相反的道义影响。至于这一事实的物质后果!巴黎至少可以有15—20天的时间,利用通往南部和西部的各条铁路调集粮食,储存起来,这就等于延长一两个月的防守时间。还可以赢得同样的时间在外省组织军队。这些军队抗击敌人时就不会再是纪律松弛、缺乏训练、缺乏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状况了。要使法国重获胜利的希望,就只有赢得时间。这种机会在11月3日和4日是出现过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机会被错过了。

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巴黎甚至没有打算出击。在一星期内,从西面向巴黎靠拢的兵力没有作过任何进攻的尝试。这不奇怪的。这些兵力大概相当薄弱。甘必大责成凯腊特里先生组织西方军团的命令是10月22日发出的。

只有卢瓦尔军团在11月7日才在博让西附近作好战斗准备。一直到9日奥雷耳才向库耳米埃的巴伐利亚人发起攻击。巴伐利

亚人一看到从沙特尔方面向他们靠拢的普鲁士第二十二师必然会撤退，他们就是往土里，第二天，即 11 月 10 日，他们就在这个师在土里会合。奥雷耳就**按兵不动**了。同时，从麦茨开来的 3 个军共 6 万人，以强行军从塞纳河方面逼近。从麦茨乘火车来的另外两个普鲁士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已经到达巴黎。现在毛奇有可能把普鲁士第十七师调往土里，该师于 12 日到达土里。这样一来，德国的 4 个师，约 35000 人就作好了同卢瓦尔军团作战的准备。卢瓦尔军团再也不使他们感到不安了。

然而在 11 月 14 日，大批法军从德勒开往格丹，距凡尔赛只有两天路程。毛奇在这一方向暂时只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侦察，来弄清这支先遣队后面还有多少兵力。当天他又打算放弃凡尔赛并取消封锁（勃鲁美²⁴⁶）。

但是这一次解决问题已经不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了。从麦茨最先调来的一个军（第九军）当天就抵达枫丹白露。第三军定于 16 日和 18 日抵达奈木尔，而第十军定于 19 日抵达云纳河岸茹瓦尼。毛奇把第十七师派往郎布耶，把第二十二师派往沙特尔，把巴伐利亚人派往奥诺，即穿到卢瓦尔军团（他给卢瓦尔军团让出通向巴黎的道路）和从西部威胁凡尔赛的军队的中间。这一次奥雷耳按兵不动倒救了自己。如果他开进摆在他面前的缺口，那就会被准备向他的两翼袭击的两路德军所击溃。11 月 19 日普鲁士第二军团的 3 个军连同在云纳河的后备队占领了枫丹白露和奈木尔。11 月 20 日，曼托伊费尔指挥的第一军团集结在从贡比臬到努瓦荣的瓦慈河一线；从麦茨调来的军队从北部和南部加强了对巴黎的封锁。于是，解除这一封锁的最后机会也丧失了，因为特罗胥、甘必大和奥雷耳彼此都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可

以说几乎像普鲁士队伍那种大受赞扬的准确行动一样，相互加深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77 年 2 月初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 年第 1 版第 15 卷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 评阿·瓦格纳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二版)第一卷(1879)²⁴⁷

(1) 瓦格纳先生的概念——“社会—法的概念”(第2页)。并且“同洛贝尔图斯、朗格和谢夫莱的观点相一致”(第2页)。在“叙述的基本论点”上他“引证”洛贝尔图斯和谢夫莱的话。甚至在谈到作为许多民族中间的“不合法的占有方法”的海盗行为时,瓦格纳先生说,它只有在“有了真正的 *jus gentium* (国际法)的前提”(第18页,注释3)下,才是一种抢劫行为。

他研究的首先是“经济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个人的经济自由的范围”(第2页)。

“满足需要的愿望”不是作为而且也不应当作为纯自然力发生作用,但是,它也和人的任何愿望一样,受理智和良心的指导。因此,由此产生的任何行动都是负责的,并且总是服从于道德的判断,诚然(!),这种道德判断本身正在经受历史的变动。”(第9页)

在“劳动”(第9页,第2节)这一节中,瓦格纳先生没有把各种劳动的具体性质和这一切具体劳动所共有的劳动力的消耗区别开来(第9、10页)。

“甚至为了获得地租收入而单是管管财产,以及为了满足需要而使用已

经获得的收入,也必须经常进行属于劳动概念范围内的活动。”(第10页,注释6)

按照瓦格纳的意见,历史一法的范畴就是“社会的范畴”(第13页,注释6)。

“位置的自然垄断,特别是在城市的(!伦敦西蒂区的位置的自然垄断!)条件下以及在气候对一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的影响下,其次,土壤特有的肥力的自然垄断,例如在有特别好的葡萄园的情况下以及在不同的国家比较的情况下,例如把热带产品销售到温带国家(“例如某些国家(南欧、热带国家)对某种自然垄断的产品抽出口税时深信,这些关税将转嫁给外国的消费者”(第15页,注释11)。如果瓦格纳先生由此推出南欧国家的出口税,那就表明,他对这些关税的“历史”一无所知)^①,——将使来自自然的(至少是部分的)自由的财物成为纯经济财物,获得这种财物要付出很高的报酬。”(第15页)

经常交换(销售)财物的领域就是它们的**市场**(第21页)。

经济财物包括“对人和物(res incorporales)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客体上完整地体现出来,是依赖于抽象概念的:(a)在完全自由交换中是顾客、商号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的活动而形成的对别人有利的关系,可以在得到补偿的条件下出让和获得;(b)在一定的法对流通的限制的基础上是生产专有权、地役权、专利权、垄断权、特许权等等”(第22、23页)。

瓦格纳先生把“服务”列入“经济财物”(第23页,注释2和第28页)。他这样做实质上是出于他的一种愿望,即把枢密顾问瓦格纳说成是“生产工作者”,因为他说,

“对于评价按职业提供个人服务的一切阶级,即仆人,自由职业的以及国家的代表来说,回答是有决定意义的。只有在服务也算作经济财物的情况下,上述阶级在经济意义上才是生产的”(第24页)。

^① 手稿中用的方括号,在本版中都改为大括号。——编者注

下面这段话很能说明瓦格纳及其同伙的思维方法：

劳的意见是：要根据“**财产和经济财物的定义**”来决定“**服务是否也包括在它们之中**”²⁴⁸。对于这一点，瓦格纳回答说：应该对“**财产**”“**事先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把服务列入经济财物**”（第 28 页）。

但是“**决定性的论据**”据说是，

“**满足需要的资料不能仅仅包括物方面的财物，因为需要不仅涉及这些，而且还涉及个人的服务**”

（即国家的**服务**，例如**法的保护**等）（第 28 页）。

财产：

（1）**纯经济地……“在其一个时期内现有的经济财物的储存”，作为用来满足需要的实际基金，是“自在的财产”，“人民的或国家的财产总和的一部分”。**

（2）“**作为历史—法的概念……——某一个人占有的或所有的经济财物的储存**”。“**财产的占有**”（第 32 页）。这是“**所有权的历史—法的相对概念**。所有权指的只是对其他人来说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和专有权**。这些权利的范围是**变动着的**”（即是历史的）（第 34 页）。“**每一种财产在第二个意义上来说，都是个体财产，是其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的财产。**”（同上）

公共财产，

“**包括官定的公共经济的财产，即特别是国家的、州的、区的财产**。这种财产规定作为**公用**（道路、河流等等），这种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作为**社会**（人民、当地的居民等等）的法律上的代表——**国家**等等；或者这是**国家和公社**的本来意义上的财产，即要么是**服务于管理目的**的、即为了执行国家职能的财产，要么是**服务于财政**的、即国家用来获得收入也就是获得为执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资金的财产**”（第 35 页）。

资本，capitale, κεφάλαιον（**基本的东西**）一词翻译过来的——用

来表示不同于利息 (τόκος) 的债款。在中世纪, **资本**, caput pecuniae, 是表示某种基本的、本质的、原来的东西 (第 37 页)。德语用的是 Hauptgeld (本钱) 一词 (第 37 页)。

“**资本**——用于制造的基金, 用于制造的财物储存; 用于制造的流动资金的储存。”与此相反的是“**消费储存**: 在某一个方面总合起来的流动消费资金的总额” (第 38 页, 注释 2)。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 (第 38 页, 2(a) 和 2(b))。

价值。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他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石**” (第 45 页)。我从来没有创造过“**社会主义体系**”, 所以这只不过是瓦格纳、谢夫莱 tutti quanti (之流) 臆造出来的东西。

又说: 马克思似乎

“在**劳动**内, 发现了只有他在这里所说的那种**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 而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 发现了**交换价值量的尺度**, 等等”。

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 而是说, 诸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 代表一种它们共有的、“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 {在这里也就是指同它们的自然形式无关} 的东西, 即“**价值**”。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因此, 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 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来把交换价值当做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 但现在, 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 (第 13 页)²⁴⁹

可见, 我并没有说“**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就是劳动**”; 而且我以专门的一节详细地考察了**价值形式**, 即交换价值的发展, 因此, 把这一“形式”归结为“**共同的社会实体**”, 归结为**劳动**, 是令人

奇怪的。瓦格纳先生还忘记了,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

又说:

“但是这个理论(马克思的)与其说是一般价值理论,不如说是来自**李嘉图**的**费用理论**。”(第45页)

瓦格纳先生从“资本论”和季别尔的**著作**²⁵⁰(如果他懂俄文的话)中应该看到我和李嘉图之间的差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

如果瓦格纳先生说,这“不是一般价值理论”,那末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对的,因为他所说的一般价值理论,是指在“价值”这个词上卖弄聪明,这就使他同样有可能像德国教授们那样传统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因为它们两者都有“价值”这一共同的词。但是,如果他又说,这是“**费用理论**”,那末这句话或者归结为一个同义反复:商品作为价值,只代表某种**社会的东**西——劳动,所以商品的**价值量**,在我看来,是由**商品所包含等等的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的,因而是由生产一物所化的标准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等等;而瓦格纳先生证明相反的看法,他的办法是断言这种价值理论不是“一般的”,因为它不符合瓦格纳先生关于“一般价值理论”的观点。或者他肯定**错误的东西:李嘉图**(随斯密之后)把价值和生产费用混淆在一起;我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注释中明确地指出,**价值和生产价格**(它只是在货币上表现出生产费用)是**不相符合的**。为什么它们不相符合?这一点我没有对瓦格纳先生说过。

此外,我“**处置太随意**”,因为我把

“这些费用归结为狭义上的所谓劳动消耗。但是为此必须先提出证据,表明没有私人资本家为建立和运用资本而进行的活动作媒介,生产过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种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过”(第45页)。

瓦格纳先生不应当要我来提出这类未来的证据,恰恰相反,他应该先证明,社会的生产过程(更不必说生产过程一般),在私人资本家出现以前就存在的很多公社(古代印度的公社、南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等等)内,是不存在的。此外,瓦格纳能说的只是:关于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简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马克思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经济看做是暂时的,而相反地,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把奴隶制经济看做不是暂时的。

“只要这类证据还没有{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也{瞧,这里露出了马脚}是价值的‘构成’因素,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第45、46页)

什么叫“对工人的剥取”,剥取他的皮,等等,无法理解。但是在我的论述中,“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资本家的利润”成为价值的“构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个不是由资本家的劳动“构成的”价值中,包含他“有权”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说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换的权利。

“这一理论过于片面地注意仅仅一个决定价值的因素{(1)同义反复。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瓦格纳的“一般价值理论”同它不相一致,因此,他的“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教授的薪水就证明这一点;(2)瓦格纳先生把价值偷换成当时的“市场价格”或与价值相背离的商品价格,而后者是某种与价值很不相同的东西},费用,而没有注意另一个因素,即有用性、效用、需要因素}{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没有把“价值”同使用价值混淆在一起,而这种混淆是多么合乎像瓦格纳这类天生的混乱者的愿望}。“它不仅不符合现时流通中交换价值的形成……”{他指的是价格形成,而这绝对不改变价值的决定,当然,在现时的流通中确实存在着交换价值的形成,这是任何一个滥设企业者、商品伪造者等等都知道的,价格形成同价值形成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却敏锐地注视着已经“形成的”价值。此外,例如在决定劳动力的价值时,我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价值真正被偿付,而实际上这种情形并不存在。谢夫莱先生在“资本主义等等”²⁵¹中认为,这是“慷慨行为”或诸如此类等等。但这仅仅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的方法},

“然而,正如谢夫莱在‘精髓’²⁵²,特别是在‘社会机体’²⁵³中出色地也许是最终地(!)证明的那样,它也甚至不符合在马克思所假设的社会国家里必然要建立的那些条件。”

{这样,谢夫莱先生如此喜欢用我的名义“建立的”社会国家,就变成“马克思的”社会国家(而不是谢夫莱在假设中偷偷塞给马克思的社会国家了)}。

“这一点可以拿粮食等等为例来加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对粮食的需求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甚至在‘社会限定价格’的制度内,由于收成好坏的影响,粮食的交换价值也必然不能仅仅根据费用而要采取另外的办法来调整。”

{每一句话都是胡说。首先,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社会限定价格**”,并且在**研究价值**时,涉及的是资产阶级关系,而不是把这个价值理论应用于那决不是由我而是由谢夫莱先生以我的名义设计的“**社会国家**”。其次,如果粮食价格因歉收而提高,那末,第一,它的**价值**提高了,因为一定量的劳动**实现在较少的产品上**;第二,粮食的**出售价格**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这同我的价值理论有什么关系呢?粮食在什么程度上按**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售,其他的商品也就在什么程度上以实物形式或货币形式按**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售**,即使在它们本身的货币价格不下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价值总额仍然不变,即使这个**价值总额**的货币表现增长了,按瓦格纳先生的看法,即“**交换价值**”总额增长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如果我们假定其他商品总和的**价格下跌**抵消不了粮食的**价格超过价值的上涨**,即它的价格余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交换价值 *pro tanto* (相应地) 跌到它们的价值以下;如果把货币也算在商品里,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额不仅依然**不变**,而且甚至在**货币表现上**也不变。再其次,由于歉收造成粮食价格提高到超过其价值的程度,在“**社会国家**”里比在现在的粮食囤积商手里无论如何要小。“**社会国家**”事先就这样来组织生产,使年粮食供应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受收成好坏的影响。生产量、供应和需求得到合理的调节。最后,假设谢夫莱的关于“**社会限定价格**”的幻想实现的话,那是否能证实或者推翻我的价值理论呢?不能,就像在海船上或者在要塞里或者在法国革命时期等等,在食品不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强制措施(这种措施同**价值**毫无关系,用来当做“**社会国家**”的可怕的东西)不可能破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价值规律**,因而也不可能破坏价值理论一样!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胡说!}

同是这位瓦格纳赞同地引证劳的话说：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确定，价值一般指的是什么，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应该是指使用价值。”²⁵⁴（第 46 页）

价值概念的推论（第 46 页及以下各页）。

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从价值概念中，应该首先得出使用价值，然后得出交换价值，而不是像我那样从具体的商品中得出这两者；仔细地研究一下他的最新版“基础”一书中的这些烦琐的言论，是很有意思的。

“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第 46 页）而在第 12 页上我们读到：“一切用来满足需要的资料，都叫做财物。”

如果我们现在把第一句话中的“财物”一词，代之以瓦格纳强加于它的逻辑内容，那末这段引文的第一句话将是这样：

“‘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用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料’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句话我们可以稍微简化一下，省略“内部的资料等等”，就像刚才瓦格纳先生在后面一句话中用“或”来处理的那样。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他的“人”，虽然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

性质。

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第一句话中就已经混淆不清了。

第一：由于在后面一句话中，“用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外部的资料”或“外部的财物”变为“外界物”，所以上述关系中的第一种关系就成为这样：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人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努力通过多多少少时常重复的活

动来握有它们,从而也保持对它们的占有;他们可能把这些物叫做“财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

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况},——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①,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②。

一位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自然愿望”是,从某一个“概念”中得出“价值”这一经济学范畴,他采取的办法是,把政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语的用法”改称为“价

① 俏皮话: (Wert) 是“价值”,也是“原子价”。——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瓦格纳先生的这种演绎法还更妙,因为他谈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人们’。这个非常简单的‘演绎法’,瓦格纳先生是这样来表现的:‘一个人的’(应读做:一个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自然愿望’是,使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外界物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料,而且在口头上加以承认,因而也就成为这样的资料)……”。——编者注

值”。而一经用这种办法找到“价值”一般后，又利用它从“价值一般”中得出“使用价值”。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价值”这个词的前面重新加上原先被省略的“使用”这个词就行了。

的确，劳（见第 88 页）只是告诉我们说，“必须（对一位德国的学究教授来说）确定，价值一般指的是什么”，并且天真地补充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应该是指使用价值”。{在化学中，一个元素的一个原子同其他元素的原子相化合的数目，叫做该元素的原子价。但是原子的化合的重量叫做各种元素的当量，等价量，如此等等。因而，必须首先给“价值一般”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如此等等。}

如果人把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来对待，那末他就把它们当做“财物”来对待，——瓦格纳这样证明。他赋予物以“财物”的属性，但是这一行为的内容并不因为瓦格纳先生把它改称为“赋予价值”而有丝毫的改变。在下面的话中，他的迟钝的脑子一下子“明白”了：

“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

我们对瓦格纳先生从价值的估价（为了“清楚地认识 and 了解”问题，他自己把“估价”用括号补充为“价值的估价”）中得出价值这一点已经可以不谈了。“人”具有把财物当做“价值”来“估价”的“自然愿望”，这样也就使瓦格纳先生有可能履行诺言，得出“价值概念一般”。难怪瓦格纳偷偷地用“或”“外界物”来代替“财物”。他的出发点是：人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当做“财物”来“对待”。因而，他对这些物进行估价，正是通过把它们当做“财物”来对待。而对这种估价的“描写”，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见过，

例如：

“人作为具有需要的生物，同他周围的外部世界处在经常的接触中，并且认识到，在外部世界存在着他的生活和福利的许多条件。”（第8页）

这无非就是指他“对外界物进行估价”，因为这些外界物满足他这个“具有需要的生物”，是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因此，正如我们后来所听到的，他把这些外界物当做“财物”来对待。

现在我们可以（尤其是在我们感觉到，教授的“自然愿望”是要得出价值概念一般时）把赋予“外界物”以“财物”属性，称为“赋予价值”。也许还可以说：人在把满足他的需要的外界物当做“财物”来对待时，对它们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格”，这样从“人”的活动方式中就得出“价格一般”的概念，并且 ready cut（现成地）给了德国教授。凡是教授本人做不到的事，他就迫使“人”去做，但是，“人”自己其实也无非是这个当教授的人，这个当教授的人认为，当他把世界列入抽象的标题时，他就了解世界了。但是，由于外界物被“赋予价值”在这里仅仅是外界物被赋予“财物”属性的另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决不能用这种办法，就像瓦格纳用欺骗办法想使人相信的那样，赋予“财物”本身以“价值”，当做一个不同于它们“作为财物的存在”的规定。这里只是用“价值”一词代替了“财物”一词。{可见，这里还可以用“价格”一词。同样可以用“财宝”一词，因为“人”在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时，对它们“进行估价”，因此把它们当做“财宝”来对待。由此我们看到，瓦格纳先生怎样用魔法，从“人的自然愿望”（它使教授获得自己的有限的概念世界）中立刻能得出价值、价格、财宝这三个经济范畴。}但是瓦格纳先生有一个模糊的愿望：想摆脱自己的同义反复的迷宫，并且用狡猾的办法来证明“由此及彼”或者“由彼及此”。由此就得出

这样的空话：“因此，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等等。由于瓦格纳先生把给“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即把它们（在观念上）标明为和确定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同样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所以他就不能说赋予“财物”本身以价值，正如不能说赋予外界物的“价值”以“价值”一样。但是他利用“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这些词来玩弄 salto mortale^①。瓦格纳应该说：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瓦格纳正是用这种办法得出“价值概念一般”的。内容并不因为这种说法的改变而改变。这始终只是在观念上标明或确定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所以，事实上只是认识和承认一定的外界物是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但是，人本身事实上苦于“概念上的需要”）。

但是瓦格纳先生想使我们或他自己相信，他并没有给予同样内容的东西以两个名称，而是相反地，从“财物”的规定上升到与它不同的、更为成熟的“价值”的规定，而他达到这一点的办法只是，用“或”“财物”来代替“外界物”，——可是这个过程又为他用“或”“外界物”来代替“财物”“弄模糊”了。他的这种混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迷惑了他的读者。他同样可以采取下列办法把这种绝妙“推论”颠倒过来：人在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作为这种满足需要的资料，而从其他的外界物中区别出来并加以标明时，对这些物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这同样可以这样来表达：他赋予它们以“财物”这个属性作为特殊的标志，或者把它们当做“财物”来评价和估价。因此，“价值”，或外界物，就被赋予“财物”的概念。这样，就从“价值”的概念中“推论

^① 直译是：惊险的飞跃；这里是：把戏。——编者注

出“财物”一般的概念。所有这类推论的目的只是回避作者不能胜任的任务。

但是，瓦格纳先生一口气迫不及待地从事物的“价值”转到对这一价值的“计量”。

如果不偷运“价值”这个词，内容也绝对不变。似乎可以这样说：人在给一定的外界物（它如何如何）打上“财物”的印记后，就逐渐在这些“财物”之间进行比较，并根据自己需要的等级加以归类，如果愿意说的话，也可以说对它们进行“计量”。关于这些财物的真正尺度的发展情况，即它们的量的尺度的发展情况，瓦格纳决不应该在这里多谈，因为读者记忆犹新：这里谈的并不是关于“价值的计量”一般指什么。

{至于把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标明为、指明为“财物”，同样可以称为“赋予这些物以价值”，——这一点瓦格纳不仅可以像劳罗那样，按照“德语的用法”来证明，而且可以用拉丁字 dignitas（重要性、尊严、等级，等等）来证明，这个词用于物时，也是指“价值”；dignitas 来自 dignus，而后者来自 dic, point out, show, 标明，表明；因而，dignus 的意思是 pointed out（被指出的），由此也就得出 digitus——手指，用手指着物和指明物；希腊语——δεικνυμι（我表明），δακτύλος（手指）；哥特语—ga- tecta (dico)；德语——zeigen（表明）；如果注意到 δεικνυμι（或 δεικνύω）（使呈现，表现，指明）同 δέχομαι 具有共同的词根 δέκ（保持，拿取），那末我们还可以得出许多进一步的“推论”。}

在瓦格纳先生不满七行的篇幅中，有那么多的陈词滥调、同义反复的混乱、咬文嚼字以及欺骗伎俩。

所以毫不奇怪，这个蠢汉（vir obscurus）在耍了这些把戏以后

还洋洋得意地继续说道：

“如果像以前做过的那样{正是瓦格纳做的}，从人的需要和经济本性出发，去了解**财物**概念，并把**价值**概念合并到**财物**概念中，那末，争论得那么多的、而且为许多往往不过是虚假的深刻研究弄模糊了的**价值**概念，就很容易(indeed (的确))弄明白(rather (不如说)“弄糊涂”)。”(第 46 页)

我们看到，这里是在玩弄**概念**；在 vir obscurus 那里，概念的虚构的发展归结为“合并”和在一定程度上“分开”。

价值概念的进一步推论：

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或广义的**财物价值**= 财物因……其有用性……而被赋予的意义……这不是物本身的属性，虽然也以物的有用性作为客观前提{因而以“**客观**”价值作为前提}……在**客观**的意义上，“**价值**”、“**各种价值**”指的也是具有**价值的财物**，在这里(!)财物和价值，各种财物和各种价值，实质上就成为“同一的概念”了(第共 46、47 页)。

瓦格纳在把通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般**”或“**价值概念**”以后，当然不会忘记：“用这种办法(这样! 这样!)推论出来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他起先把“**使用价值**”叫做“**价值概念**”一般或“**价值一般**”，接着发现他只是就“**使用价值**”胡说了一通，从而“推论出了”使用价值，因为对他说来胡说和推论“实质上”是同一的思维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主观情况把瓦格纳先生同过去混乱的“**客观**”概念纠缠在一起。他向我们泄露了一个秘密：洛贝尔图斯曾写给他一封信(这封信可以在 1878 年的杜宾根“杂志”²⁵⁵上读到)，在这封信里他(洛贝尔图斯)说明了，为什么“只有一种**价值**”，即使用价值。

“我(瓦格纳)赞同这个见解，它的重要性我在第一版里已经强调指出

了。”

对于洛贝尔图斯所说的，瓦格纳是这样评论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才能把那种通常不合逻辑地把‘价值’‘分割’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做法改变过来，这一点我还在第一版第 35 节中就已经做了”（第 48 页，注释 4），

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第 49 页，注释）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

这一切都是“胡说”。De prime abord（首先）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值。因此，我在第二版第 36 页上写得很清楚：“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对象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等等²⁵⁶。因而，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做“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面，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

其次，只有对我的“资本论”一窍不通的 vir obscurus，才会做

出结论说：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一个注释²⁵⁷中，驳斥了德国教授们关于“使用价值”一般的胡说，介绍那些希望知道一点实际的使用价值的读者去读“商品学指南”，所以使用价值对他说来就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使用价值不起其对立物“价值”的作用，除了“价值”一词在“使用价值”这一名称里出现以外，价值同使用价值毫无共同之点。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也可以说，“交换价值”被我丢在一边，因为它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价值”本身，因为我认为，商品的“价值”既不是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它的交换价值。

如果要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进行分析，那就必须把一切不涉及这个分析对象的关系放在一边。因此，就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应该谈的，我说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却着重说明了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在这里所表现的**特征形式**，即：“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第15页）²⁵⁸（这就是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使用价值**”的根源。）因此，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例如，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共同的产品直接满足公社每个社员、每个生产者的生活需要，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这里正是在于其**共同的性质**。{相反地，洛贝尔图斯先生却把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变为“社会使用价值”一般，所以是胡说。}

由上可见，在分析商品时，——因为商品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值或财物，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像瓦格纳和一般德国教授

们所做的那样，把各种关于不属于商品界领域的使用价值或财物的庸俗论述，如“国家财物”、“区的财物”等等，或者还有“健康”财物，等等，都“归并进来”，那纯粹是胡说。在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者（如经营矿山、森林等等）的地方，它的产品是“商品”，因而具有其他一切商品的特点。

另一方面，这个 *vir obscurus* 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验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

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

瓦格纳先生对我的论述不满意（厌恶）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顺他的意，没有按照德国国粹教授的“愿望”，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德国社会（诚然很晚）正由封建自然经济，或者至少是由这种经济占优势，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教授们的一只脚

却仍然站在旧的垃圾上,这是很自然的。他们从地主的农奴变成了国家的,俗称政府的农奴。因此,我们的 Vir obscurus 甚至没有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以言语掉弄舌锋,以言语构成一个系统”^①)的方法毫无共同之点,就这样说道:

“根据洛贝尔图斯和谢夫莱的观点,我把一切价值的使用价值性质提到首要地位,而且更加强调使用价值的估价,因为交换价值的估价对许多极重要的经济财物甚至根本不能应用(什么东西迫使他这样应用的呢?因为他作为一个国家官员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例如对国家及其服务以及其他公共经济关系就是如此。”(第49页,注释)

{这使我们想起化学这门科学产生以前的古化学家。因为在日常生活(按照北方的习惯)中直截了当地称为奶油的烹调用奶油具有柔软的特点,他们就把氯化物,如无水氯化锌、三氯化铈等等也叫做什么什么奶油^②等等;因而,用这个 vir obscurus 的话来说,“他们坚信,所有的氯化物、锌化物和铈化物都具有奶油的性质。”}这种无稽之谈归根到底就是这样:因为某些财物,特别是国家(一种财物!)及其“服务”{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的服务}不是“商品”,所以包含在“商品”本身中的对立的性质{这些性质同样清楚地反映在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上}应当互相混淆!不过,瓦格纳及其同伙未必能证明,他们的“服务”,按照其“使用价值”、按照其物的“内容”来“估价”,比按照其“薪金”^③(用瓦格纳的话说是根据

①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② 在德语中无水氯化锌是 Zinkbutter,按字面译是锌奶油;三氯化铈是 Antimonbutter,按字面译是铈奶油。——译者注

③ 俏皮话:《Gehalt》是“内容”,也是“薪金”。——译者注

“社会限定价格”)即按照其**报酬**来“估价”,会对他们更有利。

{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 **价值**[W ert]或**值**[W ürde]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就像**盐**这个词古代的人最初用来指食盐,后来,从普林尼以来,**糖**和其他物也列入**盐类**, {indeed[事实上]是一切能溶解于水,并具有特殊味道的无色的固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盐”的化学范畴包括糖等等。}

{买主购买商品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可用于一定的目的,所以不言而喻: (1)使用价值受到“估价”,也就是说它们的**质量**受到检验(正如它们的**数量**受到度量、衡量等等一样); (2)当各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用于同一消费目的时,其中某种商品会占优先地位,如此等等。}

在哥特语里表示W ert和W ürde的只有一个词——variths, τῦη, {τῦᾶω 估价,即评价;确定价格或价值,定价;比喻的意思是:尊重,珍视,着重,特别看待。τῦη——估价,因此是:决定价值或价格,评价,定价。其次:价值的估价,以及价值或价格本身(按希罗多德,柏拉图用法),按狄摩西尼用法,αἰτῦαί是费用的意思。再次:高的评价,尊敬,尊重,荣誉席,光荣的职位。见罗斯特的希德辞典²⁵⁹。}

在哥特语里,价值,价格(根据舒耳采的辞典²⁶⁰)是:vairths 形容词是 ἄξιος, ἰκανός。

在古代北部德意志语里是:verdhr——有价值的,verdh——价值,价格;在盎格鲁萨克逊语里是:veordh, vurdh;在英语里是:worth, 形容词;作为名词,它的意思是W ert和W ürde。

{“在中部高地德意志语里是：wert，第二格——werdes；形容词是 dignus，以及 pfennicwërt；wert，第二格——werdes，价值，意义，贵重；aestimatio，一定价值的商品，例如，pfenwert，pennyworth；werde：meritum，aestimatio，dignitas——有价值的质。”（威曼“中部高地德意志语辞典”）²⁶¹。}

可见，Wert 和 Würde，无论就词源来说，或是就意思来说，相互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情况之所以模糊起来，是由于在现代高地德意志语中，Wert 这个词的没有限制的（错误的）词尾变化方式成了通常的现象：Werth，Werthes 代替 Werdes，因为同哥特语中的 th 相当的是，高地德意志语中的 d，而不是 th= t，中部高地德意志语里的情况也是这样（wert，第二格 werds）。按照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规则，d 在词尾应该变成 t，即 werd 变为 wert，但是第二格为 werdes。

但是，所有这一切同“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点，就像同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原子论）或化学的当量或同价（化学元素的化合量）毫无共同点一样。

其次，必须注意，——甚至从这些词的关系来看——由 Würde 和 Wert 最初的同一起来源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就像从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一样，这个词是用于物，即用于劳动产品的自然形式，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直接转用于**价格**，即价值的发达形式，亦即交换价值，但这同事情的实质毫无共同点，正如这个词仍然被用来表示优越，光荣的职位等等一样。所以，在这里，在语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 vir obscurus 常常引用的证人洛贝尔图斯{他的文章可以在**杜宾根“杂志”**上找到}。这个 vir obscurus 引

证了洛贝尔图斯下列的话：

正文第 48 页：

“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或者是个人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前一种使用价值与个人及具需要相对立，同某一个社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这已经是胡说(参看“资本论”第 171 页²⁶²)，那里是这样说的，劳动过程，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等等，是“它的”(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共有的”，并且“与它的各种社会形式无关”。(第一，与个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至于其中哪些使用价值与他“相对立”(在这些人看来，一切都“立着”；一切都有“等级”^①)，那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的阶段，因而也和“某一个社会组织”相适应。如果洛贝尔图斯要说的只是这样一种陈词滥调，即实际作为使用对象与某个个人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他的个人的使用价值同他相对立，那末，这或者是陈腐的同义反复，或者是错误的论断，因为即使不谈稻子、玉蜀黍、小麦或者肉{肉就不是作为食物与印度教徒相对立}这类物，——个人对教授称号或枢密顾问称号或某个勋章的需要，也只有在完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才是可能的)。

“后一种使用价值是由许多个别的机体(或个人)组成的社会机体具有的使用价值。”(正文第 48 页)

漂亮的德语！这里指的是“社会机体的”“使用价值”，还是“社会机体”占有的使用价值{例如原始公社的土地}，还是某个社会机体内的使用价值的一定“社会”形式——例如在商品生产占统治的

① 俏皮话：《steht》——“立着”《ständig》——“等级的”。——编者注

地方,在那里一个生产者所提供的使用价值必须是“为别人的使用价值”,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同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是没有什好说的。

现在来谈谈瓦格纳的浮士德^①的另一个论点:“交换价值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使用价值的历史外壳和附属物。如果把交换价值作为逻辑的对立物同使用价值相对立,那末就使历史概念同逻辑概念处于逻辑的对立,这在逻辑上是不容许的。”(第48页,注释4)瓦格纳在那里洋洋得意地说:“这完全正确!”但是究竟谁这样做呢?无疑,洛贝尔图斯是指我,因为据他的助手鲁·迈耶尔说,他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反驳‘资本论’的手稿”。谁使之处于逻辑的对立呢?是洛贝尔图斯先生,在他看来,无论是“使用价值”或是“交换价值”,就性质来说,两者都仅仅是“概念”。事实上在任何的价目表中,每一种商品都经过这种不合逻辑的过程,它作为**财物**或**使用价值**,作为棉花、纱、铁、粮食等等不同于其他商品,表现为在质上和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财物”,但同时又表现自己的价格,表现为质上相同而量上不同的**同一本质**的东西。对使用它的人来说,它表现为自己的自然形式,而作为**交换价值**,它就表现为同自然形式完互不同的、为它和其他商品所“共有的”**价值形式**。在这里,只有在洛贝尔图斯和他的同类的德国学究教授们那里才有“**逻辑的**”对立,他们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的“概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接着就来争论,在这两个臆想的观念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在这些矫揉造作的词句背后隐藏的只是这样一个不朽的发

^① 即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现：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说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为这并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需要的}；一句说，他在任何状态下都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寻找现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们，或者用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进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界物当做“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自己使用的对象。因此，按照洛贝尔图斯的意见，使用价值是一个“逻辑的”概念；从而，由于人需要呼吸，“呼吸”就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决不是“生理学的”概念。洛贝尔图斯把“逻辑的”概念和“历史的”概念对立起来，就完全暴露出他的肤浅！他把“价值”（经济学上的，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的）只是理解为它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但是由于后者只是在那样的地方才出现，在那里，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即使用对象成为“**商品**”，而这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而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发生的，所以**交换价值**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如果洛贝尔图斯（下面我将谈到，为什么他看不到这一点）进一步分析商品的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只是存在于有许多**商品**、有不同种商品的地方），那末他就会在这个表现形式的背后发现“**价值**”。如果他再进一步研究价值，那末他就会发现，在这里，物，“使用价值”，只是当做人类劳动的**物化**，当做**相同的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因而这个内容表视为**物的对象性质**，表现为**物本身固有的性质**，虽然这种对象性不表现在其自然形式上{正是由于这一点，特殊的**价值形式**就成为必要}。这样一来，他就会发现，商品的“**价值**”只是以历史上发展的形式表现出那种在其他一切历史社会形式内也存在的、虽然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性**。因

此,如果说商品的“价值”只是一切社会形式内都存在的东西的一定的历史形式,那末,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特征的“社会使用价值”也是这样。洛贝尔图斯先生引用了李嘉图的价值量的尺度,但是也和李嘉图一样,不研究或不了解价值实体本身;例如,他不了解原始公社这个相互联系的劳动力的共同机体中[劳动过程]的“共同”性,因而也不了解这些劳动力的劳动即劳动力的消耗的“共同”性。

在这个问题上再来谈瓦格纳的谬论就是多余的了。

价值量的尺度。这里瓦格纳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认为,遗憾的是,我“**排除了**”**“形成资本的劳动”**(第 58 页,注释 7)。

“在受社会机构调节的交易中,规定**限定价值或限定价格**,应该同这种**费用因素**(他把在生产等等中消耗的劳动量称为费用)相适应,在过去的行政机关和行会的限定价格中在原则上就是这样,在任何**新的限定价格制度**下(指社会主义的(!))也必然会是这样。但是,在自由交易中,**费用不是规定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唯一基础**,并且在任何**可能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因为不管费用怎样,使用价值和需要是一定会发生波动的,而这种波动对**交换价值和价格**(合同价格和限定价格)的影响,改变着和一定会改变费用的影响”,等等(第 58、59 页)。“这个{正是这个!}对社会主义价值学说的非常聪明的修正……是谢夫莱的功劳”(!),他在“社会体”第 3 卷第 278 页上写道:“不管社会对需要和生产发生任何影响,务必使**所有的需要在质上和量上每次都同生产保持平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费用的社会指标就不可能同时成为使用价值的按比例的**社会指标****”(第 59 页,注释 9)。

这一切只是关于**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的变动的陈词滥调**,并设想在“马克思的社会国家里”,他为**资产阶级社会**阐发的价值理论仍然有效,这一点可由瓦格纳下面这段话来证明:

“它们(价格)将暂时地或多或少背离它们(费用),它们对使用价值增大的财物来说将提高,对使用价值减少的财物来说将降低。费用只有在长时期

内才能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调节者发生作用”，等等（第 59 页）。

法。下面这一段话足以说明我们的 *vir obscurus* 关于法对经济的创造性影响的臆想，虽然在这一段话中包含的荒谬观点，他在许多地方宣扬过：

“个体经济都由某个作为法的和经营的主体的个人来领导，以充当其技术和经济活动的器官……这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同时取决于法的性质。因为法决定，谁被承认是这个个人，因而可以领导某个经济”，等等（第 65 页）。

交通和运输事业（第 75—76 页和第 80 页，注释）。

第 82 页上“解释{某个经济的}财物总量(实物的)组成部分的变换”{瓦格纳又称之为“财物变换”，谢夫莱称之为“社会物质变换”。}。{这至少是后者的一个场合：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那一段话，是从我这里抄袭去的，那里在分析 $W-G-W$ （商品—货币—商品）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来说明的。

瓦格纳先生其次谈到某个生产部门（在他看来，是某个“个体经济”）中财物的“内部变换”，这些话一部分应用于它们的“使用价值”，一部分应用于它们的“价值”，这些话也是我在分析 $W-G-W$ 的第一阶段，即 $W-G$ （如织麻布的人的例子，“资本论”第 85、86、87 页）时说过的，那里结尾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相互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资本论”第 87 页）。²⁶³

通过交易获得财物的契约。在这里这个蠢汉 (*vir obscurus*) 完全本末倒置。在他看来，先有法，后有交易；而实际情况却相反：先

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时就指出,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他们还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财物,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形式既不构成自己的内容,即交换,也不构成存在于这一形式中的人们的相互关系,而是相反。与此相反,瓦格纳写道:

“这种获得(通过交易获得财物)必须以一定的法制为前提,根据它(!)进行交易”,等等(第84页)。

信贷。瓦格纳没有阐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就立即把流通过程(只要这一过程是以两个等价物在W—G中不是同时互相对立的形式来完成的)变为“信贷交易”(第85页及以下各页),而且“补充说”,它往往同“利息”的支付相联系,这也是为了把“给予信任”,从而把“信任”当做“信用”的基础。

关于普赫塔等人对“财产”的法律概念,根据他们的看法,作为负数组成部分的债务,也是财产(第86页,注释8)。

信贷或者是“消费信贷”,或者是“生产信贷”(第86页)。前者在文明的低级阶段占主要地位,后者在“高级”阶段占主要地位。

关于古罗马负债的原因(贫困的原因:收成不稳定,兵役,奴隶的竞争)(见耶林“罗马法的精神”第3版第2部第2册第234页²⁶⁴)。

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在“低级阶段”,“消费信贷”在“下层被压迫”阶级和“上层挥霍”阶级中间占统治地位。事实上:在英国和美国“消费信贷”随着储蓄银行系统的建立而普遍流行!

“特别是生产信贷……表现为以土地私有制和流动资本为基础并允许自由竞争的国民经济的一个经济因素。它同财产的占有相联系，而不是同作为纯经济范畴的财产相联系”，因此，只是“历史—法的范畴。”（1）（第 87 页）

个体经济和财产对外界影响，尤其是对国民经济行情影响的依赖。

（1）使用价值方面的变化：随着作为一定自然过程的条件的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有所改进（葡萄酒、雪茄烟、小提琴，等等）。

“在多数情况下变坏……分解为自己的物的组成部分，各种意外情形。”与此相适应的是交换价值在这方面的“变化”，“价值提高”或者“价值降低”（第 96、97 页）。见关于柏林的住房租赁契约（第 97 页，注释 2）。

（2）人对财物属性认识方面的变化：由于这种认识的变化，在好的情况下“财产增加”。{1620 年左右森林的减少已经威胁到炼铁生产的继续存在，当时英国利用煤来炼铁；化学上的发现，如碘（含碘的盐源的利用）。磷钙石做肥料。无烟煤做燃料。煤气照明材料，照相材料。发明染料和药物。古塔波胶。橡胶。植物象牙（用 *Phytelephas macrocarpa* 做的）。杂酚油。蜡烛。利用沥青、松针（松毛）、高炉的煤气、煤焦油制造苯胺，利用废毛、锯屑，如此等等。}在不好的情况下，有用性减少，因而价值也降低（例如，猪身上发现旋毛虫，染料和植物中发现毒物，等等）（第 97、98 页）。发现土地中的矿物、它的新的有用属性及其新的用途，使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增加（第 98 页）。

（3）行情。

有些外界条件对“用于交易的财物的生产、需求和销售”……从而对它们的“交换价值”，以及对“个别现成的财物的交换价值有

重大影响”，这一切外界“条件”的影响……“完全或者几乎不取决于经营的主体”“或所有者”（第 98 页）。行情是“自由竞争制度”中的“决定性因素”（第 99 页）。一个人“通过私有制的原则”获得“其不应获得的东西”，而另一个人则遭到“损失”、“经济上不应有的亏损”。

关于投机（第 101 页，注释 10）。住宅的价格（第 102 页，注释 11）。煤炭工业和炼铁工业（第 102 页，注释 12）。技术上的许多变化降低工业品如生产工具的价值（第 102、103 页）。

在“人口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是有利于土地占有，特别是城市（在大城市）的土地占有的机会，尽管偶然地有时候和有些地方发生一些偏离和波动”（第 102 页）。

“因此，行情对土地占有者特别有利。”（第 103 页）“这些利润，以及其他大多数和行情相联系的利润……是与‘投机亏损’相一致的纯拉机利润。”（第 103 页）

“粮食买卖”（第 103 页，注释 15）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必须

“公开承认……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实质上是行情的结果”，而这必然“削弱个人在经营上的责任心的意义”（第 105 页）。

因此，“如果现在的国民经济组织及其法的基础（!），土地的私有制和资本等等被看做是基本上不应变化的制度”，那就没有（在说了冗长的废话以后）任何办法“来消除……（那些由此产生的灾祸，如销售方面的阻碍、危机、解雇工人、减少工资，等等的）原因”，从而消除“这个祸害本身”；至于“征兆”或“祸害的后果”，瓦格纳先生认为有可能消除，其办法是征收“行情利润”“税”，通过建立“合理的……保险制度”来防止成为行销产物的“经济上不应有的”“亏损”（第 105 页）。

这个蠢汉说,如果认为现在的生产方式及其“法的基础”是“不应变化”的,就会得出这个结果;而他的研究比社会主义学说深刻得多,将洞察“事物的本质”。Nous verrons (我们会看到)究竟用什么办法?

形成行情的各个主要因素。

(1)在天气和政治条件(例如耕地由于战争遭到破坏)的影响下,主要食物的收成不稳定。这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第106页。{关于粮食商贩,见图克“价格史”²⁶⁵;关于希腊——伯克“雅典人的国营经济”第1卷第1册第15节²⁶⁶;关于罗马——耶林“精神”第238页。在我们的时代,每次价格稍许有些提高,下层阶级居民中死亡率就增高,这“无疑地证明,工人阶级群众的平均工资很少超过生活上绝对必需的数目”(第106页,注释19)。}交通工具的改进{正如我们在注释20中读到的,“同时”成为“使价格拉平的粮食投机买卖的极重要前提”,土地耕作法的改变{“轮作制”——“栽培不同的产品,它们由于天气的变化受到不同的影响,有利或者不利”};因此,“同中世纪和古代”相比,在短时期内,粮价的波动较少”。但是现在波动还很大(见注释22,第107页;事实见同上)。

(2)技术方面的变化。新的生产方法。贝氏钢代替铁,等等,第107页(再加上注释23)。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

(3)影响人和财物的空间移动的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变化;这影响……土地和相对价值低的物品的价值;一系列生产部门必须克服困难采用其他生产方法(第107页)。{再加上注释24,同上。交通近便地方的土地的价值由于这里生产的产品销路好而提高;城市人口便于集中,因此城市和靠近城市的地方的土地价值大大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原料、木料和矿产品便于从目前价格便宜的

地方输往价格高的地方；因此，前一个地区的有固定收入的居民阶层的经济状况恶化，相反，那里的生产者，尤其是土地占有者的情况改善。粮食和其他相对价值低的材料便于输入，就起相反的作用。它有利于输入地区的消费者，而不利于那里的生产者。必须过渡到其他的生产，例如从农业过渡到畜牧业，英国从四十年代起就是如此，德国由于东欧廉价粮食的竞争也是如此；对于德国的农业主来说，这是困难的（在目前），第一、由于气候，第二、由于不久前工资急剧提高，农业主不可能像工厂主那样容易把工资的提高转移到产品上去，等等。}

(4)趣味的变化、时式等等，这往往是在短时期内很快发生的。

(5)国内交换和国际交换范围内的政治变动（战争、革命、等等）；指由于在分工的加强、国际等等交换的发展、信贷因素的影响、现代战争的巨大规模等等情况下信任或者不信任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第 108 页）。

(6)农业、工业和商业政策的变化（例如：英国谷物法的改革）。

(7)全体居民的分布状况和总的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从农业地区移住城市（第 108、109 页）。

(8)个别居民阶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由于保证结社自由等等（第 109 页）。{法国的 50 亿赔款²⁶⁷，同上，注释 29。}

个体经济中的费用。所谓生产“价值”的“劳动”（一切费用都归结为这种劳动），也应该是指真正广义的、包括“一切人类有目的的、为获得收入所必需的活动”的“劳动”，因而尤其应该是指“领导者的精神劳动和资本借以形成和应用的劳动”，“因此”酬谢这种活动的“资本的利润”是“费用的构成因素”。“这个观点同社会主义的价值和费用理论，同对资本的批评是相矛盾的。”（第 111 页）

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第 114 页，注释 3）。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且不谈这类诡辩，只举出下列的陈词滥调，就可以揭露我们的 viri obscuri 的讲坛社会主义性质：

“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人”“忽视许多剥削的情形：纯收入分配不合理（!）和个别企业的生产费用过分地缩减到有损于工人（时而也有损于借贷资本家）而有利于雇主”（同上）。

英国和法国的国民收入（第 120 页， $\%-\phi$ ）。

国家的年度总收入：

（1）一年内新生产的财物总和。本地原料应该完全列入自己的价值总额；用本地和外国原料制造的产品算在（避免原料计算两次）借助工业劳动取得的价值提高的总额中；在商业和运输业中流通的原料和半成品算在由此造成的价值提高的总额中。

（2）国外输入的货币和商品，即一国根据信贷契约或该国国民的国外投资所产生的债务的利息。

（3）该国航运从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中因输入外国的财物而实际所得的海运利润。

（4）国外汇寄给在该国的外侨的现金或商品。

（5）没有相应的补偿而输入的财产，例如，另一国向该国长期纳贡，经常移民和经常输入移民的财产。

（6）入超的商品和货币额，{但这时在第一项应该扣除向国外的输出}。

（7）供使用的财产（如住宅等等）因使用而提供的价值额（第

121、122 页)。

纯收入中应该扣除向外国航运事业支付运费而输出的财物(第 123 页)。**{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生产价格(国内的)+运费=出售价格。如果一国用自己的船只输出商品,那外国就支付运费;如果这里存在的市场价格,等等}。**

“除了长期纳贡以外,还应该加上向国外的外国国民定期支付的款项(例如:波斯人对希腊人的贿赂,路易十四时代给外国学者的奖金,圣彼得的迪纳里²⁶⁸)。”(第 123 页,注释 9)

为什么不算德国的公爵们从法国和英国定期获得的津贴?

见由“国家和教会的服务”(第 125 页,注释 14)构成的私人收入的素朴形式。

从个体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观点来估价价值。

库尔诺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38 年版)一书中,把**销毁一部分商品储备而后贵卖其余的商品叫做“商业意义上的真正的创造财富”²⁶⁹**(第 127 页,注释 3)。

关于私人的消费储备即瓦格纳所谓的“供使用的资本”的减少,——在现在的文明时期,尤其是在柏林,第 128 页,注释 5 和第 129 页,注释 8 和 10;**生产企业中的货币或自有的流动资本太少,**第 130 页和同上,注释 11。

现在**对外贸易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第 131 页,注释 13 和第 132 页,注释 3)。

卡·马克思写于 1879 年下半年—
1880 年 11 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1930 年俄文版第 5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
复信^①草稿
初稿

(1)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²⁷⁰。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什么呢?请看第三十二章,那里写道:

“这一消灭过程,即变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剥夺,——这就是资本的来源和起源……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第341页第2栏)²⁷¹

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

^① 见本卷第268—269页。——编者注

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俄国农民的**私有财产**,那末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怎样才可以应用到俄国农民身上去呢?

(2)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农民公社必然解体**的唯一有力论据如下:

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所有的人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外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

素。

另外一个对于保存(采取发展公社的办法)俄国公社的有利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相反地,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①。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②(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²⁷²。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一连串的变化。然而,关于这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

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但是,无论如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展到足够证明下面两点的程度:(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2)它们解体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通过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总之,它已经变为各种强烈的对抗、冲突以及周期性灾难的场所了;即使它表现得极其令人迷惑,它是一种由于社会回复到……而注定要灭亡的、暂时的生产体系。”——编者注

② 路·摩尔根。——编者注

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现代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

我们在阅读资产阶级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善意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²⁷³

不管怎样,这种公社是在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的情况下灭亡的,显然是死于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占领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时,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有个别的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社所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后,就能还原成它的古代原型结构。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如果说,在塔西佗时代以后,我们关于公社的生活,关于公社是怎样消失和在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一点也不了解,那末,至少由于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起点还是知道的。在凯撒的时代,日耳曼人各氏族和血统亲属联合[tribus des confédérations]之间已经每年重分土地,但还不是在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由此可见,德国的农村公社是从较早的古代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生的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

亚洲现成地输入的东西。在那里,在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并且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

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触。

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农业出现以前,公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形式的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的环境的一切影响,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甚至有像农奴这样一种财富的积累)、动产在农业本身

中所起的日益重大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有关的许多其他情况(如果我要对此加以阐述就会离题太远),都是起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作用的因素,并且就在公社内部产生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森林、牧场、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正由于这个原因“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a priori(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3)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①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当然,这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因为农民到处都是各种急剧转变的反对者。”——编者注。

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²⁷⁴，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表要否认上述现代农村公社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末，可以问他们，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也可以问他们，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一缺点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农民公社选出的代表会议代替乡^①——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农业公社的情况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 *modus operandi*（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会是逐步进行的,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①

但是,除国有土地外,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公社对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甚至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俄国也只能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的农业现在所处的绝境;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来注意一下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末应当承认,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末,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可是开始的时候,恰恰相反,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编者注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会是逐步进行的,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①

但是,除国有土地外,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公社对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甚至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俄国也只能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的农业现在所处的绝境;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来注意一下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末应当承认,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末,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可是开始的时候,恰恰相反,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编者注

去寻找它的“复兴的泉源”。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

(4)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显然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一试超过一定的限度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那末，尽管你们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不是农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抛弃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强征暴敛的借口的财产。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外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削弱得陷于束手无策境地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①。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国家靠剥削农民来培植一些最容易接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赘生物——交易所、投机买卖、银行、股份公司、铁路，国家抵补它们的亏空，并用垫款来支付给企业主的利润，如此等等。”——编者注

门,它们丝毫不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掠夺农产品。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总之,国家对于最能促进和加速对农民(俄国的最雄厚的生产力)进行剥削、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办法,是促使它们加速实施的。

(5)破坏性影响的这种结合,只要没有被强大的反作用击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在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竭力想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不行了。由于农民的困苦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成贫瘠不堪。丰年和荒年互相交替。最近十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不能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既然“农村公社”的现状有利于这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者,并且特别有利于在亚历山大二世政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新栋梁”,那末,为什么它们还决意要使公社灭亡呢?为什么它们的代表人物还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确凿证据呢?为什么它们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

只是因为，根据经济上的事实（我要来分析这些事实，就会离题太远），大家都知道，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由于事态的发展，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不行了。因此，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社所有制，使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形成农村中等阶级，而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干脆变为无产者。

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被推向灭亡的边缘；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二 稿

(1)我在“资本论”中指出,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并特别指出,“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法文版第315页)。接着我又说:“这种剥夺(剥夺农民)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了使人们对我的意思不至发生任何怀疑,我在第341页上说: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面,只存在于……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

由此可见,我所分析的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l.c.(同上),第342页²⁷⁵),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过程。这怎么能应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俄国呢?因此,他们有理由根据西方事态的发展做出的唯一结论可能就是:俄国要想在自己国内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就应该从消灭公社所有制、从剥夺农民即广大人民群众着手。而俄国自由派的愿望就是这样的^①;但是,他们的愿望是否比叶卡特林娜二世企图把西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他们想在俄国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且作为彻底的自由派,也想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编者注

方中世纪的行会制度移植到俄国土地上来的愿望更有理由呢？²⁷⁶

总之，西方对农民的剥夺，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变为”资本家私有的、集中的所有制。但这究竟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俄国则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问题。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俄国获得胜利，那末，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剥夺的办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但是，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

(2)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

(3)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土地公社占有制必然解体的唯一郑重的论据如下：公社所有制曾在西欧各地存在过，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它在各地都消失了，而在俄国，它怎么能免于同样的遭遇呢？

首先，在西欧，土地公社占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连串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化，而资本主义生产不过是其中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

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

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那末,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①

(4)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在这种公社里面,农民已经根据私人所有权占有了他所居住的房屋和作为房屋附属物的菜园。这正是古代形式的第一个破坏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正在趋于衰落、正在接近它只有成为‘古代’形态的时期,但是这些俄国的崇拜者……”。——编者注

性因素,是较古的类型所没有的。另一方面,较古的类型都是建立在公社各个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而俄国公社所属的类型已经摆脱了这种狭窄的联系。这使它有了较广阔的发展余地。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我认为,在俄国,这种最初由幅员辽阔决定的孤立性,一旦摆脱了政府的桎梏是很容易消除的。

现在我来谈谈问题的实质。无可讳言,俄国公社所属的古代类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土地虽然是公有的,但是每个农民则和西方的小农一样,都靠自己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变成危险的了。一方面,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因素,促使公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特别是在国家的财政压力之下,还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土地公社占有制,它的经济上的优越性日益丧失。可是也不应该忘记,俄国农民在使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方面,已经采用了集体行动方式,并且他们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就大大便利了他们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有利于进行大规模使用机器的联合耕种;而且,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为公社垫付实现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只是逐渐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

(5)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那也用不着向您说明,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己获得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

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

三 稿

亲爱的女公民：

要认真弄清您 2 月 16 日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深入钻研细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但是，我希望，现在我很荣幸地写给您的这一简短的说明，就足以消除因我的所谓理论引起的一切误解。

一、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 315 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 341 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从这一分析中，至多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们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

二、用来反对俄国公社的最郑重的论据如下：

如果您仔细考察西方社会的产生过程，那你到处都会发现土地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又到处让位给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免于同样的遭遇。

我所以注意这一论据，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譬如说东印度，那末，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现，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经不存在了。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血统亲属联合**之间已经每年重分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间重分；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在日耳曼尼亚本土，这种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生的发展而变为塔西佗所描绘的那种**农业公社**。从那时起，我们就看不到它了。它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消灭了；很有可能，它是死于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所证实。零星的这类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农业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现在从它产生出来的新公社里面，以至毛勒在研究了新公社后能够还原成这种“农业公社”。这种耕地是农民

的**私有财产**，而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仍然是**公共财产**的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起来。由于它承袭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内是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间也有“农村公社”。但是，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新型**的公社，也可以说，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形式。为了指出这一事实，所以我就谈了一些关于日耳曼公社的细节。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公社的最主要的特征。

(1)所有其他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统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

(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改换占有者。这样，个人使用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它的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

(3)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

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泉源——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基础。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极大的作用）将日益强烈地对整个农村经济施加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别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会破坏耕地的公有制，然后会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制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

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①。

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这样做过: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灾难更加严重。

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这又该怎样呢?这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中消失。

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便于他们从小土地劳动过渡到合作劳动,并且他们在公社草地的割草、以及像排除沼地积水等集体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完全古代类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霸占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它对立的。正因为如此,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俄国试图采用与本国整个社会条件如此不合的英国类型的资本主义租佃方法来摆脱它的绝境是徒劳无功的。”——编者注

型的小土地占有制(这是现代农学家感到头痛的东西)也有利于实行合作劳动。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农业公社的社员并没有学过地租理论课程,可是他们了解,在天然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农业劳动,会得到不等的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机会均等,他们根据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把土地分成一定数量的地段,然后按农民的人数把这些比较大的地段再分成小块。然后,每一个人在每一块地中得到一份土地。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制度,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制度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制度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小块土地……^①

卡·马克思写于1881年2月底—3月初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1924年俄文版第1卷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
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²⁷⁷

I^①

[准备改革的]^②过程

亚历山大二世在 1857 年的第一批谕旨中把赎买园地^③一事说得如此令人惬意。(编纂委员会在这方面不可能作任何改变)——(斯卡尔金,第 117 页下面和第 118 页²⁷⁸)。就在这位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农民在 1848 年前后购买土地这件事情上受了骗(第 123 页²⁷⁹)。

(1) 1861 年 2 月 19 日(3 月 3 日)的解放诏书颁布以后——农民中普遍发生了骚动和暴乱;他们认为诏书是虚假的、伪造的文件;武装镇压开始了;在“诏书”发表以后头三个月内农奴普遍遭受鞭答。这一场被捧上了天的表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序曲”呢?

① 用以标明手稿各个部分的罗马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② 方括号里的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③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为了使以下各点条理清楚,除用拉丁字母以外,还用数字标明。

(a)关于编纂委员会及其“自由”(笔记第102页²⁸⁰)。编纂委员会会议于1859年3月4日召开,3月5日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1859年4月15日(所谓吸收平民参加)(第106页)。1859年5月6、9、13、20日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暂时义务状态的决议: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和帕斯凯维奇公爵[反对这个决议],认为农民的人身解放不应该取决于给农民规定的(强制性的)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条件²⁸¹。紧接着,5月21日的诏令禁止把他们的反对意见列入记录簿(第107、108页)。委员会宣称:“稍微离开陛下的意志的倾向都是多么有害”(第108页上面)。1859年1月5日,禁止省贵族委员会吸收公众[参加会议]等等。

1859年1月21日和3月3日,禁止所有的[委员会]刊登[决议],等等(第106页)。

最后,皇帝公开许诺在草案成为法律之前,将召集各省委员会的代表到彼得堡,以便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进行修改……他们被召到首都以后,却不许集合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为召开全体会议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只是要求他们在印好了的、有关某些细节问题的表上写出书面回答。其中一些敢于讨论细节的人,被个别邀请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在那里遭到了冷遇;一些代表上书沙皇,抗议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他们接到了由警察局转来的正式训斥。他们当即决定在下一次省贵族会议上提出抗议。通令禁止他们涉及农民解放问题。尽管如此,某些会议还是恭恭敬敬地向沙皇指出,已经到了也要进行其他改革的时候了。在这以后,某些贵族首领受到训斥,另一些首领被免职。其中有两人被遣

送^①到边远的省份,另一些人遭到警察局监视。

其实,一切都是 per ordre de Mufti (按照圣旨) 进行的。亚历山大二世从一开始就决定给地主尽可能多一些(而给农民尽可能少一些),以便使地主能够同意在形式上废除农奴制;他打算把必须赎买的范围仅限于农民的园地(即农民的庭院、菜园和大麻地),以及耕地使用权(在已经实行的地方);他甚至打算给地主保留独特的领主审判权;他坚持要农民经过 12 年的暂时农奴依附时期等等。见他于 1857 年 11 月 20 日为答复维尔纳、柯夫诺、格罗德诺三省贵族委员会的请愿而给侍从武官长、三省总督纳集莫夫的圣旨(第 103 页²⁸²)。

尽管他在 1856 年 3 月(1855 年 1 月 29 日征召后备军以后)就对省和县的[贵族]首领谈过废除农奴制,但是他并不准备立即着手进行(!),——他继续动摇不定,从而使地主^②能够大大恶化农民的实际状况。见通令,第 105 页;斯卡尔金,第 110、114 页。

1857 年 1 月 3 日,根据兰斯科伊的建议成立了秘密委员会,由亚历山大任主席,当他缺席时则由奥尔洛夫公爵代理。当时决定吸收贵族委员会参加工作等(第 103 页)。早在 8 月 14、17、18 日的会议上,委员会就决定只是缓慢而谨慎地改善农民的状况(同上)。

1858 年 1 月 8 日,“秘密委员会”改为“总委员会”,另外,下设

① 特维尔省的贵族翁科夫斯基被流放到维亚得卡,耶符罗彼乌斯被流放到皮尔姆。——编者注

②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特别委员会”，以便预先审查省委员会的草案。此外，成立了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地方自治^①科，以便讨论帝国以内的土地关系，以及预先审查省委员会的[草案]（第 103 页）。

I (2)

4 月 21 日（1858 年），连同兰斯科伊的通令分发了皇上所批准的省委员会工作纲要等（第 105 页）。

以后在 1858 年 10 月 18 日总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仍然具有同样的精神；这些决议成了编纂委员会的出发点（第 105 页）。

1859 年 2 月 17 日[成立了]两个编纂委员会，由罗斯托夫策夫任主席（第 105 页）。

1859 年 4 月 27 日（除编纂委员会外，又成立了财政委员会）（后者的成员都是财政部和内务部的专家和官员）（第 105 页）。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第 105 页）。（1860 年 2 月 6 日罗斯托夫策夫去世。）

II

[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59 年 3 月 4 日—9 月 5 日	共计—— 一年零 七个月
第二时期——1859 年 9 月 5 日—1860 年 3 月 12 日	
第三时期——1860 年 3 月 12 日—10 月 10 日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虚伪的原则(皇帝的圣旨等等以及总委员会早已宣布过的)。

(a) 赎买应当是双方自愿的(园地^①除外)。

(1859年4月29日罗斯托夫策夫)(第106页)。同一内容(1859年5月20日)(同上)。

关于赎买的其他材料(第106页)。

1858年12月4日总委员会的建议。(由罗斯托夫策夫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1859年5月27日的会议)(第107页下面)。

从1858年12月4日总委员会的记事簿中可以看出, 赎买^①大概是要在政府协助之下进行(第108页)。

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和帕斯凯维奇公爵在抗议书等等中非常正确地指出: 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议“使农民等级的彻底解

实际情况。

(a) 只对农民是强制性赎买; 地主可以强迫他们赎买。

(见同上, 第108页下面和第109页, 戈洛瓦乔夫²⁸³, 第109页)。

赎买条件——同上。

地主的^①债务为4亿银卢布。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放”取决于赎买^①，这是“用反常的办法，迫使自由人违反自己的意志而取得土地所有权”（第108页）。

1859年2月14日——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议。当时预定，赎买期只是37年（后来为49年），而[赎金]恰恰等于“农民的一般代役租”。

(b) 农奴不应该支付取得人身自由的费用。

(c) 现行代役租不应当提高。

(d) 农民应该得到足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以及支付赎金和税款的份地。

赎买手续的财务方面（戈洛瓦乔夫，第109页）。

交易所经纪人的收入（同上）。

[赎买]证券[价值]下跌；地主在自愿赎买的情况下要求农民额外支付（斯卡尔金，第110、117页）（第123页²⁸⁴）。

(b) 农奴应该支付取得人身自由的费用（斯卡尔金，第113页），（同上，第115页）。扬松，第124页。扬松，第125页下面²⁸⁵。

(c) 现行代役租在提高（固然是由于份地减少）（第116页）。

(d) 事实上份地（包括最高份地在内）不能保证农民的生存，而农民仍得暂时依附于地主。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1)

(b) 暂时义务农

1859年5月6、9、13日的会议(第107页)。当时规定暂时义务农的期限为12年(第107页)。

赎买开始以前,农民的份地保持现有的数量,“同时有必要的缩减和限制”(第107页)。赎买^①时则不同(见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议],第108页,[标题]为“赎买”)。

暂时义务农的支出(斯卡尔金,第111页;在非黑土地带)。

中部和南部地带的农民宁愿担负他们早先极其憎恨的徭役(斯卡尔金,第115页开头)。

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缚九年的[农民],[在这个期限满了之后]不能放弃这块土地(斯卡尔金,第117、118页)。

哪里的农民由于当地原因而特别希望赎买园地^①,那里的地主对此就横加阻挠,等等。(斯卡尔金,第118页第2点)。事实上[个别赎买园地]从来没有实行过(同上)。因此,地主在头一个九年期满之前急于进行赎买^①(见斯卡尔金,第119页)。

1878年——暂时义务农的人数(扬松,第119页)。

(2)进行赎买^①的农民。他们要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缚49年(斯卡尔金,第118和第119页)。离开[公社]的种种无法办到的条件(同上)。

(c)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压]在农民身上的人头税等日益加重的[负担](戈洛瓦乔夫,第109页)(斯卡尔金,第111和第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112 页) (第 113 页下面, 第 114 页开头)。

对追索欠缴税款有功的官员实行的奖励制(同上)(第 109 页)。

关于一般人头税(斯卡尔金, 第 112 页)。

和贵族一样, 商人在 1861 年以后可以购置的土地纳税极少, (斯卡尔金, 第 112 页)。

保守分子——反对人头税(斯卡尔金, 第 112 页)。

同时实行身分证制(同上和第 113 页)。(自 1863 年起向农村公社交纳身分证费, 同上。)

由这个制度[产生的]对国家的危险性(斯卡尔金, 第 112 页下面)。

无土地者同样要向公社登记(斯卡尔金, 第 113 页)。

(d) 割农民的地。森林、草地、牧场和部分农民土地转让的结果。农民事实上听凭地主^①任意支配(斯卡尔金, 第 114 页)。地主的和国家的[土地]出租(斯卡尔金, 第 110 页)。商人、国家土地租佃者等购买这些割地(斯卡尔金, 第 110 页, 同上, 第 114 页)。

农民不得向地主租种土地(斯卡尔金, 第 110 页)。

从农民那里割来的土地至少占领地的一半。份地减少而支出增多(斯卡尔金, 第 114 页), 以及第 114 页第 2 点(割地并入地主的领地)。

份地不足(因此必须租地和外出做工)。

份地勉强糊口(甚至在黑土地地区)(斯卡尔金, 第 111 页)。划给农民的土地贫瘠而耕种不便(斯卡尔金, 第 114 页)。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按照法令^①：土壤越肥沃，份地就越少（斯卡尔金，同上）。

委员会对最高份地的规定（斯卡尔金，第 116 页）。国家参议院又予以削减（斯卡尔金，同上）。

扬松，第 124 页。加之迁移有困难（同上）。

最初预定，份地不足时，由政府用协助迁移的办法补救；后来这一点根本没有实行（第 125 页）。

(a) 由于政府使农民所处的条件，——农民遭受富农^①和商人的掠夺（斯卡尔金，第 110 页）。

饥荒（第 113、114 页下面的脚注）。（和农奴制时期相比）（第 114 页，引自斯卡尔金，第 205 页）。

(b) 份地负担过重。

参看[关于]北部地带的例子（第 113 页）；俄国中部和南部的负担也非常重（同上）。

骇人听闻的不合理现象：

(1) 在给徭役农民（第 116 页）规定代役租方面（斯卡尔金，第 115 和第 116 页）。

[规定代役租时]按每人的俄亩数量而定的递减法（斯卡尔金，第 116 页）（尤其是在黑土地带）。（份地越少，代役租就越重。）

最低[份额]——份地的三分之一（见斯卡尔金，第 116 页最后几行）。份地较少的地方，[最初]预定补拨土地，但是国家参议院不允许这样做（斯卡尔金，第 116 页开头）。

赎买时，根据地区^①规定代役租（斯卡尔金，第 117 页）。

代役租普遍提高（扬松，第 125 页）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2) 在规定最高份地和最低份地方面。

暂时义务农的份地较少(最高份地的潮湿斯卡尔金, 第 117、118 页)。

在赎买^①时的最低份地为[最高份地]的三分之一(斯卡尔金, 第 118 页)(见第 118 页第 2 点; 仅仅赎买园地^②的情况实际上从未有过, 第 118 页)。

规定份地, 主要原则(扬松, 第 124 页)。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仍然在]地主手里(扬松在第 125 页谈到这一点)。这一情况愈益恶化, 最终为法令^①[所确认](同上)。

递减法(扬松, 第 125 页)。

(3) 纯粹农业省份的“孤儿份地”^②(斯卡尔金, 第 115 页)。

(a) 赎买^①时过高代役租的资本化; 因此对土地估价过高(斯卡尔金, 第 117 页, 斯摩棱斯克省的例子)。在非黑土地带(117)。在黑土地带——同上。

(b) 银行和赎买(第 126—130 页)(第 132 页最后)。

(c) 农民的现状:(扬松)只有最富裕的人才能[接受]迁移条件(扬松, 第 143 页)——这些条件等于禁止迁移(见第 144 页)。

(α) 三圃制的黑土地带(扬松, 第 120 页)。

(β) 草原地带(西部)——赫尔松、塔夫利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各省(扬松, 第 120 页最后和第 121 页开头)。

(γ) 西部各省(斯卡尔金, 第 119 页; 扬松, 第 121 页, 同上, 第 126 页)。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② 指农民领取的微不足道的份地, 又称“乞丐份地”。——译者注

III

地方自治机关

(用于地方民政管理和军事管理的)必要开支占[地方自治机关经费的]大部分;这些[地方自治]机关暂时还只是政府行政机关的工具。国家开支逐年增加。连续不断发行公债只是为了支付以前的公债的利息。

在 1862—1868 年这一短短时间内,一般的国家开支增加了 42%,即平均每年增加 2050 万卢布(1862 年一般年开支是 295532000 卢布,1868 年 41893 万卢布)。拿俄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诺夫哥罗德省为例,就可以看出各省和各县必要开支的增加情况;该省 1861 年必要的开支是 8 万卢布,而在 1868 年是 412000 卢布。

[农民]解放的真实质

农民同地主之间进行游击战争。

解放一般说来就是高贵的地主再也不能支配农民的人身,出卖他们等等。这种人身奴役制已被消灭。地主失去了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力。

打算解放农民的风声刚一传开,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地主用强力剥夺农民或者把农民迁往不毛之地的做法。

从前在农奴制时期,地主关心的是把农民当做必要的劳动力加以支持。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

他们原先的地主。

赎 买

由于政府发行的赎买(兑换)债券的价格下降了 20%，很多地主都不实行“强制性”赎买，而要求农民**额外支付**，以便补偿这笔损失。有些地方的农民根据同地主达成的自愿协议支付这笔额外的款项，但是一年半以后，就不再向政府支付赎金。这笔额外费用平均每个纳税人为 27 个卢布。

赎买期是 49 年(而不是 41 年)；当时农民已经怀疑，这个诺言是否会兑现，期满以后，他们是否不再为他们向政府购买的土地交纳代役租^①。

在向地主偿付[赎买贷款]时扣除债款。

政府立即扣除了地主欠监护院的债款，对地主说来监护院起着银行的作用，在借债期满以前不要任何补偿。

例如，1870 年 4 月 1 日，从靠农民支付的 505652107 卢布中扣除了 235032183 卢布——地主欠国家信用机关的**债务**。

人头税的提高

自 1864 年以来，人头税^①大约增加了 80%；同时，国家地方自治捐^①也[增加了]。人头税增加最多的一年是 1867 年。

从“委员会报告书”²⁸⁶中可以看出：

1862 年：俄国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总额中，即 29200 万卢布中，有 76%即 22300 万卢布是由贫民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负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担又大大地增加了,因为各类农民的人头税、国家农民的代役租^①以及几乎全部由纳税人^①缴纳的国家地方自治捐^①都提高了。

1863年:每人的人头税[增加了]25个戈比。到1867年已经[增加了]50个戈比。自1865年以来,按人分摊^①的国家地方自治捐^①每人增加了20个戈比,现在每人平均是98个戈比。

从1862年到1867年,国家农民的代役租^①由25256000卢布增加到35648000卢布(每人增加1个卢布以上)。1863年7月1日,小市民^①[负担的]人头税^①废除了,但是,这种人头税从小市民^①和农民要[分摊]一份的城市、郊区、小市镇不动产[税]中,以及从几乎完全由一些纳税^①阶级担负的小商业执照税^①和营业税中得到了补偿,而且还绰绰有余。

从1862年到1867年,一般国家开支(不包括特殊开支)由295532000卢布增加到398298000卢布,即差不多增加35%,而国债则增加了46116万卢布,即增加了60%;因此,每年[为新增的债务付息还本]必须支付25315000多卢布(1867年的全部国债是1219443000卢布,这笔款额每年要支付73843000卢布)。

1874年的国债(转期的和未列入总帐的债务)已[达]147150多万卢布。

此外,非转期债务为120800多万卢布(=483300万法郎)。

1867年,纳税阶层所负担的直接税为11100万卢布,其中单是各种人头税(人头税^①、国家地方自治捐^①和国家农民的公共^①税^①)就有6200多万卢布。而且还不包括赎金,省^①和县^①的地方自治捐^①,以及在那些未设有地方自治^①机关的省份为维持^①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调解^①农民^①事务^①机构^①而征收的特别税^①。

(斯卡尔金^①。)

根据扬松(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教授)的统计(“试验^①”²⁸⁷1877年版),农民交的直接税为17600万卢布,即:

6360万卢布为人头税、公共^①税和国家地方自治捐^①,
3750万卢布为代役租^①,
700多万卢布为省^①和县^①的捐税^①,
300多万卢布为没有实行法令^①的那些省份的地方税^①,
3900多万卢布为赎金;这里还不包括实物贡赋。

此外,还应加上几乎全部的消费税,酒税和盐税(18000万)以及前地主农民^①的代役租^①——2500多万。——总共是37200多万,超过国家预算的56%。

官家拥有:.....	151684185 俄亩	
		(= 165335763 公顷)
农民拥有:.....	120628246 俄亩	
		(= 131484744 公顷)
地主拥有:.....	100000000 俄亩	
		(= 109000000 公顷)
皇室管理处拥有:.....	7528212 俄亩	
		或 8205859 公顷。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 (1) 国家农民(不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 9194891 人——
77297029 俄亩
- (2) 皇族农民..... 862740 人——
4336454 俄亩
- (3) 各种名称的前地主农奴..... 35149048 俄亩

在 1878 年 1 月 1 日以前,在 37 个省(除了西部各省、贝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省)靠政府帮助进行赎买的有 4898073 人(占有地主^①农民^①的 74.6%),17109239 俄亩。

在所有非黑土省份,赎买价格大大高于土地的实际价格,[赎买]是根据地主的要求[进行的]。在纯黑土省份则根据农民同地主达成的协议。

属于第(3)类的,部分是代役租,部分是徭役。

(4) 暂时义务农。1878 年 1 月= 1882696 人,拥有份地 6657919 俄亩。

据御事室(1870 年 4 月 1 日)统计:实行赎买的前地主^①农民为 5830005 人,拥有 20123940 俄亩土地。

国 债

1867 年的国债= 1219443000 卢布。

比 1862 年增加了 46116 万。

因此,1862 年的国债为 758283000 卢布。

1869 年的国债:190750 万卢布。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1878年的国债: 347400万卢布。

政府从解放农民中所得到的好处:

(1) 欠政府所保障的那些银行(后来,这些银行全部与国家银行合并)的债务都转给了政府,因此,农民应当向政府交付利息。

(2) 在编纂委员会的报告书中(斯克列比茨基。罗斯托夫策夫给皇帝的信:“政府^①将得到很多在省和国家国家机关中身居高位的候补者”)。

(3) 直接向农民征税(从前是地主^①担负赋税),因而有广泛的可能提高捐税。

(4) 结束领地贵族的世袭领地权力。

(5) 由此有广泛的可能征集新兵(以及普遍改革军队)。

(6) 与解放农民有关的所谓地方自治^①机关: 国家的负担现在大部分都转嫁给省和县(国家直接税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根据“税制修订委员会”正式公布的第二十二卷的资料(1873年)以及“农业委员会”发表的“蓝皮书”,我们可以看到:

(1) 37个省(这里不包括西部各省)的国家农民和皇族农民所支付的,占所谓农业纯收入的92.75%,因而,他们只有农业收入的7.25%用于其他一切需要。

(2) 前地主农奴所支付的,相当于自己的农业收入的198.25%,因而,他们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全部收入,而且几乎连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农业的及其他的)所得到的工钱都交给政府了。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1862 年的预算: 29200 万卢布。

1878 年的预算: 62690 万卢布。

1852 年的人头税约为 1850 万卢布。1855 年的税收因克里木战争而减少, 不到 1500 万卢布。1862 年的税收总额增加到 2850 万卢布。1867 年由于赋税激增, 税收增加到 4050 万卢布, 现在则超过 9450 万卢布。

我们从国家产业部的公告中可以看到, 从 1871 年到 1878 年, 尽管粮食产量每年都有很大变化, 但是, 平均产量仍然完全一样(同时, 粮食的出口却大规模地增加, 只是在荒年——大约 5 年发生一次——略有降低, 而在 1880 年这一荒年就完全停止出口)。

就在这段时, 1877—1878 年的粮食出口比 1871—1872 年大约增加了 86%。在西方人们看到, 随着铁路网的发展, 粮食出口大量增长, 却没有察觉, 这种出口的增长因两个荒年的间隔时间缩短而被抵销了, 现在荒年每 5 年发生一次, 并在 1880 年达到了最高峰。

农奴制废除后的农民状况

扬松指出黑土地带(是在三圃制的地区, 而不是在草原区)农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比农奴制时期更坏, 并从有关繁殖牲畜(也是在黑土地带)的官方报告中引用了下列资料:

在喀山省, 牲畜数量大大地减少了(指前农奴的牲畜, 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牲畜赶到地主牧场上去放牧); 减少的原因是, 缺乏牧

场^①，为了纳税而卖掉牲畜，收成不好。在辛比尔斯克省[牲畜数量]减少了；较富裕的农民出卖他们不十分需要的牲畜；他们预先出卖牲畜，为的是不至于将来被迫出卖牲畜以[支付]因公社连环保而担负的欠款(有的是个人负担，有的是共同负担)。另一个原因是，在有份地^①的情况下实行割地，主要是割去森林牧场。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平兹省(这些省的马匹数量也减少了)也是同样的情况；梁赞省的牲畜数量由于牧场缺乏而减少了50%。土拉省由于同样原因，由于税吏强迫出卖牲畜以及牲畜病死，马匹和牲畜都减少了。在库尔斯克省，由于要[支付]欠款而不顾一切地出卖牲畜，由于缺乏牧场以及分家等原因，[畜牧业]也[减少了](见第75页)。

非黑土地带(北部各省)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在诺夫哥罗德省，根据地方自治机关[对土地收入]所作的估计，前国家农民在每俄亩土地的收入方面所支付的费用[为]100% (即全部收入)；

前皇族农民·····	161%
前地主农奴·····	180%
暂时义务农·····	210%，

而在份地少、捐税高的情况下，赎买自己的份地的前农奴的费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用则为 275%；

暂时义务农的费用为 565%（“税务委员会报告书”第 22 卷）。

非黑土地带的农民的份地，大部分连养活农民自己都不够。北部这些省份也是工业省份，但是，地方手工工业的工钱（正像给地主干活所得的报酬一样）^①不够[农民]弥补亏空；他们只得离乡背井，到南方，到新俄罗斯，到乌拉尔，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去找工作。

（1 俄亩= 1.092 公顷。

1 普特= 40 俄斤= 16.38 公斤。

1 俄石= 209.901 升或 0.72 夸特）。

IV

俄 国

（1）1877 年的国家收入和支出。

收入= 54800 万卢布。

其中：11700 万是向农民征收的直接税。

主要间接税	}	189676000 卢布间接税 ^② 主要仍然由农民负担。
		1000 万卢布间接税 ^③ 也是[由农民负担]。
		5200 万卢布是关税。

支出= 58500 万卢布（赤字= 3700 万卢布）。

① 本版中将马克思用的方括号改为大括号。——编者注

② 酒税收入。——编者注

③ 盐税收入。——编者注

其中：11500 万卢布——用于国债的还本付息。

22000 万卢布——用于陆海军。

8600 万卢布——用于财政部。

42100 万卢布——国家的主要开支。

其次是战争引起的特殊开支。

1864 年的预算为 35460 万卢布；因此，自 1864 年以来，税收增加了 55%。

(II)列入国家预算的**铁路基金**；目前铁路是私人的财富；国家的铁路变成了私人公司的财产，但是，建筑铁路的资金不是由这些公司提供的。

政府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控制一部分资本，为推销这些股票和债券而发行“**俄国铁路转期债券**”。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款项构成“**铁路基金**”；政府就用这笔钱支付它所控制的股票和债券，此外，还预支铁路有价证券。

在 1878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行了 138800 万卢布的**铁路股票和债券**，其中政府控制了 72000 万卢布以及尼古拉（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债券 57700 万法郎，即 144433000 金卢布，除了政府所预文的证券以外，约占全部资本的 52%。

政府从**铁路基金**中支付的：

1877 年……8000 万卢布，但是政府左 1878 年 1 月 1 日以前所支付的总额= 554475000 卢布以及尼古拉铁路债券 57700 万法郎。

为了弥补这些开支，政府发行了五次俄国铁路长期公债，总额为 6900 万英镑，推销这些公债就提供了 38500 万金卢布；发行两

次尼古拉铁路公债，总额为 57700 万法郎，而且还有 1866 年的国内有奖公债——推销这两种公债就提供了 10765 万。

除了这些补助费以外还有保证金。1877 年政府所支付的保证金总额= 16617000 卢布。国库支付这笔款额也像支付铁路债券的本息一样。1877 年支付铁路债券本息的总额= 32780 万卢布。

国家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总共是 139034000 卢布。

铁路基金预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 6000 余万卢布。

国库预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 3780 万卢布。

铁路欠国库的债务增加了 3950 万卢布，等等。

在 1878 年 1 月以前，欠国库的全部债务达到 46990 万卢布。

农民的债务= 3250 万= 6.9%。

铁路的债务= 31550 万= 67%，即全部国家收入的 57%。

(Ⅲ) 银行。除了政府以外，铁路还得到银行的支持。

1864 年以前只有政府信用机关。

1864 年[成立了]第一个私人信用机关；从那时起，[信用机关]就迅速增加了，把大量款项吸收到定期和不定期的计息往来帐上。这些款需要预付出去，于是就出现了股份公司；居于所有这些公司之首的是铁路公司。

到 1876 年底，(公司的)全部股票和债券的资本= 204300 万卢布。

铁路：占[上述]款数的 67.91%= 138800 万卢布。

到 1863 年底，国家银行及其分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放款 1860 万卢布。

到 1876 年底，所有银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共放款 36000 万卢布，即增加到 2007% 以上。

从银行表报中看不出,这些贷款中有多少钱用于铁路方面。但是丹尼尔逊知道,一家铁路公司的一部分证券是属于政府的,而其余的股票则作为一家私人信用公司贷款的抵押。

但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铁路企业的收入得不到政府的保证,就不能提供任何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就来帮助收押这些股票的私人银行,预支款项或者购买股票。

国家银行从来不缺乏资金,譬如,国库不管银行库存现金的情况如何,就从银行提取[现款],而银行则扩大它在世界上收入最大的经营。用这种方式发行的信用券被列入第十八号银行平衡表(1879年1月1日平衡表=46785万加上列入第一号平衡表的信用券=720265000;因此,这些处于流通中的信用券总额=118800万卢布)。

(IV) 铁路的收入。

1877年的铁路统计资料还没有完全公布。在此以前的几年中,总收入是不断增加的:

1865年…………… 2400万

1877年……………19000万

1878年……………22000万(概算),因此:

每一俄里的总收入增加了17%;

而每一俄里的纯收入却减少了。虽然如此,最近几年的纯收入每年还有4800—5200万卢布;这就是说,假如铁路的全部收入都归国库的话,那末,铁路的赤字就会大大缩减。但是,全部利润都装入私人腰包,而赤字的全部重担却落在官家头上。

那末,政府花费这么多钱,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其结果是贸易大为发展,在同一时期内创办的信用银行和土

地银行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

(V) 银行; 贸易的种类 (输出粮食及其他)。

1884 年国家银行及其分行的全部 (计息) 存款和活期存款 [为] 26200 万卢布, 其中 4200 万卓有成效地用于贸易, 即:

2300 万 [用于] 期票贴现,
1800 万——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
债券等为抵押的贷款。

1877 年——全部信用机关有 72380 万; 增加了 175%。

上述总额中: 36000 万是以股票、债券和国家有息证券为抵押的贷款;

48930 万是期票贴现。增加了 1900%。

最重要的贸易部门是粮食贸易; 它的发展特别快。

在 1864 年, 运往欧洲的粮食为 925 万俄石——5470 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 16490 万卢布。

出口粮食的价值= 全部出口额的 33% 左右。

在 1877 年, 出口的粮食为 3050 万俄石= 26400 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 50800 万卢布。

粮食的价值= 全部出口额的 51.8%。

[出口] 粮食的价值增加了 382%。

俄石数量增加了 241%。

同时, [出口] 粮食的价值超过了 1864 年全部出口的价值 1 亿卢布。

在 1869 年, 铁路运输了 14900 万普特粮食= 全部货运量的

33.4%。

在 1877 年……运输了 54780 万普特粮食=全部货运量的 41.28%。

除粮食以外的主要出口项目：

1864 年牲畜[出口]为 1821000 卢布

亚麻[" "]为 15985000 " "

大麻[" "]为 8993000 " "

增加的百分数

1877 年牲畜[出口]为 15724000 卢布 763%

亚麻[" "]为 67690000 " " 323%

大麻[" "]为 16820000 " " 87%

1864 年棉花出口为 21824000 卢布；[1877 年]棉花出口为 3550 万卢布= 62%。

(VI) 土地信用机关

在 1864 年，欠旧土地信用机关的债务是 39550 万卢布，其中很大一部分落在农民身上——为了赎买土地。

俄国地主的抵押债务

(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除外)

(a) 到 1873 年底，欠旧信用机关的抵押债务 99614000

(b) 到 1873 年底，土地信用公司放款 102692000

(c) 土地信用银行放款 63668000

(d) 相互信用银行(?)^①放款 7182000

273156000 卢布

① 市公立银行。——编者注

与这种情况相比较, 1877 年欠上述各机关的[债务]:

以[字母]分类 (a)	73393000	可见, 三年内债务 (不包括农民的债务)增加了 34%。
(b)	163505000	
(c)	118322000	
(d)	11250000	
366470000 卢布		

(VII)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全部信用机关(和铁路), 看一看它们到 1876 年底究竟得到了哪些款项以及是怎样分类的。

	(1)	(2)	(3)	(4)
	固定资本	%	计息存款 及其他	土地信用公 司的抵押品 债券
信用机关	167778800	18.8%	723790000	
土地信用机关(到 1877 年底)·····	27753000	5.6%	6848000	460000000
铁路(到 1877 年 底)·····	474185000	34.3%		
	669726000	25%		915706000
	卢布			

[丹尼尔逊把 2、3、4 项的各种公司的债务加起来= 2006440000]
[卢布, 实际上得到的是 2106344000。]

各信用机关的债务与资本比较

土地信用机关的

铁路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81 年底—1882 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1952 年俄文版第 12 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²⁸⁸

凯撒和塔西佗

日耳曼人决不是他们现在所占据的领土上的最初居住者^①。在他们以前，至少有三个种族在这里居住过。

人类在欧洲的最古遗迹，发现于南英格兰的若干地层中，这些地层的年代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断定，大概处在所谓冰河时代的两个冰期之间。

第二冰期以后，气候逐渐温暖，人类开始出现于整个欧洲、北非、前亚细亚以至印度。和人类一同出现的，有已经绝种的巨大的厚皮动物（毛象、有直牙的象、毛犀）、肉食动物（穴狮、洞熊）以及现在还生存着的动物（驯鹿、马、鬣狗、狮子、野牛、原牛）。这一时代的工具，表明了文化发展的极低阶段：极其粗糙的石刀、无柄的梨形石锄或石斧、刮兽皮用的削刀、钻，所有这些都是用燧石做成的，这大致相当于现今澳洲土人的发展阶段。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骨骼残骸，还不允许我们对这些人的身体结构作出结论，但就其分布地域之广和到处都有同样的文化这些事实来看，可以断定这个时期延续得很久。

^① 我在这里主要依据博伊德·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1880年伦敦版(Boyd Dawkins.《Early Man in Britain》.London, 1880)²⁸⁹。

这些早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的结局怎样,我们不知道。在他们出现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包括印度在内,还保存有什么种族可以作为他们在现代人类中的代表。

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南郊的洞穴里,大多只是在土壤沉积的最下层中,发现有这些已经死绝的人类的工具。在这个最低的文化层上面(中间往往隔着一层厚薄不等的钟乳石),发现有第二个有着种种工具的文化层。这些工具属于一个较晚的时代,它们的制作精巧得多,它们的材料也复杂得多。这些石器,固然还没有磨光,但在设计和制造上比较合理。此外,还发现有石制的、驯鹿角制的和骨制的箭头和枪头、骨制的和鹿角制的短剑和缝针、动物牙齿钻孔后串成的项链等物。在某些器物上,我们有时看到很生动的动物画,如驯鹿、毛象、原牛、海豹、鲸鱼等,也有赤身人物狩猎图,甚至还可看到兽角上的原始雕刻。

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和多半来自南方的动物一起出现,而和晚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出现的,则是产自北方的动物:两种现在还生存着的北方熊、北极狐、狼獾、白兔。这些人大概就是和这些动物一起从东北方面迁移来的,他们残存在今日世界上的后代,大概就是爱斯基摩人。这两种人的工具,不仅个别是相似的,而且整批都是完全一致的。从图画上看,也是如此。这两种人的食物,几乎取自完全相同的动物。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我们对已绝灭的种族所能下的判断来说)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种爱斯基摩人(到现在为止,只能证明他们曾生存在比利牛斯山脉及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在欧洲土地上也绝迹了。就像美洲的红种人在前一世纪经过残酷的歼灭战争以后,将爱斯基摩人驱逐到极北那样,那时在欧洲出现的新种族,大概也逐渐赶走

了这种爱斯基摩人，最后并把他们消灭干净，而没有和他们混合起来。

这个新种族至少在西欧是来自南方。他们大概从非洲进入欧洲，当时这两块大陆在直布罗陀和西西里还是由陆地连接着的。他们比他们的前人在文化发展阶段上要高得多。他们已经知道耕作。他们有家畜（狗、马、绵羊、山羊、猪、牛）。他们会用手工制作陶器，他们会纺纱和织布。他们的工具诚然还是石制的，但是已经做得很精致，而且大多数都磨得很光滑（这些工具被称为新石器，以别于前一时期的工具）。斧子装上了柄，因而第一次可以用它来砍伐树木。这样，就有可能将树干挖成小舟，就有可能乘小舟到达由于陆地逐渐下沉这时已经和大陆分离了的不列颠群岛。

这种人和他们以前的人截然不同，他们很细心地埋葬他们的死者。因此给我们保存了很多的骨骼和头骨，据此足以推断他们的身体结构。长长的头骨、小小的身材（女子身高平均约 1.46 米，男子 1.66 米）、低额、鹰鼻、突出的眉骨弓、不很高的颧骨和中度发达的下颞骨，都可证明这种人在今天的最后代表是**巴斯克人**。不仅西班牙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就连法国、英国和至少全部莱茵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大概都属于伊比利亚种族。在雅利安人²⁹⁰到达以前，意大利也住着和伊比利亚人相似的身材短小的黑发种族。这个种族跟巴斯克人亲属关系的远近问题，现在还很难判断。

微耳和考察这种长头骨的巴斯克人，一直深入到德国北部和丹麦²⁹¹。阿尔卑斯山北坡上最古的新石器时代的木桩建筑物，也是属于巴斯克人的。另一方面，沙弗豪森则宣称，在莱茵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头骨肯定是芬兰人的，尤其是拉普人²⁹²的，而在古代史上，斯堪的那维亚的日耳曼人及俄罗斯的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的

北方邻人，却只有芬兰人。这两个身材矮小的黑发种族，一个是从地中海对岸迁来的，一个是直接从亚洲里海北面迁来的，后来这两种人大概是在日耳曼尼亚相遇了。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发生的，根本还没有弄清楚。

在这许多次移民以后，终于（也还是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次最后一个主要大部落即**雅利安人**的迁徙。这个部落的语言是以最古的一种语言——梵语为中心而形成的。最早的迁入者是希腊人和拉丁人，他们占据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其次移入的或许是现在业已绝迹了的斯基台人，他们是黑海以北草原上的居民，和米底一波斯部落有很近的亲属关系。接着来到的是克尔特人。关于克尔特人的迁徙，我们只知道这是发生在黑海北面，而且是通过日耳曼尼亚。他们最前面的集团，进入了法兰西，占领了直到加龙河一带的土地，甚至征服了西班牙西部和中部的一部分。一面有海，另一面又有伊比利亚人的抵抗，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同时在他们后面，从多瑙河两岸又有其他的克尔特部落逼迫他们。希罗多德正是在海岸上和多瑙河发源地发现了这些克尔特人。他们一定老早就迁移到这里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坟墓和其他文物证明，克尔特人在占领这一带土地的时候，还没有金属工具。相反，在不列颠，他们一开始出现就已有青铜工具。由此可见，克尔特人从征服高卢到移入不列颠，一定经过了相当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克尔特人跟意大利和马赛发生了贸易关系，才知道了青铜，并且输入了青铜。

在这期间，遭受日耳曼人逼迫的后面的克尔特部落，愈益加紧向前推进，但前进的道路已被封锁，于是向东南回流，这种情形我们以后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迁徙时期还会看到。各克尔特部落

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色雷斯半岛和希腊,一部分灭亡了,一部分定居于波河谷地和小亚细亚。在那个时期(—400年至—300年)^①,在直到加龙河一带的高卢地区,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多瑙河两岸,直达美因河和理森山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部落的人。虽然北日耳曼尼亚的山河带有克尔特人名称的,比南部少而且不可靠,但是绝不能认为,克尔特人只选择了一条通过南日耳曼尼亚山区比较崎岖的道路,而没有同时利用那条横贯北日耳曼尼亚大平原的比较便利的道路。

克尔特人的迁徙,只赶走了本地居民的一部分。尤其在高卢南部和西部,本地居民虽然处于被压迫种族的地位,但当时仍占居民中的多数,并把他们的体型遗传给现在的居民。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在他们新定居的地区,对本地的深色头发的居民进行了统治,这可以从这两个种族都用皂把头发染成黄色这个习惯上看起来。浅色头发是统治种族的标志,因此,凡是由于种族混合而失去这个标志的地方,就必须用皂来补救。

在克尔特人以后迁来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迁徙的时期,我们至少大体上可以比较确实地指出来。这大约在一400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在凯撒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

皮提亚斯在他—325年左右的旅行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日耳曼人的最初的一些确实材料²⁹³。他从马赛前往琥珀海岸,记载了居住在那里的无疑是日耳曼民族的古顿人和条顿人的情况。但是,这个琥珀海岸究竟在哪里呢?通常当然都只能理解为东普鲁士海岸,而如果把古顿人称为这个海岸的邻人,这肯定是不错的。

^① 为了简便起见,我把公元前的年代用数学上的负号(—)来表示。

但是皮提亚斯记载的里程,和这个地方不相符合,它对北德意志海岸和基姆布利半岛之间的北海海湾倒很适合。那里恰巧住着也被称为邻人的条顿人。那里,在什列斯维希和日德兰的西面,也有一个琥珀海岸。临克宾今天还经营着相当规模的当地采集的琥珀贸易。此外,皮提亚斯在这样早的时期,就能远航到完全不熟悉的海面,似乎不太可能;在他那本非常详细的旅行记中,不仅完全没有提到从卡特加特海峡到东普鲁士这一段危险的航程,而且根本没有记载这件事情,这就更加令人难以相信。因此,应该坚决同意列列韦尔首先发表的意见:如果不是由于只可能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古顿人这一名称,那末皮提亚斯所说的琥珀海岸就应该在北海上去找。弥伦霍夫更进一步消除了这个最后的障碍,他认为古顿人是从条顿人一词错写而来的²⁹⁴。

公元前 180 年左右,无疑是日耳曼人的巴斯泰尔人出现于多瑙河下游,几年以后,他们已在马其顿国王柏修斯和罗马人打仗的军队中当雇佣兵,即最初的雇佣步兵。这是些野蛮的战士:

“人们既不善耕作,也不善航行,也不会利用畜产品。他们只关心一件事,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和打倒一切抵抗。”

这是普卢塔克²⁹⁵提供给我们的关于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最早报道。一世纪后,我们在多瑙河以北稍稍偏西的地方又发现了这种巴斯泰尔人。50 年以后,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侵入了凯尔特人居住的多瑙河地区,但被住在波希米亚的凯尔特部落的波伊人击退。于是他们便分做许多群,向高卢前进,侵入西班牙,打败了一批又一批的罗马军队,最后,马利乌斯制止住了他们长达 20 年之久的迁徙,消灭了他们那无疑已大为削弱的大军(条顿人是一 102 年在普罗凡斯的埃克斯被消灭的,基姆布利人则在一 101 年被

歼于意大利北部的韦尔切利)。

半世纪以后,凯撒又在高卢和日耳曼人的两支新部队冲突起来,开始是在上莱茵和阿里奥维斯特的军队发生了冲突。阿里奥维斯特这支军队代表了七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马可曼尼人和苏维汇人。其后不久,又在下莱茵和乌西佩特人及邓克泰人发生了冲突。这两种人是受到苏维汇人的排挤,离开以前居住的地方,过了三年流浪生活以后,才来到莱茵河的。这两支军队都败于罗马部队的正规作战,而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除此以外还败于罗马人的背信行为。狄奥·卡西乌斯说到,在奥古斯都统治的初年,巴斯泰尔人曾经侵入色雷斯;马可·革拉苏在格布尔河(现在的马里乍河)打败了他们。这个历史学家还提到赫蒙杜利人的一次迁徙,他们在公元初年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被罗马的指挥官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把他们移住在“马可曼尼人的一部分土地上”²⁹⁶。这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几次迁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已经巩固起来的罗马统治,长期地限制了他们的迁移。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东北方面,在易北河及理森山那一边,各民族很久还没有找到最后的住处。

日耳曼人这几次迁徙,是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种民族大迁徙,在三百年中被罗马的抵抗所阻止,可是到了三世纪末,却以不可遏止的声势,冲过边境上的两条河流,泛滥到南欧和北非,直至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占领意大利时方才结束。这所谓结束,只是指日耳曼人所参加的迁徙而言,不是指斯拉夫人,他们在日耳曼人迁徙以后,还在很长时期继续移动。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整个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用兽皮搭盖起来的车辆用做住所,并用来装载

妇女、儿童和少量家具。家畜也赶着一起走。男子都武装起来，编制起来，准备摧毁一切抵抗和防备袭击。白天进行战斗行军，夜晚宿营在用车子做成的堡垒中。在这样的征途上，由于不断的战斗，由于疲劳、饥饿和疾病，人员的损失一定是很大的。这是生死攸关的孤注一掷。如果行军成功，活着的这部分人就可以在异乡土地上住下来。如果行军失败，移出的部落就会从地面上消失。不是在战斗的屠杀中死去，便是沦为奴隶。被凯撒挡住其迁徙的海尔维第人及其同盟者，出发时共有 368000 人，其中有战斗力的 92000 人；被罗马人打败后，只剩下 11 万人，这些人凯撒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破例地把他们放归故乡。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是以 18 万人之众渡过莱茵河的；他们几乎全部在战斗中或溃退中死去了。在这个漫长的迁徙期间，整个整个的部落往往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是不足为奇的。

凯撒在莱茵河畔所发现的情况，同日耳曼人不稳定的生活方式完全相符。莱茵河决不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一条精确界线。比利时—高卢族的梅那普人在莱茵河右岸的威塞尔附近拥有村落和耕地；另一方面，莱茵河左岸的麦士河三角洲，却被日耳曼族的巴达维人占据着，而在伏尔姆斯直达斯特拉斯堡一带，也住着日耳曼族的梵乡人、特里包克人和涅麦特人，他们是从阿里奥维斯特时代起住在这里的呢，还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的呢，那就不能肯定了。比利时人经常跟日耳曼人作战，到处还有有争执的领土。在美因河和厄尔士山脉以南，那时还没有日耳曼人居住。海尔维第人是在不久以前被苏维汇人从美因河、莱茵河、多瑙河及波希米亚森林之间的地带驱逐出来的，正如波伊人从现在还带着他们的名字的波希米亚 (Boihemum) 被驱逐出来一样。但是，苏维汇

人并没有占领这块土地，他们把这块土地改变成长达 600 罗马里（150 德里）^①的林野，作为他们南面的屏障。凯撒还知道，再往东去，在多瑙河北面住着凯尔特人（沃尔克—特克托扎格人），即塔西佗后来称为日耳曼族的魁代人。一直到奥古斯都的时候，马罗博杜斯才率领他的苏维汇族的马可曼尼人来到了波希米亚；同时，罗马人却把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这一块地区用堡垒封锁起来，让高卢人移住。边境墙的那一面，以后大概被赫蒙杜利人占领了。从这里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日耳曼人是经过喀尔巴阡山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以北的平原来到日耳曼尼亚的，直到他们占领了北方的平原以后，才把住在南方山中的凯尔特人赶过了多瑙河。

根据凯撒的描写，日耳曼人的生活方式也表明他们还根本没有在他们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牧畜，依靠干酪、牛奶和肉，较少依靠粮食。男子主要的职业是打猎和军事训练。他们也搞一点农业，但只是附带的，采用的方法也非常原始。凯撒报道说，他们的耕地只种一年，第二年总要耕种一块新土地²⁹⁷。这大概是火耕法，直到现在，在斯基的那维亚和芬兰北部，还采用这种方法：把森林（除森林以外，只有沼泽地和泥炭地，这些土地当时还不适于耕作）烧掉，把树根马马虎虎地拔一拔，再把这些树根和松过的表层土壤一起烧一遍。然后在这块施过灰肥的土地上播种谷物。可是，甚至在这种情形下，也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凯撒关于每年更换耕地的那种说法；通常总在收获两三次以后，才换种新土地。非日耳曼人所有的那种由君主和官吏分配土地的

① 一罗马里约等于 1.5 公里；一德里（地理里）等于 7.420 公理。——编者注

办法,尤其是强加在日耳曼人身上的这种迅速更换土地的情节,所有这些方面,都反映了罗马人的想像。对于罗马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是不能理解的。对于已经定居下来的莱茵河畔的日耳曼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已经是一种过时的习惯,逐渐失去了目的和意义。但是,对于内地的日耳曼人来说,对于刚刚到达莱茵河畔的苏维汇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主要也适用于他们),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仍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整个民族以当前遇到的抵抗所许可的方向和速度,慢慢向前推进。他们的社会制度也和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苏维汇人分为一百个区,每一个区每年派一千个人去当兵,其余的男子都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并照管家畜,到了第二年,他们再去替换那些出征的人。只有在占领了新土地以后,人民大众才带着妻子儿女随同军队前去。这比起基姆布利人时代的行军生活来,已经是向定居生活前进了一步。

凯撒不止一次地提到日耳曼人有这样一种习俗,在同敌人的交界外,即在同任何异族的交界处,用广阔的林野来保护自己。这种习俗一直盛行到中世纪后期。为保护北阿尔宾吉亚的萨克森人而防御丹麦人的,有埃德尔河和什莱湾之间的边境森林(古代丹麦语叫 Jarnwidhr),防御斯拉夫人的,有从基尔湾到易北河一带的萨克森森林,而斯拉夫名字勃兰登堡、勃腊尼博尔,也是指保护森林(捷克语《braniti》是保护的意思,《bor》是松树和松林的意思)。

了解了这一切情况以后,对于凯撒所看到的日耳曼人的文化发展阶段,不可能再有任何疑问。他们决不是像现在亚洲游牧民族那样的游牧人。游牧民族必须有草原,而日耳曼人却住在原始森林里。但是,他们离定居的农业民族的阶段也很远。60年以后,

斯特拉本就这样谈到过他们：

“所有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由于生活方式简单而便于**迁移**，因为他们不从事耕作，不搜集财宝；他们住在小屋里面，这些小屋他们每天都可以搭起来；他们像游牧人那样，吃的大部分是畜产品；他们还有一点也很像游牧人，那就是他们也用车去搬运自己的财物，赶着家畜，想到哪里，就到哪里。”²⁹⁸

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凯撒指出，他们没有忘掉这种农业知识。但是，对于一个穿过中欧林野慢慢移动的好战的半游牧部落来说，这种农业不过是一种临时手段和次要的生活来源。

由此可见，日耳曼人向多瑙河、莱茵河和北海之间的新家乡的迁徙，在凯撒时代还没有结束，或者是刚刚结束。在皮提亚斯时代，条顿人，也许还有基姆布利人，可能已经达到了日德兰半岛，而日耳曼人的先头部队或许已经达到莱茵河畔(由于缺乏关于他们到达的任何报道，可以作这样的推断)，这和前面的说法一点也不矛盾。只能和经常的迁徙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向西方和南方的多次进军，最后，凯撒看见他所熟悉的最大一个集团(苏维汇人)当时还处于经常移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显然只是关于日耳曼人向他们欧洲主要居住地实行大规模迁徙的最后阶段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报道。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和以后在多瑙河上的抵抗，阻止了这种迁徙，把日耳曼人限制在他们现在占据着的领土上，并且强迫他们定居下来。

此外，根据凯撒的观察，我们的祖先是真正的野蛮人。他们允许商人入境，只不过为了向某个商人出卖战利品，他们自己从商人那里几乎什么东西都不买。他们需要什么外国东西呢？他们甚至

喜欢他们那种矮小的弩马，而不愿要漂亮的高卢骏马。苏维汇人根本不允许把酒运入境内，因为它会使人身体衰弱。在这方面，他们的近亲巴斯泰尔人恐怕要文明一些。巴斯泰尔人那次侵入色雷斯的时候^①，曾向革拉苏派遣过使节，革拉苏灌醉了这些使节，盘问出关于巴斯泰尔人阵地和意图的重要情报，以后便使巴斯泰尔人中了埋伏，消灭了他们。还在伊迪西阿维佐谷地会战（公元 16 年）以前，盖尔马尼库斯就向他的士兵描述过日耳曼人，说他们不戴甲冑，只拿着柳条编成的或薄板做成的盾牌，只有他们的先头部队才有真枪，后面的部队只拿着烤硬的尖根。由此可见，威悉河畔的居民当时未必就知道金属的加工，而且罗马人当然也不让商人把武器偷运到日耳曼尼亚去。

凯撒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塔西佗供给我们一本关于日耳曼人的名著²⁹⁹，在这本书里，有许多事情看来已经完全不同了。直到易北河，甚至易北河以东，迁移不定的部落都已安定下来，有了固定的住处。城市当然还完全谈不到。一部分人居住在村落里，这种村落有的由一些独家院子组成，有的由一些毗连的院子组成；就是在后一场合，每一所房子也是单独建立的，周围都有一片空地。房屋都是简陋地用没有加过工的原木（*materia informi* 在这里应指同 *caementa* 和 *tegulae* 相反的原木）盖起来的，还没有使用粗石和瓦。在斯堪的那维亚北部，现在还有这样的木房，但它们已经不是斯特拉本所说的一天之内就可以建造起来的那种木房了。关于耕作制度，下面再谈。日耳曼人已经有了地下仓库（一种地下室），冬天他们躲在里面御寒，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妇女在里面纺织。耕

① 见本卷第 484 页。——译者注

作当然已经有了比较重要的意义,可是家畜还是主要的财富。家畜虽多,但品种不好,马长得很难看,没有善跑的骏马,牛羊都很小,牛没有角。食品有肉、乳、野苹果,没有面包。不再经常打猎,猎物从凯撒时代起业已大大减少。衣服也非常原始,大多数人以粗布遮体,也有赤裸着身子的(和卡弗尔—祖鲁人差不多),但是最富有的人已经有了合身的服装;也使用毛皮;妇女的衣服和男子一样,但是她们也往往穿着没有袖子的亚麻布衣裳。小孩子都光着身体跑来跑去。不知道读书写字,但是有一处说到,僧侣已经使用借用拉丁字母创制的鲁恩文字,把它们刻在木板上。内地的日耳曼人并不重视金银,罗马人赠送给国王和外交使节的银器,像陶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小规模的商业周转是一种简单交换。

男人还完全保持着一切原始人所共有的习俗,把家务和耕作看成是没有丈夫气的事情,交给妇女、老人和儿童去做。但是,他们却染上了两种文明的习惯:酗酒和赌博,而且是用天真的野蛮人那种毫无节制的方式聚赌,甚至会赌到把本人也输掉。内地日耳曼人的饮料,是大麦或小麦做成的啤酒。如果当时已经发明了烧酒,那末世界史恐怕会有另一种发展过程。

在和罗马领土接界的地区里,可以看出更大的进步:这里喝输人的葡萄酒,对金钱也比较习惯,他们当然更愿意要那些便于进行小规模交换的银子,同时按照野蛮人的习惯,他们当然也更愿意要那些币面上铸有他们早就熟悉的花纹的硬币。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他们这种用心是非常有根据的。同日耳曼人的贸易,只在莱茵河岸进行。只有住左边境墙以外的赫蒙杜利人,才为了进行贸易,早在高卢和勒威亚等地进出。

这样看来,从凯撒到塔西佗这段时间,是日耳曼人历史的第一

个大段落，在这段时间内，从游牧生活最后过渡到了定居生活，至少这个民族的大部分，自莱茵河起远至易北河以东是这样。各个部落的名称，开始或多或少地和一定的地区结合了起来。但是，由于古人的报道有矛盾，由于名称的变化不定，往往不能精确地肯定每一个部落的居住地点。而且这样做，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里，我们只举出普林尼的一段总的叙述就够了。

“基本的日耳曼部落有五个：温底尔人，其中有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和古顿人；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其中有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住得最靠近莱茵河的是易斯卡伏南人，其中有西干布尔人；住在这块土地中央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第五个部落是和达克人邻接的佩夫金人及巴斯泰尔人。”³⁰⁰

此外，还有住在斯堪的那维亚的第六个分支——希列维昂人。

在古人的所有记载中，普林尼的这段文字，最符合于以后的事实和留传给我们的语言遗物。

温底尔人包括说哥特语的各个部落，他们占据了易北河至维斯拉河之间波罗的海沿岸直到内地一些地区；维斯拉河对岸弗里希—加弗周围住着古顿人（哥特人）。保留下来的贫乏的语言遗物，使我们毫不怀疑，汪达尔人（他们无论如何是应该属于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的，因为他把这部分人的名称转用到整个基本部落上去了）和勃艮第人讲的都是哥特人的方言。可能引起怀疑的只有瓦伦人或瓦林人，根据五世纪和六世纪的史料，通常认为他们属于绍林吉亚人；关于他们的语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它首先包括说弗里西安语的各个民族，住在北海沿岸和基姆布利半岛上的居民，非常可能还包括住在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说萨克森语的各个民族；如果这样，凯鲁斯

奇人也应该算入这个部落以内。

易斯卡伏南人也包括西干布尔人这一事实，立刻表明他们是后来的法兰克人，他们住在莱茵河右岸，由陶努斯山脉起，直到兰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北面则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为界。

赫米奥南人，塔西佗更正确地把他们叫做赫米诺南人，就是后来的高地日耳曼人，他们包括赫蒙杜利人（绍林吉亚人）、苏维汇人（士瓦本人和马可曼尼人；巴伐利亚人）、卡滕人（黑森人）等等。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在这个部落里面，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这是普林尼全部记载中唯一的一个明显错误。

第五个部落（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已经灭绝了。雅科布·格林把他们算做哥特人，这无疑是正确的。

最后，第六个部落是希列维昂人，这包括丹麦岛和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居民。

这样看来，普林尼的分类非常确切地符合于后来实际出现的日耳曼方言的分类。我们不知道有哪些不属于哥特语、弗里西安—低地萨克森语、法兰克语、高地德意志语或斯堪的那维亚语的方言，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把普林尼的分类看做是标准的分类。凡是和普林尼的分类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我都在关于各日耳曼部落的注释中加以考察^①。

因此，关于日耳曼人向他们新家乡的最初迁移，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断：最早沿着南部山地和波罗的海及北海之间的北日耳曼尼亚平原向前移动的，是易斯卡伏南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更靠近

^① 见本卷第 523—538 页。——译者注

海岸的，是印格伏南人。在他们之后的，大概是希列维昂人，但他们转向岛屿方面移动。跟在这些人后面的可能是哥特人（即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他们把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留在东南方了；瑞典有哥特人的名字，证明哥特人的个别分支曾经参加过希列维昂人的迁徙。最后，在哥特人南面移动的是赫米奥南人，他们（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直到凯撒时代甚至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占领了他们的居住地，这些居住地他们一直保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①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自凯撒时代以来，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对峙在莱茵河上，从奥古斯都征服了勒威亚、诺里克和班诺尼亚以后，双方又对峙在多瑙河两岸。这时，罗马在高卢的统治已经巩固；阿格利巴在全国修筑了军用道路网。要塞建筑了；在罗马的压迫下出生的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奥古斯都时代修建的阿尔卑斯山道，通过了大小圣伯纳德山口，将高卢和意大利直接联系起来，于是高卢就成了从莱茵河进攻日耳曼尼亚的基地。这项任务和配备在莱茵河的八个军团，奥古斯都都交给了他妻子前夫的儿子（也许是亲生子）德鲁苏斯。

边境居民之间的不断摩擦、日耳曼人的侵入高卢、心怀不满的比利时人和西干布尔人谣传的或实有的阴谋（按照这个阴谋，西干布尔人要渡过莱茵河去进行全面暴动），都能成为战争的借口。德鲁苏斯在比利时首领们的协助下（—12年），在莱茵河三角洲上游

^① 手稿这里有一个铅笔字的注：“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编者注

紧靠巴达维亚岛的地方渡过莱茵河，蹂躏了乌西佩特人的地区和西干布尔人的一部分地区，然后又乘船向莱茵河下游航行，强迫弗里西安人向他供应步兵后援部队，并率领舰队，沿着海岸，开到埃姆斯河的入海口去征服乔克人。在这里，他的不熟习潮汛的罗马水手，在退潮时使他的舰队搁浅了。由于比较通晓此事的弗里西安同盟军的援助，德鲁苏斯才能解缆而归。

这第一次的进军，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侦察。第二年（—11年）他开始了真正的侵略。他在利珀河口下面重新渡过莱茵河，征服了住在这里的乌西佩特人，在利珀河上架起了桥梁，侵入西干布尔人的地区。西干布尔人这时正在和卡滕人打仗，因为卡滕人不愿加入西干布尔人领导的反对罗马人的同盟。以后，德鲁苏斯在利珀河与埃利佐河的合流处，建筑了一个巩固的兵营（阿利佐），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又渡过莱茵河归去。在这次归途上，他的部队在一个狭谷中受到日耳曼人的袭击，费了很大的劲才幸免于全军复没。这一年，“在卡滕人的土地上，快到莱茵河边的地方”³⁰¹，德鲁苏斯又建筑了另一个巩固的兵营。

德鲁苏斯的第二次进军，已经是按照一个完整的侵略计划进行的，从此以后，他就在彻底地遵循这个计划。他要首先征服的地区，已经相当精确地划了一个范围，这包括易斯卡伏南人的内部地区，直到同凯鲁斯奇人及卡滕人的交界处，还包括属于这一地区的直到埃姆斯河也许直到威悉河的沿海地带。征服沿海地带的基本工作，是由舰队担任的。在南方，阿格利巴创建的、德鲁苏斯扩建的美因兹成了作战基地，在它的邻近，我们应该可以找到那建筑“在卡滕人土地上”的要塞（这个要塞，最近人们认为就是霍姆堡附近的扎耳堡）。从这里起，美因河下游流进了韦特劳和兰河上游之

间的开阔地带，占领这个地带，就能把易斯卡伏南人和卡滕人分开。在进攻阵地的中心，利珀河所横贯的平原，尤其是利珀河和鲁尔河之间的平坦高原，是罗马主力军的最适当的作战线，占领了这个地方，他们就能把要征服的地区分成两个大体相等的部分，同时也把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分离开来。从这个阵地出发，他们就可以在左翼和舰队采取共同行动，在右翼用从韦特劳开来的军队孤立易斯卡伏南人的片岩山地，在正面可以阻挡凯鲁斯奇人。阿利佐堡垒是这个作战线上极巩固的据点。它的位置，离利珀河发源地不远，不是在阿耳梅河流入利珀河处帕德波恩附近的埃耳森，就是在最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罗马要塞的利普施塔特的近旁。

第二年（—10年），卡滕人看到了共同的危险，终于和西干布尔人联合了起来。但是德鲁苏斯进攻他们，至少把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征服了。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到冬季以后，因为第二年（—9年）春天，德鲁苏斯再度进攻他们，并且一直推进到苏维汇人的地区（显然也到了绍林吉亚人的地区，根据弗洛尔和奥罗修斯的说法，还推进到当时尚住在厄尔士山脉以北的马可曼尼人的地区），然后攻击凯鲁斯奇人，渡过威悉河，直到易北河后才退兵。他蹂躏了所有经过的地方，可是到处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归途中，他还没有达到莱茵河就死了，那时他30岁。

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狄奥·卡西乌斯的记载，这里再引斯维托尼乌斯的说法作为补充。他说，德鲁苏斯在莱茵河和艾塞耳河之间开了一条运河，利用这条运河，他带着自己的舰队，通过弗里西安人的土地和弗累沃（即符利斯特隆，现在是从符利兰岛和特斯基林乌之间的须德海而来的一条航路）而到达北海。根据弗洛

尔的记载，德鲁苏斯沿着莱茵河建筑了五十多个堡垒，在波恩架了一道桥，并且加强了麦士河阵线，这样，不论在高卢人暴动时或日耳曼人侵犯时，都能确保莱茵军团的阵地。至于弗洛尔胡吹什么威悉河和易北河畔有堡垒和要塞，那纯粹是信口雌黄。德鲁苏斯在行军时可能在那里挖过一些工事，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统帅，要他在那些地方驻一个守备兵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利珀河沿岸的阵线上，他建筑了巩固的兵站。他也在陶努斯山脉的通道上建筑了工事。

德鲁苏斯在莱茵河方面的后继者提比利乌斯，在下一年（—8年）渡过了莱茵河。日耳曼人都派了和谈代表，只有西干布尔人没有派遣。当时在高卢的奥古斯都表示，只要西干布尔人不派代表，他就拒绝进行任何谈判。最后，当西干布尔人也派来了代表，派来了像狄奥所说的“许多可尊敬的人物”的时候，奥古斯都却下令逮捕他们，并把他们监禁在帝国内地各城市中；“他们都由于忧愤而自杀了。”³⁰²第二年（—7年），提比利乌斯又率领军队来到了日耳曼尼亚，在这里，除去若干次不重要的骚动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镇压的了。关于这个时期韦莱是这样说的：

“提比利乌斯已经完完全全征服了这个国度（日耳曼尼亚），它同有纳税义务的行省几乎已没有什么差别。”³⁰³

这种成功的取得，不仅应当归功于罗马人的武器和提比利乌斯声誉卓著的外交“机智”，也许还应当特别归功于把日耳曼人移居到罗马地区莱茵河岸的做法。阿格利巴业已根据永远效忠于罗马人的乌比人的愿望，打他们迁到了科伦附近的莱茵河左岸。提比利乌斯强迫4万西干布尔人迁徙，从而长期摧毁了这一强大部落的抵抗力。

提比利乌斯此后在很长时间内不同一切国事，我们也不知道，在这许多年间日耳曼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狄奥的片断记载中，谈到了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从多瑙河出发向易北河对岸的进军。但是此后不久，大约在公元元年，日耳曼人举行了起义。根据韦莱的说法，罗马的最高统帅马可·维尼齐乌斯总的说来成功地进行了这次战役，甚至为此还获得了奖赏。虽然如此，提比利乌斯不得不在公元4年，即在他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后不久，再次渡过莱茵河去重建那摇摇欲坠的罗马统治。他征服了住在莱茵河近处的塔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以后又征服了布鲁克泰人，并且“争取到了”凯鲁斯奇人。韦莱参加了这一次和下一轮的出征，但他没有对此作更详细的叙述。暖和的冬天，使罗马军团能够继续活动到12月；以后，他们就在日耳曼尼亚，大概在利珀河发源地建立了冬季兵营。

次年（公元5年）的进军，是想征服西部日耳曼尼亚。当提比利乌斯从阿利佐向前推进并在易北河下游打垮了伦巴德人时，舰队则沿海岸前进，并“争取到了”乔克人。在易北河下游，陆军和逆河而上的舰队会了师。由于这一次出征的得手，按照韦莱的说法，罗马人在北方的事业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了。第二年，提比利乌斯向多瑙河推进，这里，不久以前在马罗博杜斯领导下迁移到波希米亚来的马可曼尼人威胁着国境。马罗博杜斯在罗马受过教育，通晓罗马的战术，他依照罗马的榜样，组织了一支包括7万步兵和4000骑兵的军队。提比利乌斯在多瑙河从正面攻击这支军队，而森提乌斯·萨土尔尼努斯则率领军团从莱茵河出发，穿过卡滕人的土地去进攻敌人的背面和翼侧。这时，在提比利乌斯自己的背后，班诺尼人举行了起义。军队必须撤回，必须重新夺回自己的作

战基地。战争延续了三年。班诺尼人被打败以后，北日耳曼尼亚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也不能作侵占马可曼尼人土地的打算了。

德鲁苏斯的征服计划，完全保存了下来。不过要顺利执行这个计划，就必须使陆海部队进军到易北河边。在对马罗博杜斯的作战计划中，闪耀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要把国界推进到小喀尔巴阡山、理森山和易北河一直到该河的入海处。但是这在当时还是遥远的未来的事，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沿韦特劳上去，当时罗马筑垒要点究竟伸展得多远，我们不知道。看来，这条作战线当时没有像利珀河沿岸那条更重要的作战线那样受到重视。但是在这里，罗马人显然已经在相当大的土地上安居下来。莱茵河右岸自波恩以下的平原，是属于他们的。鲁尔河以北至埃姆斯河对岸直到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交界处的威斯特伐里亚平原，仍然处在军队的占领之下。在背后有巴达维人和弗里西安人，当时他们还是忠实的友人；更往西去，是乔克人、凯鲁斯奇人和卡滕人，他们在屡次败北以后，在遭到伦巴德人也遭到的打击以后，可说是相当驯服的。无论如何，在这三个部落里面，当时有一个相当有势力的派别，他们认为只有和罗马结成同盟才能得救。在南方，西干布尔人的武力刚刚被摧毁；他们在利珀河与鲁尔河之间和莱茵河平原上的一部分领土已被占领，其余的领土则被罗马人建立在莱茵河、鲁尔河和韦特劳的阵地三面包围着，而且罗马队伍大概相当经常地在这里开过。最近查明存在着通往利珀河发源地的罗马大道，它们经过高耸的山岭，从诺依维特通到济克河，从多伊茨和诺伊斯通到乌培河，至少到达贝尔格和马尔克的边界。再往前去，是赫蒙杜利人，他们在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同意下，占领了马可曼尼人放弃的一部分土地，并和罗马人保持着和平关系。最后，各

日耳曼部落之间众所周知的纷争,使人们有理由期待,只要罗马人再进行几次这样的战斗,就可以按他们的愿望把同盟者逐渐变成臣民。

罗马阵地的核心,是利珀河两岸直至奥斯宁格山脉一带的土地。罗马军团在营垒的长期驻扎,使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罗马人的统治和罗马人的习俗,用狄奥的话来说,这就使野蛮人“好像转变过来了”³⁰⁴。在这里,围绕着守备部队的营盘,形成了这位历史学家谈到过的城市和市场;它们的和平的贸易关系,首先加强了外国的统治。一切看来都很好,但是结局却全然两样。

昆提利乌斯·瓦鲁斯被任命为驻日耳曼尼亚军队总司令。这是一个开始进入衰退的时代的罗马人,萎靡不振,疏忽大意,总想靠他前辈人的月桂冠寻找安逸,尤其渴望利用这些月桂冠来达到自私的目的。

“他决不是一个不爱金钱的人,他管理过的叙利亚就是证明:他来到这个国家时是个穷光蛋,国家是富裕的,他离开这个国家时是个有钱人,国家贫穷了。”(韦莱语)³⁰⁵

一般说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可是这位“性格温和”的人一旦被派到一个很不容易勒索的地方,便勃然大怒,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可以搜刮的了。但是瓦鲁斯还是不肯放手,而且采用了罗马总督和副总督们久已实践过的方法。首先要尽快使日耳曼尼亚被占领的地方变成罗马的行省,以罗马的政权代替那原来处在军人统治下的本地政权,从而把这个国家变为国库和总督收入的源泉。因此,瓦鲁斯企图“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压力把日耳曼人改造过来”,他“像对奴隶一样对他们发布命令,像对臣民一样对他们索取金钱”(狄奥语)³⁰⁶。但他在这里所使用的久经考验的压迫和

勒索的主要手段，是罗马行省总督的最高司法权。他在这里攫取了这种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想把罗马法强加到日耳曼人身上。

可惜，瓦鲁斯和他这个文明传播者的使命，走在历史前面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年左右，因为大约经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方才成熟到能够“接受罗马法”的地步。事实上，罗马法及其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经典分析，在日耳曼人看来简直是荒谬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开始发展起来的少量私有财产，只在他们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同样，日耳曼人习惯于根据祖传的风习，在公开的民众法庭上面，在几小时以内就可以自己作出判决，所以罗马审判程序上的隆重仪式、抗辩和无休止的延期，在他们看来，不外是一种拒绝审判的花招，而围绕着总督的一群辩护士和百般刁难的家伙，不过是一帮十足的强盗——实际上他们也正是一帮强盗。这样，日耳曼人就必须放弃他们同伴审判同伴的自由法庭，服从于这样一个人的武断判决，这个人用外国话来审理案件，用至少是他们所不熟悉的甚至可说是完全不适用的法律作为根据，而且他本人就是当事人。依照塔西佗的报道，自由的日耳曼人只有僧侣才在极少情况下有权殴打他们，他们只有在背叛自己的部落时才被处死，在其他的场合，任何过失，甚至杀人也可以用罚金(Wergeld)来赎罪，他们还惯于替自己及自己的亲人报血仇，这样的日耳曼人现在却要屈服于罗马扈从的木棍和斧钺之下。而这一切并无其他目的，不过是为吸取这个国家的民脂民膏，为国库征收赋税，为总督及其亲信进行勒索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罢了。

但是瓦鲁斯打错了算盘。日耳曼人不是叙利亚人。他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罗马文明，只使他们在一个方面留下了印象。他只向那些被迫跟罗马结成同盟的各邻近部落表明，不堪忍受的压迫

在威胁着他们，从而促使他们达到了从来不能达到的团结。

瓦鲁斯带着他的三个军团驻扎在日耳曼尼亚，阿斯普雷涅斯带着另外两个军团驻扎在下莱茵，离核心阵地阿利佐只有五六天的行程。在这样的兵力面前，只有经过长期而周密的准备而突然发动的决战，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这样，谋叛的方法事先就决定了。负责组织这次叛乱的，是阿尔米纽斯。

阿尔米纽斯出身于凯鲁斯奇人的部落贵族，是似乎在该部落中当卫兵头目的塞吉美尔的儿子，他青年时代曾在罗马军队里服务，通晓罗马人的语言和风俗，在罗马人的大本营里是一位常见的很受欢迎的客人，他的忠诚似乎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直至袭击的前夕，瓦鲁斯还是坚决地信任他。韦莱说他

“是一位出自名门，勇敢、机敏，在野蛮人中无可比拟的青年，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焕发着智慧的火焰；在以前的多次战役里（即在对日耳曼人的战役里）他是我们经常的战友；他除享有罗马公民权外，并已取得罗马骑士的称号”。

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阿尔米纽斯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卓越的统帅。他一经决定要摧毁莱茵河右岸的罗马人的统治，就毫无顾虑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些早已为罗马势力所控制的凯鲁斯奇人的军事贵族，至少要大部分争取过来；卡滕人、乔克人，特别是直接处于罗马羁绊之下的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也要拉来谋反。尽管瓦鲁斯的勒索已为此事作了准备，但一切都还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需要使瓦鲁斯失去警惕性。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就利用了瓦鲁斯对诉讼程序的癖好，并以此狠狠地愚弄了他。

韦莱说道：“日耳曼人虽然非常野蛮，但是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撒谎的，谁要没有亲身经历过，对这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在瓦鲁斯面前

玩弄一连串捏造的争讼把戏,时而毫无根据地互相控告,时而对瓦鲁斯表示谢意,说他以罗马人的公道裁决了一切,说他们的野蛮习气在新的、前所未闻的纪律和秩序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减轻,说他们以前惯于用武力解决的纠纷,现在可以按照法律和公理来处理了。这样,他们把瓦鲁斯弄到全然不知警惕的地步,他竟然以为他是在集会场合中审理案件的一位城市大法官,而不是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率领军队的一位司令官。”³⁰⁷

公元9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为了更能保证成功,日耳曼人把瓦鲁斯引入迷途,使他向各处派遣军队,分散他的兵力;由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做到这一点是并不困难的。

狄奥说道:“瓦鲁斯并不把它的军队,像在敌国所应该做的那样适当地集中起来,而是把他的兵士一队一队地供给要求援助者使用,这些人时而请求派兵防守其一据点,时而请求派兵兜剿盗匪,时而请求派兵护送粮食,运送车队。”³⁰⁸

这时,主要谋反人阿尔米纽斯和塞吉美尔却经常在瓦鲁斯左右,并且常常跟他同桌吃饭。根据狄奥的说法,瓦鲁斯当时已经受到警告,可是他的信任是没有止境的。最后,到了秋季,当起义的准备业已全部完成而瓦鲁斯和他的主力部队已被引诱到凯鲁斯奇人的地方直到威悉河畔的时候,一个在比较远的地方爆发的假装的暴动,发出了行动的信号。当瓦鲁斯得到这个消息并且发出进军命令时,凯鲁斯奇人的另一个首领,大概和阿尔米纽斯家族有世仇的塞格斯特向他提出了警告。瓦鲁斯还不肯相信他。于是,塞格斯特又向瓦鲁斯建议,把他本人和阿尔米纽斯及其他凯鲁斯奇人的首领都禁闭起来,然后再出发,说事情的结局会证明谁是正确的。但是,甚至当瓦鲁斯出发以后,谋叛者以集合同盟军然后同他会师为借口而留在后方的时候,瓦鲁斯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不像瓦鲁斯所期待的那样。凯鲁斯

奇人的军队真的集合了起来。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溃他们自己以前请求派遣来的驻扎在他们那里的罗马军队，然后从侧面袭击行军途中的瓦鲁斯。瓦鲁斯沿着崎岖的森林道路前进，因为在这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还没有建筑完好的罗马军用大道。遭到突然袭击的瓦鲁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于是鼓起了勇气，并且从这时起表现出自己真是罗马军队的统帅，不过已经太晚了。他命令他的军队排成纵队，整顿由妇女、儿童、车辆、驮兽等等组成的庞大的辎重队，并且在这狭窄的道路和茂密的森林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保护他们，然后继续向自己的作战基地前进，这个作战基地我们应该认为就是阿利佐。倾盆大雨使遍地泥泞，阻碍了行军，常常使过于庞大的辎重队陷于混乱。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以后，瓦鲁斯来到了一个密布密林的山岭，上面还有一块可以勉强扎营的空地；在这里，还相当有秩序地而且按照条令规定扎了兵营，筑了工事。盖尔马尼库斯的军队六年以后来到此地时，还清楚地看到这里“三个军团的工事”³⁰⁹。瓦鲁斯针对这种情况，下了决心，命令把那些不十分必要的车辆和行李都在这里烧掉。第二天，他通过了一片开阔的平原，但又受到非常重大的损失，军队陷于更大的混乱，晚上，再也无法有秩序地建立兵营了。盖尔马尼库斯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堵半倒的墙和一道浅浅的壕沟。第三天，又走过了林木繁茂的山岭，瓦鲁斯和大多数军事长官在这里丧失了勇气。瓦鲁斯自杀了，军团几乎全部复没。只有骑兵队，在瓦拉·努蒙尼乌斯的指挥下幸免于难；还有个别的逃亡步兵，像是逃到了阿利佐而保全了性命。阿利佐至少还守住了若干时候，因为日耳曼人还不会进行正规围攻。稍后，全部或一部分守备部队为自己打开了一条道路。惊惶失措的阿斯普雷涅斯，大概只作了一段

短程的行军去迎接守备部队。布鲁克泰人、西干布尔人和一切较小的部落全都起义了，罗马的统治又被赶到了莱茵河彼岸。

关于这次行军所经过的地区，有许多争论。可能性最大的是：交战之前，瓦鲁斯在处于豪斯贝尔格与哈默伦之间某处的林特恩盆地；在假装的暴动和第一次袭击发生以后，就向德特莫耳特附近的德伦狭谷退却，这个狭谷形成一条经过奥斯宁格山脉的平坦而宽阔的通道。这是一般的传统说法，和史料以及由当时战争局势所引起的军事要求都是符合的。瓦鲁斯达到德伦狭谷与否，还不能断定；但骑兵队（也许还有步兵先头部队）的突围，似乎肯定了这一点。

三个军团的消灭和整个日耳曼尼亚西部暴动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惊动了罗马。眼看着阿尔米纽斯就要渡过莱茵河并把高卢煽动起来，另一方面，马罗博杜斯又要渡过多瑙河，并带动勉强被压服的班诺尼人加入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意大利的力量已经枯竭到这种地步，几乎再也不能派出任何军队。狄奥说道：在罗马市民中适于服军役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年岁较大的人又逃避当兵，因而奥古斯都就用没收财产的手段惩罚他们，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最后，皇帝拿已释放的奴隶及退伍军人勉强拼凑成一些队伍来保卫罗马，解除了他的日耳曼人禁卫军的武装，并把所有的日耳曼人从城中驱逐出去。

但是阿尔米纽斯没有渡过莱茵河，马罗博杜斯也没有想要进攻，因此罗马可以毫无阻碍地对“背信弃义的日耳曼人”发泄它的愤怒。我们已经看到，韦莱说日耳曼人“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撒谎的”。斯特拉本也这样说。他不知道有什么“日耳曼人的诚实”和“罗马人的奸险”。恰恰相反。他说克尔特人是“单纯

而不做假的”，单纯到“他们在众人眼前毫不防备地急于参加战斗，因而使他们的敌人容易取得胜利”³¹⁰，谈到日耳曼人时他却说：

“不相信他们总是有好处的，相信他们，他们就会使你大倒其霉，凯鲁斯奇人就是例证，他们破坏了条约，并以伏兵歼灭了三个军团及其统帅瓦鲁斯。”³¹¹

至于奥维狄乌斯那种愤怒而渴望复仇的诗句，就更不必说了。这简直像是读到了沙文主义最盛行时代的法兰西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对于约克的背信和萨克森人在莱比锡附近的叛卖行为³¹²，倾吐了他们的怒气。日耳曼人对罗马人的诚实和遵守条约的忠诚，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凯撒在休战和谈判期间，袭击了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奥古斯都逮捕了西干布尔人的使节，但在他们未来以前，却又拒绝同各日耳曼部落进行任何谈判。一切征服民族都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他们的敌人，而且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敌人也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便说那是背信弃义和叛卖行为。可是，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末，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当然，在德特莫耳特给阿尔米纽斯建立的荒诞的纪念碑，不过是一种幼稚行为，它只有一点好处，诱使路易—拿破仑在阿利塞[—圣雷讷]附近的山上，给维尔琴盖托里克斯也建立了一个同样可笑和荒诞的巨大纪念碑。然而，有一点还是正确的，同瓦鲁斯的会战，是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之一。这次会战使日耳曼尼亚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关于这种独立对日耳曼人本身是否有很大的好处，能够作许多翻来复去的无益争论，但可以肯

定,没有这种独立,全部历史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虽然,日耳曼人自此以后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几乎纯粹是一长串的民族不幸事件(这大部要由他们自己负责),因而最可靠的成绩也几乎每次都变成了人民的灾难,但是还应该说,日耳曼人在当时,在他们历史的初期,的确有过好运气。

凯撒用来征服高卢的,是垂死的共和国最后一些有生力量。军团从马利乌斯时代起就由招募来的雇佣兵所组成,但毕竟还是完全由古意大利人组成的;这种军团从凯撒以后确实在消亡下去,正像当时古意大利人自己在那急剧扩大的大地产及其奴隶经营的压迫之下正在消亡下去一样。当时只有采用非常手段,才能把 15 万人,即 25 个步兵军团的完整队伍保持住。20 年的服役期限并未遵守,服役期满的老兵被迫无限期地继续从军。这是奥古斯都死后莱茵军团发生兵变的主要原因。塔西佗很清楚地描写了这次兵变,它在反抗与纪律的奇妙结合方面,使人鲜明地想起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兵士在尼德兰的兵变。在这两次兵变中,受君主背约欺骗的军队表现了坚强的团结。我们看到,在瓦鲁斯会战之后,奥古斯都企图恢复那早已废弃不用的旧的征兵法是怎样没有结果,他怎样不得不去找那些服役满期的士兵,甚至去找那些被释放的奴隶,而这些被释放的奴隶是他在班诺尼人起义时曾经一度招募过的。以意大利自由农民的子孙来补充军队,随着意大利自由农民本身的消灭而停止了。每一批新加入军团的补充兵员的来到,都降低了军队的素质。不过还必须尽量爱惜这些军团,爱惜这个勉强维持下去的全部军事力量的核心,因而辅助部队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他们打仗,在打仗时军团只用作后备队,因此,在克罗狄乌斯时代,巴达维人已经能够说:行省是用行省的血来征服的。

这种军队对旧日罗马军队的纪律、沉着乃至旧日罗马的战术日益生疏，这种军队日益由行省人民所组成，最后甚至大部分由帝国以外的野蛮人所组成，这样的军队现在差不多已经不能用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争，很快连较大的攻击战斗也不能进行了。军队的蜕化迫使国家只能进行防御，防御开头还带有进攻的性质，但很快就越来越变成消极的防御，最后，进攻的主动权完全落到日耳曼人手里，他们在从北海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不断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突破帝国国界。

当时，甚至为了确保莱茵河战线，也要让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本土上重新领略罗马武装的优越性。为了这个目的，提比利乌斯急忙赶到莱茵河去，以自己作为榜样，并用严峻的刑罚恢复废弛的军纪，将行军部队辎重控制到最必要限度，并两次向西部日耳曼尼亚进军（公元10年和11年）。日耳曼人回避决战，罗马人不敢在莱茵河右岸扎下他们冬季的兵营。在阿利佐和在埃姆斯河口乔克人土地上建筑的工事中，是否冬季也保有常驻的守备部队，关于这一点没有谁谈到过，但可以认为是实有其事的。

14年8月，奥古斯都逝世。莱茵军团既不能在服役期满以后退伍，也不能得到军饷，于是他们拒绝承认提比利乌斯，宣布德鲁苏斯之子——盖尔马尼库斯为皇帝。盖尔马尼库斯平定了暴乱，恢复了军中的纪律，并且带领他们向日耳曼尼亚进行了塔西佗所描写的三次进军。这里阿尔米纽斯起来和他对抗，并且表现出他是完全可以和他的对手相匹敌的一个统帅。他总设法避免在开阔地区进行决战，尽可能阻碍罗马人的推进，并且只在罗马人不能展开的沼泽地带和狭窄小道上进攻他们。但是日耳曼人并不永远听他的话。好战的热情往往引诱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获得

战利品的渴望，不止一次地使深深落入陷阱的罗马人幸免于难。这样，盖尔马尼库斯在伊迪西阿维佐谷地和安格利瓦尔边境墙附近取得了两次毫无战果的胜利，在归途中很费劲地从沼泽地的小路上逃了出来，在弗里西安海岸由于暴风雨和涨潮的缘故，战船和人员受到了损失，最后，在公元 16 年那次出征以后，他就被提比利乌斯召回了。罗马人深入日耳曼尼亚腹地的远征，从此便告结束。

但是罗马人深知，只有控制通向对岸的渡口，才能控制河流本身。罗马人决不是消极地撤退到莱茵河后面，而是把他们的防御转移到莱茵河右岸去。那掩护着利珀河下流、鲁尔河及乌培河地区的大群罗马堡垒（这至少在个别的场合下，是和以后的区相对应的）和那从莱茵河修到马尔克伯爵领地边境的军用大道，令人推想到这里建立过防御工事体系。这些由艾塞尔河直至济克河的防御工事，同现在在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之间的界线是一致的，只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上有某些出入。这个在七世纪时大概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有防御能力的工事体系，或许在莱茵河阻止了当时入侵的萨克森人，这样便划定了他们这一个部落和法兰克人之间的现在的境界线。近几年来，才在这里有了极重要的发现（由雅·施奈德尔作出的）；因此可以预料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逆莱茵河而上，逐渐建立起了一道罗马的边境墙，这主要是在多米齐安和阿德里安时代建筑的。它从诺依维特附近开始，通过蒙塔包尔高地，向埃姆斯河伸展，在那里越过兰河，在阿道夫塞克附近顺着陶努斯山脉北坡折向西方，包括了韦特劳谷地中的格吕宁根这一极北点，从这里向东南进展，并经哈瑙以南地区直达美因河。从这里起，这道边境墙沿美因河左岸直到米尔腾堡；从此沿着一条只有一个地方有曲折的直线到达霍亨施陶芬城堡附近的维尔

腾堡的雷姆斯河。在这里,大概是后来在阿德里安时代继续修筑起来的边境墙折而向东,经过丁克斯比尔、贡岑豪森、埃林根和基普芬堡,并在克耳海姆上方的伊尔恩津克附近达到了多瑙河。在边境墙后面,筑有较小的工事,在稍远的地方又有较大的要塞作为据点。这样封锁起来的莱茵河右岸上的这一块土地,至少从美因河往南一带,自从海尔维第人被苏维汇人赶跑以后便一直荒芜着;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里住着高卢的流浪者和匪兵。

这样,在莱茵河边境墙附近和多瑙河一带,逐渐出现了比较安定、比较平静的局面。战斗与侵袭仍继续发生,但是双方领土的界线在几世纪当中没有变化。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在塔西佗和托勒密以后,关于日耳曼尼亚内地情况和事件的文字史料便中断了。但是我们却得到了其他一系列更明了的史料,这就是可以归入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许多古代文物。

我们已经看到,在普林尼和塔西佗时代,罗马人跟日耳曼尼亚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普林尼的著作中指出了一条在他那个时代有时就已利用过的、来自卡尔农特(对着马尔赫河流入多瑙河的河口)的旧通商道路,这条道路沿着马尔赫河与奥得河直通到琥珀海岸。这条道路,和通过波希米亚沿着易北河前进的第二条道路一样,大概在很早的时候已经由伊特刺斯坎人使用着,而伊特刺斯坎人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面的谷地里住过,这已经被许多文物特别是哈耳施塔特出土的文物³¹³所证明。高卢人一侵入北部意大利,大概就把这种贸易终止了(约在一400年)

(根据博伊德·道金斯的看法³¹⁴)。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末和伊特刺斯坎人发生这种以输入青铜器为主的贸易关系的,一定是在日耳曼人之前就占据了维斯拉河和易北河这一地区的民族,也就是凯尔特人,而日耳曼人的移入正像凯尔特人向意大利的回流一样,都会使这种贸易关系中断。只是在这种关系中断以后,才出现了从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沿着德涅斯特河和德涅泊河直通到维斯拉河河口的那条更偏东的通商道路。在勃罗姆堡、埃捷尔岛及其他地方所发现的古代希腊钱币,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钱币中间,有的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也许是五世纪在希腊、意大利、西西里岛、昔勒尼等地铸造的。

当迁移的民族一旦安定下来的时候,奥得河和易北河沿岸中止不用的两条通商道路一定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在托勒密时代,似乎不仅仅这两条道路,而且还有其他经过日耳曼尼亚的通道也重新利用了起来。在这方面,凡是托勒密的证明中断的地方,出土的文物都能接下去加以证明。

卡·弗·维贝尔格^①把文物作了仔细的比较,在这方面弄清了许多问题,并证明,在公元二世纪,人们又使用了通过西里西亚沿奥得河顺流而下和通过波希米亚沿易北河顺流而下那两条通商道路。塔西佗早就提到波希米亚那些

“从我国行省去的战利品包买人和商人 (*lixae ac negociatores*), 他们由于贪图金钱和忘了祖国而跑到敌人的地区和马罗博杜斯的阵地里去”³¹⁶。

赫蒙杜利人也是一样,他们老早就跟罗马人友好,而且按照塔

① 《Bidrag till kannedomen om Grekerna och Romarna förbindelse med Norden》. Deutsch von J. Mestorf: 《Der Einfluss der Klass. Völker》 etc., Hamburg, 1867.³¹⁵

西佗的说法,他们在德库马特地区^①和勒威亚直到奥格斯堡自由地进行贸易,当然也把罗马人的货物和硬币从美因河上游运到萨利河和韦雷河去。再往前去,在罗马边境墙附近,在兰河河畔,也显示出有一条通往内地的通商道路的痕迹。

最重要的道路,看来始终是横贯莫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那一条。马尔赫河(或叫贝奇瓦河)和奥得河的分水岭,是必须翻越的唯一分水岭,它通过了一个辽阔的丘陵地区,海拔在 325 米以下;铁道现在也是从这个地方通过的。从下西里西亚起,展开了北日耳曼尼亚的低平原,于是就产生了一些道路,沿着不同方向通往维斯拉河和易北河。在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的时候,一定经常有罗马商人居住。在那里,我们不仅发现有玻璃瓮、香料瓶[Tränenfläschchen]和刻有拉丁文的骨灰罐(在西里西亚的特雷布尼茨附近的马塞耳及其他地方),而且还有完整的罗马人的墓穴,内有放骨灰坛的壁龛(骨灰安放处)(在格洛高附近的纳赫耳恩)。在梅克伦堡的瓦林附近,也发现了毫无疑问是罗马人的坟墓。硬币、罗马的金属制品、粘土制的灯等等文物,同样证明了贸易关系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一般地说,整个日耳曼尼亚东部,罗马的军队虽然从来没有到过,却到处散布着罗马的硬币和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上面的商标,往往也可以在罗马帝国各行省发掘出来的文物上看到。在西里西亚发现的粘土制的灯,和在达尔马威亚、维也纳等处发现的其他的灯有同样的商标。例如在两个青铜器上都有《Ti.Robilius Sitalcis》这样的戳记,而其中一个是在梅克伦堡发现的,另一个是在波希米亚发现的;这证明沿着易北河有

^① 德库马特地区(Dekumatland),拉丁文是 agri decumates,位于今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译者注

一条通商道路。

但在奥古斯都以后的头几个世纪,罗马的商船也来到了北海。在奥斯特河畔的诺伊豪斯(易北河口)所发现的、属于尼禄到马可·奥里略时代的344个罗马银币和一条大概在那里遇难的海船的残骸,都证明了这一点。沿波罗的海南岸也有一条海上航线,直通丹麦诸岛、瑞典、哥特兰岛;关于这条航线我们还要作更详细的研究。托勒密和马尔齐安(约在公元400年)所说的各个沿海地点彼此之间的距离,只能以到过那一带海岸的商人们的报告为根据。这些商人从梅克伦堡沿岸到但泽,并从这里到斯堪的亚。最后,在霍尔施坦、什列斯维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丹麦诸岛及瑞典南部发掘出来的来自罗马的许多其他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离海岸都很近,而且彼此间的距离也很小。

在罗马的这种贸易中,向日耳曼尼亚的武器输入占多大比重,很难判断。在日耳曼尼亚发现的大量武器也可能是战利品,在边境上的罗马当局当然要竭力阻止把武器输送给日耳曼人。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从海道上运去的,特别是运给较远的民族,例如运往基姆布利半岛。

通过上述各种不同道路而输入日耳曼尼亚的其他罗马商品,有家用器具、装饰品、化妆品等。家用器具之中,有青铜制的碗、尺子、杯子、容器、烹饪用具、滤器、匙子、剪子、勺子等以及个别的金银制的容器和传布很广的粘土制的灯。青铜或金银制的装饰品有:颈饰、头饰,手镯、指环和同我们的胸针相似的扣子。在化妆品中,我们发现梳子、镊子、耳挖子等,至于那些用途还有争论的物品就不谈了。这些制品,按照沃尔索的意见,大多数都是一世纪时在罗马流行的风尚的影响下产生的³¹⁷。

凯撒时代甚至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和使用这些器具的这个民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纵然可以认为使用这些东西的只是少数豪门巨富。塔西佗所说日耳曼人用以“解饿”的那种“既未细心调制(sine apparatu)也不加调味品”的“简单食物”³¹⁸,现在则为另一种食物所代替,这种食物在烹饪上已经使用相当复杂的设备,此外还有从罗马人那里弄来的各种适当的调味品。他们不再轻视金银器物,出现了以金银器物装饰自己的癖好;他们改变了漠视罗马货币的心理,出现了罗马货币流通于日耳曼尼亚全境的情况。至于说到这些化妆品,单单它们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不就说明这个民族的习俗在开始彻底改变吗,虽然这个民族我们知道过去已经发明了皂,但他们只懂得用皂来把头发染成黄色。

日耳曼人用什么东西向罗马商人换取所有这些现金和商品呢,这我们首先可以从古人的报道中得到了解,但这些古人,我们已经说过,几乎使我们一无所知。普林尼说蔬菜、鹅毛、毛织品和皂是罗马帝国从日耳曼尼亚输入的物品。但是,这种在边境上刚刚开始贸易,不能作为衡量以后时代的尺度。我们知道的主要商品是琥珀,但这也不足以说明那样普及于全国的贸易。构成日耳曼人主要财富的家畜,大概是最重要的输出品,单拿配备在国境上的军团来说,就对肉类有大量的需要。在约尔南德时代由斯堪的那维亚输往维斯拉河河口、再由这里输入罗马帝国的兽皮和绒毛商品,一定在更早的时代,就从日耳曼尼亚东部的森林中找到了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杂技团中的野兽,维贝尔格认为是罗马的航海者从北方运来的。但是除了熊、狼、也许还有野牛以外,那里什么也不能弄到,而狮子、豹、甚至熊,却可以比较近便和比较容易地从非洲和亚洲输入。是不是奴隶呢?维贝尔格最后近乎羞怯地

问道。这大概倒叫他碰对了。事实上,除开家畜以外,奴隶是为了和罗马取得贸易平衡而能够大量从日耳曼尼亚输出的唯一商品。单单意大利就在城市里和大地产上使用着大量的奴隶人口,而这些奴隶人口自身是繁殖得很少的。全部罗马大土地占有经济都靠大规模输入贩卖的战俘来维持,这些战俘是在日趋没落的共和国时代以及奥古斯都时代不断的侵略战争中流入意大利的。现在这种现象已经结束。帝国已在固定的国境线上转向防御。从中可以征集大量奴隶的战败的敌人,在罗马部队中越来越少。必须向野蛮人购买奴隶。难道日耳曼人不能以贩卖者的身分出现在市场上吗?按照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人早就在出卖奴隶了(“日耳曼尼亚志”第24章),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也像弗里西安人那样,在金钱不足时就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作为奴隶向罗马人交纳贡赋,他们在三世纪的时候,甚至更早就已经在波罗的海上航行,并且他们在北海上所进行的远征,从三世纪萨克森人的航行开始到十世纪诺曼人的航行为止,除开进行其他的海盗活动以外,其最直接的目的主要是猎取奴隶,而且猎取奴隶差不多专门是为了贩卖。就是这些日耳曼人,在几世纪之后,不论在民族大迁徙时期或者在他们对斯拉夫人作战时期,不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奴隶掠夺者和奴隶贩卖者吗?除非我们认为二世纪和三世纪的日耳曼人全然不同于罗马人的其他一切邻人,全然不同于三、四、五世纪日耳曼人的后代,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们也大规模地参加了向意大利贩卖奴隶的贸易,而这种奴隶贸易,当时被认为是体面的事业,甚至是光荣的事业。这样,那遮掩着当时日耳曼尼亚出口贸易的神秘面纱就脱落下来了。

我们在这里应该回头来谈谈当时波罗的海上的贸易。在卡特

加特海峡沿岸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罗马文物，但在波罗的海南岸直至里夫兰内地，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丹麦诸岛的南岸及内部地区，在瑞典的南岸和东南岸，在厄兰岛和哥特兰岛，罗马文物却有很多。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属于所谓迪纳里时期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到下面再谈。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统治的初期，也就是说延续到公元 200 年前后。塔西佗已经谈到苏伊翁人，说他们因有桨划船的舰队而强大起来，他们都敬重财富。可见他们大概早就从事海上贸易了。当他们的航海事业首先在波罗的海、厄勒海峡、厄兰海峡以及近海处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就一定要冒险到大海上去，企图把博恩霍尔姆岛和哥特兰岛纳入他们的活动圈内。他们在船只的操纵上一定很有把握，所以能够发展繁盛的贸易，而贸易的中心正是在离大陆最远的哥特兰岛。事实上，到 1873 年为止^①，在这里已找到了 3200 多个罗马迪纳里银币，而在厄兰岛发现的约有 100，在瑞典大陆不到 50，在博恩霍尔姆岛 200，在丹麦和什列斯维希 600（其中 428 个是在西兰岛的斯拉耶耳塞一次发掘中出土的）。对这些遗物的研究表明，在公元 161 年，即马可·奥里略即位的那一年以前，流入哥特兰岛的罗马迪纳里银币是很少的，但从这一年起直到该世纪末，迪纳里银币却大量流入该岛。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波罗的海的航海事业一定已经很发达了。至于航海事业以前早就出现这一事实，已为托勒密的记载所证明，根据这个记载，从维斯拉河口到斯堪的亚的距离是 1200—1600 斯达第（30—40 地

① 汉斯·希尔德布兰德“瑞典的异教时代”，德译者梅斯托尔夫，1873 年汉堡版（Hans Hildebrand. 《Das heidnische Zeitalter in Schweden》. Deutsch von Mestorf. Hamburg, 1873）。

理哩)^①。这两个距离,就布累金格的东端和厄兰岛或哥特兰岛的南端来说,大致都是不错的,要看是从里克斯赫夫特角量起,还是从纽法尔瓦塞尔或皮耳劳量起。这两个距离,完全跟其他关于沿德意志海岸到维斯拉河口的距离的说法一样,都只能以海员的报道为根据。

在波罗的海上从事这种航行的不是罗马人,其证明有二:第一,所有罗马人关于斯堪的那维亚的概念都很模糊;第二,在卡特加特海峡和挪威没有找到过一个罗马钱币。罗马人在奥古斯都时代到过基姆布利海角(斯卡晏),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片无际的海洋,这个地方大概始终是他们直接进行海上贸易的终点。由此可见,当时日耳曼人自己航行于波罗的海,进行贸易,并往斯堪的那维亚运送罗马的货币和罗马的工艺品。而且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从三世纪的下半叶起,萨克森人突然从海上袭击高卢和不列颠海岸,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信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这必须要长期熟悉大海上的航行。而这一点,萨克森人(这个名词,我们在这里是指基姆布利半岛上的一切民族说的,也就是说还指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朱特人)只能在波罗的海上得到。这是一个没有潮水涨落的大内海,西南大西洋上的风暴在北海大为减弱之后方才来到这里,这是一个伸展得很长的有许多岛屿、海湾和海峡的海域,从这一岸航行到那一岸,至多只在很短的时间内看不到陆地,这真像是一个为演习新发展起来的航海术而创造出来的海。属于青铜时代的画着许多桨划船的瑞典岩画,证明这里存在过古代航海事业。这里,在什列斯维希的尼达姆沼地,发掘出一只

^① 大约 220—290 公里。——编者注

长 70 英尺,宽 8 到 9 英尺的柞木船,该船建造于三世纪初,完全适合于大海航行。在这里,在默默无声中形成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使萨克森人和诺曼人有可能日后在大海中实行远征,而且由于这个缘故,日耳曼人直到现在还站在世界一切航海民族的前列。

直到二世纪末,流入日耳曼尼亚的罗马硬币,主要是银迪纳里(一个迪纳里= 1.06 马克)。而且日耳曼人,正像塔西佗告诉我们的,喜欢他们早就熟悉的边缘为锯齿形并铸有双驾马车花纹的旧硬币。确实,在古代硬币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 *serrati bigatique*^① 硬币。这种古币含铜量只有 5%—10%。图拉真已经下令把 20% 的铜掺到银币里去;日耳曼人那时大概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当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从 198 年起将掺入物提高到 50%—60% 的时候,就引起了日耳曼人的愤恨。在文物中,这种后期的劣质迪纳里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能看到,罗马货币的输入当时是中止了。只有在君士坦丁于 312 年规定以金索里达(72 个索里达等于一罗马镑纯金,即 327 克纯金,也就是说,一个索里达= 4.55 克纯金= 12.70 马克)为货币单位以后,货币才又开始输入,从这时起流入日耳曼尼亚的,更多是流入厄兰岛尤其是哥特兰岛的,主要是金币——索里达。这一罗马货币输入的第二个时期,即索里达时期,就西罗马硬币来说,一直继续到西罗马帝国的末日,就拜占庭硬币来说,一直继续到阿纳斯塔西乌斯(死于 518 年)时代。这些文物大部分是在瑞典、丹麦诸岛发现的,有些是在德国波罗的海海岸上发现的;在德国内地发现的很少。

但是,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及其后继者的铸造伪币,还不

① 锯齿形的、有双驾马车花纹的。——译者注

能说明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贸易为什么突然中断。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原因之一显然是政治关系。从三世纪初,日耳曼人对罗马人开始了进攻性的战争,在250年前后,战火烧遍了多瑙河口直到莱茵河三角洲一带。在交战国之间,当然不会有正常的贸易。但是,这种突然发生的全面的持久的进攻性战争本身,需要加以说明。在罗马的内部关系中,找不到这种说明;恰恰相反,帝国到处都进行着成功的抵抗,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在各个极端混乱时期之间,还产生过几个强有力的帝王。可见,日耳曼人的进攻是由他们自己内部发生的变化引起的。在这里,能对此事加以说明的还是出土的文物。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什列斯维希的两处泥炭沼泽上发掘出了一些极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由哥本哈根的恩格耳哈尔特作过详细的研究,并且经过许多波折之后,现在存放在基尔博物馆。这些文物和其他同类文物不同的地方是,其中的硬币可以相当确切地确定这些文物的年代。在聚德布腊卢普附近的塔施堡(丹麦语——Thorsbjerg)沼地出土的一批文物中,有37枚从尼禄到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时期的硬币。在尼达姆沼地(这是一个淤塞的变成了泥炭沼泽的海湾)出土的另一批文物中,有34枚从提比利乌斯到马克里努斯(218年)时期的硬币。可见这些文物毫无疑问是公元220年到250年期间的东西。但是在这些文物中,不仅有罗马出产的东西,而且还有许多本地制造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含有铁质的泥炭水中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们令人惊奇地向我们说明了北日耳曼尼亚在三世纪上半叶时的金属工业、织布业和造船业的情况,而文物上的鲁恩文字,也说明了当时使用文字的情形。

这里更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工业水平本身。精致的纺织物、美丽的平底鞋和制作精巧的套具，都说明这是一个比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高得很多的文化阶段；而尤其使我们惊讶不止的，是本地的金属制品。

日耳曼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属的知识，这已为比较语言学所证明。他们也许还有过金属开采和金属加工的知识，但是当他和罗马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未必还保有这种知识。至少在公元一世纪的著作家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在莱茵河与易北河间有开采和加工铁或青铜的说明；他们倒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不错，塔西佗谈到过哥汀人（在上西里西亚？）的采铁，而托勒密也说到他们的邻人魁代人的制造铁器，但这两种人可以从多瑙河沿岸学到冶铁术。由硬币证明是属于一世纪的文物中，也没有任何本地制作的金属品，而只有罗马的金属品；如果日耳曼尼亚有自己的金属加工业，那末大量的罗马金属商品怎么还会运到那里去呢？诚然，在德意志也找到过古代的铸型、未完工的青铜铸件和青铜铸件废品，但都没有同时发现可以证明其年代的硬币；大概这都是前日耳曼人时代的遗痕，是流浪的伊特刺斯坎人青铜铸工活动的残迹。不过，提出关于移来的日耳曼人是否完全忘掉了金属加工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全部事实都说明，日耳曼人在一世纪的确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从事金属加工。

但是，塔施堡沼地出土的文物突然在这里出现，并向我们表明，本地的金属工业有出乎意料的高度水平。钮扣、饰有兽头和人头的装饰用的金属片、除眼鼻嘴以外把全部面孔掩盖起来的银盔、用金属丝编的锁子甲（这需要付出极端艰苦的劳动，因为金属丝一定要预先经过锤打，拔制金属丝是到1306年才发明的）和一个金

发箍,至于其他一些不知是否是本地所造的物品,就不在这里列举了。和这些物品相似的,还有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芬宁岛沼地出土的以及也是六十年代初在波希米亚(在哥尔若维策)出土的物品,如饰有人头的豪华的青铜盘、钮扣和带扣等。这些物品同塔施堡的完全属于一个类型,因此也必定同属于一个时代。

从三世纪开始,日益进步的金属工业一定普及到了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们说,到了五世纪末,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单是铁和青铜,就连金银也经常加工制作了,仿照罗马钱币铸造了装饰用的金片,并对非贵金属镀金;还出现了镶饰,珐琅和细丝工;在形状往往很笨拙的整个物件上,可以找到有高度艺术性的、饶有风趣的、只是部分模仿罗马人的装饰——这一般主要是指都有一定特殊外形的钮扣、带扣和胸针说的。在英国博物馆里,来自阿速夫海滨刻赤的钮扣和在英国发现的完全一样的钮扣同时陈列着;它们可能是同一个作坊的出品。这些制品的风格,虽然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但从瑞典到多瑙河下游,从黑海到法国和英国,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日耳曼人金属工业的第一期,在大陆上,随着民族大迁徙的告终和普遍地信奉基督教而逐渐结束;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还维持得稍久一些。

这种工业在六七世纪时在日耳曼人中间传播得多么广泛,并在多大的程度上已作为单独的工业部门分离出来,可由“民族法”来作证。铁匠、刀剑铸造匠、金银匠常被提到,在“阿勒曼尼法”中甚至还说到经过公家审查(*publice probati*)过的工匠。“巴伐利亚法”对于在教堂、公爵庄园、铁匠铺和磨坊的盗窃行为课以更多的罚金,“因为这四种建筑物是公用的房子,而且是经常开门的”。按照“弗里西安法”,杀害金匠的杀人罚金要比杀害同一等级的其

他人多四分之一。“萨利克法”规定普通奴隶的价格是 12 索里达，而铁匠奴隶 (faber) 的价格则为 35 索里达。

关于**造船业**，我们已经谈过了。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船是桨划船：大的是柁木船，要十四对人划桨，小的是用松木做的。桨、舵和水斗还都放在船里。只有在日耳曼人也开始在北海航行以后，他们似乎才从罗马人和凯尔特人那里学会了怎样使用船帆。

制陶业他们在塔西佗时代就已经有了，但还只有手工制陶业。在边界上，即在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边境墙以内，罗马人有大规模的制陶作坊，烧在陶器上的工人名字，证明在这种作坊里面工作的也有日耳曼人。关于陶工旋盘和釉的知识以及更高级的技能，必定通过他们而传入到日耳曼尼亚。横渡多瑙河而入侵的日耳曼人，也知道了玻璃制造法；在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常常发现玻璃器皿、彩色的玻璃珠和金属制品上的玻璃镶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日耳曼尼亚制造的。

最后我们看到，鲁恩文字已经得到普遍的传播和采用。在塔施堡出土的文物中，有刻着鲁恩文字的一个刀鞘和一个盾牌的带扣。这种鲁恩文字，我们在瓦拉几亚发现的一个金戒指上，在巴伐利亚和勃艮第出土的扣子上，以及在斯堪的那维亚最古的鲁恩文字石上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比较完善的鲁恩文字母，日后便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鲁恩文字；它比后来在斯堪的那维亚占支配地位的北方鲁恩文字多七个字母，它也表明这是比流传到现代的、最古老的北方语言形式更早的一种语言形式。而且这是一种极端笨拙的文字体系，渊源于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但是为了便于刻在石头上金属上特别是木杆上，这些字母已经作了改变。圆形的字母被有角的字母所代替；只能上下写或斜写，不能横写，这都是为了

适应树木的纤维。正因为这样，在羊皮纸或普通纸上写这种有角文字，是极不方便的。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文字实在只适用于宗教、巫术和题词方面，也许还适用于其他简短报道；只要产生了真正书籍文字的需求（像在哥特人中和以后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样），这样的文字就被抛弃，重新采用希腊字母或罗马字母，而只保留个别鲁恩字母。

最后，日耳曼人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里，在耕作和畜牧上一定也有显著的进步。转向定居生活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不然，人口就不可能激增，以致在民族大迁徙时期造成人口过剩。原始森林中的许多地段一定已经开垦了出来，从这里大概就产生了处在当时日耳曼人境内的大部分“熟荒地”（即带有古代耕地痕迹的森林地段）。关于这方面的特别证据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如果普罗布斯约在三世纪末喜欢为他的骑兵挑选日耳曼人的马，如果在不列颠的萨克森地区排挤掉克尔特人的小黑牛的大白牛，像现在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去的，那末，这就证明在日耳曼人的畜牧和耕作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革命。

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日耳曼人从凯撒到塔西佗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佗到民族大迁徙（公元 400 年左右）以前，他们的进步更要快得多。商业传播到了他们那里，并为他们运来了罗马的工业品，因而至少也带来了一部分罗马人的需求；商业唤起了本地的工业，这固然仿效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它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什列斯维希沼地出土的文物，代表这种工业的可以确定其年代的第一阶段；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文物，代表有了更高发展程度的第二阶段。这里有一个特点是，西部各部落显然落后

于内地各部落,尤其落后于波罗的海沿岸各部落。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更晚的萨克森人提供的金属品,质量都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从内地迁来的各部落——黑海沿岸及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法兰西的勃艮第人。从多瑙河中游沿易北河奥得河前进的那条旧商道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是不容否认的。同时,海岸居民逐渐变成了巧妙的造船家和勇敢的水手;人口数目到处都在急剧增加;被罗马人局限起来的领土再也不够了。首先从遥远的东部发生了寻求土地的各部落的新的迁徙;最后,蜂拥的人群从四面八方,从陆地和海上不可遏止地奔向新的地区。

注释:各日耳曼部落

罗马军队只沿着几条远征的路线进入过大日耳曼尼亚腹地,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也仅仅达到易北河;在塔西佗时代以前,商人和其他旅行家到这里来的也很少,并且都没有深入内地。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报道这样贫乏和这样矛盾,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惊奇的,倒是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可靠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那两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只有在完全证实以后才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这两个人都是死啃书本的学者,现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并且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方法来说也是这些材料的批判的评论者。他们对这个地方缺乏亲历的阅历。斯特拉本认为,罗马人这样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莱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与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当诚实地承认,易北河彼岸的地区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依靠那种使人经常想起本世纪初的朴素的唯理论,来解决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问;而

很有学问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却企图把他史料中的上述各个日耳曼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图上精密计算出来的、确定不移的经纬线网中的方格里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著作对当时来说是如何辉煌，但他的关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毕竟是错误的³¹⁹。第一，他所利用的资料大半都是不确切的，矛盾的，往往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他的地图画得不对，河流和山脉大半完全画错了。他真像一个从未出门的柏林地理学家，在 1820 年前后，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非洲地图上的空白填补起来，于是就调和了从阿非利加的利奥以来的一切史料，替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指出确定的走向，替每一个民族指出确切的居处。这种要做不可能做的事的企图，一定会加深他所利用的材料的错误。所以，托勒密把许多民族都弄重复了；易北河下游有拉科巴德人，莱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中游又有伦巴德人；他知道两个波希米亚，一个住着马可曼尼人，另一个住着拜诺卡姆人等等。塔西佗明确地说，日耳曼尼亚没有城市，但不到 50 年，托勒密却已经举出了 96 处带有名称的地点。其中有许多名称，也许是正确的地名；托勒密像是从商人那里搜集了许多资料，这些商人很多当时已经到过日耳曼尼亚东部，而且熟悉了他们到过的那些地方的逐渐固定下来的名称。虚构的城市锡阿土坦德这个例子，说明其他一些名称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城市，我们的地理学家大概是在污损的手稿上从塔西佗的《ad sua tutanda》（“为了保存它”）这句话中推敲出来的。同时，也有一些异常精确和具有头等历史价值的报道。例如，托勒密是古人中正确指出伦巴德人（诚然用了拉科巴德人这个错误名称）居住地方的唯一人物，那里巴德高和巴德维克这两个地名，今天还可以作为他们的证明。他同样正确指出印格里南人居住在恩格尔斯高，那里在莱茵河畔诺依维特附近，今天

还有名叫恩格尔斯的地方。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出过立陶宛的加林德人和苏迪特人的名称,这些人今天还继续居住在东普鲁士的格律德和苏道这两个地区。不过,这些例子只证明他的学问渊博,并不证明他其余的材料都是正确的。原文中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最重要的关于名称的地方,字迹污损得非常厉害。

最直接的史料仍然是罗马人,特别是那些亲身到过日耳曼尼亚的罗马人。韦莱曾以士兵的身分到过日耳曼尼亚,而且也是以士兵的身分来写作的,他写作的神气,好像是一个 *grande armée* [大军]的军官在描写 1812 年和 1813 年的出征。他的叙述甚至不能使人确定发生战事的地点。这在一个没有城市的地区是并不奇怪的。普林尼以骑兵军官的资格,也曾经在日耳曼尼亚服役,而且访问过乔克人居住的海岸;他把同日耳曼人进行的全部战争写成了 20 卷书;塔西佗便是从这里汲取资料的。并且,普林尼又是不但在政治、军事观点上,而且在理论观点上,对于在一个野蛮地区里所进行的战争发生兴趣的第一个罗马人。^①因此,这位罗马的科学百科全书家根据亲身观察写出来的关于日耳曼部落的报道,具有特别的价值。依据传统的说法,塔西佗到过日耳曼尼亚,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证据。不管怎样,他当时只能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搜集直接材料。

为了使[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托勒密关于各民族的分类彼此协调,并且使它们同其他混乱的古代史料也能协调,曾经有两本古典著作在这方面作了徒然的努力,这便是卡斯巴尔·措伊斯的“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和雅科布·格林的“德意志语言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编者注

史”320。这两位天才的学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没有做到的事情，应当说，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料也是无法解决的。资料的不足，从这两位学者不得不建立一些虚假的辅助性的理论这一事实中看出来；措伊斯以为一切争论问题的最后结论应该从托勒密的著作中去寻找，虽然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尖锐地指明了托勒密的根本错误；格林以为推翻罗马世界帝国的那种力量，应该是在比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拉河之间这一块地方更为广阔的地区成长起来的，因此多瑙河下游的北部及东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应该和哥特人及达克人的土地一起，同样看做是日耳曼人的。不论是措伊斯的或者是格林的假设，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我们打算至少把问题搞得清楚一些，因此我们把任务加以限制。如果我们能够把各民族整个地划分为几个基本部落，那就可以为进一步详细研究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里，普林尼的著作片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的稳固性，在研究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这比任何其他的说法所碰到的困难要小些，使我们所牵涉到的矛盾要少些。

但是，当我们从普林尼的体系出发时，必须拒绝无条件地利用塔西佗的三位一体说，否认关于曼奴斯的三个儿子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的古代神话。第一，塔西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他丝毫没有想把他列举出来的各个民族纳入这三个基本部落。第二，以后也没有一个人做成这件工作。措伊斯拚命要把他认为是“易斯泰伏南人”的哥特民族塞到那个三位一体说中去，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从来没有打算把斯堪的那维亚人包括在这里面，他把他们构成为第四个基本部落。但是这样一来，三位一体说就垮台了，正像普林尼的五个基

本部落使它垮台一样。

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五个部落吧。

一、Vindili, quorum pars Burgundiones, Varini, Carini, Guttones (温底尔人,其中包括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古顿人)。

这里有三个民族: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自己。关于他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他们说的都是哥特方言;第二,他们当时都住在日耳曼尼亚的极东部分:哥特人住在维斯拉河河口和河口彼岸;勃艮第人,按照托勒密的说法,住在瓦尔塔河流域直至维斯拉河一带;汪达尔人,据狄奥·卡西乌斯(他用汪达尔人的名字来称呼理森山)说,住在西里西亚。如果按照语言来划分部落,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把格林认为其方言属于哥特方言的一切民族,都列入这个哥特人的基本部落中去,这首先包括普罗科皮阿斯认为(正像他对汪达尔人那样)说哥特语的地方³²¹。他们以前的居住地点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海鲁莱人的住处,格林是把这些海鲁莱人同斯基尔人和鲁吉人一道算作哥特人的。普林尼提到过维斯拉河畔的斯基尔人,塔西佗提到过和哥特人一起住在海滨的鲁吉人。这样看来,哥特方言在汪达尔山(理森山)、奥得河和波罗的海之间,直到维斯拉河及维斯拉河彼岸,占据了一块相当完整的地区。

喀林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瓦伦人也引起了一些困难。塔西佗把他们和盎格鲁人一起列入供奉纳塔斯神的七个民族之中;措伊斯已经正确地指出,他们具有印格伏南人所特有的面貌。托勒密却把盎格鲁人列为苏维汇人,这显然是错误的。措伊斯则把这同一位地理学者所写错的一两个名称,认做是瓦伦人,因而

将他们安置在哈斐尔兰德，并将他们划为苏维汇人。古代“民族法”的记载，简直把瓦伦人和绍林吉亚人混同了，但法律本身对瓦伦人或盎格鲁人都是一样的。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来看，瓦伦人应该算是哥特部落还是印格伏南部落，还是一个疑问；不过他们已经完全消失，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二、*Altera pars Ingaevones, quorum pars Cimbri, Teutoni ac Chaucorum gentes* (另一部分是印格伏南人，其中包括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

普林尼在这里首先指出，基姆布利半岛及易北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沿海地带是印格伏南人的居住地。在上面举出的三种人当中，乔克人毫无疑问是弗里西安人最亲近的同族。弗里西安语今天还在北海沿岸、荷兰的西弗里斯兰、奥登堡的扎特兰德和什列斯维希的北弗里斯兰占着支配的地位。在卡罗林王朝时代，从辛克法耳海湾（这个海湾现在还是比利时的弗兰德和荷兰的西兰省的分界线）到济耳特岛和什列斯维希的维道的全部沿海地区，也许在更北面的一大片土地上，差不多说的都是弗里西安语；只有在易北河河口两边直到海岸，才说萨克森语。

普林尼说的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显然是指当时基姆布利半岛的居民，可见他们都是属于乔克—弗里西安语族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措伊斯和格林一起，把北弗里西安人看做是古代半岛上的日耳曼人的直系子孙。

诚然，达尔曼（“丹麦史”）³²²曾经断言，北弗里西安人是直到五世纪时才从西南方面迁移到半岛上来的。但是他没有替他的论断提出任何证据，而他的论断在以后的全部研究中完全没有为人注意，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可以根据有古代文物留传到现代和仍然存在的那些方言,来称呼整个语族;在这个意义上,印格伏南语首先和弗里西安语具有相同的含义。不过,印格伏南部落的范围是否就以此为限呢?格林把他不完全确切地称为低地日耳曼人的那些人,即除弗里西安人以外也包括萨克森人都归入印格伏南部落,这是否正确呢?

我们一开头就承认,普林尼把凯鲁斯奇人算做赫米诺南人,这就对萨克森人作了完全不正确的分类。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把萨克森人也算做印格伏南人,从而把这个基本部落看做是弗里西安—萨克森部落。

这里应当谈一谈盎格鲁人。塔西佗假定地把他们算做苏维汇人,托勒密则肯定地把他们列为苏维汇人。托勒密把他们安置在易北河右岸,伦巴德人的对面;如果这个意见一般还有若干正确成分的话,那也只能是指易北河下游的真正的伦巴德人。照这样说,盎格鲁人从劳恩堡大概到了普里格尼茨。后来我们就在半岛上发现了他们,那里保存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从那里,和萨克森人一同迁往不列颠去的。他们的语言是现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组成部分,而且肯定是这种新形成的语言中的**弗里西安语**的那一部分。不管停留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的或者僻居远处的盎格鲁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单单这个事实就迫使我们把盎格鲁人算做印格伏南人,并且要把他们列入其中弗里西安人那一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大部分是弗里西安语式的而不是萨克森语式的)整个元音发音法的形成,盎格鲁撒克逊语以后的发展在许多场合同弗里西安方言发展的惊人类似,这都应归功于这些弗里西安人。在大陆上的各种方言中,弗里西安语现在和英语最接近。例如,英语中喉音向啞音的转变,不是渊源于法语,而是渊源于弗里西安语。英语用 $ch = \check{c}$

代替 k, 英语在软元音前用 dz 代替 g, 这可能渊源于弗里西安语的用 tz, tj 代替 k, 用 dz 代替 g, 而决不可能渊源于法语的 ch 和 g。

我们应该把朱特人和盎格鲁人一同归入弗里西安—印格伏南部落, 不管他们是否在普林尼或塔西佗时代已经住在半岛上, 或者是以后才迁移到这里来的。格林在塔西佗时代信奉纳塔斯神的一个民族——欧多兹人的名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称; 如果盎格鲁人属于印格伏南部落, 那就很难把这一集团中的另一些民族划入其他部落。这样看来, 印格伏南人可能已经伸展到奥得河口, 他们和各哥特民族之间的空地也许已经住满了人。

三、Proximi autem Rheno Iscaevones (alias Istaevones), quorum pars Sicambri (紧靠莱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或称易斯泰伏南人), 其中包括西干布尔人)。

格林和他以后的其他人, 例如瓦茨³²³, 都已经多多少少把易斯卡伏南人和法兰克人混同了起来。语言把格林引入了迷途。在九世纪中叶以后, 法兰克国家的一切德意志语文献, 都是用一种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没有什么不同的方言写成的; 因此格林就认为, 古代法兰克方言在外国已经死亡, 而在本国又被高地德意志语所代替, 所以他终于把法兰克人列入了高地日耳曼部落。

对保存下来的语言遗物进行了研究以后, 格林自己也承认: 古代法兰克方言具有独立方言的意义, 它在萨克森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暂时说到这里就够了; 法兰克方言的发展条件还非常不清楚, 对于它的比较详细的研究, 必须留待另一次专门的注释^①。

① 见本卷第 564—598 页。——译者注

我们应该把木杆人和益格官人一同归入弗至西人——印格伏南部落,不管他们是否在普林尼或塔西佗时代已经住在半岛上,或者是以后才迁移到这里来的。格林在塔西佗时代信奉纳塔斯神的一个民族——欧多兹人的名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称;如果盎格鲁人属于印格伏南部落,那就很难把这一集团中的另一些民族划入其他部落。这样看来,印格伏南人可能已经伸展到奥得河口,他们和西哥特民族之间的空地也许已经住满了人。

三、Proximi autem Rheno Iscaevones (alias Istaevones), quorum pars Sicambri (紧靠莱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或称易斯泰伏南人),其中包括西干布尔人)。

格林和他以后的其他人,例如瓦茨³²³,都已经多多少少把易斯卡伏南人和法兰克人混同了起来。语言把格林引入了迷途。在九世纪中叶以后,法兰克国家的一切德意志语文献,都是用一种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没有什么不同的方言写成的;因此格林就认为,古代法兰克方言在外国已经死亡,而在本国又被高地德意志语所代替,所以他终于把法兰克人列入了高地日耳曼部落。

对保存下来的语言遗物进行了研究以后,格林自己也承认:古代法兰克方言具有独立方言的意义,它在萨克森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暂时说到这里就够了;法兰克方言的发展条件还非常不清楚,对于它的比较详细的研究,必须留待另一次专门的注释^①。

① 见本卷第 564—598 页。——译者注



日耳曼人移住图

无论如何,归易斯卡伏南部落所有的领土,对一个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来说,尤其对一个在历史上起过那样重大作用的基本部落来说,显得太小了。这块领土,从莱茵高起,沿莱茵河伸展到迪耳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直至内部地区,在北部弗里西安人和乔克人把它同海隔开,在莱茵河河口还住着其他部落(主要是卡滕人部落)的遗民:巴达维人、哈图阿里人等。属于法兰克人的,还有居住在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人,也许还有特里包克人、梵乡人、涅麦特人。这块领土面积所以这样小,是因为克尔特人及凯撒时代以来的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对易斯卡伏南人的发展进行了抵抗,同时在他们后面又住上了凯鲁斯奇人,而在侧面,则像凯撒所证明的那样,苏维汇人特别是卡滕人越来越排挤他们。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地面上,当时拥挤着按日耳曼人的情况来说是很稠密的人口,这可由不断向莱茵河对岸的推进来证明:起初是通过大批征服者,以后像乌比人那样用自动向罗马领土移住的办法。由于同样的原因,罗马人老早就能够轻易地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把印格伏南部落的一大部分迁移到罗马领土上去。

在关于法兰克方言的注释中所进行的研究,将会证明,法兰克人是一个分裂为许多不同部落的日耳曼人的特殊集团,他们用一种分裂为许多土话的特殊方言讲话,总之,他们拥有一个日耳曼人基本部落的一切特征,这正是为了说明他们和易斯卡伏南人是同一类人所需要的。有关属于这个基本部落的各民族的情况,雅科布·格林把必要的话都已经说了。除去西干布尔人以外,他还把乌比人、哈马维人、布鲁克泰人、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都包括在这个基本部落里面,这些人也就是住在我们前面称之为易斯卡伏南人地区的莱茵河右岸的各民族。

四、Mediterranei Hermiones, quorum Suevi, Hermunduri, Chatti, Cherusci (在内地居住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

雅科布·格林已经认为赫米诺南人(他采用了塔西佗的比较正确的写法)就是高地日耳曼人。苏维汇人的名称,按凯撒的说法是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高地日耳曼人在内的,现在他们开始分化。绍林吉亚人(赫蒙杜利人)和黑森人(卡滕人)成了独立的民族。其他的苏维汇人还没有分离出去。我们甚至把最近几百年来已经消失的许多神秘名称,看做不可理解的东西而撇开不谈,那末这些苏维汇人还是应该包括下面三个以后出现在历史上的讲高地德意志语的大部落:阿勒曼尼—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和伦巴德人。伦巴德人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的巴德高附近,他们离开了其他同部落的人,插在印格伏南人各民族中间;他们这种经过长期斗争才能保持下来的孤立地位,塔西佗作了出色的描述,但他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们从措伊斯和格林时代以来,同样也知道巴伐利亚人以马可曼尼人的名称居住在波希米亚,而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则住在他们现今居住的地方和南面邻接的地区。但是在法兰克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以南,就是罗马的领土,因此除去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今日的勃兰登堡军管区与萨克森王国的这一片土地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地方留给士瓦本—阿勒曼尼人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种苏维汇民族——色姆诺南人。士瓦本—阿勒曼尼人和这些色姆诺南人可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西北和印格伏南人为邻,在东北和东面同各哥特部落接界。

到此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普林尼却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做赫米诺南人,他在这里肯定犯了错误。凯撒已经把凯

鲁斯奇人和苏维汇人明确地区别了开来，他还把卡滕人也算做苏维汇人。塔西佗也不知道凯鲁斯奇人和任何高地日耳曼部落之间有任何共同性。甚至把苏维汇人的名称扩大到盎格鲁人的身上的托勒密，同样什么都不知道。在南面的卡滕人与赫蒙杜利人和东北面的伦巴德人之间住满了凯鲁斯奇人，但仅仅根据这一事实，还远远不够做出结论，说他们之间有较近的部落亲属关系；虽然，也许正是这一事实，在这里把普林尼引入迷途。

就我所知，在值得重视其意见的研究者中，没有一个人把凯鲁斯奇人算做高地日耳曼人。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把他们归入印格伏南人还是归入易斯卡伏南人？传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名称，都带有法兰克语的特征：日后用 h 的地方用 ch，例如 Cherusci, Chariomerus，用 i 的地方用 e，例如 Segestes, Segimerus, Segimundus。但是，罗马人从莱茵河方面接受的几乎全部的日耳曼人名称，看来都以法兰克语的形式从法兰克人那里得来的。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在七世纪时法兰克人还发 ch 音的这个第一辅音音变的喉音送气音，是否一世纪时在所有西部的日耳曼人中间都按 ch 发音，而只在以后才软化为大家所共有的 h 音。此外，我们也找不到凯鲁斯奇人同易斯卡伏南人之间有任何部落亲属关系，找不到西干布尔人收容从凯撒那里逃走的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的残余部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属关系。在瓦鲁斯时代被罗马人占领的并被他们看做是一个行省的莱茵河右岸的领土，也是同易斯卡伏南人一法兰克人的领土吻合的。这里有阿利佐和罗马的其他堡垒；在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看来顶多也只有奥斯宁格与威悉河间的一片土地实际上被罗马人所占领；这块罗马领土的那一面，住着卡滕人、凯鲁斯奇人、乔克人、弗里西安人，这是些胁从的不大可

靠的同盟者,但是在他们的内部事务上却是自主的,而且摆脱了罗马人长期占领的情况。罗马人在这个地区遭到强有力的抵抗时,总是暂时地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停止在部落的边界上。凯撒在高卢就是这样做的;他停留在比利时人的边界上,只是当他相信所谓凯尔特人的高卢真正可靠以后,才跨过了这条边境线。

因此,只能依据雅·格林和一般人的观点,把凯鲁斯奇人和跟他们有最近亲属关系的一些小的邻居民族都划归萨克森部落,从而划归印格伏南人。正是在古代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古代萨克森语复数所有格和阳性弱变化中的 a,被最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和流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 o 形成了对照,这个事实也对上述观点作了说明。这样一来,一切困难都消失了;印格伏南部落也和其他部落一样,有一块相当完整的领土,只是赫米诺南部落的伦巴德人,稍微向这块领土突进了一点。这一部落的两大支派之中,弗里西安—盎格鲁—朱特人这一支派,占了沿海一带,并且至少占了半岛的北部和西部,而萨克森人这一支派,则占据了内部地区,可能当时也已经占据了北耳宾吉亚的一部分,而在此后不久托勒密在那里第一次提到了 Saxones (萨克森人)。

五、Quinta pars Peucini, Basternae contermini Dacis (第五部分是和达克人为邻的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

我们对这两个民族所有的一点点知识以及巴斯泰尔人这一名称形式本身,都说明他们是哥特人的同族人。普林尼所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特殊部落,大概是由于他是通过希腊人从多瑙河下游得到有关他们的资料的,而他对居住在奥得河和维斯拉河的各哥特民族的知识,则是在莱茵河和北海沿岸取得的;因此他就忽略了哥特人和巴斯泰尔人之间的联系。巴斯泰尔人和佩夫金人,都是

还在长时间内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口过着游牧生活的日耳曼人，他们为以后的大哥特王国作了准备工作，而他们也就在这个王国里面消失了。

六、希列维昂人。普林尼把日耳曼人中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都列在这个总名称的下面。我现在举出他们，只是为了顺序的关系，也为了再度说明：古代的所有著作家都只把群岛（其中也包括瑞典和挪威）划归这个基本部落，而把他们和基姆布利半岛分离开来。

这样，我们就有了操五种基本方言的五个基本日耳曼部落。

哥特部落住在东部和东北部。这一部落的阳性及中性复数所有格都有 e，阴性都有 ö 和 e；弱变化阳性都有 a。现在时（陈述式）变位的词尾变化形式，在辅音音变上，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特别是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仍然有紧密的联系。

印格伏南部部落住在西北部。这一部落的复数所有格都有 a，弱变化阳性也有 a；在现在时陈述式中，所有三种人称的复数，都有完全失去了鼻音的 d 或 dh。这个部落分为两个主要支派，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但在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里面，他们又合而为一。在弗里西安人这一支派里面，又加上了

斯堪的那维亚部落；他们的全部名词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情形是：复数所有格是 a，弱变化阳性是 i，这是从 a 软化而来的。在现在时陈述式中，单数第二人称最初的 s 变为 r，复数第一人称保留 m，第二人称保留 dh，其他的人称也有或大或小的变化。

和以上三个部落相对立的是两个南方的部落：易斯卡伏南部部落和赫米诺南部部落，在以后的术语中，称他们为法兰克部落与高地日耳曼部落。这两个部落所共同的，是弱变化阳性是 o；极可能复数所有格也是 ö，虽然这在法兰克语中不能得到证实，但从最古的

西方(萨利克人的)纪念碑上可以看出,复数的直接目的格是以 as 结尾的。根据我们对法兰克方言的了解,两种方言在现在时变化中是互相接近的,它们在这方面并且和哥特语一样,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整部语言史(从最古的法兰克方言极显著的和古老的特点起,直到这两种方言的现代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别止)都不允许我们将这两种方言合而为一;这正如这两个民族本身的全部历史,不许可我们把这两个部落合并为一个基本部落一样。

我在上述整个研究中,只注意到语形变化形式而没有注意到声音的相互关系,这是由于在一世纪和我们最古的语言资料编成的时代之间,声音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德意志,我只须提一提第二辅音音变就够了;在斯堪的那维亚,古代歌谣的同音法表明,从编成歌谣到用文字写下歌谣这一段时期里,语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做的工作,德国的语言学家们将来大概都会做到的;在这里,它只会毫无必要地使这个研究复杂化。

弗·恩格斯写于 1881—1882 年

原文是德文

德文是按手稿刊印的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

版

第 19 卷译出

弗·恩格斯 法兰克时代³²⁴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 土地关系的变革

马尔克制度,直到中世纪末,依然是日耳曼民族几乎全部生活的基础。这种制度在存在了一千五百年之后,终于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逐渐没落下去了。它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它再也不能继续适应经济上的进步。我们将在下面探讨它的衰败以及最终的灭亡。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的残余在今日还继续存在。

但是,马尔克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是靠了它的政治意义。它在数百年间曾经是体现各日耳曼部落的自由的形式。后来它却变成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民受奴役的基础。怎么可能这样呢?

最早的公社,我们知道,是包括整个民族的。全部占有的土地当初都属于整个民族。以后,彼此之间具有较近亲属关系的一个区的全体居民,成为他们所移住的地方的占有者,而民族本身就只有处置余下来的无主土地的权利了。区的居民又将他们的耕地马尔克和林地马尔克让给各个农村公社(这些农村公社同样是由近亲组成的),同时也把剩余的土地留给区支配。干村在从原始村的旧马尔克中分出土地、成立新的移民村时,情形也是一样。

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制度的基础;而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这种联盟愈来愈被人们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际的血统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忆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相反,在一个区的居民内部,血统联盟的意识自然保存得较长久些。因此,民族便成为一种比较牢固的区联盟了。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人,大概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曾经明白地讲到阿勒曼尼人的这种情形。这在“民族法”上,也可以到处看得出来。萨克森人在查理大帝时代还是处在这个发展阶段;而弗里西安人则一直延续到弗里西安的自由丧失的时候。

但是,向罗马境内的迁徙把区内的血统联盟也破坏了,而且必然要破坏它。虽然原来打算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进行迁移,但这也是做不到的。长期的远征,不仅把各个部落和氏族,而且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混合了起来。而各个农村公社的血统联盟,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保存了下来。因此,这些农村公社便成为构成民族的实际政治单位了。罗马领土上的新区,一开始就成为多少是任意划定的(或者说,是由当地原有的关系所决定的)司法区,或者很快就变成这种司法区。

这样,民族就溶化在小的农村公社的联盟之中,而在这些农村公社之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联系,因为每个马尔克都是自给自足的,它们自己的需要由自己生产来满足,并且邻近的各个马尔克的产品,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它们之间的交换,便几乎不可能了。这些小的公社的经济利益诚然都是相同的,但

正因为这样，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由于民族是纯粹由这样的公社组成的，因而，一个不是从公社内部产生、而是跟它们格格不入地对立着的、并且不断地剥削它们的国家政权，便成为民族继续生存的条件了。

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权便以专制政体而出现。相反地，在日耳曼人侵占的罗马领土上，我们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者的自由财产，即只对马尔克负担一定赋役的财产了。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下，在这种自主地的基础上，一种社会国家制度是怎样产生的，这种社会国家制度又怎样——这是常见的历史的恶作剧——最终瓦解了国家，而且在古典的形态之下，消灭了一切的自主地。

自主地使土地占有的原始平等不但可能而且必然转化为它的对立面。日耳曼人的自主地，在旧日罗马领土上一出现，就变成了跟它同时并存的罗马人的地产所早已变成的那种东西，即变成了商品。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矛盾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确定不移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它的充分的发展，但并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能起作用。所以，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可是，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代，耕作和牧畜是具有决定性

的生产部门。地产及其产品占当时财富的绝大部分。当时存在的各种动产，自然跟随地产之后，同地产一样地日益聚积在同一些人手里。工业和商业在罗马崩溃时期已经衰落了，日耳曼人的侵略几乎把它们全部摧毁。留下来的一半都由非自由人和外国人经营，并且仍然成为被人轻视的行业。在财产不均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在这里逐渐形成的统治阶级，只能是一个大土地占有主阶级，他们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只能是一种贵族制度。因而，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一阶级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诈，那末，我们就不要忘记，这种政治手段，只是在促进和加速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不消说，我们也会常常看到，这种政治手段如何阻挠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事情是相当经常的，而且每次都发生在不同的当事人把这样的政治手段，朝着相反的方向、或者彼此交错的方向运用的地方。

这一个大土地占有主阶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在法兰克人侵占高卢以后，那里仍然留下很多罗马的大土地占有主，他们的田地，大部分由缴纳地租（*canon*）的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耕种。

其次，我们也看到了，王权如何通过侵略战争而在移居的日耳曼人中间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和实际的权力；它如何把旧日的民田变成王室领地，如何把罗马的国有土地也并入自己的领地。在分割帝国引起的多次内战期间，由于大量没收所谓造反者的土地，王室领地不断地增加。不过它增加得快，挥霍得也快。因为国王不断赠送土地给教会和私人，给法兰克人和罗马人，给他的侍从（*Antrustionen*）和其他的宠幸者。邦君同样也赠送土地给豪族、巨室、地主、官吏和军事首领所组成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是在内战

中、由于内战的影响开始形成的),以贿赂他们的支持。罗特^①无可辩驳地证明,所有这一切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真正的馈赠,赠送的土地成为自由的、世袭的、可以出让的财产,直到查理·马尔泰尔,在这方面才有了转变。

查理掌权的时候,国王的权力已经全部崩溃了,但是还远未因此而被宫相的权力所代替。在墨洛温王朝时由于牺牲王室而创造出来的豪绅显贵阶级,千方百计地促进了王权的毁灭,但绝不是为了屈从于宫相,屈从于和他们同一地位的人。恰恰相反。掌握着整个高卢的,正如爱因哈德所说的,是这些

“暴君,他们到处都想进行统治”(《tyrannos per totam Galliam dominatum sibi vindicantes》)³²⁶。

除去世俗的豪绅显贵以外,主教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许多地方,攫取了对于周围伯爵领地和公爵领地的统治权,并利用豁免权和教会的牢固组织作他们的护符。随着帝国内部的瓦解,外敌纷纷入侵;萨克森人侵入莱茵法兰克尼亚,阿瓦尔人打到巴伐利亚,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而达到了阿奎丹尼亚。在这种情势之下,仅仅镇压内乱、驱逐外敌,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已受贬抑的豪绅显贵或者把由查理委派去接替他们的后任,跟王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旧日的权力是以大土地占有制为依据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根本改变土地占有关系。这一种变革是卡罗林王朝的重要事业。这一变革的特点还是在于:选择这一手段,是为了统一帝

① 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年厄兰根版(P.Roth.《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Erlangen, 1850)³²⁵。这是在毛勒以前时期出版的最好著作之一,我在这一章中要多次引用。

国，将豪绅显贵跟王室永久联系起来，从而加强王室，而结果却导致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

为了弄清查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手段，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当时教会的财产状况，因为这是当时土地关系的本质因素，在这里，是不能忽略过去的。

在罗马时代，教会在高卢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地产，由于在捐税和其他赋役方面享有重大的特权，这些地产的收入就越加多了。不过，高卢教会的黄金时代，是在法兰克人信奉基督教以后才开始的。国王们彼此竞赛，看谁给教会捐献的土地、金钱、珠宝以及教堂用具等等最多。希耳佩里克就常常说（见图尔的格雷哥里）：

“看，我们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全都送给教会了！”³²⁷

在贡特朗（他是教士们的宠儿和奴仆）在位的时候，捐献简直是漫无止境的。这样一来，被加上谋叛罪名的自由法兰克人的地产，在被没收以后，大部分变成了教会的财产。

国王怎样，人民也怎样。不论贫富，都无节制地向教会捐献。

“神奇地治好了一种真正的或臆想的病痛，实现了一种宿愿，例如生了一个儿子，避免了一种危险，都要给圣者发了慈悲的那个教堂进行捐献。在上下层居民中，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向教会捐献可以赎罪，所以，经常的慷慨施舍，也就更加必要了。”（罗特，第 250 页）

除此以外，还有豁免权，它在接连不断的内战、抢劫、没收的年月里，保护教会财产，免遭暴力的侵犯。许多小百姓们也都认为把他们的地产让给教会是合算的，只要在缴纳相当数量的租金的情况下能够保留土地使用权。

但是，这一切对虔敬的教士来说，还是不够的。利用万劫不复

的地狱刑罚作威胁，他们可以合法地勒索到愈来愈多的捐献。查理大帝早在 811 年的亚琛敕令³²⁸里，就已经责备他们这一点，并且责备他们

“引诱人们发伪誓，造假证件，借以增加自己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财富”。

他们还诈取不合法的捐献，因为他们确信，教会除了法律上的特殊地位，还拥有充分的手段，对司法进行欺骗。在六、七世纪，高卢的宗教会议，对于一切反对捐献给教会的人，几乎没有哪一次会议，不是以逐出教会相威胁的。甚至手续上无效的捐献，也通过这一途径而变为有效的。有一些僧侣的私人债务，也能赖掉不还了。

“为了继续唤起人们捐献的兴趣，我们看到，他们采用多么无耻的手段啊！描绘天堂之乐和地狱之苦已经不再见效的时候，他们就从遥远的地方搬来圣徒的遗骨，举行巡回展览，建造新的教堂；这在九世纪简直成为一种正式的营业部门了。”（罗特，第 254 页）“苏瓦松的圣梅达尔德修道院的使者，在罗马费了极多的周折，乞求到圣塞巴斯提安的遗体，并将格雷哥里的遗体也一同偷走。当这两具遗体放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跑来瞻仰新到的圣者的人是那么多，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布满了那个地区，对于求助者，不是一个一个治疗，而是成群结队一起治疗。结果是，修道士们只得用升子来量金钱，这样的升子就有 85 个，修道院的黄金储藏量达到 900 磅。”（第 255 页）

欺骗、魔术、死者，特别是圣者的显灵，都被教会用作骗取财物的手段。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假造证件。

我们还是让罗特说话吧：“许多宗教界人士大规模地干这种事……这一种营业老早已开始了…… 这样的营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可以从我们所搜集的大量假造文件的数目中看出来。在布雷基尼所引用的 360 件墨洛温王朝文书中，约有 130 件绝对是假的…… 兰斯的欣克马尔就利用过莱米鸠斯

的假遗嘱为他的教会侵占了许多财产，而这些在真的遗嘱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过，虽然真遗嘱从未遗失，欣克马尔又清楚地知道前者是伪造的。”

甚至教皇约翰八世也企图利用一张明知是伪造的文件霸占巴黎附近圣丹尼修道院的产业(罗特,第256页及以下各页)。

采用捐献、勒索、欺骗、诈骗、假造证据以及其他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来的教会地产，在短短几世纪间竟然达到了极其庞大的数目，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座落在巴黎境界内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在九世纪初共有地产8000芒斯或胡菲^①，根据盖拉尔的计算，面积计达429987公顷，每年收益100万法郎=80万马克³²⁹。如果每胡菲面积平均以54公顷计算，收益以125法郎=100马克计算，那末，在同一时候，圣丹尼、吕克瑟伊和图尔的圣马丁诸修道院，每处有地产15000芒斯，面积81万公顷，收益达150万马克。而这还是矮子不平没收教会土地以后的情形！据罗特(第249页)估计，在七世纪末，高卢教会的全部土地，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些庞大的地产，一部分是交给教会的不自由的佃农耕种的，可是也有一部分是由教会的自由佃农耕种的。在不自由的人中间，奴隶(servi)必须向主人提供的赋役在当初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因为他们并非有权利的人；但是在这里，对于有固定住所的奴隶，似乎不久也在习惯上定出了赋役的标准。与此相反，其他两种不自由的阶级，隶农和半农奴(他们当时在法权地位上究竟有什么差别，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他们的赋役倒有明确的规定，内容包含一定数目的人工、畜工，还有一定数量的农产品。这是从很久

^① 芒斯或胡菲是中世纪农民的份地。——编者注

以前保留下来的依附关系。相反,自由人不在公有地上或者他们的私有地上,而在他人的土地上耕作,这对日耳曼人来说,却是一件新事情。不待说,日耳曼人在高卢,或者一般地在实行罗马法的地区,相当经常地遇到作为佃农的自由的罗马人。但是,他们在占地时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不要变做佃农,而能够在自有地上耕种。因而,在自由的法兰克人能够变做任何别人的佃农之前,一定是由于某种原因把占据土地时所获得的自主地丧失了,一个特殊的无地的自由法兰克人阶级一定已经形成了。

这个阶级是由于地产开始集中而形成的,也是由于引起地产集中的那些原因而形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内战和没收,另一方面多半是由于时势的逼迫,为了求得安全而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而教会很快又发现了一种特殊方法,来鼓励这样的转让:它不仅让捐献者在缴纳代役租的情况下保留他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在这以外还租给他一块教会土地。这种捐献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捐献者在生前保有土地使用权,只在他死后土地才成为教会的财产(*donatio post obitum*);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而且以后在国王教令里也明确规定,捐献者从教会得到比捐献的土地多一倍的纳租租种地。另一种情况是捐献立即生效(*cessio a die praesente*),捐献人根据教会颁发的文件,即所谓暂时租佃契约,得到教会的多两倍的租地(不包括他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是交给他终身耕种的,但也往往只租给他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时期。无地的自由人阶级一经形成,其中便有许多人也参加到这种关系中去。答应给他们的暂时租佃,大概在开头的时候多数是5年,可是不久也都变成终身的了。

没有疑问,早在墨洛温王朝时代,在世俗豪绅显贵们的土地

上,也发生了跟教会土地完全相同的关系;所以在那里,除了不自由的佃农以外,还移来了缴纳代役租的自由佃农。早在查理·马尔泰尔的时代,这类自由佃农的人数想必已经很多了,不然,查理·马尔泰尔所开始的、由他的儿子和孙子所完成的土地关系的改革,至少在一个方面,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这种变革是以两种新制度为基础的。第一、为了把帝国的豪绅显贵同王室密切联系起来,王室土地以后就不再赠送给他们了,而是仅仅作为“采邑”授予他们,终生使用;不过这是带有一定条件的,违反这些条件,就以收回采邑相处罚。这样一来,豪绅显贵本人也成了国王的佃农。第二、为了确保豪绅显贵的自由佃农服兵役,把区的伯爵对移居在他们领地上的自由人的管辖职权部分地转交给他们,任命他们当这些自由人的“领主”。这两种变革,我们暂时只来考察前一种。

在征服了谋叛的小“暴君”以后,查理便按照旧日的惯例,没收他们的地产(关于这一点缺乏材料);但是,当他以后恢复了他们的职位和官爵的时候,便把这些地产的全部或一部,作为采邑重新授予他们。对于倔强的主教们的教会土地,他还不敢冒险这样做;他撤换他们,将他们的职位赐予对他恭顺的人;在这些人中,不消说,有许多人除去行过剃发式(*sola tonsura clericus*)以外,是毫无僧侣资格的。这些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现在开始遵照他的命令,将大块的教会土地,暂时出租给俗人。这在过去不是没有先例的,不过现在是大规模地进行罢了。他的儿子丕平做得彻底得多了。教会没落了,僧侣受人藐视了,教皇受到伦巴德人的压迫,除了依靠丕平的援助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丕平帮助教皇,协助他扩大教会的统治,给予他种种支持。可是,他取得了报酬,他把绝大

部分的教会土地都合并于王室土地，只给主教和修道院留下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一部分。这第一次大规模的教产还俗，教会是无抵抗地忍受了。勒斯廷的正教最高会议批准了这件事，虽然附有保留条件，可是从未执行。这些极其庞大的地产，使得已经涸竭的王室土地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大部用于以后的封赐，而这些封赐事实上不久都采取了一般的采邑形式。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教会很快便从这种打击之下恢复起来了。这些上帝的勇士们一清算了不平，便马上重新开始旧日的那一套办法。捐献又从各个方面源源而来。自由的小农们还处在二百年以来的那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在查理大帝及其后继者们统治下，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坏了，许多农民都带着自己的房屋土地，投靠主教的曲柄圭杖的庇护。国王们把一部分赃物退还给一些受到特别优待的修道院，把大量王室土地送给另外一些修道院，特别是在日耳曼尼亚的修道院。在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教会的贡特朗幸运时代似乎又重新降临了。在修道院的档案里，关于九世纪的捐献的材料，是特别丰富的。

采邑，也就是我们现在打算比较详细研究的这一种新制度，还不就是以后的封地，但已经是它的萌芽。采邑的授予，一开始就以封主和受封者双方共同的生存时间为限。双方有一方死亡，它便归还所有人或其继承人。旧有关系的更新，必须重新履行一次授予受封者或其继承人的手续。可见，按照以后的说法，采邑在封主死亡时，要归还封主[Thronfall]，在受封者死亡时，也要归还封主[Heimfall]。封主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不久便取消了；大的受采邑者甚至比国王还强大。至于受封者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往往早已改为授予原受采邑者的继承人了。在奥顿附近的一个帕

特里西阿克庄园(佩西),由查理·马尔泰尔作为采邑授予希尔德布兰,在他这一家里,父子相传,经过四代,直到839年,国王方才把这个庄园的全部所有权赐给第四代受采邑者的一个弟兄。像这样的例子,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并不少。

在凡是牵涉到没收财产の場合,封主都可以收回这些采邑。这样的事件,在卡罗林王朝之下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例如,在矮子丕平时候的阿勒曼尼亚的暴动,绍林吉亚人的谋叛,萨克森人多次的起义,都不断引起没收;有的是没收自由农民的土地,有的是没收豪绅显贵的庄园和采邑。在虔诚者路易和他的几个儿子统治之下,虽然契约上有相反的规定,但在内战中间,这样的事情仍然不断地发生。还有一些非政治性的犯罪,也会招致财产的没收。

除此以外,倘使受采邑者玩忽了他应尽的一般臣民职责,王室也可以收回采邑;例如,滥用豁免权,不交出盗匪,不带自己的甲胄上阵,不尊重国王的敕谕等等。其次,采邑的授予是附有特殊条件的,倘使违犯这些条件,采邑就可收回;当然,这并不牵涉受采邑者的其他的财产。例如,在旧有的教会土地授出后,受采邑者未向教会缴纳应付的租税(nonae et decimae(九一税和什一税)^①)时,或者是使土地荒芜了,就要收回采邑;在后一种场合,通常先要给予一年的警告期,以便受采邑者在这个期间可以改进经营,避免没收的危险,等等。此外,地产的授予,可以附带一定的服役,而且事实上,当采邑愈益发展为真正的封地的时候,这样的事也就愈多了。不过,这在开头的时候,完全不是必要的;至少,就服兵役说是这样的。有许多采邑,是授予低级僧侣、修道士、教会的或世俗的妇女

^① 即收获物和其他收入的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编者注

的。

最后,也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国王起初授予土地也保留了收回的权利,或者规定了一定的期限,即作为暂时租佃。从个别的材料和教会的做法看来,这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做法不久就停止了,因为采邑的授予,在九世纪已经普遍通行。

如上所述,教会过去多半是把土地作为暂时租佃的土地,在一定期间,交给它们的自由佃农耕种,现在得仿照王室的榜样了(我们应该假定,大土地占有主和受采邑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不但也开始采用采邑,而且这种方式竟然达到这样的优势,以致使原有的暂时租佃也变成了终身租佃,不知不觉地带上了采邑的性质,到了九世纪,暂时租佃差不多全部都已变为采邑了。在九世纪后半期,教会的受采邑者以及世俗豪绅显贵的受采邑者,一定在国家中早已占到重要的地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定成为占有庞大地产的人物,并且成为以后的下层贵族的始祖。否则,有些人的采邑被郎城的欣克马尔无理地夺回的时候,秃头查理也许就不会这样热心地关怀这些人了。

我们看到,采邑已经具有在发展起来的封地里面可以重新看见的许多特征。封主死亡,归还封主;受封者死亡,也归还封主,这对采邑和封地都是一样的。和封地一样,采邑也是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能收回的。由采邑造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是从国王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帝国公爵的前身),到中等受采邑者(以后的贵族),并且从中等受采邑者起,下至绝大多数生活在马尔克内的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农民,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中我们看到了以后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如果说,以后的封地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一种职田,而且对封地主负有服兵役的义务,那末,

后一种情形在采邑上还未发生,前一种情形也根本不是非有不可的。可是,采邑转为职田的倾向已经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并且在九世纪,它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大了。这种倾向愈发自由地发展,采邑也就愈益发展为封地了。

不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还有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区制度和军事制度起初在大地产的影响下、以后在大采邑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而以前的大地产,由于不断的内战和与之相连而来的地产的充公和再度的授予,愈来愈转化为采邑了。

显然,这一章里谈的,只是纯粹的、古典形态的采邑;这种采邑当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并非到处同时出现的形态。可是,只有拿这种纯粹的形态来考察,才能了解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表现形态,而罗特的主要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从一切混杂的附属物中拣出了采邑这种古典形态。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

上面叙述过的土地占有情况的变革,不能不影响到旧有的国家制度。它使国家制度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又反过来影响土地占有关系。我们暂且不谈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革,而在这里先考察一下,新的经济状况对于旧的人民制度在区和军事这两方面还保存着的残余发生了什么影响。

在墨洛温王朝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伯爵、公爵们往往充任王室土地的管理人。不过,只是到了九世纪,我们才确凿地看到,某些王室土地同伯爵官职有了这样的联系:在任的伯爵领取这些土地的收入了。从前的名誉官职,现在成了一种由可靠的收入中支

付俸禄的官职了。此外，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另一种现象，即伯爵们占有了授予他们个人的王室采邑。这样，伯爵在他的伯爵领地内，便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地主了。

首先，很明显，伯爵的权威一定受到了在他下面、与他并存的大土地占有主的损害；这些人在墨洛温王朝以及在卡罗林王朝初期，对国王的敕论都常常加以嘲笑，对于伯爵的号令，一定会更加不尊重。他们的自由佃农，仗着有势力的地主的庇护，往往同样忽视伯爵传唤他们出庭或征召入伍的命令。这正是以授予采邑代替授予自主地的一个原因，也是旧日自由的大地产后来多半逐渐转变为采邑的一个原因。

单单这样，还不能保证吸引豪绅显贵土地上的自由人履行对于国家的义务。必须紧接着作进一步的变动。在国王看来，必须让大土地占有主们，对于他们的自由佃农在出席法庭、应征入伍以及执行其他传统的对国家的义务方面，负起责任，正如过去伯爵对其领地内的一切自由居民所负担的责任一样。而这只有当国王把伯爵对于他们的佃农的一部分权力转让给豪绅显贵时，方才能够做到。地主或受采邑者，必须把他自己的人提到法庭；就是说，他们必须经过他而被传唤到案。他必须使他们应征入伍；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他来征集他们；为了能够经常负起对他们的责任，他必须具有领导他们并维持军事纪律的权力。但是，这以前是，当时还依然是佃农对于国王的服务；处罚抗命者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国王的伯爵；罚款也应归入王室的国库。

这种改革也要追溯到查理·马尔泰尔。至少是从他那时起，我们才看到教会显贵亲身上阵的习尚；而这一习尚，按照罗特的看法，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说明，即查理命令主教们带领他们的佃农

出征,是为了保证后者能够上阵。毫无疑问,世俗的豪绅显贵及其佃农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查理大帝统治之下,这种新制度已经稳固地确立起来,而且已经普遍推行了。

可是这样一来,自由佃农的政治地位,也起了重要的变化。他们过去不管在经济上怎样厉害地依附于地主,但在法律上是同他们的地主平等的,现在他们在法律上也成了地主的臣属了。经济上的屈从取得了政治上的认可。地主成为领主、老爷,佃农成为他的 *homines* (人);“主人”成了“人”的长官。自由人法权上的平等地位,一去不复返了;最下层的“人”的充分的自由,由于世袭地产的丧失早已受到了极大损害,现在他们同不自由人又接近了一步。同时,新的“主人”超出旧日的一般自由的水平也就更多了。新贵族在经济上已经打下的基础,为国家所承认,成为国家机器中经常起作用的一种飞轮。

除了由自由佃农构成的这种《*homines*》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这就是自愿跟豪绅显贵们发生服役关系或侍从关系的贫穷的自由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都有他们的侍从人员,即所谓随从。当时的豪绅显贵们,也不会没有侍从人员的。在卡罗林王朝,国王的这些侍从们叫做《*vassi*》、《*vasalli*》或者《*gasindi*》;这些称呼,在古代“民族法”中还是使用于不自由人的,可是现在通例却含有自由的侍从的意义了。这同一的称呼,也适用于豪绅显贵们的侍从,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到处出现,而且在社会和国家中,成为一种人数日益众多、地位日益重要的成分了。

豪绅显贵是怎样获得这些侍从的,这可以从当日的契约程式中看出来。例如,在一张这样的契约程式(西尔蒙契约程式集第43号)中说:

“众所周知，我无衣无食，所以请求您（主人）开恩，我希望受您的庇护（mundeburdum——等于监护）并投靠于您，条件如下：您按照我为您服务的情况和应得的报酬负责供给我衣食；而我只要还活着，就要按照一个自由人（ingenuili ordine）的样子，听候您的使唤；并且，我终生都不脱离您的权力和保护，一辈子留在您的权力和保护之下。”³³⁰

这一契约程式充分说明了单纯的、丝毫没有掺杂外来成分的侍从关系如何产生和具有怎样的性质，尤其是说明了一个完全破产的穷人贫困到了极点的情况。给领主当侍从的关系的产生，乃是出于双方自由的协议——所谓自由，乃是罗马的和现代的法学上的自由——它往往跟现代工人为工厂主服务的情况是一样的。“人”投靠主人，主人接受他的投靠。投靠的仪式用握手和宣誓效忠表示出来。协议是终身的，只有在缔约双方有一方死亡的时候，方能解除。仆从必须负责完成他主人交给他的任何一种与一个自由人地位不相违背的劳役。为此，主人必须维持他的生活，并酌情给予报酬。土地的转让并不一定要与此相联系，而且事实上也决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有这种联系。

这种关系，在卡罗林王朝，特别是在查理大帝以后，不但被容忍了，而且受到了直接的鼓励；最后，大概是在 847 年的一道敕令里，把这一点规定为一切普通的自由人的义务，而且由国家监督施行。这样一来，仆从对于主人的这种关系，只有在主人企图杀他、用棍子打他、强奸他的妻女、或者夺取他的世袭地产的时候，仆从才能单方面地解除（813 年的敕令）。只要仆从从主人那里接受 1 索里达金币的东西，他便被束缚于主人了；从这里可以再一次清楚地看出，当时的臣仆关系并不一定是跟土地的授予相联系的。这同样的规定也出现在 816 年的一道敕令里面，不过附加了一条

规定,即当主人企图以非法的方法使仆从陷入不自由地位,或者能够履行答应给仆从的保护而不履行的时候,仆从可以解除这种关系。

在国家面前,现在封君[Gefolgsherr]对他的侍从取得了跟地主或受采邑者对其佃农一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对于国王依然负有服役的义务;只不过在这里,在国王同其伯爵之间,插进了封君。他叫他的臣仆出席法庭,他征集他们,带领他们参战,在他们中间维持军律;他为他们负责,并按照规定标准武装他们。因此,封君对于他的臣属也就取得了一定的处罚权,这就形成了以后日益发展起来的领主对其臣仆的审判权的起点。

在这两种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中,在臣仆制的形成中,在伯爵(也就是国家)对臣属,即对佃农和无地侍从(他后来不久称之为《Vassi》,《Vasalli》,《Homines》)的行政权力转交给地主、王室领地管理人、受采邑者和封君的这件事中,在国家这样确认并加强主人对臣仆的实际权力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采邑中业已产生的封地的萌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国王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到他们的自由佃农,最后直到不自由人,这一种身分等级制度,已成为国家组织中被确认的、在行政上正式起作用的要素了。国家承认,没有它的帮助,就不能存在下去。这里当然要说明,事实上是怎样进行这种帮助的。

侍从和佃农的区别,只是在开头为了证明自由人依附关系的双重起源,才有重要的意义。不久,这两种臣仆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区分地合而为一了。大的受采邑者日益接受投靠国王的习尚,即不但成为国王的受采邑者,而且成为国王的臣仆。国王认为叫豪绅显贵、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臣仆亲自对

他举行效忠宣誓,对于他是有利的(“贝坦年鉴”³³¹,837年,九世纪较多)。在这里,一般的臣民宣誓与特殊的臣仆宣誓之间的差别,不久也就消失了。于是,所有的豪绅显贵都逐渐变为国王的臣仆了。但是,大土地占有主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成为贵族,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包括于国家组织之中,成为行政上正式起作用的一种杠杆了。

各个大土地占有主的侍从,也同样地慢慢变为佃农了。除了在老爷的庄园里直接供给膳食(而这也只能适用于极少数人)以外,想要保证侍从们的生活,只能将他们安置在土地上,将土地作为采邑,分给他们,别无其他办法。维持大量具有战斗力的侍从,这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是豪绅显贵生存的首要条件,而这些侍从只有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老爷的庄园内的无地仆从由于大批人居住在老爷的土地上而逐渐消失了。

但是,这种新因素愈渗入旧制度,旧制度的基础愈动摇。以前由国王和伯爵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法,日益让位于一种间接的方法;在普通的自由人和国家之间,出现了领主,自由人通过尽忠的宣誓在人身上愈来愈受领主的束缚。国家机器中最有力的发动机——伯爵,不得不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查理大帝在这里的做法,也和他在其他方面例行的做法一样。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在开头的时候,极力鼓励臣仆关系的扩张,直至独立的小自由人几乎完全消灭为止;但当他看到因此而削弱了他的权力时,他便企图通过国家的干涉重新恢复自己的权力。这在一个如此有魄力、如此威严的统治者之下,在许多场合,是可能成功的,可是到了他的软弱无力的后继者统治的时候,在他帮助下造成的事实,以不可阻挡之势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查理所喜爱的方法是派出王室特命全权大臣 (*missi domini*)。有的地方,普通的王室官吏——伯爵——无法控制愈来愈混乱的局面,特使就应当去加以控制(这要从历史上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挥)。

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改变伯爵的地位,使他在行使权力的物质手段方面至少能与其伯爵领地内的豪绅显贵相等。这只有使伯爵同样加入大土地占有主的行列,才能做到,而这又需要通过两种方法。可以将各个区的若干土地,作为赠予地拨给伯爵官职,由在任的伯爵作为公务来管理这些土地,并取得土地的收入。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档案文件中是非常之多的,并且从八世纪末就已开始了;自九世纪起,这种关系已经很普遍了。这样的赠予地,不用说,大多数都是取之于王室国有土地;正如我们在墨洛温时期所早已看到的情形那样,伯爵和公爵往往成为他们辖境内王室国有土地的管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甚至还有这样的契约程式):主教们也把教堂土地捐赠给伯爵官职,自然仍旧保留教堂土地的不可转让权,而采取某种采邑的形式。教会的慷慨是十分出名的,所以在这里,除了由于严重困难是不能用别的理由来说明的,在邻近的世俗豪绅显贵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教会也只有跟国家权力的残余结为同盟了。

这种同伯爵官职施在一起的附属物 (*res comitatus, pertinentiae comitatus* (伯爵财产,伯爵所属物)),起初是同授予在任伯爵个人的采邑严格地划分开的。采邑的授予,通常也是很多的;所以,把赠予地和采邑加在一起,原来属于名誉官职的伯爵官职,现在却成为收入非常优厚的职位了,而自虔诚者路易以后,这种赠予

地同王室其他慷慨的赠予一样,也是特意授予国王想争取或者想靠他们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人。所以,关于口吃者路易有这样的记载,《quos potuit conciliavit sibi, dans eis abbatias et comitatus ac villas》(“凡是能够争取到的人,他都授予他们修道院、伯爵领地和庄园,把他们争取过来”)(“贝坦年鉴”,877年)。《honor》(“荣誉”)这个名词,在过去本来是指跟一些名誉权利相联系的官职说的,到了九世纪却具有同采邑一词完全相同的意义了。于是,像罗特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那样(第408页),伯爵官职的性质,必然也要跟着发生一种本质的变化了。领主制就其获得公共性质这一点而言,起初是仿照伯爵的官职,被赋予了伯爵的权柄。现在——在九世纪后半期——领主制已经到处盛行,以致伯爵的官职有被压倒的危险,它本身只有日益接受领主制的性质,才能保持它的权力地位。伯爵愈来愈多地、并非没有成效地篡夺了领主对其所辖区内的居民(pagenses)的地位,而且侵入了他们的私人关系和公务关系。正如其他的“主人们”对待他们邻近的小百姓那样,伯爵也对区内的一些贫困的自由居民威胁利诱,使他们依附于他,充当他的臣仆。伯爵能够如此滥用他的职权这一简单的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当时残余下来的普通的自由人要想从王权及其机构那里期待保护,是怎样地不可能,这样一来,伯爵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了。受尽了各方面的暴力欺凌的这些自由人,倘使能够找到一个保护人,纵使交出他们的自主地,然后再单作为采邑收回来,那已经是很幸运了。早在811年的敕令里,查理大帝已经埋怨说,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法官、百户长,不断地施展司法上的诡计或频繁地征募兵役,使小百姓们遭到破产,只好把自己的自主地奉送或出卖给他们,穷人们只得为自己的财产被掠夺而高

声喊冤了，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九世纪末的高卢，大部分的自由财产已经转入教堂、伯爵以及其他豪绅显贵的手中（兰斯的欣克马尔，869年）。稍后，在若干省份，小自由人的自由地产，甚至完全消灭了（毛勒“概论”第212页）。随着受采邑者权力的扩大和王权的衰落，采邑逐渐变为世袭，伯爵官职不久也按照习惯变为世袭的了。如果说，在大量的王室的受采邑者之中，我们看到了后来的豪族的萌芽，那末，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从区的伯爵中产生出来的邦君的领土主权的胚胎。

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已经这样完全改变以后，以一切自由人服兵役——这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为基础的旧军事制度，在外表上还是照旧不变；只不过在有新的依附关系出现的地方，领主插在他的臣仆和伯爵的中间。可是，普通的自由人一年一年地愈来愈无力负起兵役的重担了。所谓兵役不单包括个人的服役；被征集的人还要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在头半年里伙食也要自备；最后，查理大帝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事情超过了极限。负担重到不堪忍受的地步，为了逃避这种负担，大群的小自由人宁愿将他们剩余的田产，甚至他们自身及其后代，都转让给豪绅显贵，尤其是转让给教会。查理把那些自由的尚武的法兰克人弄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他们宁愿做依附农民和农奴，只求不去打仗就行了。在大量的自由人已经全部或大部丧失了他们的地产以后，查理还要坚持实行建立在一切实自由人的土地共同和平均占有上面的军事制度，而且推行到极端的地步，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此。

然而事实强于查理的执拗和野心。旧的军事制度是无法再维持下去了。以国家经费装备和供养军队，在那个几乎没有货币和

商业的自然经济时代，也是无从谈起的。因此，查理不得不对兵役义务加以限制，以便能够保证兵员的装备和给养。这是在 807 年的亚琛敕令中提出的，当时战争还是限于国境上的战斗，帝国的处境整个来说大致还是安全的。首先，每个王室的受采邑者都要毫无例外地应征；其次，占有 12 胡菲 (mansus (芒斯)) 的人，必须以甲冑武装起来，因而也要骑马出征 (《caballarius》(“骑士”)，这个词出现在这同一个敕令里)。占有 3 至 5 胡菲的人，都有出征的义务。每两个占有 2 胡菲的人，每 3 个占有 1 胡菲的人，每 6 个占有半胡菲的人，每次需出兵一人，由其余的人负责装备。完全没有土地但占有价值 5 索里达动产的自由人，也必须每 6 人出兵一人，其他 5 人每人出 1 索里达，以资助他。征发亦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邻近地区发生战争时，必须全部出征，如战地相离较远，则根据距离远近，将人员数目缩减到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查理在这里的用意，显然是想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适应有服兵役义务的人的已经改变了的经济生活状况，想救出还能救出的东西。然而，这种让步也无济于事；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在“关于扩军的敕令”里，再度减免兵役的负担。一般认为，这一敕令早于亚琛敕令，但照它的全部内容看，毫无疑问，要晚于亚琛敕令许多年。它把每出兵一人所需的胡菲数，由 3 胡菲提高到 4 胡菲；占有半胡菲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是豁免了兵役，而受采邑者的兵役义务也限制到每 4 胡菲出兵一人。在查理的后继者的统治之下，似乎每出兵一人所需胡菲的最低限度，甚至提高到 5 胡菲。

值得注意的是，征集必须身披甲冑入伍的拥有 12 胡菲的人入伍，像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至少是，身披甲冑出阵的命令在敕令里重复了无数次。

于是,普通的自由人日渐消灭了。他们日益跟土地分离,早已驱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沦为新兴大地主的臣仆,由于害怕兵役造成直接的破产,另一部分人甚至被迫当了农奴。这种陷于受奴役境地[Ergebung in die Knechtschaft]的过程发展十分迅速,这从当时还位于巴黎郊外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记册中可以看出。这本地产登记册是由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在九世纪初编制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修道院的农民中间,有 2080 户是隶农,35 户是半农奴,220 户是奴隶(servi),只有 8 户是自由人。可是,隶农这个词,当时在高卢,断然是不自由人。一个女自由人同隶农或奴隶通婚,被认为是亵渎神明(deturpatam),她必须受主人的支配(817 年的敕令)。虔诚者路易下令,要(普瓦提埃的一个修道院的)《colonus vel servus ad naturale servitium velit nolit redeat》(“隶农或奴隶,不管他愿意与否,应当回到他的天然的依附地位”)。他们往往受体罚(853 年、861 年、864 年、873 年的敕令),有时获得自由(见盖拉尔“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这些农奴并不是什么罗马人。按照研究过这些姓名的雅科布·格林自己的证明(“德意志语言史”第 1 卷),他们的姓名“几乎全是法兰克人的,法兰克人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为数很少的罗马人”。

不自由的人口如此大量的增加,又打乱了法兰克社会的阶级关系。除了当时正在迅速形成一个特殊等级的大土地占有主们以外,除了他们的自由臣仆以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不自由人的阶级,这个阶级把残余的普通的自由人日益吸收进去。这些不自由的人,有一部分曾经是自由人,另一部分则是自由人的子女;从三代以前或更早的时候起就祖祖辈辈受奴役[erbllicher Knecht-

schaft]的，占极少数。他们大多数人还并不是从外面偷运来的萨克森人的、温德人等的战俘；相反地，他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兰克人和罗马人。对付这样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已开始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的情况下，就不像对付世袭的或者外来的农奴那样容易了。他们还没有习惯于受奴役的地位[Knechtschaft]；连隶农也不免要受到的体罚（853年、861年、873年的敕令），他们仍然认为是一种耻辱，而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不自由的人、甚至农民臣仆就发生了多次的叛乱和暴动。查理大帝曾经亲自以极端残暴的方法镇压过兰斯主教管区佃农的一次暴动。虔诚者路易曾在821年的敕令里，说到弗兰德及梅纳比地区（在利斯河上游）奴隶（servorum）的叛乱。848年和866年，曾经对美因兹主教管区的仆从（homines）的暴动进行了镇压。镇压这类叛乱的命令，在779年以后的敕令里一再地重复着。在萨克森的“斯特林加”暴动³³²，一定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以后，不自由人的赋役，甚至包括定住的奴隶们的赋役在内，都渐渐地规定出一定的、不许超过的限度。查理大帝在他的敕令里，对此曾作明文的规定。这显然是不自由的大众的这种带威胁性的行动的结果。

在占领高卢时构成了全部法兰克人中的普通的自由人等级消灭了，人民分裂为大土地占有主、臣仆和农奴，——这就是查理为取得他的新罗马帝国所付出的代价。随着普通的自由人的消灭，旧的军事制度瓦解了，随着两者的消灭，王权也崩溃了。查理把他自身统治的唯一基础破坏了。他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可是一到了他的后继者们的手里，实际上由他亲手造成的东西，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注释: 法兰克方言³³³

对于这种方言,语言学家们开了一个出奇的玩笑。格林认为它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和高地德意志语中,但新近的研究者们则认为自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起,至翁施特鲁特河、萨利河、雷察特河止,甚至一直到多瑙河,并且经过移民而直达理森山,都是法兰克方言流行的范围。甚至像库里茨·海奈那样的语文学家,竟也根据在韦尔登抄录的一篇古福音诗³³⁴手稿,编造出一种古代下法兰克语言,而这几乎是一种略带法兰克语色彩的纯粹的古代萨克森语,——而布劳涅则干脆把一切真正的下法兰克方言,一部划归萨克森语,一部划归尼德兰语³³⁵。最后,阿尔诺德是把里普利安人征服的地区,局限于阿尔和康塞尔两河分水岭以北的地方,而认为所有位于南方及西南方的地区,开头是由阿勒曼尼人占领,以后又是单独由卡滕人(他把卡滕人也划归法兰克人之中)占领的,因此,他们说的话也是阿勒曼尼—卡滕语。

首先,让我们恢复法兰克语言区的实际界限。绍林吉亚、黑森和美因法兰克尼亚,在卡罗林王朝时代曾在《Francia》的名称下并入这个地区,此外就没有任何理由划入这个地区。在施佩萨尔特、福格耳贝克林山和卡累尔—阿斯坦山以东诸地所说的语言,绝对不是法兰克语。黑森和绍林吉亚是独立的部落居住的地方,有它们自己的独立的方言;在美因法兰克尼亚居住的是斯拉夫人、绍林吉亚人和黑森人的混血人口,其中还夹杂有巴伐利亚人和法兰克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它的独特的方言。

只有把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侵入这些方言中的程度拿来

作为主要区别标准,才能将这三个语言分支算做法兰克语。但是,我们将要看到,正是这种方法引起了非法兰克人在判断法兰克语言时的全部混乱。

我们从最古的文物开始,并且首先对摩里茨·海奈^①的所谓古代下法兰克语作一个正确的说明。写于韦尔登而目前存放在牛津的所谓古福音诗的柯顿手稿,根据海奈的意见,应当是古代下法兰克语,因为这个手稿是在韦尔登的修道院写成的,这个修道院虽然仍然是在法兰克境内,但离萨克森边境极近。旧的部落边界,今日还是贝尔格区同马尔克区的边界;在处于两地之间的修道院中,韦尔登的修道院属于法兰克尼亚,埃森的修道院属于萨克森。韦尔登在东面和北面,都跟毫无疑问的萨克森的村庄紧紧相连;在鲁尔河同利珀河之间的平原上,萨克森语言在若干地方差不多侵入到莱茵河一带。有一部萨克森语的作品在韦尔登抄写出来,而且显然是由一个法兰克人抄写的,在这个法兰克人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法兰克语的字形——这种情形还远不足以说明抄本上的语言就是法兰克语。除了柯顿的这个古福音诗抄本以外,海奈还举出了一些具有同一性质的韦尔登的断简残篇以及他认为来自亚琛地方的一首赞美诗译文的残稿,他以为这些也是用下法兰克语写的;但凯伦(“‘萨利克法’注解”)³³⁶却直截了当地认定这篇译文是尼德兰语。事实上,这篇译文一方面带有完全的尼德兰语形,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有真正的莱茵—法兰克语形,甚至还有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痕迹。它显然是在尼德兰语和莱茵—法兰克语之间的边境

① 摩里茨·海奈“古代萨克森语及古代下法兰克语简明语法”1873年帕德波恩版(《Kleine altsächsische und altniederfränkische Grammatik von Moritz Heyne》.Paderborn, 1873)。

上,大约是在亚琛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的地方译出的。译文的语言要比那两个古福音诗抄本的语言年轻得多。

但是,单单根据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根据抄本中出现的少量法兰克语形,就足以肯定法兰克语和萨克森语的若干基本差别。

一、在所有的印格伏南方言里,现在时直陈式复数的三种人称的结尾都是相同的,即同样是以一个前面带有元音的齿音字母为结尾;古代萨克森语结尾为 *d*, 盎格鲁撒克逊语为 *dh*, 古代弗里西安语为 *th* (这大概也可以代替 *dh*)。例如,在古代萨克森语中, *hebbiad* 的意思是 *wir haben, ihr habt, sie haben*, 同样地, *fallan, gawinnan* 的所有三种人称,都同样是 *fallad, winnad*。在这里,第三人称使所有三种人称都从属于它自己,但应当注意的是,印格伏南语新特有的那种在 *d* 或 *dh* 之前省略了 *n* 的现象,也是所有上述这三种方言所共有的。在一切现存的方言之中,只有威斯特伐里亚语还保留这种特殊性;在那里,今天仍然说 *wi, ji, se hebbed* 等等。其他的萨克森方言同西弗里西安方言一样,已经没有这种特殊性了;它们的三种人称是有区别的^①。

西莱茵的赞美诗,同中部高地德意志语一样,复数第一人称结尾为 *m*, 第二人称为 *t*, 第三人称为 *nt*。相反地,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除了萨克森语形以外,还曾好几次出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例如: *tholònd—sie dulden* [他们容忍], *gornònd—ihr klagt* [你们诉苦], 以及命令式, *mârient—verkündigt* [宣告], *seggient—sagt* [讲]。而这在萨克森语里,则要求 *tholòd, gornòt, màriad, seggiad*。这些形式,不单是法兰克的语形,它们甚至直到今日仍

① 恩格斯在手稿中用铅笔添了这几个字:“和第三人称同第二人称的区别。”³³⁷——编者注

然是真正的韦如登方言,贝尔格的地区方言。在贝尔格语里,现在时复数三种人称也是相同的,不过不是像萨克森语那样以 d 结尾,而是像法兰克语那样以 nt 结尾。同马尔克福的 wi hebbed 相反,在这里,在边界线上,却说 wi hant, 并且与上面的命令式 seggient 相同,这里说 seient ens—sagt einmal [讲一讲]。在这里,在贝尔格语里,所有的三种人称的语形完全相同;布劳涅等人根据这一简单的观察,就不加思索地宣称全部的贝尔格山区都属于萨克森语的范围。这种规则,诚然是从萨克森传到这里来的,但遗憾的是,它是由法兰克语输出的,因此,他们所证明的,恰恰是他们应当证明的反面。

在齿音之前省去 n,这在印格伏南方言里,并不限于上述的场合;这在古代弗里西安语中较为稀少,相反地,在古代萨克森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则流行颇广。例如: mudh—Mund, kudh—Kund, us—uns, odhar—ein anderer。那个法兰克人在韦尔登抄写古福音诗的时候,曾有两处把 odhar 写成法兰克语形 andar。在韦尔登的赋税登记册上,法兰克语形的姓名 Reinswind, M egin—swind 同萨克森语形的姓名 Reinswid, M eginswid, 彼此交错着。相反地,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到处都写的是 munt, kunt, uns, 只有在所谓利普西乌斯³³⁸的注解(摘自这首赞美诗的一种已经失落的手抄本)中,有一 90 处用 farkutha abominabiles[可恨的]代替 farkuntha。同样地,在古代萨利克人的文物上,姓名中的 n 也到处保存着,例如 Gund, Segenand, Chlodosindis, A nsbertus 等等;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在现代的法兰克方言中, n 到处都有(贝尔格语中唯一的例外是语形 os—uns)。

二、一般用来构成所谓古代萨克森语语法的语言文物,全部

都出于西南威斯特伐里亚、闵斯德、弗雷肯霍斯特、埃森。这些文物上的语言,不但同一般的印格伏南语形有某些重大差别,而且同那些直到今天还作为真正古代萨克森语形而保持在恩格伦和奥斯特法利亚的专有名词中的语形也有某些重大差别。相反地,它同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却相似到了惊人的地步。因此,这种方言语法的新近研究者科瑟伊恩称它为古代西萨克森语³³⁹。

因为我们在这种研究中所依据的,差不多只限于拉丁文文献中的专有名词,所以,西萨克森语和东萨克森语之间的可证实的语形差别,为数并不很多。这种语形差别只限于两种场合,但是都具有决定的意义。

(1)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面,第二格复数的一切变化,都以 a 为词尾。相反地,在古代西萨克森语、古代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则都以 ô 为词尾。但是,真正的古代萨克森语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种方言是否在这里真正地背离了印格伏南语的规则呢?

恩格伦和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回答了这个问题。在 Ste-dieraburg, Horsadal, W inethahûsen, Edingahûsun, Magathaburg 和其他许多名称里面,复合词之前一部分是复数第二格,并以 a 为词尾。甚至在威斯特伐里亚, a 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记册³⁴⁰中,就有 A ningera lô 和 W ernerâ- Holthûson 字样,而 O snabrûck 一词中的 a,也正是古代的复数第二格。

(2) 法兰克语的阳性弱变化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一样,都是以 o 结尾,跟哥特—印格伏南语以 a 结尾是不同的。古代西萨克森语,照例也同样是 o 结尾;可见,也是跟印格伏南语的习惯不同的。但古代萨克森语,却绝不是全部如此。甚至在威斯特伐里

亚, o 也并不是没有例外; 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记册上, 除了 o 之外, 还有一系列以 a 为词尾的名字 (Siboda, Uffa, Asica, Hassa, Wenda 等等); 在维干德³⁴¹掌握的帕德波恩的文物中, 几乎都是 a, 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有 o; 在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里面, a 差不多处于独占的地位; 因此, 雅·格林 (“德意志语言史”) 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不能不承认, a 和 an (间接格中的) 是通行于民族各部分之间的原始的萨克逊语形。a 之被 o 排斥, 也不单限于威斯特伐里亚。十五世纪初叶, 编年史和其他文献中的东弗里西安语的阳性名词, 几乎总是以 o 为词尾: 例如 Fokko, Occo, Enno, Smelo 等等, 而不是西弗里西安方言里个别场合依然保留着的早先的 a。

由此可以肯定, 西萨克逊语同印格伏南语语法规则上的上述两种差别, 并不是萨克逊语起初就有, 而是由外来的影响所引起的。这种影响, 可以很简单地由这样的事实来说明, 即西萨克逊以前本是法兰克的领土。直到法兰克人的主要部分退出以后, 萨克逊人才越过奥斯宁格山脉和埃格山脉, 逐步地推进到直到今日还仍然是把马尔克和藻厄兰山同贝尔格和济克兰德划分开来的那条边界线。落在后面的现在已经跟萨克逊人混合起来的法兰克人, 他们的影响就表现在 a 被那两个 o 所代替; 就是在今天的方言里, 这种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

三、莱茵—法兰克语言有一种特点流行于鲁尔河到摩塞尔河这一带, 那就是动词第一人称现在时直陈式的词尾为 n; 在后面是一个元音的情况下, 这一点保持得最好^①。例如, (在贝尔格语里)

①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 奥特弗里德³⁴²。——编者注

dat don ek— das tue ich, ek han—ich habe。这种动词形式 (don, han), 通行于全部下莱茵和摩塞尔河流域, 至少达到洛林的边境。这种特点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 已经可以看到了, 例如 bid-don—ich bitte[我恳求], wirthon—ich werde[我成为], 虽然并不彻底。在萨利克方言里, 没有这个 n; 在那里, 在最古的文献³⁴³里, 已经可以看到 ec forsacho[我放弃], gelòbo[我允诺]。尼德兰语也没有这个 n。古代西萨克森语, 不同于法兰克语的只有一点, 即这个 n 仅仅出现在一种动词变化 (即所谓第二弱变化) 上面; 例如, skawôn—ich schauē[我看], thionôn—ich diene[我服务]等等。在盎格魯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 这个 n 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因此不妨作这样的推测, 即这个 n 也是法兰克语在古代西萨克森方言上面留下的遗迹。

除去在文献和其他方面保留下来的许多专有名词以及字迹往往模糊到不能辨认的“萨利克法”注解之外, 关于萨利克方言简直得不到任何其他的遗物了。但是, 凯伦 (“‘萨利克法’注解”) 已经消除了相当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 确定了在许多场合是正确的、在另一些场合是极为可能的原文, 而且证明, 用以书写这一法典的语言是中尼德兰语和新尼德兰语的直接祖先。不过, 这样恢复原状的材料, 当然不能直接应用在语法上的。此外, 我们还只有一张附录于 743 年查理曼敕令之后的简短宣誓书式; 这大概是在勒斯廷的宗教会议上, 即在比利时草拟的。在这里, 我们一开头就碰见了两个典型的法兰克词: ec forsacho—ich entsage[我放弃]。在法兰克人中间说 ec 而不说 ich, 即在今日, 也还是极其普遍的。在特利尔和卢森堡说 eich, 在科伦和亚琛说 ech, 贝尔格一带说 èk。虽然书写的尼德兰语有 ik, 但在民间口语里, 尤其在弗兰德, 人们却

经常可以听到 ek。在古代的萨利克人名里,例如, Segenandus, Segemundus, Segefredus, 一律是以 e 代 i。

在 forsacho 这个词里面, ch 代替了两个元音之间的 g; 这也出现在文物上面和其他场合(例如, rachineburgius), 而且直至今日, 仍然是从普法尔茨到北海之间所有法兰克方言的特点。关于法兰克方言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即常常以 e 代替 i 和以 ch 代替元音之间的 g——我们在分别研究各种方言时, 再来分析。

作为以上研究的结果, (人们还可以拿格林在“德意志语言史”第一卷末尾对于古代法兰克语所说的话和以上的研究结果作比较) 我们打算提出这样一个现在未必还会有什么争议的论点: 法兰克语早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方言, 它是高地德意志语(即首先是阿勒曼尼语)同印格伏南语(即首先是萨克森语和弗里西安语)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 当时还完全处于哥特—低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阶段。要是这一论点可以成立, 那就必须承认, 法兰克人并非由于外部环境而结合起来的不同部落的混合物, 而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基本部落, 乃是易斯卡伏南人, 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吸收了外来的分子, 可是具有同化他们的力量。同样, 我们还可以认为以下这点已经证实: 法兰克部落的两个主要支派, 每一个支派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特有的方言, 法兰克方言已分化为萨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 而且区别这些古代方言的许多特点在今天的民间口语中还继续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些现在仍然生存着的方言。

一、萨利克语还继续生存于两种尼德兰方言, 即佛来米语和荷兰语之中, 而保持得最纯粹的, 是在从六世纪起即已成为法兰克

领土的那些地方。关于这点,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了。自从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发生的大海啸,差不多毁灭了整个西兰省,形成了须德海海湾、多拉尔特湾和亚德湾,从而使弗里西安人之间的政治联系,随同地理上的联系一起中断,从此以后,古代弗里西安残存的自由,在附近的封建诸侯压迫之下,也都化为乌有了,弗里西安语言跟着也几乎到处都消灭了。弗里西安语言在西部被尼德兰语,在东部和北部被萨克森语和丹麦语所限制,或者完全被排斥;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在侵入的语言中留下了显明的痕迹。古代弗里西安的西兰省和荷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成了尼德兰人独立斗争的核心和支柱,正如它们在这以前早已成为国内各主要商业城市的所在地一样。因此,主要是在这里,形成了标准新尼德兰语,而且采用了弗里西安语的因素、单词和字形,而这是应该跟法兰克语的基础区别开来的。另一方面,萨克森语言又从东面侵入了以前的弗里西安领土和法兰克领土。如果想要划出准确的界线,那就要作详细的研究;但是,纯粹的萨利克语,只限于比利时说佛来米语的那些地区——北布拉班特、乌得勒支、赫耳德兰和欧佛赖塞耳,但要除去东面的萨克森语地带。

在以麦士河为界的法兰西语区和莱茵河以北的萨克森语区之间,萨利克人同里普利安人碰了头。双方的分界线,在这里还要详细地确定,关于这点,我们到下面再说。现在,我们首先研究尼德兰语的语法特点。

在元音上,首先令人注意的是像真正的法兰克语那样,i为e所代替,例如,brengen—bringen, K reb—K rippe, hemel—Himmel, geweten—Gewissen, ben—bin, stem—Stimme。这在中尼德兰语里出现得更频繁: gewes—gewiss, es—ist, selber—Silber,

blent—blind。而这在新尼德兰语则为 gewis, is, zil ver, blind。同样地,我在根特附近又找到了两个地方,名叫 Destelbergen 和 Desteld-onck;在那里,就是现在也依然把 Distel 叫做 Destel。在这一点上,完全在法兰克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受到了弗里西安语影响的标准新尼德兰语,跟它就不是那样地一致了。

其次,还有一点跟里普利安语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带有辅音的 m 或 n 之前,以 o 代替 u,然而并不像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那样彻底。在新尼德兰语中,有 konst, gonst, kond, 同时也有 kunst, gunst, kund。另一方面,也有两者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mond—Mund, hond—Hund, jong—jung, ons—uns。

跟里普利安语不同,长音 i (ij) 在发音上变作 ei, 这在中尼德兰语上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 ei 在发音上不是像在高地德意志语里那样 ei= ai, 而是实际上像 e+i, 虽然也不像丹麦人和斯拉夫人的 ej 发音那样的窄。书写出来不是 ij, 而是 ei 的二合元音, 发音与此稍有不同。与此相应,代替高地德意志语的 au 的,是 ou, ouw。

元音交替从语形变化中消失了。在变格上,有单数和复数,在动词变化上,直陈式和虚拟式具有同一的词根元音。相反地,在词的构成上,元音交替则表现为双重形式:(1)一切哥特后期的方言所共有的形式,即 a 经 i 而变为 e;(2)尼德兰语所特有而在以后才发达起来的形式。中尼德兰语,正如里普利安语一样,依然有 hus—Haus[家], brun—braun[褐色的], rum—geräumig[广阔], tun—Zaun[垣篱], 复数则为 huse, brune。新尼德兰语则只有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向所未见的语形,例如, huis, bruin, ruim, tu-

in (ui=高地德意志语的 eu)。相反地,以 eu 代替短音 o(高地德意志语的 u),则已经侵入中尼德兰语了。例如,jeughet 与 joghet 同时并存,新尼德兰语有 jeugd—Jugend[青年]; doghet—Tugend[道德], dor—Tür[门], kor—Wahl[选择],而同时还有带 eu 的语形;在新尼德兰语则只有 deugd, keur, deur。这同十二世纪起在法兰西北部发展起来的语形——以 eu 代替重读的拉丁语 o——,是完全一致的。凯伦注意到了元音交替的第三种情形:在新尼德兰语里,ei 是由 e(ee)的元音交替变成的。所有这三种元音交替形态,都是里普利安语以及其他方言所没有的,是尼德兰语的一种特殊的标志。

Ald, alt, old, olt, uld, ult 变为 oud, out。这种变化,在中尼德兰语里就已经可以看到了,不过,在那里,既有 goudin, houde, scoude(sollte),同时也有 guldin, hulde, sculde,因此,这种转变发生于什么时候,是可以大致确定的。这也同样是尼德兰语的特点,至少它同所有大陆的日耳曼方言是相反的;它在英格兰的郎卡郡方言里反而还存在着;例如, gold, hold, old,在那里是 gowd, howd, owd。

说到辅音,尼德兰语没有纯粹的 g(即意大利语、法语或英语的后舌音 g)。这个辅音的发音像强烈的送气音 gh,在若干音结合中,它和深后舌音(瑞士语、现代希腊语或俄语的)ch 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已经看到,从 g 到 ch 的这种转变,在古代萨利克语中就已经出现了。它也出现在一部分的里普利安语和在以前法兰克土地上形成的萨克森方言里,例如,在闵斯德,也跟在贝尔格语里一样,甚至单词的开头的 j,特别是在外来语里,在某些场合发音也和 ch 一样,人们在那里可以听到 Choseph,甚至可以听到 Chahr

(Jahr)。倘使摩·海奈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在古福音诗中 j, g 和 ch 的常常彼此换用和互押头韵,就不致于使他感到困惑了。

在单词的开头,尼德兰语有时还保留着 wr, 例如 wringen—ringen [扭夺], wreed—grausam [残忍的], wreken—rächen [复仇]。在里普利安语里,也有这一方面的残迹。

从弗里西安语里,采纳了将指小词词尾 ken 软化为 tje, je 的办法,例如, mannetje—Männchen [小人儿], bietje—Bienchen [蜜蜂儿], halsje—Hälschen [围脖儿], 等等。不过,也有保留 k 的,例如, vrouken—Frauchen [爱妻], hoeteken—Hättchen [小屋]。在佛来米语里,至少在民间语言里, k 却保留得更好:布鲁塞尔的著名的小人儿叫做 manneken—pis³⁴⁴。可见法国人的 mannequin, 英国人的 mannikin, 都是从佛来米语那里借来的。两者词尾的复数为 vroukens, mannetjes。这个 s, 我们在里普利安语里还会看到。

尼德兰语同萨克森诸方言,甚至同斯堪的那维亚诸方言共同的地方,是元音之间的 d 的脱落,特别是两个 e 之间的 d, 例如, leder 和 leer, weder 和 weer, neder 和 neer, vader 和 vaer, moeder 和 moer—Mutter [母]。

尼德兰语的变格显示着强变化和弱变化语形的完全的混合,而因为在复数时无元音交替,所以尼德兰语复数的形成,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是与里普利安语或萨克森语一致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语言的一种极其显著的特点。

萨利克语和里普利安语同一切印格伏南方言共同的地方,是 er, der, wer 等主格标志的脱落,即在尼德兰语里是 hij, de (冠词) 和 die (指示代词), wie。

动词变位的分析,会使我们跑得过远。上面讲过的,已经足够

使我们在任何地方将现代的萨利克语言跟其他邻接的各种方言区别开来。对尼德兰的民间方言进行更精密的研究，一定还能获得许多重要的东西。

二、**莱茵法兰克语**。我拿这个名称表示其余一切的法兰克方言。我在这里不照旧的办法把里普利安语跟萨利克语对立起来，是有充分理由的。

阿尔诺德³⁴⁵就已经注意到：真正的里普利安人是住在一块比较狭小的地区，其南面境界大体可用两个同名为莱夫费尔舍伊德的村落（在阿得瑙和什莱登附近）作标志。这一点正确之处在于：这样一来，就能在语言方面也把**纯粹的里普利安人**的地区，同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在其他日耳曼部落之后或者和他们同时占据的地区划分开来。但是，由于“下法兰克语”这一名称已经获得了另外的意义，而且这一名称还包括了萨利克语，所以，我只好把在萨利克语区和这条界线之间的地区通用的相近的方言语族，统称为里普利安语——狭义的里普利安语。

1. **里普利安语** 这一方言语族同萨利克语的分界线，是同荷兰—德意志的边境线决不相符的。相反地，在莱茵河右岸，还有雷斯区的大部分属于萨利克语的范围，而在这里的威塞尔地区，则为萨利克语、里普利安语和萨克森语接触之外。在莱茵河左岸，属于萨利克语的，则有克列维和格耳德恩，并且大约延伸到下面这条线：从莱茵河起，经过克散滕和威塞尔之间，南到符律恩村（在默尔斯之西），并从那里起，西南到文洛为止；要想划出更精确的界线，只有到当地去才行，因为经过了荷兰多年的管辖，不单在格耳德恩，而且在默尔斯伯爵领地，都有许多带有萨利克—尼德兰语形的里普利安的名称保留在地图上面。

从文洛地区往上去,麦士河右岸的大部地区大概都讲里普利安语,因此在这里,政治上的界线并未在任何地方穿过萨利克语地区,却总是穿过里普利安语地区,而后者几乎伸展到马斯特里赫特附近。带 heim(不是 hem)的地名以及带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语形 ich 的地名,在这里,大量地出现在荷兰领土上。再往南去,便有了带 broich(荷兰的 broek)并有辅音音变的地名,例如鲁尔蒙特附近的 Dallenbroich,以及带 rade 的地名(锡塔特附近的 Bingelrade,以及那里的 Amstenrade、Hobbelrade 和六、七个这一类的地名);那已落入比利时之手的麦士河右岸的一小片德意志土地,则完全属于里普利安语范围以内(拿距离麦士河 9 公里的 Krützenbergt 同文洛北面的 Kruisberg 相比)。甚至在麦士河左岸,在比利时境内名叫灵堡的地方,我也发现,马宰克附近有 Ke-ssenich,麦士河畔有 Stockheim 和 Reckheim,马斯特里赫特附近有 Gellik,这就证明这里居住的并非纯粹的萨利克居民。

里普利安同萨克森的界线,自威塞尔附近向东南延伸,愈往前离莱茵河愈远,在法兰克方面的鲁尔河畔缪尔海姆、韦尔登和萨克森方面的埃森之间穿过,直达贝尔格同马尔克的边界,这条边界线直至今日,仍然是莱茵省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这条线直到奥耳珀以南,才同那条边界分离,由此向东,将法兰克语的济克兰德同萨克森语的藻厄兰山分开了。再向东去,很快就到了黑森方言区。

同我称为中法兰克语的那种方言为邻的上述南面边界,是和旧日的阿瓦耳高、崩高和埃弗利亚等区的南面边界大体相符的,并由此西去,稍稍偏南,进入瓦龙语的区域。这样划定的领域,包含古代的里普利安大区及其北面和西面邻接的区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里普利安语在许多方面是和尼德兰语一致的,不过,中尼德兰语却较新尼德兰语跟它更为接近。在里普利安语的发音中,与新尼德兰语相一致的地方是 $e\bar{=} e+i$,以 ou 代替 au ;以及 i 到 e 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里普利安语和中尼德兰语里比新尼德兰语更为彻底;中尼德兰语的 $gewes, es, blend, selver$ (Silber [银]),即在今日也还完全按照里普利安语发音。与此相同而且更为彻底的是,在后面紧跟着辅音的 m 或 n 之前的 u ,变为 o 。例如 $jong, lomp, domm, konst$ 。如果后面紧跟着辅音是 d 或 t ,则这个 d 或 t 在某些方言中就变为 g 或 k ;例如 $honk$ —Hund[狗],复数为 $hõng$;在这里, k 变为浊音 g ,是受到脱落掉的结尾元音 e 的影响。

相反地,里普利安语的元音交替的情形同尼德兰语有显明的差别,一般地说,它同高地德意志语是一致的,而在个别的例外场合之下(例如以 $hanen$ 代替 $Hähne$ [雄鸡]),则同萨克森语一致。

词首的 wr 变为清音 fr ,这保存在 $fringen$ (将布等等中的水拧干)和 $frèd$ (即荷兰语的 $wreed$,意为锻炼)中。

以 $hè, dè, wè$ 代替 er, der, wer 。

变格处于高地德意志语和萨克森语间的中间地位。以 s 构成复数是常见的,但几乎从来不与尼德兰语相同;这个 s ,在当地的高地德意志语上,完全符合于语言发展的过程而变成了 r 。指小词词尾 $ken, chen$,在 n 之后变成了 $schen$,如 $männchen$,复数与尼德兰语相同,也有 s ($männches$)。这两种语形,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洛林。

在 s, st, d, t 和 z 前的 r 被省略了; r 之前的元音,在某些方言中仍然是短音,在另一些方言中则为长音。例如, $hart$ 变为 $hatt$

(贝尔格语)和haad(科伦语)。在这里,由于南德意志语的影响, st 战变作 scht, 例如 Durst, 在贝尔格语里为 doascht, 在科伦语里为 döscht。

同样,由于高地德意志语的影响,词首的 sl, sw, st 和 sp 都变成了 schl, 等等。

像尼德兰语一样,里普利安语也没有纯粹的 g。位于萨利克语边界线上的一部分方言,譬如贝尔格方言,词首和词中间的 g 也变成了送气音 gh, 但比尼德兰语要软些。其余的方言都有 j。在词尾上, g 到处都像 ch 那样发音,但不像硬的尼德兰语的 ch, 而像软的莱茵—法兰克语的 ch, 发音类似硬化了的 j。里普利安语在实质上所具有的低地德意志语的性质,可由以 boven 代替 oben 这样一些词语而得到证明。

大部分的清辅音,到处都还处于辅音音变的第一阶段。只有南方方言中的 t 以及词中和词尾的 k, 有时还有 p, 才具有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在这些方言中, lōten—lassen[放置]变做 lōsze, holt[树木]变做 holz, rik—reich[富]变做 rich, ek—ich[我]变做 êch, pipe—Pfeife[笛]变做 pief。但 et, dat, wat 和另外一些词,却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并未彻底实现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在三种场合下的侵入,成为通常划分中法兰克语和下法兰克语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原来是一种由一定的声音关系——如上所指明的——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整个方言语族(并且这在民众意识中现在还认为是相互连在一起的),现在却任意地、根据一种完全偶然的标志把它们分开了。

我说,这完全是偶然的。其他的中德意志方言,如黑森、绍林

吉亚、上萨克森等方言，每一种方言自身，总的说来，都是处于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一定阶段上。自然，它们所表现出的辅音音变，可能在低地萨克森的边界上略少些，而在南德意志的边界上较多一些，但这顶多不过形成地方的差别。相反地，在北海沿岸、麦士河畔以及下莱茵的法兰克方言，却绝无任何的辅音音变，而在阿勒曼尼亚的边界上则差不多只有阿勒曼尼亚的音变；在这两种类型之间，至少还有三个过渡阶段。由此可见，辅音音变已经侵入独立发展了的莱茵—法兰克语之中，而将其分裂为若干部分。这种辅音音变的最后痕迹，不一定是消灭在一个过去存在过的特殊的方言语族的边界上；它也可能死亡在这一方言语族的内部，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相反地，实际构成方言的辅音音变的影响，像下面所要指出的那样，一定是停止在两个原来就有区别的方言语族的边界上。schl, schw 等等和词尾的 scht, 不也是同样地，而且在更晚得多的时候，从高地德意志语侵入到我们这里来的吗？而这些——至少是其中的第一批——甚至深入到了威斯特伐里亚。

早在部分里普利安方言中的 t 和词中、词尾的 k 以及 p 发生音变以前，里普利安诸方言已形成了一种稳固的语族。此种变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侵入于该语族的内部，对于这一语族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现象。诺伊斯的方言，同克雷弗尔德方言和明兴—格拉特巴赫的方言，甚至在外地人完全听不出来的细微之点上也是一致的。虽然如此，其中一种却被称为中法兰克语，一种被称为下法兰克语。贝尔格工业地区的方言，在不易觉察之中，一步步地转变成了西南莱茵平原的方言。可是，它们却似乎是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方言语族。每一个熟悉这些地区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来，在这里，书斋里的博学者是把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

不知道的活生生的民间方言，硬套在他们削足适履地 a priori (预先) 虚构出来的特征的框框里去。

这种纯粹表面上的区别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结果是，人们把各种南里普利安方言在所谓中法兰克语的名称之下，跟其他的方言混杂在一起，而如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南里普利安方言同这些方言的关系，比同所谓下法兰克方言是更为疏远的。可是，另一方面，结果却留下一条狭长的地带，人们不知如何去对付它，最后，只得将其中的一片宣称为萨克森语地区，而将另一片宣称为尼德兰语地区，这跟这些方言的实际情形是很不符合的。

我们试举贝尔格方言为例来看看吧，这一方言是布劳涅毫不迟疑地肯定地称为萨克森语的。这种方言，我们知道，它的直陈式现在时复数三种人称都是完全相同的，而法兰克语的古代形式则为 nt。在贝尔格方言里，凡是 m 和 n 后面紧跟着辅音时，m 和 n 前的 u 一律以 o 去代替，按照同一布劳涅的意见，这绝非萨克森语所具有的情况，而是下法兰克语所特有的现象。上述里普利安语的这一切特征，乃是其他里普利安方言所共有的。它在不易察觉之间，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农户到另一个农户，变成了莱茵平原的方言，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边境上同萨克森方言截然地分开了。在日耳曼尼亚全境，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找到像这里所看见的这样突出的语言界线。语言上的差别是多么大啊！全部的元音发音法就像是彻底改变了；开口度最宽的 ai 直接地与开口度窄的下法兰克语的 ei 对立，正如 au 同 ou 相对立一样；在为数甚多的二合元音和半元音之中，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这里的 sch 跟日耳曼尼亚其他各处是一样的，而那边的 s+ch 则与荷兰相同；这里是 wi hant，那边是 wi hebbed；这里的复数使用双重的形式 get

和 enk, ihr 和 euch; 那边则只有 ji, i 和 jü, ü。这里把麻雀 [Sperling] 用普通的里普利安语称为 Mösche, 那边则用普通的威斯特伐里亚语叫 Lünig。至于其他为贝尔格方言所独有的特征就不必谈了, 这些特征一到边界上, 也都同样地突然消失了。

一个外国人最能体会到一种方言的特质, 是当他所遇到的人们不说方言, 而说他懂得的高地德意志语的时候, 这种高地德意志语, 在我们德国人这里, 在大多数场合之下, 是受到了方言的强烈影响的。可是贝尔格工业地区的所谓萨克森居民和莱茵平原的居民(他们可能是说中法兰克语), 除去一方稍强的送气音 gh, 在另一方作 j 的发音而外, 如非本地土生土长的人, 是绝对听不出他们说话的差别的。但是, 贝尔格的赫金豪斯人(来自上巴门, 在乌培河左岸), 跟住在东面不到一公里远的马尔克的兰格斐特人, 他们在日常讲话上所用的本地高地德意志语, 其差别之大, 远远超过赫金豪斯人同科布伦茨人之间的差别, 至于亚琛人或波恩人, 那就更不消说了。

对于莱茵法兰克人来说, 甚至 t 和词尾 k 的音变的侵入, 并未造成一种语言分界的印象; 甚至在他们极其熟悉的地方, 他们也不得不先想想 t 同 z, k 同 ch 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 而当他们越过这个界线的时候, 两者的发音, 对于他们都是一样地顺口。由于许多带有发生音变的 sz, z, ch 和 f 的高地德意志单词侵入于方言之中, 这就显得更容易了。十四世纪的古贝尔格诉讼法典(拉康布累“档案”第一卷第 79 页及以下各页³⁴⁶)提供了一种显明例证。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 zo, uiss (aus[自]), zween[两个], bezahlen[支付]; 与此相并, 同一文句中还有 setten[使坐下], dat nutteste (nütteste [最有用的]); 与 reicket (reicht[他达到])相并, 还有 Dache[屋

顶], redelich[诚实];与 verkouffen[出售]相并,还有 upladen[装上], upheven[举起], hulper (Helfer[助手])。在第 85 页上的另一段里,甚至交错地出现了 zo 与 tho (zu[到])。简单地说,山岳地带的方言跟平原的方言经常地交错在一起,甚至一点也没有引起书写人的困惑。像往常一样,波及法兰克领土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最后的波浪,是最弱最小的。指出它所达到的界线,的确是饶有趣味。但是,这不会是一条方言的界线;它不可能将一个自古就具有近亲关系的独立的方言语族彼此分开,也不能作为借口,来违反一切语言上的事实,把那硬用强力撕开的破片划入关系较为疏远的语族中去。

2. 中法兰克语 从上面所讲的可以明显地看出,我认为中法兰克语的北面边界比通常所划定的边界要偏南得多。

由于莱茵河左岸中法兰克地带在克洛维时代看来曾经被阿勒曼尼人所占据,这就使得阿尔诺德有了理由在当地的地名中去寻找阿勒曼尼人移居的痕迹;并得出结论说:直至科伦—亚琛这一条线上,可以确定在法兰克人之前曾有过阿勒曼尼人的居民;不消说,这样的痕迹,在南方最常见,往北则愈来愈少。他说,这些地名表明,阿勒曼尼人曾经短期推进到科布伦茨和亚琛的境界以外,并在较长时期之内,占领了韦特劳和南部拿骚的地方。因为带有纯粹阿勒曼尼语词尾的名称,如 ach, brunen, felden, hofen, ingen, schwand, stetten, wangen 和 weiler, 这些都是在纯粹的法兰克土地上所绝对看不到的,而从亚尔萨斯起,在全部普法尔茨、莱茵黑森和莱茵普鲁士,却到处散布着,只是愈向北愈少,愈来愈让位于主要为法兰克语词尾的名称,如 bach, berg, dorf, born, feld, hausen, heim, scheid 等(“德意志的古代”³⁴⁷)。

我们首先研究中法兰克土地上的所谓阿勒曼尼的名称。brunnen, stetten, felden, wangen 等词尾,我在莱曼的地图³⁴⁸(应当指出,这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地图)上,在这个地区内,任何地方也未找到过。Schwand 这个词尾曾见于文威累尔附近的 Metzelschwand 庄园,再见于兰德施土尔北面的 Schwanden。因此,两处都是在南法兰克的普法尔茨,而这和我们眼下研究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至于词尾 ach——我们沿着莱茵河可以看到圣哥阿尔附近的 Kreuznach, Bacharach, Hirzenach, 科布伦茨附近的 Rübenaach (在施普鲁奈尔—门克的分区图³⁴⁹上则为 Ribiniacus)。Andernach (即罗马的 Antunnacum),以及 Wassenach。因为在整个莱茵河左岸,在罗马时代到处都出现有罗曼语化的克尔特语词尾 acum; 例如, Tolbiacum—Zülpich, Juliacum—Jülich, 贝克海姆附近的 Tiberiacum—Ziewerich, Mederiacum; 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顶多也不过是在语形的选择上,即以 ach 代 ich,才显示出阿勒曼尼人的影响。只有 Hirzenach (= Hirschenbach) 这一个词毫无疑问是德意志语,而以前在分区图上,却写的是 Hirzenowe = Hirschenau [鹿的草场],而不是 Hirschenbach [鹿的溪]。但是,位于比德里赫和莱茵贝尔格之间、紧邻萨利克边境的 Wallach, 却如何去解释呢? 这总可以肯定地说它不是阿勒曼尼人的村落吧。

摩塞尔河流域也还有一些 ach; 例如别恩堡东面的 Irmenach, 特利尔附近的 Waldrach, Crettnach, 萨尔河畔的 Mettlach。在卢森堡有 Echternach, Medernach, Kanach; 在洛林,只有在摩塞尔河右岸有 Montenach, Rodlach, Brettnach。纵然我们可以承认,所有这些名称都意味着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它们为数也是很少的,而且其分布地点也并未超出中法兰克领土的最南部。

剩下的还有 weiler, hofen 和 ingen, 需要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

首先, 词尾 weiler 并不能无保留地算做阿勒曼尼语, 而是外省拉丁语的 villarium, villare, 而且在罗马帝国旧的疆界以外, 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之下才能遇到。villare 之德语化为 weiler, 并非阿勒曼尼人的特权, 只不过是他们的偏爱, 把这种词尾大量地使用于新的移住地而已。仅仅在罗马的 villaria 出现的地方, 法兰克人才被迫把这个词尾德语化为 wilare, 其后又变做 weiler, 或者完全把它丢掉不用。大概他们有时采用这种方法, 有时又采用另一种方法, 同样地, 他们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 weiler 称呼新的移住地, 不过比阿勒曼尼人要少得多。从亚琛附近的 Eschweiler 以及从 Ahrweiler 往北去, 阿尔诺德连一个以 weiler 为词尾的比较重要的地名也找不到。不过, 地点的现代的意义, 是和问题全然无关的; 事实是, 在莱茵河左岸, 以 weiler 为词尾的地名一直向北几乎延伸到萨利克边界 (Garzweiler 和 Holzweiler, 距离说尼德兰语的最近的格耳德恩地方还不到 5 英里); 在 Eschweiler 和 Ahrweiler 这一线之北, 带有此种词尾的地名至少也有二十个。这样的地名, 自然, 最常见于由马斯特里赫特经幽里希而抵科伦这一条旧日罗马大道的近处; 其中有两处, 即 Walwiller 和 Nyswiller, 甚至位于荷兰领土上; 这也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吗?

更向南去, 在艾费耳高原, 这样的地名几乎一个也没有, 在马尔美提地段 (莱曼地图, 第 159 图) 连一个也见不到。在卢森堡, 这样的名称也很少, 在摩塞尔河下游直到洪斯吕克出的脊背上, 也同样地不多见。相反地, 在摩塞尔上游, 这种名字在河的两岸都很多, 向东去更多, 从萨尔鲁伊向东去, 这个词尾愈来愈占支配地位。

不过,从这里起,已经开始出现了南法兰克语言,而且,在这里,任何人也不会否认,阿勒曼尼人曾在法兰克人之前占领过这一带土地。

因此,在中法兰克和里普利安领土上,这些 weiler,跟法兰西为数极多的 villers 一样,并不能证明这些地方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

现在我们来研究 hofen。这个词尾更加不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它出现在整个法兰克,其中包括后来由萨克森人占领的今天的威斯特伐里亚。在莱茵河右岸只有几个例子:在鲁罗尔特附近的 W ehofen,杜斯堡附近的 M ellinghofen 和 Eppinghofen,梅特曼附近的 Benninghofen,丁斯拉肯附近的另一个 Eppinghofen,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多尔斯滕附近的 K ellinghofen,卡斯特罗普附近的 W esthofen,还有 W ellinghofen, W ichlinghofen, N iederhofen,两个 Benninghofen, Berghofen, W esthofen, W andhofen——所有这些都在赫耳韦格,等等。直至异教时代,在阿格尔河岸还有 Ereshofen,即 M artis villa [玛尔斯城],单从战神在这里被称为 Eru 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说这里有阿勒曼尼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自称为 T iu wàri,因之,不称他们的神为 Eru,而称为 T iu,以后经过辅音音变,成为 Ziu。

在莱茵河左岸,说 hofen 是起源于阿勒曼尼语,就更不行了。在这里,又有一个 Eppinghofen 在克散滕的东南方,因而,也许这里已经是属于萨利克人的了,从这里向南去,在全部的里普利安领土上,除了个别庄园以 hof 为词尾以外,到处都麇集着 hofen 的地名。我们一经踏上萨利克的领土,那就更糟糕。沿麦士河的两岸,从法兰西语言的界线起,到处都是 hofen。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

看看西岸。在那里,我们在荷兰和比利时至少可以找到7个Ophoven,在荷兰有Kinckhoven等等;在比利时,我们首先看看勒文地段(莱曼地图,第139图)吧。这里有汤格恩附近的Ruykhoven, Schalkhoven, Bommershoven, Wintershoven, Mettecoven, Helshoven, Engelmanshoven, 哈塞耳特附近的Zonhoven, Reekhoven, Konings-Hoven; 更往西去,有Bogenhoven, Schuerhoven, Nieuwenhoven, Gippershoven; 圣特罗伊登附近的Baulershoven; 极西处,在提耳蒙(提楠)的东面和东北面,有Gussenhoven和Droenhoven。在特瑙特地段(第120图)至少有33个hoven,大多数都在比利时领土以内。再向西南去, hove(第三格词尾n在这里一律省略了)分布于全部法兰西语言的边界线上:从尼诺夫(它自己就是一个罗曼语化了的 hove)附近的Heerlinkhove和Nieuwenhove起(这中间,大约还有10个,我都略去了),到迪克斯莫伊德附近的Ghyverinckhove和Pollinchove以及法属弗兰德的圣奥梅尔附近的Volkerinckhoveo。Nieuwenhove出现了三次;这就证明这一词尾仍然活在人民之中。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以hof为词尾的个别的庄园。由此可见,所谓hofen专属于阿勒曼尼语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最后,谈谈ingen。用ing, ung来表示同一的起源,这对整个的日耳曼民族都是共同的。因为移住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所以这一词尾,在各处地名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这个词尾,用第二格复数同一个地方的词尾结合起来;例如,明登附近的Wolvaradingahusun, 英格兰的Snotingaham(诺定昂)。有时,这一词尾的复数即可单独构成地名;例如,荷兰弗里斯兰省的Flissinghe(符利辛根), Phladirtinga(符拉尔丁根), Crastlingi和古代萨

克森的 Grupilinga, Britlinga, O tlinga。这些名称,现在大多数都已还原为第三格,并且以 ingen 为词尾,而 ing 则很少见。大多数的部落都熟悉并使用这两种语形;阿勒曼尼人似乎偏爱后一种,至少就目前说是这样。寥拉赫近处的 Rümmingen,从前(764年)叫做 Romaninchova,所以,士瓦本的 ingen,许多都是出于较近的起源的(蒙奈“巴登地方古代史”第1卷第213页³⁵⁰)。瑞士的 kon 和 kofen,差不多都是由 inghofen 缩写而成的;例如, Zöllinchovon—Zöllikofen, Smarinchowa—Schmerikon, 等等。参看弗·博伊斯特:“苏黎世州的历史地图集”³⁵¹。在这本书里面,这样的地名,在那代表阿勒曼尼人时代的第三图上,整打整打地出现。但是这样的名称也同样出现在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中间,因此,一看到有些地名带有 ingen 的词尾,马上便断定那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就未免太大胆了。

上面举出的名称证明,ingas(复数第一格)和 ingum, ingon(复数第三格)这样的名称,从些耳德河到易北河,不论在弗里西安人或萨克森人那里,都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即在今日,在全部下萨克森 ingen 也依然不稀罕。在威斯特伐里亚,单是在鲁尔河两岸,翁纳—左斯特一线以南,除开 ingsen 和 inghausen 不算,至少可以找到 12 个 ingen。只要是在法兰克领土上面,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以 ingen 为词尾的地名。

在莱茵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荷兰,莱茵河畔有 Wageningen, 艾塞耳河畔有 Genderingen(在这里,我们将一切可能是弗里西安的名称除去);在贝尔格地区有 Huckingen, Ratingen, Ehingen(紧接着,在萨克森的领土上,有 Hattingen, Sodingen, Ummingen), 韦尔登附近有 Heisingen(格林认为这来自塔西

佗的 Silva Caesia[凯西亚森林],可见已很古远), Solingen, Husingen, Leichlingen (在分区图上则为 Leigelingon, 可见已有上千年之久), Quettingen 以及济克河畔的 Bödingen 和 Röcklingen, 另有两个以 ing 为词尾的地名尚未计算在内。莱茵布罗耳的 Hönningen 以及维德河一带的 Ellingen, 构成了同莱茵河、兰河、迪耳河各地之间的联系, 在这里, 至少也有 12 个 ingen。再往南去找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阿勒曼尼人确曾移住过一个时刻的地方, 已经从这里开始了。

在莱茵河左岸, 在荷兰的奈梅根的上面有 Millingen, 克散滕下面有 Lüttingen, 莱茵贝尔格下面还有一个 Millingen, 其次还有 Kippingen, Rödingen, Höningen, Worryngen, Fühlingen, 都在科伦的北面, 在布吕耳近处有 Wesselingen 和 Köttingen。从这里起, 以 ingen 为词尾的地名, 分两个方向向前伸展。在上艾费耳高原, 这样的地名很少; 在法兰西语言边界线上的马尔美提, 我们看到有 Büllingen, Hünningen, Mürringen, Iveldingen, Eibertingen, 它们成了在卢森堡以及在普鲁士和洛林境内的摩塞尔河上游为数极多的 ingen 的过渡。另一条连结线, 则顺着莱茵河及其沿岸谷地(阿尔河地区——7 到 8), 最后又沿着摩塞尔谷地走向特利尔上面一带去; 在这里 ingen 占到支配的地位, 不过, 首先是结尾为 weiler 的名称, 然后是结尾为 heim 的名称把它跟大多数的阿勒曼尼—士瓦本的 ingen 分开了。因此, 如果我们按照阿尔诺德的要求, “在情况的相互联系上去考虑一切情况”³⁵², 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结论: 德意志境内摩塞尔河上游地带的 ingen, 是法兰克人的, 不是阿勒曼尼人的。

当我们从亚琛附近的法兰西—里普利安语的语言界线开始,

在萨利克语的领域探寻 *ingen* 的时候,我们立即就会更加明白,我们在这里是无须借助于阿勒曼尼人的。在麦士河西岸的马宰克近处有 *Geystingen*, 再向西去,在布雷附近有 *Gerdingen*。其次,倘使我们再拿第 139 图勒文地段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在汤格恩、圣特罗伊登及哈塞耳特,有 *Mopertingen*, *Vlytingen*, *Rixingen*, *Aerdelingen*, *Grimmersingen*, *Gravelingen*, *Ordange* (而不是 *Ordingen*), *Bevingen*, *Hatingen*, *Buvingen*, *Hundelingen*, *Bovelingen*, *Curange*, *Raepertingen*, *Boswiningen* 和 *Wimmertingen*, 等等。最西部,离勒文不远的地方有 *Willebringen*, *Redingen*, *Grimmingen*。在这里,联系似乎中断了。可是,当我们走进那个目前在讲法兰西语、而在六到九世纪之间两种语言在进行斗争的地区,我们就可以发现,从麦士河起有整整一个法兰西语化了的 *ange* 的地带;这一语形,在洛林和卢森堡同 *ingen* 相对应;自东向西走,有 *Ballenge*, *Roclinge*, *Ortrange*, *Lantremange*, *Roclinge*, *Libertange*, *Noderange*, *Herdange*, *Oderinge*, *Odange*, *Gobertang*, *Wahenges*; 再稍向西去有伐佛尔附近的 *Louvenge* 和滑铁卢附近的 *Revelinge*, 它们跟 *Huysingen* 和 *Buisingen*, 也就是跟散布在布鲁塞尔西南、自哈耳到希腊蒙这条语言分界线上的二十多个 *ingen* 之群的前哨联系起来。最后,在法属佛兰德有 *Gravelingen*, *Wulverdinghe* (就是古代萨克森的 *Wolvaradinges-hûsun*), *Leubringen*, *Leulinghen*, *Bonninghen*, *Peuplingue*, *Hardinghen*, *Hermelinghen*; 在圣奥梅尔附近直到布伦后面,有 *Herbinghen*, *Hocquinghen*, *Velinghen*, *Lottinghen*, *Ardinghen*, 所有这些,同在这一地区为数极多的以 *inghem* (—*ingheim*) 为词尾的地名,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由此可见,阿尔诺德认为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 3 个词尾,已

经证明也同样是法兰克人的词尾，因此，想根据这些地名来证明在中法兰克领土上，在法兰克人移住之前曾经有过一次阿勒曼尼人的移住，这种企图必须认为已经失败了。不过，在这一地带的东南部，曾经存在过一种不甚强大的阿勒曼尼人的因素，这种可能性还是可以承认的。

阿尔诺德从阿勒曼尼人转而谈到卡滕人。除开真正的里普利安人以外，这些卡滕人在阿勒曼尼人之后和与之同时，占据了Ripuaría(里普利安)区以南的领土，也就是我们称为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的地方。这一点的根据也在于这个地方除去阿勒曼尼亚的地名以外，还有黑森的地名：

“直至阿勒曼尼亚的境界，莱茵河两岸地名的相同是这样地惊人而惹人注意，如果说这是偶然的，那倒是真正的奇迹了；相反地，只要我们假定一下，移住者把他们故乡的地名也带往新的移住地，就像目前美洲天天都在发生的那样，那末，这便显得极其自然了。”³⁵³

要反对这个论点，理由是很少的。而说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同在整个的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地方的移住毫无关系，并且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只有阿勒曼尼人和卡滕人，这样的结论，就更少有理由来反对了。大部分离开故乡向西迁移的卡滕人(如像过去巴达维人、塔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那样)，大概早就跟易斯卡伏南人结合在一起了。那末，他们究竟移向何处去了呢？在公元最初两世纪之间，卡滕人只是在背后通过绍林吉亚人，才同其余的赫米诺南人联系起来的；一方面有印格伏南族的凯鲁斯奇人，另一方面有易斯卡伏南人，而在前面还有罗马人。后来统一成为阿勒曼尼人的赫米诺南各部落，是从日耳曼尼亚内部出来的；这些部落同卡滕人在数世纪之间被绍林吉亚人及其他的民族所隔断，因此同

他们的关系要比他们同易斯卡伏南族的法兰克人疏远得多，因为他们和法兰克人有数百年之久的战友情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卡滕人的参加该地的占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而不把里普利安人算在里面，这一点倒是可疑的。这只有在这里没有出现里普利安所特有的地名时，才能认为是被证实了的。但事实却正相反。

在阿尔诺德举出的那些作为法兰克语所特有的词尾之中，hausen 是法兰克人、萨克森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所共有的；heim 在萨利克语里读做 ham；bach 在萨利克语和下里普利安语里读做 beek；在其他词尾之中，只有 scheid 在实际上是特殊的。它是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正如 ich, rath 或 rade 和 siepen 那样。其次，两种法兰克方言所共有的还有 loo (loh), donk 和 bruch 或 broich (萨利克语——broek)。

Scheid 只出现在山上，而且照例都是在分水岭的地方。法兰克人在整个威斯特伐里亚的藻厄兰山，都留下了这个词尾，一直达到黑森的边境，在这里，它只作为山地的名称出现，东面直到科尔巴赫。在鲁尔河，与古代法兰克语的 scheid 相对应的是经过萨克森语改造的词尾 schede，例如，M elschede, Selschede, M eschede；在这里，同时还有 Langscheid, Ramscheid, Bremscheid。在贝尔格地区常见的这种词尾，在莱茵河右岸直至韦斯特林山都可以看到，再往南就没有了。相反地，在莱茵河左岸，不消说，只有到了艾费耳高原才开始出现 scheid^①；在卢森堡，这种地名至少有 21 个；在

① 在平原上，我只有在比利时灵堡的哈塞耳特东面找到了 W aterscheid，而在这里，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看到有显著的里普利安语的混合物了。[见本卷第 575—576 页。——编者注]

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里,它经常出现。但是,正如在兰河以南那样,在这里,在洪斯吕克山和臧林山的东面和南面,与之并列地又出现了一个似乎是黑森语化的语尾 *schied*。这两种语形并列向南,越过纳埃河直达佛日山脉,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顿奈斯山西面有 *Bisterscheid*,在凯则尔斯劳顿附近有 *Langenscheid*,在霍赫施派耶尔南方有 *Breitscheid* 高原,在比奇附近有 *Haspelscheid*,吕特策耳施泰因北面有 *Scheidwald*;最后,作为最南面的前哨是在多农山北坡的 *Walscheid*,这比阿尔诺德认为是卡滕人最远的前哨的萨尔堡附近的黑森村,更要偏南些。

其次,里普利安语所专有的语形还有 *ich*,它跟 *ach* 一样,都是从同一个哥特萨词根 *ahva—Wasser*[水]来的;正如 *Tiberiacum* 所表明的那样,两者也都把比利时—罗马语的 *acum* 德语化了,在分区地图上写做 *Civiraha*,现在则为 *Ziewerich*。在莱茵河右岸,这样的词尾不太多;鲁罗尔特附近的 *Meiderich* 和 *Lirich* 是最靠北面的;从那里起,这一词尾沿莱茵河前进,直达 *Biebrich*。在莱茵河左岸的平原上,从威塞尔河对岸的 *Büderich* 起,到处有这个词尾;经过艾费耳高原,伸展到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但在 *scheid* 和 *roth* 尚未停止出现以前,它就在臧林山和纳埃河地方消失了。相反地,在这个地方的西部,这一词尾却继续前进,直达法兰西语言的界线,并且更向前去。在特利尔地方,这一词尾为数甚多,我们不去管它;在荷兰的卢森堡,这样的词尾我找到了 12 个;还是在那一边,在比利时,有 *Törnich* 和 *Merzig* (*Messancy—ig* 的写法毫无改变,词源和发音是相同的)。在洛林,摩塞尔河以西有 *Soetric*, *Sentzich*, *Marspich*, *Daspich*; 以东有 *Kintzich*, *Penserich*, *Kemplich*, *Destrich*, 两个 *Kerprich*, *Hibrich*, *Helsprich*。

词尾 rade、rad、莱茵河左岸的 rath, 也远远超出了它们古代里普利安故乡的境界。它布满了全部的艾费耳高原和摩塞尔河中下游的谷地及其旁边的谷地。在 scheid 和 schied 混合起来的同一地方, 在莱茵河两岸, 除 rad 和 rath 之外, 也同样出现了 rod 和 rath; 这也同样起源于黑森语。只有在莱茵河右岸, 在韦斯特林山, rod 向北走得更远。在霍赫瓦尔特山脉, 山北面为 rath, 山南面则通例为 roth。

向前推进得最少的是 siepen, 音变为 seifen。这个词的词义是指有急流的小谷, 现在也到处都是依然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莱茵河左岸, 它越过古代里普利安的境界并不远, 在右岸, 它出现在尼斯特河上的韦斯特林山, 还出现在兰根施瓦耳巴赫(兰根泽芬)附近。

研究其他的词尾, 会使我们跑得太远了。但是, 不管怎样, 自宾根沿莱茵河溯流而上, 深入阿勒曼尼人的领土, 并且在凡有法兰克人定居的地方到处都有的那无数的 heim, 我们都可以宣称, 那不是卡滕人的, 而是里普利安人的。它们的故乡不是黑森, 因为在那里, 它们很少出现, 似乎是以后才侵入的, 而是萨利克和科伦周围的莱茵平原, 因为它们在这里出现的次数, 跟其他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名称差不多相等。

因而, 这一研究的结果是说明, 里普利安人绝对没有因黑森人迁徙的浪潮而被阻止于韦斯特林山和艾费耳高原附近, 恰恰相反, 甚至整个中法兰克领土都为他们所占据了。而且, 他们向西南方发展到摩塞尔河上游地区去的势力, 比向东南方到陶努斯山脉和纳埃河流域的势力更大。这也可由语言获得证明。西南方的方言, 直至卢森堡和西部洛林, 同里普利安语的关系, 远比东方——特别

是莱茵河右岸——的方言跟它的关系要接近得多。前者可以认为是受到更多高地德意志语音变影响的里普利安语的继续。

中法兰克方言的特征,首先表现在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侵入。不单是若干清辅音音变为送气音(这只牵涉到比较少数的单词,而不涉及方言的性质),而是浊辅音[M edien]开始音变,这种音变造成中德意志语和南德意志语中的 b 和 p, g 和 k, d 和 t 的一种特殊的混合。只有在字首的 b 和 p, d 和 t, g 和 k 不能严格地辨别,也就是在法兰西人主要地理解为 accent allemand (德意志音调)的地方,才会使低地日耳曼人开始感觉到第二个辅音音变在德意志语言中所撕开的巨大的裂口。这一裂口穿过济克河同兰河之间,阿尔河同摩塞尔河之间。与此相应,中法兰克方言在词首有一个 g,这是更靠北方的方言所缺少的,而在词中和词尾,则 g 的发音等于软化的 ch。此外,北方方言的 ei 和 ou,则又转变为 ai 和 au。

几个真正的法兰克语的特征:在所有萨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中, Bach[小溪]——即未经辅音音变的 Beek——是阴性的。这也至少适用于中法兰克方言西部的绝大部分。正如尼德兰和下莱茵无数的其他同名的 Bäche[小溪,复数]一样,卢森堡的 Glabach (Gladbach, 尼德兰语——Glabeeck)也是阴性。相反地,少女的名字却被当做中性名词:从巴门起,经过特利尔,人们不但说 das Mädchen, das Mariechen, das Lisbethchen,而且还说 das Marie, das Lisbeth。在当初由法兰西人绘制的地图上,在洛林的福尔巴赫附近标着一个《K arninschesberg》(K aninchenberg)[兔儿山]。可见,也就是我们在上面确定为里普利安语的那个指小词词尾——schen,复数为 sches。

从摩塞尔河同纳埃河的分水岭以及莱茵河右面,兰河以南的

丘陵地带起,一种新的方言语族开始了。

3.南法兰克语 这一片地带,毫无疑问最初是阿勒曼尼人占领的地区(我们不谈更早一些时候它被梵乡人等等占据过,关于这些部落的亲属关系和语言,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而在这片地带内,也有较强烈的卡滕人的混血种,这是我们所乐于承认的。但是我们无须重述,在这里,地名上也显示出存在有并非不重要的里普利安因素,特别是在莱茵平原上。语言本身尤其证明是如此。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最南部的可确定的方言普法尔茨方言吧,这是同时还有文献存在的方言。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这样一事实,即所有法兰克人在发音上,除将词中间和词尾的 g 读做浊音 ch 外,简直没有其他办法^①。在那里,人们说 Vöchel[鸟], Flechel[连枷], geleche (gelegen[便利]), gsacht—gesagt[说过], licht—liegt[躺下]等等。跟一般的法兰克语一样,单词中间的 b 由 w 代替。例如, Bûwe—Buben[小孩], glâwe—glauben[相信](但说 i glâb), bleiwe[停留], selwer—selbst[自己], halwe—halbe[一半]。辅音的音变,远不如看来那样彻底。特别是在外来语中,甚至发生辅音的逆辅音变,即词首的清辅音的音变,不是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而是向后倒退了一个阶段;如下面所指出的 t 变 d, p 变 b。词首的 d 和 p 还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如 dùn—tun[做], dag[白天], danze[跳舞], dūr[门], dodt[死的]。但在 r 之前,则不发生这样的音变,例如 trinke[饮], trage[携带], paff—P fäff[教士], peife

① 所有的引文都是摘自卡·哥·纳德勒“快乐的帕耳茨,上帝保佑你!普法尔茨方言诗”18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Fröhlich Palz, Gott erhalt' s! Gedichte in Pfälzer Mundart)》, von K.G.Nadler. Frankfurt a.M., 1851)。

[烟斗], palz—Pfalz[行宫], parre—Pfarrer[神甫]。但是因为 d 和 p 代替了高地德意志语中的 t 和 pf, 所以在外来语上, 词首的 t 逆转为 d, 词首的 p 逆转为 b。例如 derke—Türke[土耳其人], dafel—Tafel[宴席], babeer—Papier[纸], borzlan—Porzellan[磁器], bulwer—Pulver[火药]。其次, 普法尔茨方言不许元音之间有清辅音; 在这一点上, 只有丹麦语同它是一致的。例如, ebbes—etwas[少许], labbe—Lappen[布片], schlubbe—schlupfen[滑入], schobbe—Schoppen[酒杯], Peder—Peter, dridde—dritte[第三], rodhe—raten[劝告]。只有 k 是一个例外: brocke, backe; 但在外来语上则有 g, 例如 musigande—Musikanten[音乐家]。这也是后来由于辅音的逆转音变而传播起来的一种低地德意志语音变阶段的遗迹^①; 仅仅是由于 dridde, hadde 没有发生辅音音变, Peter 才能够变为 Peder。因而, 与此相对应的高地德意志语的 t 也受到了同样公平的待遇。halde—halten[握], alde—alte[老]等词中的 d, 也同样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上。

虽然普法尔茨方言在低地德意志语上面已经印上了确定的高地德意志语的全部痕迹, 但它所接受的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 却远未达到那怕是我们的标准语上所保持的那种程度。恰恰相反, 普法尔茨方言, 却借它的辅音逆转音变来抗拒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程度, 高地德意志音变是从外面侵入普法尔茨方言的, 直至今日, 在这种方言之中, 依然显示出它是一种外来的因素。

在这里, 指出一个常被误解的现象是适当的, 这就是, 方言中的浊辅音发生了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那些日耳曼人, 常把 d 和 t,

^①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 “同奥特弗里德相符”。——编者注

b 和 p, 甚至 g 和 k 的发音混同了。这种混同, 只要在每人说他自己的方言时, 是不会发生的。相反地, 如刚才所述, 例如普法尔茨人, 他在这一点上的区分是那样严格, 以致当他说外来语的时候, 为了使它们适应自己方言的要求, 甚至对外来语实行辅音的逆转音变。仅仅因为标准德意志语的 t 同他的 d 相对应, 他就把外来语词首的 t 变成 d, 因为标准德意志语的 pf 同他的 p 相对应, 于是就把外来语的 p 变成 b。在其他的南德意志方言中, 只要人们说他们自己方言的时候, 清辅音也是很少发生混淆的现象。其中每种方言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严格实行的辅音音变规则。但是, 一讲标准语或外国话, 情形便不同了。想对这种语言运用地方方言辅音音变规则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无意识的), 跟想正确地讲出这种新语言的企图, 发生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 写出来的 b 和 p, d 和 t, 丧失了一切确定的意义; 因而, 也就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例如, 白尔尼在他的巴黎来信³⁵⁴中抱怨说, 法兰西人不能区别 b 和 p 的发音, 因为他们顽固地认为, 他的姓(他自己的发音为 Perne)头一个字母是 p。

不过, 还是回头来谈普法尔茨方言吧。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可说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 而在直至今日依然不过是一种外来的因素, 而且绝未达到标准语的语音阶段(而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则远远超过了它, 一般都保持着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某种阶段)——仅这一点就完全足以确定普法尔茨方言所具有的主要是法兰克语的性质了。因为甚至在更靠北方的黑森, 一般地说, 音变是更加彻底的, 因而就把普法尔茨方言的所谓主要是黑森语的性质, 缩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紧靠阿勒曼尼人的境界上, 在留居下来的阿勒曼尼人中间, 如果要以这样大的力量来抗拒高地德

意志语的音变,除去本身基本上就是高地德意志人的黑森人以外,至少还需要同样为数甚多的里普利安人也停留在当地。除去地名以外,还有两种一般法兰克语的特征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这就是在单词中间,以法兰克语的 w 代替 b,单词中间和末尾的 g 发音为 ch。除此以外,个别相符的情况还有许多。普法尔茨方言中的 G undach— guten Tag[您好],一直通行到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正如在普法尔茨,把《ein gewisser M ann》[某一个人]说成 ein sichrer M ann[可靠的人],在整个尼德兰则说成 een zekeren man。把 Handschuh[手套]叫做 Handsching,这是和里普利安语的 Händschen 一致的。甚至在 Ghannisnacht (Johannisnacht)中,以 g 代 j,也是里普利安语的现象,而且像我们所看到的,一直通行到闵斯德。并且,为全部法兰克人(连尼德兰人也在内)所共有的 baten (bessern, nützen[改善,有用],从 bat—besser 来),也通行于普法尔茨。例如, 's badd alles nix—es hilft alles nichts[那全没用处];在这里,甚至 t 并不像高地德意志语那样音变做 tz,而是像普法尔茨语那样,变为在元音之间的浊辅音 d。

弗·恩格斯写于 1881—1882 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7年第1版第16卷第1部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法兰克方言”1935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

注 释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这是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它同卡·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1875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信件）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191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2卷中（《A us meinem Leben》，Teil 2，Stuttgart，1911）。——第3页。

- 2 指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4页。
- 3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

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4页。

- 4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由威·李卜克内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4页。
- 5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高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的简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4页。
- 6 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 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 and 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
 2. 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
 3. 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
 4. 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
 5. 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2. 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4页。

- 7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5页。
- 8 斐·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页(F. Lassalle. 《Arbeiterlesebuch》, Frankfurt am Main, 1863, S. 5)。拉萨尔在这一页上援引了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这是他在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Ö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 Zürich, 1863, S. 15—16)上的提法。——第6页。
-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76—784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03—978页)。——第6页。
- 10 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 Braunschweig, 1873)。——第6页。
- 11 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461—504页)。——第7页。
- 12 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该书第一卷于1873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纲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

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见注4)。——第8页。

- 13 卡·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的发展的重大贡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典范,于1875年4—5月初写成,并于1875年5月5日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给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于1891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说明。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关的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正如大家从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的,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缓和某些最尖锐的地方。收集在本版中的这一文件是同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的。——第11页。

- 14 指作者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第14页。
- 15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第二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它是由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所属的该党的出版社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第14页。
-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6页。——第24页。
- 17 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曼讽刺地称为马拉。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是从 1871 年至 1876 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袖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 25 页。

- 18 马克思指的是 1875 年 3 月 20 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同时指出，“社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反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1861 年至 1918 年在柏林出版。——第 26 页。

- 19 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1965 年杜斯堡版第 144—161、180 页（《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 S. 144—161, 180）上所发表的言论。——第 27 页。
- 20 “工场”（《L'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 29 页。
- 21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 34 页。
- 22 指国际总委员会 1875 年 5 月 16 日的关于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这个文件应当使国际的成员对即将正式解散组织这一点作好准备。——第 36 页。

- 23 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36页。
- 24 “人民报”（《La Plebe》）是恩·比尼亚米主编的意大利报纸，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在七十年代初期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者的报纸；1872—1873年是国际的支部的机关报。尽管“人民报”有某种不彻底性，它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给了报纸很大帮助，1871—1873年和1877—1879年为该报撰稿并且同编辑恩·比尼亚米经常通信。1882年，在“人民报”周围形成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独立政党——工人党。对该报的评述见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一文（本卷第110—114页）。——第37页。
- 25 这是恩格斯于1876年1月22日在1863年波兰起义的国际性纪念会上的演说。出席会议的有数十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主持会议的是波兰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委员瓦·符卢勃列夫斯基。恩格斯的演说用德语发表的，几天以后，他把法语稿给了符卢勃列夫斯基，大概是为了译成波兰文。——第39页。
- 26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

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它的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后特别加紧了。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在给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39页。

- 27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写于1876年2月。恩格斯的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以单页发表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斯的著作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33年。——第41页。
- 28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与民族自由党有联系。——第43页。
- 29 根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在进军特洛伊城时，错误地同自己的盟友、海格文斯的儿子泰列夫的军队交战起来。在战斗中，阿基里斯击伤了泰列夫，后者只是在伤口敷上从阿基里斯的矛枪上刮下的铁屑以后才痊愈。

愈。——第 51 页。

- 30 欧·杜林“国民—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柏林版第 263、264 页（E. Dühring. 《Cursus der National- 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Berlin, 1873, S. 263, 264）。——第 52 页。
- 31 据传说，科累卓是在拉斐尔的画幅“圣·契奇利娅”前面说这句话的。——第 52 页。
- 32 是指 1872 年普鲁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废除了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的世袭领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公社选举社长、在地方行政长官下面设立按等级选举的专区议会，等等。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阶级。同时，容克地主们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职务，实际上保持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第 53 页。
- 33 “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是弗·恩格斯于 1876 年 6—11 月间为威·李卜克内西主编的“新世界”杂志而写的。这篇著作是关于极有名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威·沃尔弗的传略。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献给他作为纪念。马克思曾经打算亲自来自写沃尔弗的传记。他为沃尔弗传记所写的初稿保存下来了（第一次发表在 1959 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 4 期第 105 页）。但是，马克思的打算没有实现，因为他当时没有掌握有关沃尔弗早期生活的某些他所需要的资料。

除了传记材料而外，恩格斯还对沃尔弗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作了叙述。威·沃尔弗的以“西里西亚的十亿”为题的文章在 1849 年 3 月和 4 月间刊载在报纸上。发表沃尔弗的这些文章，是“新莱茵报”为了吸引德国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而实行的措施之一。在这些文章中，沃尔弗根据确凿事实和统计材料对农民受剥削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描绘，并要求把地主以赎金形式从农民那里盗走的 10 亿法郎归还农民。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在读者中间受到了极大欢迎，西里西亚农民协会曾将登载这几篇文章的那几号报纸翻印一万份，免费散发给农民。

- 在 1886 年，恩格斯把他的“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作为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A bdruck aus der《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M ärz—A pril 1849. M it E inleitung von Friedrich Engels. Hottingen-Zürich, 1886）一书的导言的一部分刊印出来；导言的第二部分是他重新写成的那篇“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恩格斯为这一版作了许多重要补充，同时删去了叙述沃尔弗文章内容的几章。——第 61 页。
- 34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5—1846 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11—640 页）。——第 63 页。
- 35 联邦议会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种工具。——第 65 页。
- 36 “蛊惑者” 是德意志主要各邦大臣于 1819 年举行的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的决议对德国知识分子中间那些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在三十年代对“蛊惑者”实行迫害，因为当时在法国 1830 年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加强了。——第 65 页。
- 37 弗·罗伊特“狱中生活”载于“罗伊特文集”莱比锡和维也纳版第 4 卷（F. Reuter. 《U t mine Festungstid》. In: 《R euters W erke》, Bd. 4, Leipzig und W ien）。恩格斯所提到的威·沃尔弗于 1863 年 12 月 30 日给弗·罗伊特的那封信，第一次发表在“历史科学问题杂志”1957 年第 6 册第 1244—1245 页（《Zeitschrift für G eschichtswissenschaft》, H eft 6, 1957, S. 1244—1245）上。——第 65 页。
- 38 弗·沃尔弗本人在 1863 年 12 月 30 日给弗·罗伊特的信中写道：由于他的一篇文章手稿落到普鲁士的警察手中，这篇手稿便成了对他提出违反出版法的起诉理由。——第 67 页。
- 39 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 阴谋” 1853 年柏林版第 1 册、1854 年柏林版第 2 册（《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 67 页。
- 40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 年 1 月创刊，1848 年 2 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从 1847 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 年 9 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 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 68 页。
- 41 德意志工人协会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居住在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公开的联合在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在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 68 页。
- 42 科伦民主协会 于 1848 年 4 月成立；它的成员除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协会，目的是影响加入该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坚决行动。马克思积极参加协会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

报”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在民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揭露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谴责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立场不坚定的决议。1849年4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采取实际行动着手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后，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组织联系，并退出了民主协会。——第70页。

- 43 提 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停战协定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后来由于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的援助，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70页。
- 44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就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第70页。
- 45 沃尔弗指的是1846年2—3月间在加里西亚爆发的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当时在克拉科夫恰好爆发了民族解放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使加里西亚的起义农民和准备援助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发生冲突。农民起义由解除小贵族起义队伍的武装开始，后来形成大规模地捣毁地主庄园的行动。奥地利政府平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以后，又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75页。
- 46 “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第84页。
- 47 “煽动者”（Wühler）是1848—1849年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对民主共和派的称呼。——第99页。

- 48 恩格斯指的是一本在一出版物中发表的笔记，这出版物是：“皇室文件和通信”1870—1871年巴黎版第1—2卷（《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 Tome I — II, Paris, 1870—1871），第2卷第161页。——第102页。
- 49 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可里看出，沃尔弗在1853年9月已经搬到曼彻斯特去了。——第105页。
- 50 后备军——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它是由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27岁到32岁）组成的。他们在正规军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后，即被编入后备军。后备军制度最初是在1813—1814年在普鲁士实行；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在平时后备军各部队只进行几次集训；在战时后备军则应当担负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第108页。
- 51 指的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323—452页），该文于1874年译成德文在不伦瑞克出版，题为：《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恩格斯直接参加了译文的校订工作。——第110页。
- 52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巴枯宁1872年4月5日给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该信和同盟的其他文件一起公布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第十一部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451—452页）。——第111页。
- 53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是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自1872—1878年用法文出版，起初每月出两期，从1873年7月起每星期出一期，主编是吉约姆。——第113页。
- 54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一些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该报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具有日益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115页。

- 55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3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116页。
- 56 恩格斯指的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1845年1月16日下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第116页。
- 57 “十字报”(《Kreuz-Zeitung》)是“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的别名(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是一家德国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第118页。
- 58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

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人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118页。

- 59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了撰稿，因为当时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了，并且报纸的编辑部也离开了进步立场。——第119页。
- 60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参与下出版，不久马克思就成了该报的事实上的编辑。在“人民报”上曾刊载过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给马克思这一著作所写的评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许多文章。该报总共出版了16期；1859年8月20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119页。
- 61 见注48。——第119页。
- 62 指1873年的席卷了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

刻。——第 123 页。

- 63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 1877 年 10 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第 10 期，“时评”第 320—356 页）一文后不久写的，这篇文章包含有对“资本论”的错误解释。马克思的信没有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 1884 年 8 月 6 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 1886 年“民意导报”第 5 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 1888 年 10 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 126 页。
- 64 K .M arx .《D as K apital .K ritik der politischen O ekonomie》. Bd .I, Hamburg, 1867, S .763.——第 126 页。
- 65 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 年汉诺威—柏林版第 I—III 册（A .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 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 inrichtungen Rußlands》, Th . I — III , Hannover—Berlin, 1847—1852）。——第 126 页。
- 66 K .M arx .《D as K apital .K ritik der politischen O ekonomie》. 2 .A ufl ., Bd .I, Hamburg, 1872, S .8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18 页（参看“资本论”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11 页））。——第 126 页。
- 67 K .M arx .《L e Capital》.Paris, [187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728 页）这一段引文和第 28 卷这个地方原文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马克思援引的“资本论”第 1 卷是根据 1875 年的法文版，而俄课本第 23 卷是根据 1890 年的德文第 4 版（参看“资本论”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905 页）。——第 130 页。
- 68 指 1866 年 5 月 7 日在柏林发生的谋刺俾斯麦未遂一事。——第 132 页。
- 69 恩格斯指的是争取法兰西共和国反对保皇势力的斗争，其中包括 1876

- 年选举以后保皇党集团和众议院中共和党多数派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共和党人取得了胜利，于是在法国确立了议会制共和国。——第 133 页。
- 70 1877 年在美国，工人阶级同企业主的斗争已广泛地开展起来。1877 年 7 月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由于在三条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干线（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纽约中央铁路）减低工资 10% 而引起的，只是由于政府军队和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的帮助，罢工才被镇压下去。——第 133 页。
- 71 指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第 134 页。
- 72 本文是恩格斯为美国周刊“劳动旗帜”（《The Labor Standard》）写的。“劳动旗帜”是流亡美国的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麦克唐奈于 1876—1900 年出版的。1931 年，本文用德文在“社会”杂志（《Die Gesellschaft》Jahrg. 8, Bd. II）发表，用俄文在“阶级斗争”杂志第 6—7 期上发表。——第 135 页。
- 73 指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第 137 页。
- 74 指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次战役是在 1870 年 9 月 1—2 日进行的，以德军胜利和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投降而告结束。法军在色当附近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第 139 页。
- 75 指无政府主义者 1877 年占领意大利贝内万托省的小城列亨诺的那次发动；这次发动很快被警察镇压下去了。——第 142 页。
- 76 讽刺话，是根据这样一个传说：有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向下院提出控诉书，头一句话是：“我们，英国的人民。”——第 145 页。
- 77 指新马德里联合会，它是因“解放报”（《La Emancipacion》）揭露了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解放报”编辑委员于 1872 年 7 月 8 日组成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和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立西班牙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为它的机关报

- “解放报”撰稿。——第 145 页。
- 78 “抗议报”（《O Protesto》）是葡萄牙社会主义周报，从 1875 年起开始在里斯本出版。——第 146 页。
- 79 指 1875 年 10 月起在斯梅德雷伏（塞尔维亚）出版的民主派报纸“民意报”。——第 149 页。
- 80 根据 1872 年的法律，法国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第 153 页。
- 81 指 1863—1864 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第 157 页。
- 82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 1846 年至 1930 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发行。——第 159 页。
- 83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 1848 年至 1915 年在柏林出版。——第 159 页。
- 84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是德国日报“普鲁士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的简称。该报是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从 1851 年至 1871 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 159 页。
- 85 “先驱”（《Der 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的机关刊物；1866 年至 1871 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 159 页。
- 86 指德国“大选帝侯号”装甲舰于 1878 年 5 月 31 日在福克斯顿城（英国）附近的加来海峡因同“威廉国王号”轮船冲撞而沉没。——第 160 页。
- 87 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写于 1878 年 7 月初，是对叛徒豪威耳在“十九世纪”杂志发表的“国际协会史”一文的答复，因为该文对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国际中的作用作了虚伪的断言。杂志编辑部拒绝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因此这篇文章于 1878 年 8 月 4 日在“世俗纪事”（《The Secular Chronicle》）杂志第 3 期上发表。该杂志具有无神论—共和倾向，编辑哈·罗当时是国际会员。

- 这篇文章的德译文登在 1901—1902 年“新时代”（《Neue Zeit》）第 1 卷第 1 期第 585—589 页。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弗·伊·列宁的注意。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 1933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1 期上。——第 163 页。
- 88 见“十九世纪”第 4 卷第 19 页，1878 年 7—12 月，伦敦。
“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英国自由派的月刊；从 1877 年至 1900 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从 1900 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从 1951 年起则用“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名称出版。——第 163 页。
- 89 豪威耳把 1865 年 9 月 25—29 日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称为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工作的有总委员会委员和一些支部的领导人。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163 页。
- 90 马丁的信在 1865 年 10 月 14 日“世纪报”上发表。
“世纪报”（《Le Siècle》）是从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 164 页。
- 9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0—22 页。
致美国总统阿·林肯的公开信是马克思于 1864 年 11 月 22—29 日之间写的。11 月 22 日，总委员会决定致函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总统。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于 1864 年 11 月 29 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由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林肯总统。1865 年 1 月 28 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去的回信，该信于 1 月 31 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在 1865 年 2 月 6 日“泰晤士报”上刊载。正如马克思在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在林肯给他收到的各团体的贺信的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第 165 页。
- 92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盟是米·巴枯宁在 1868 年创建的组织。同

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165页。

- 9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17页。——第166页。
- 94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伦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编委会;从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66页。
- 9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90页。——第167页。
- 96 见卡·马克思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2—403页)。——第167页。
- 97 地主议会是1871年法国国民议会的单称。该议会成员多半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农村选区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议会的630名议员中大约有430名保皇党人。
- 1871年底,这个国民议会着手调查巴黎公社事件,调查材料发表时名为“议会对3月18日起义的调查报告”1872年凡尔赛版第1—3卷(《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insurrection du 18 mars》, T. I—III, Versailles, 1872)。——第167页。

- 98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9页)。——第167页。
- 99 这里和上面讲的是欧洲反动势力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对第一国际采取的镇压手段。在许多国家里,国际的活动被明令禁止。在1872年3月公布的西班牙外交大臣博尼法西奥的通令中,要求各国政府联合努力对国际采取共同行动。德奥两国皇帝于1871年8月在加施坦和1871年9月在萨尔茨堡会晤时,也专门商讨过共同对付国际的问题,达两次会晤是由俾斯麦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事先通信约走的。——第168页。
- 10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9年9月17—18日写的通告信虽然是寄给奥·倍倍尔的,但作者却是指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领导的,因此这封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信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个文件叫做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弗·伊·列宁(不知道这封信的原文)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把他们对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的看法和党的立场的叙述叫做“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50页)。这封信的方案是恩格斯在9月中拟定的。9月17日马克思一回到伦敦,他们两人就立即共同讨论这个方案,并最后确定下来。
- 这封信第一次发表在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2年卷第23册上。——第172页。
- 101 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它是卡·赫希柏格(用的是路德维希·李希特尔这个笔名)于1879—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该杂志共出3册。——第172页。
- 102 “灯笼”(《Die Laterne》)杂志是社会民主党人出版的一种讽刺性周刊;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开始施行时,曾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

会主义倾向；该杂志从 1878 年 12 月 15 日至 1879 年 6 月 29 日在布鲁塞尔出版，由卡·希尔施主编。——第 175 页。

- 103 “自由”（《Freiheit》）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一种德文周报，由约·莫斯特 1879 年创办于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莫斯特和他主编的报纸发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后来，该报在比利时（1882 年）和美国（1882—1910 年）出版。——第 178 页。
- 104 “前进报”（《Vorwärts》）是 1876 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 1876 年 10 月起在莱比锡出版。1878 年 10 月，该报因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停刊。——第 181 页。
- 105 这篇文章是由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合写的，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 年苏黎世版第 1 年卷第 1 册第 75—96 页上。——第 182 页。
- 106 指 3 月 18 日柏林的街垒战，它为德国 1848—1849 年的革命奠定了始基。——第 185 页。
- 107 指 1878 年 10 月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187 页。
- 108 “未来”（《Die Zukunft》）是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从 1877 年 10 月至 1878 年 11 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该杂志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想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
- “新社会”（《Die Neue Gesellschaft》）是 1877—1880 年在苏黎世出版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杂志。——第 188 页。
- 109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写于 1880 年 2 月底，在“平等报”（《L'Égalité》）上分两号发表。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 1877 年莱比锡出版的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877）一书中的事实。
- “平等报”（《L'Égalité》）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于 1877 年由

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号),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应当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只在1886年出过一号。每一专刊都有它的副标题。——第191页。

- 110 指俾斯麦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报告”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会议,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70、125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I. Session 1878, Bd. I, Berlin, 1878, S. 70, 125)。——第191页。
- 111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1852年。Crédit Mobilier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同第二帝国的政界人士有密切的关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仿效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建立了类似的机关。马克思专门写了几篇文章来分析Crédit Mobilier的活动和评价股份联合公司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页)。——第193页。
- 112 指勒洛在他的1877年不伦瑞克出版的“费拉得尔菲亚来信”(《Briefe aus Philadelphia》. Braunschweig, 1877)一书中的见解。——第194页。
- 113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285—294页)。——第200页。
- 114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弗·恩格斯于1877—1878年写成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一著作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

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同年出版。这一法文版本成了波兰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基础。1883年,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的是1882年)。这本小册子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经从德文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并且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在恩格斯生前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这一小册子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并且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第201页。

- 115 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9卷(G.W.F.Hegel.《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Werke, 2. Aufl., Bd. IX, Berlin, 1840)。——第206页。
- 116 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自然状态。消灭这种自然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Amsterdam, 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第206页。
- 117 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的办法来实现这种思想。——第207页。
- 118 恩格斯首先指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托·莫尔“乌托邦”(1516年

出版)和托·康帕内拉“太阳城”(1623年出版)。——第207页。

- 119 恐怖时代 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208页。

- 120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第209页。

- 121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a ses 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斯用的版本是:G.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G. Hubbard.《Saint-Simon. Sa vie et ses travaux. Suivi de fragments des plus célèbres écrits de Saint-Simon》.Paris, 1857)。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

傅立叶的第一部大作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写于十九世纪头几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考虑到书报检查,在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

新拉纳克(New Lanark)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第209页。

- 122 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43页和第135页上。——第212页。

- 123 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

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H. Saint-Simon. 《L'industrie, ou Discussions politiques, morales et philosophiques, dans L'intérêt de tous les hommes livrés à des travaux utiles et indépendans》. T. II, Paris, 1817)。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55—157页上。——第212页。

- 124 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ou de la nécessité et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 en cons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contre la coalition de 1815》）：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在雨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149—154页，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68—76页。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

百日 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第212页。

- 125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第212页。
- 126 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

挥，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1841, p. 195—196）。——第 213 页。

- 127 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 1 卷和第 4 卷；“全集”1843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78—79 页和 1841 年巴黎版第 5 卷第 213—214 页（Ch. Fourier.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vol. I et IV ; *Oeuvres complètes*, t. II, Paris, 1843, p. 78—79 et. t V, Paris, 1841. p. 213—214）。

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全集”1845 年巴黎版第 6 卷第 27—46, 390 页（Ch Fourier.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Oeuvres complètes*, t. VI, Paris, 1845, p. 27—46, 390）。该书的第一版于 1829 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 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1814, p. 202。——第 213 页。

- 128 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VI, Paris, 1845, P. 35. ——第 213 页。
- 129 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1841, p. 50 et suiv. ——第 213 页。
- 130 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 年伦敦版（R. Owen. *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 or, 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 London, 1849）。——第 216 页。
- 131 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 月 18 日、4 月 12 日和 19 日、5 月 3 日”1823 年都柏林版（R. Owen.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blic meetings, held in Dublin... on the 18th March, 12th April, 19th April and 3rd May》.Dublin, 1823)。——第 216 页。

- 132 1815 年 1 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 1815 年 6 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到 1819 年 7 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 9 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 18 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 12 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第 217 页。
- 133 1833 年 10 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 1834 年 2 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 1834 年 8 月宣告解散。——第 217 页。
- 134 指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立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第一个这样的市场是罗伯特·欧文于 1832 年 9 月在伦敦创办的,存在到 1834 年年中。——第 217 页。
- 135 蒲鲁东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于 1849 年 1 月 31 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并于 4 月初宣告关闭。——第 217 页。
- 136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 1762 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由歌德译成德文于 1805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 1821 年(实际上是 1823 年)巴黎出版的“狄德罗轶文集”(《Oe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一书中。——第 219 页。

- 137 科学发展的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 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名称是由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得到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 220 页。
- 138 “圣经”,“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37 节。——第 221 页。
- 139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 1755 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论述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的尝试”(《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ünge des ganzen Weltgebä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ätzen abgehandelt》.Königsberg und Leipzig, 1755)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1796]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 1—2 卷(《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T. I—II, Paris, 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796])中得到了阐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是在该书的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注释中加以阐述的。——第 223 页。
- 14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322—515 页(参看“资本论”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371—620 页)。——第 230 页。
- 141 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 和 1672—1674 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第 234 页。
- 142 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 第2版第23卷第445页和第498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29—530页和第595—596页)。——第236页。
- 14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73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63—564页)。——第236页。
- 1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0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13页)。——第236页。
- 145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VI, Paris, 1845, p. 393—394)。——第237页。
- 146 Seehandlung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39页。
- 147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第四节和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本卷第30—35页和第3—10页)。另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4节和第四章第3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82—388页和第426—429页)。——第242页。
- 148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宣读的,发表在1878年3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上。——第244页。
- 149 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78年2月21—22日在柏林举行。——第245页。
- 150 “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短文是马克思于1880年3月底写成的,载于1880年4月7日法文报纸“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12号上,作为编辑部对该报发表“哲学的贫困”一文的引言。

这篇短文的手稿第一次刊登在“年鉴”杂志上 1958 年米兰版第 1 年卷第 204—205 页上(《Annali》, Anno I, Milano, 1958, p. 204—205)。——第 248 页。

- 151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P. 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第 248 页。
- 152 “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 des Economistes》)——法国自由派的经济学杂志,1841—1943 年间在巴黎出版。——第 248 页。
- 153 是指“论蒲鲁东”一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因蒲鲁东逝世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于 1865 年 1 月 24 日写成的,刊载于 1865 年 2 月 1、3、5 日该报第 16—18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8—36 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 18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871 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 至 1865 年约·巴·施韦泽任该报编辑,当时编辑中还有威·李卜克内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64 年 11 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该报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但是在 1865 年 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停止为该报撰稿,因为同施韦泽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第 249 页。

- 154 “工人调查表”是马克思应“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出版人边·马隆(他在 1880 年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涨的影响下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请求,在 1880 年 4 月上半月编写成的。“调查表”刊登在 1880 年 4 月 20 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没有署名),并印成单行本在法国全国发行。“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为发表“调查表”写了下述前言。

“任何一个政府(君主政府或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都都不敢对法国

工人阶级的状况做认真的调查。可是，关于农业危机、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商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调查却有多少啊！

英国政府的官方调查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行径的揭露，以及由这些揭露引起的某些法律的制定（如法律许可的工作日限制为 10 小时，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更加害怕由于进行公正和系统的调查而带来的危险。

我们希望也许我们能促使法国共和政府仿效英国君主政府的榜样，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所作所为及其罪行进行广泛的调查；因此我们利用自己的一点有限的款项，试图为这件事作出一个开端。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得到所有城乡工人的支持。他们懂得：只有他们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灾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我们也期望得到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既然他们想进行社会改革，那就应该愿意准确而清楚地了解工人阶级这个未来正是属于它的阶级进行工作和活动的条件。

这些劳动委托书是社会民主派为了准备社会革新所应该作的第一件事。

下面列举的一百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回答问题时必须写明所答问题的顺序号码。不一定要回答全部问题，但我们建议尽可能回答得具体和详细些。回答问题的男女工人的名字，如果没有得到特别许可将不予公布，但是名字和地址仍应写明，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联系。

请将答复寄交 巴黎近郊圣克鲁伊亚尔街 28 号‘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负责人 累克吕兹先生。

问题将进行分类，以便为专题著作提供材料。这些专题著作将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以后还将出版单行本。”——第 250 页。

- 155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是马克思在 1880 年 5 月 4—5 日左右写的。在小册子中导言是由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拉法格署名的。在新近发现的手稿中发现有马克思给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导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导言是作为附录刊印的。——第259页。

- 156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可能派的倍·马隆创办的月刊。先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物,后来是激进派和合作派的刊物;1880年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从1885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在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259页。
- 157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259页。
- 158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菲·奥康瑙尔,在四十年代乔·哈尼也做过该报的主编。从1843年至1850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一些论文和短评。
- “新道德世界和理性的报纸”(《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1846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260页。
- 159 这一时期的事件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60页。
- 160 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或称最低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是马克思对盖得口授的。至于纲领其余的一部分,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给伯恩斯坦的信中曾谈到它:“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某些增减。”

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后来（1880年7月10日）又发表于“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和“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7月20日）。

下面援引的最低纲领是根据“平等报”刊载的：

A. 政治方面：

1. 废除一切出版法、集会法和结社法，特别是反国际工人协会法。——取消工资计算簿这种登记工人阶级的办法和法典中有关使工人处于和雇主不平等地位的一切条文。

2. 取消宗教经费并将‘认为不能出让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归还给国家（1871年4月2日巴黎公社法令），其中包括这些团体的工商业企业。

3. 普遍武装人民。

4. 公社主管行政管理机关和警察机构。

B. 经济方面：

1. 星期一为每周休息日，换言之，即颁布一项禁止业主要求工人在星期一上工的法律。——通过立法限制成年人的工作日为8小时。——禁止私营企业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而14岁至18岁的工作日通过立法限制为6小时。

2. 法律规定按当地的食物价格每年确定一次最低工资。

3. 男女工人的工资平等。

4. 由国家和公社代表的社会负担全体儿童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费用。

5. 取消雇主对工人互助会、保险会管理的任何干涉，重新恢复纯粹由工人管理。

6. 业主对不幸事故的责任，应由雇主提交保证金来保障，其比例与他现有工人数量和企业工作的危险性相称。

7. 工人参加制订各个不同车间的专门规则，取消被雇主据为己有的任意规定对工人罚款或克扣工资的权利（1871年4月27日巴黎公

社法令)。

8. 修改一切涉及公共财产(银行、铁路、矿场等等)收归国有的契约并由一切国农企业的在业工人经营国家的企业。

9. 废除一切间接税,并把一切直接税改为收入在3000法郎以上和遗产在20000法郎以上的累进税。”——第264页。

16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也有保·拉法格和弗·列斯纳签名的公开信,是1880年11月2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1830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宣读的。纪念会是由波兰“平等”杂志(《Równość》)编辑部召开的。参加纪念会的约有500名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各民族的代表,其中有波兰人、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纪念会是在国际团结和各国劳动人民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目的和任务一致的口号下进行的。——第265页。

162 1846年2月在波兰国土上酝酿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由于贵族分子的叛变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遭到了破坏,仅在个别地区举行了革命发动。只有在1815年以来就归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才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民族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邓波夫斯基代表了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的利益,他在克拉科夫起义时制定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也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将土地分给无地者,成立国家的或“社会的”工厂来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各种计划)。克拉科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将克拉科夫合并给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266页。

163 指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大会的工作。——第266页。

164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来信的回信,是1881年3月8日写的。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

运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卡·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公民，——查苏利奇继续说——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的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给查苏利奇信的草稿（除最后一稿，即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外）载于本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第430—452页）。——第268页。

- 165 是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第268页。
- 166 K. Marx. 《Le Capital》. Paris, [1875], p. 3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26页和第728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3页和第905页）。文中的差别见注67）。——第268页。
- 16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72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3页）（文中的差别见注67）。——第268页。
- 168 出席1881年3月21日在伦敦举行的大会的有各民族的代表：俄罗斯、波兰、捷克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者。俄罗斯革命者、民粹派列甫·加特曼担任大会主席，会上成立了斯拉夫人革命俱乐部。——第270页。
- 169 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1881年3月1日在彼得堡刺杀了皇

帝亚历山大二世。——第 270 页。

- 170 指 1878 年俾斯麦实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80 年春，非常法的有效期又延长了 5 年。——第 270 页。
- 171 本文是恩格斯替“劳动旗帜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恩格斯从 1881 年 5—8 月是该报的撰稿人。这些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差不多每星期有一篇作为社论定期地刊登出来。由于该报的总的机会主义方针恩格斯不得不停止撰稿。
“劳动旗帜报”（《The Labour Standard》）是一家英国周报，是工联的机关报，1881—1885 年在伦敦由乔·希普顿编辑出版。——第 273 页。
- 172 这里是指 1824 年议会废除了不准建立任何工人组织并进行活动的禁止结社法。但是 1825 年通过的结社法，或者说工人联合法，极其严格地限制了工会的活动。例如，仅仅是进行争取工人加入工会和参加罢工的鼓动，就被认为是“强迫”和“暴力”，并按刑事罪论处。——第 273 页。
- 173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 1873 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正义法”进行的。——第 277 页。
- 174 这里指的是在爱尔兰占有土地的大地主的不满，这种不满的产生是由于格莱斯顿政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们对租佃者的专横行为，从而使爱尔兰农民脱离在爱尔兰已经展开的革命斗争。1881 年的土地法案限制了大地主从租地上赶走租佃者的权利，如果后者按时缴纳租金；租金额 15 年不变。虽然 1881 年的法令使大地主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把土地卖给国家，而且规定的租金仍然非常高，但是英国的土地占有主仍然阻挠法令的通过，力图在爱尔兰保持不受限制的统治。——第 282 页。

- 175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的1849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284页。
- 176 这里指的是1867年英国保守党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选举改革。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选举改革运动。根据新的法律，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在郡里，租佃者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12英镑以上的租金，而在城市里，所有的房主和房屋租赁者，以及在该地居住满一年并缴纳房租10英镑以上的住户，都有选举权。1867年改革的结果，英国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得了选举权。——第285页。
- 177 曼彻斯特学派 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则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287页。
- 178 指1858年撤销东印度公司以后，印度转归不列颠国王直接管辖。——第288页。
- 179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第289页。
- 180 反谷物法同盟 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所谓的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自由贸易的口号曾被同盟广泛用来进行所谓工人和工业家利益一致的蛊惑性的宣传。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同盟就不存在了。——第289页。

- 181 见注 174。——第 306 页。
- 182 1881 年土地法案的施行（这个法案于 1881 年 8 月成为法律），引起了爱尔兰租佃者的反抗。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采取了高压手段，派出军队去强迫抗拒缴纳租金的租佃者迁走。——第 308 页。
- 183 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 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 309 页。
- 184 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英国议会议员约翰·狄龙当时关在监牢里这一情况。——第 309 页。
- 185 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 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迈克尔·戴维特于 1879 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土地同盟的领袖们采取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帕涅尔等人）便利用了这一点，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土地同盟于 1881 年被查禁，但事实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为止。——第 310 页。
- 186 见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 年伦敦版第 361—369 页（《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43, p. 361—369）和“当代评论。第一篇。现时代”1850 年伦敦版第 42 页（《Latter-Day Pamphlets. No 1.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850, p. 42）。——第 312 页。
- 187 恩·恩格尔“从技术和统计说明蒸汽时代”1881 年柏林第 2 版（E. Engel. 《Das Zeitalter des Dampfes in technisch-statistischer Beleuchtung》. 2. Aufl., Berlin, 1881）。正文中的表格是恩格斯根据恩格的书的第 178、180、182—184 页上的统计材料制出的。——第 313 页。
- 188 指 1831 年为英国下院通过、1832 年 6 月为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

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 316 页。

- 189 恩格斯指的是 1881 年 10 月 27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 30 多万张选票。——第 320 页。
- 190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82 年 1 月 21 日写成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起进行这一版的准备工作。和马克思、恩格斯有亲密关系的彼·拉甫罗夫，直接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序言。1882 年 1 月 23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序言原文寄给了他。该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 1882 年 2 月 5 日“民意”杂志上。“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普列汉诺夫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于 1882 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
- 该序言第一次用德文发表在 1882 年 4 月 1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 号上，是根据“民意”杂志上的俄文序言翻译的。1890 年恩格斯重新发表了 1882 年的原文，并把它编入“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序言。——第 325 页。
- 191 日期说得不确切，这一版是在 1869 年出版的。——第 325 页。
- 192 “钟声”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 1857 年至 1867 年用俄文出版；1868 年至 1869 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 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 325 页。
- 193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 1881 年 3 月 1 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纳。——第 326 页。
- 194 恩格斯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是 1882 年 4 月下半月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布·鲍威尔的逝世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鲍威尔关于新约全书和基督教的著作，当时不仅有助于摧毁正统

教义的基础,而且有助于摧毁自由主义的新教的杜宾根学派的结论。所以尽管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肯定了这些著作。

恩格斯在本文中提出的思想,在他以后的著作“启示录”(1883)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327页。

- 195 恩格斯在这里把“雅利安人”一词,用为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名称。这一用语是根据十九世纪中叶流行的对这些民族过去在种族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持有的不正确的看法提出的,现在已经陈旧了。在现代资产阶级著作中,“雅利安人”一词是指印欧语系伊朗和印度分支的各民族而言。——第327页。
- 196 对于新约的批评见布·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1840年不来梅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Johannes》. Bremen, 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I—II, Leipzig, 1841)及该书第三卷“复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1842年不伦瑞克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 Braunschweig, 1842)。——第327页。
- 197 克·哥·维耳克“第一个福音书编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注释批判研究”1838年德勒斯顿和莱比锡版(Ch. G. Wilke. 《Der Urevangelist oder exegetisch kri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ß der drei ersten Evangelien》. Dresden und Leipzig, 1838)。——第328页。
- 198 大·施特劳斯在下列著作中表述了他的理论:“经过批判整理的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Bd. I—II, Tübingen, 1835—1836)。——第328页。
- 199 恩格斯指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见文集“罗曼采罗”),这是一个年轻的浪荡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手。——第329页。

-
- 200 格·艾瓦德“基督以前的以色列民族史”1852年哥丁根第2版第4卷第222—224页(H. Ewald. 《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 bis Christus》. 2. Ausg, Bd. 4, Göttingen, 1852, S. 222—224)。——第330页。
- 201 指圣经之一“约翰启示录”。——第330页。
- 202 指佩特罗尼乌斯的“蔬蒂里孔”。这部著作描写一个发了财的被释放的奴隶特里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第331页。
- 203 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施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第227页(J. Ph. Fallmerayer. 《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Th. I,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30, S. 227)。——第332页。
- 204 “白厅评论”(《The Whitehall Review》)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1876年至1929年在伦敦出版。——第337页。
- 205 “纽约人民报”(《New-York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出版的日报,从1878年至1932年在纽约出版。——第339页。
- 206 F. Engels.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 1880。——第345页。
- 207 Fr. Engels. 《Socy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Genève, 1882。——第345页。
- 208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时期出版的一种周报,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反对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在自己的篇幅中贯彻党的无产阶级的路线。——第345页。
- 20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5—498页。——第347页。
- 210 刊登在1882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弗·恩格斯的“品特是怎样造谣的”:发表时没有署作者的名字。在这篇文章前面,编

辑部写了下面的话：“我们的一位最杰出的德国同志写了一篇题为品特是怎样造谣的文章……”。——第 348 页。

- 211 恩格斯指的是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所引起的法国罢工运动，其中有孟索-累明事件。受尽矿主残酷压迫的孟索-累明的煤矿工人起来反对矿主。1882 年 10 月“北德总汇报”刊登了许多像恩格斯所描述的报道这些事件的通讯。——第 348 页。
- 212 这里指的是 1882 年 7 月 4 日在维也纳布置的一次警察挑衅事件。为了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制造一个诉讼案，控告他们为党搞经费而进行谋杀，发生了暗中安排好时抢劫梅尔施塔林格鞋匠的事件。
1882 年 8 月 29 日“北德总汇报”第 401 号上，登载了把这一谋杀事件同社会民主党牵连在一起的通讯。——第 349 页。
- 213 1882 年 10 月 21 日“北德总汇报”第 493 号。——第 349 页。
- 214 “马尔克”一文是恩格斯于 1882 年 9 月中到 12 月上半月写的，它是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小册子的附录。本文部分利用了恩格斯研究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时收集的材料。恩格斯的这些研究，载于本卷“遗稿”部分。1883 年本文转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并印成单行本。在恩格斯生前，“马尔克”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起用德文出了 4 版。
本卷中所载的“马尔克”一文，是根据恩格斯审阅过的德文第四版“社会主义的发展”（1891）译出的。1892 年，“马尔克”也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附录由爱·艾威林译成英文出版，恩格斯并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马克思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手稿时曾对该文作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谈到这篇论文时写道：“‘马尔克’这篇附录，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中传播某些有关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情况的基本知识而写成的。当这个党的影响几乎已经扩大到了全体城市工人，因而需要去争取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其必要了。”——第 351 页。
- 215 格·路·毛勒用一个总题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是研究中世纪把德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

- 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 der Mark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V, Erlangen, 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I, Erlangen, 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V, Erlangen, 1869—1871)。——第353页。
- 216 恩格斯指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这里讲到的事实,载于第4册第22章。——第353页。
- 217 “帝国法”是中央政权颁布的中世纪日耳曼帝国的全帝国法律。见这些法律的最完备的汇编之一:“H.E.恩德曼博士根据1372年手稿(同其他手稿校订过)并附有注释的帝国法”1846年加塞耳版第244页(《Das K eyserrecht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1372 in V ergleichung mit andern Handschriften und mit erläuternden A nmerkungen herausgegeben von Dr. H. E. Endemann》. Cas-sel, 1846, S. 244)。恩格斯引用的材料载于“关于森林法”部分。——第354页。
- 218 “氏族法”(即所谓野蛮人法,拉丁文为 Leges barbarorum, 德文为 Germanische V olksrechte, 是日耳曼各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这些部落于五至七世纪在过去西罗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和公国。这部民族法是五至九世纪之间制定的。——第356页。
- 219 “里普利安法”是一个古代日耳曼部落——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的习惯法的记录,这些法兰克人于四至五世纪居住在莱茵河和麦士河之间。

“里普利安法”，是研究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社会制度的主要材料。“里普利安法”第八十二节(表A)和第八十四节(表B)。谈到了耕地的私人占有制。见最完备的版本之一：“里普利安和法兰克—哈玛维法”1883年汉诺威版第104页(《Lex Ribuaria et lex Francorum Chamarorum》.Hannoverae, 1883, p.104)。——第357页。

- 220 恩格斯指1878年4月15日颁布的各种林木盗窃法(《Gesetz, betreffend den Forstdiebstahl》),该法律规定,未经警察的特别允许不准采集草、野果和蘑菇。——第359页。
- 221 指陪审法庭。这种法庭于1848年革命以后在许多德意志邦内建立,自1871年以后则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堂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审员)组成,和过去的陪审员不同,他们参与了全部审判,不仅是确定罪行,而且规定处罚方法。法庭成员是从统治阶级的代表中特别挑选出来的。——第360页。
- 222 西法兰克王国 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该帝国是一个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盟。843年帝国在查理的三个孙子之间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其中一人秃头查理得到了瓦解的帝国的西部领土,包括现代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的土地(未来德国的核心)交给了德意志的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间的地带则归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第362页。
- 223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战争,是各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形式。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派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以后参战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两个阵营。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德意志的天主教邦君,在天主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新教的国家:捷克、丹麦、瑞士、荷兰共和国和许多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邦。新教国家曾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法兰西国王的支持。德意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野心的对象。战争于1648年结束,签订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该和约巩固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第366页。

- 224 Code civil 是拿破仑第一的民法典,这个法典也常在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在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这个法典在该省继续有效。——第 367 页。
- 225 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近郊的溃灭,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的法国投降,这表明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 367 页。
- 226 “正义报”(《La Justice》)是法国的日报,激进党的机关报,从 1880 年至 1930 年在巴黎出版。在 1880—1896 年期间,领导该报的是报纸的创办者若·克列孟梭,在这一时期,报纸是所谓“极左派”即坚持个别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纲领而反映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党左翼的机关报。——第 370 页。
- 227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的机关报,1869 年 12 月至 1870 年 9 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
燕妮·马克思所写的一些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刊登在 1870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24 日“马赛曲报”第 71、79、89、91、99、113、118 和 125 号上(共 8 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670—700 页)。——第 370 页。
- 228 新喀里多尼亚岛 是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些岛屿,那里的气候对人的身体极其有害,是巴黎公社社员的流放地。——第 371 页。
- 229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的报纸,该报于 1844 年 1 月至 12 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 1844 年夏天起开始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 1845 年 1 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 375 页。
- 230 关于敖德萨大学的学生希望向马克思墓献花圈的消息,载于 1883 年 4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7 号。根据他们的要求,花圈的题词应

- 为：“献给‘资本论’的作者和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卡尔·马克思。他的学生和拥护者敖德萨大学的一群社会主义者敬挽。”——第 381 页。
- 231 指侨居苏黎世的斯拉夫各国青年组成的“斯拉夫”同盟。——第 381 页。
- 232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 是纽约各工会的联合会，于 1882 年产生，在八十年代是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联合了白人和黑人以及美籍和外籍工人。领导这个中央劳动联合会的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为了有效地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既需要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又需要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第 384 页。
- 233 恩格斯 1883 年 4 月 18 日给范·派顿的信是用英文写的。——第 385 页。
- 234 恩格斯提到 1845 年时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叙述的他和马克思的观点（该书写于 1845—1846 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385 页。
- 23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90—491 页。——第 385 页。
- 236 恩格斯指的是小册子：约翰·莫斯特“资本和劳动。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一书的通俗概述”（J. Most.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这本小册子于 1873 年在克姆尼次出版。——第 386 页。
- 237 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1880 年米兰版（A. Loria. 《La rendita fondiaria e-la sua elisione naturale》. Milano, 1880）。——第 386 页。
- 238 指的是小册子：阿·洛里亚“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1882 年博洛尼亚版（A. Loria. 《La teoria del valore negli economisti italiani》. Bologna, 1882）。——第 387 页。
- 239 指阿·洛里亚“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杂志 1883 年罗马版第 2 集第 38 卷第 7 章，第 509—542 页（《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ser. 2, vol. 38, fas. 7, Roma, 1883, p. 509—542)。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是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政论性杂志,从1866年至187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从1878年至1943年在罗马出版,每月两期。——第387页。

- 240 “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是恩格斯在读完法国新闻记者、共和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普·利沙加勒所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年布鲁塞尔版(《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Bruxelles, 1876)一书后,于1877年2月初写成的。1877年2月9日,该书作者在复信中感谢恩格斯在信中就军事事件所发表的“卓越意见”。恩格斯的“意见”一文在1933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利沙加勒的著作是在研究了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揭露了法国统治阶级的反民族政策,指出了人民群众在创建巴黎公社中,在公社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称该书为“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马克思认为该书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而大力促进该书用德文出版。——第391页。

- 241 指国防政府代表梯也尔(当时他没有参加政府,但是实际上却起着政府秘密领导人的作用)和俾斯麦在凡尔赛举行的停战谈判。1870年10月30日巴黎知道了谈判的消息。对于即将签订的、被资产阶级政府说成是法国的莫大幸福的这一卖国停战协走,巴黎群众表示十分愤慨。梯也尔谈判的消息和麦茨的投降,都推动了10月31日巴黎工人的革命行动。俾斯麦利用法军指挥部在谈判期间的毫无准备,在赢得了时间以后,就中断了谈判。——第391页。

- 242 指汉涅金的匿名出版的著作“‘麦茨之战’作者的军事思想和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见解”1871年美因兹版第185—186页(《Militärische Gedanken und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der Jahre 1870 und 1871 vom Verfasser des 《Krieges um Metz》》. Mainz, 1871, S. 185—186)。——第

392 页。

- 243 自由射手(法文 francs-tireurs),即志愿游击队员。他们分成小队队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与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敌军侵入法国时建立起来的。
1867年,法国开始组织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领土以后,协会会员根据专门的指令拿起了武器。当法国正规军被击溃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部队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第 392 页。
- 244 讲的是 1796—1797 年拿破仑在意大利作战时,法军包围曼都亚一事。——第 393 页。
- 245 弗·埃拉赫“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期间。一个瑞士军人的观察与思考”1874 年莱比锡—伯尔尼版第 230 页(F. Erlach. 《Aus dem französisch-deutschen Kriege 1870—1871. Beobachtungen und Betrachtungen eines Schweizer-W ehrmanns》. Leipzig-Bern, 1874, S. 230)。——第 393 页。
- 246 实际资料是恩格斯从威·勃鲁美的“从色当战役至战争结束时德军的军事行动”(《Die Operationen der deutschen Heere von der Schlacht bei Sedan bis zum Ende des Krieges》)一书中取得的。该书第一版和第二版于 1872 年在柏林出版。——第 394 页。
- 247 1“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 是马克思 1879 年下半年—1880 年 11 月在伦敦写的,收在他 1879—1881 年的笔记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批评的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第 1 部分:基础”1879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第 2 版(《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I . A llgemeine oder theoretische Volkswirtschaftslehre. Th. I . G rundle-gung》. 2. A usg,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79)。马克思在批评瓦格纳歪曲“资本论”中阐述的价值理论时,再一次表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并加以具体化。马克思的“评论”前面有他所编的五十四

种书目,这些书目是从瓦格纳书上所列的参考书中引来的。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30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卷上。——第396页。

- 248 卡·亨·劳“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1847年海得尔堡第5版第63页(K. H. Rau.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5. A usg., Heidelberg, 1847, p. 63)。——第398页。
- 249 见“马克思恩格斯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7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0页)。——第399页。
- 250 指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400页。
- 251 阿·谢夫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1870年杜宾根版(A. Schäffle. 《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äfts- und Vermögensformen》. Tübingen, 1870)。——第402页。
- 252 指谢夫莱1875年在哥达匿名出版的《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一书。——第402页。
- 253 阿·谢夫莱“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1875—1878年杜宾根版第1—4卷(A. Schäffle. 《Bau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örpers》. Bd. I — IV, Tübingen, 1875—1878)。——第402页。
- 254 K. H. Rau.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8. A usg., I . A bt.,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68, S. 88——第404页。
- 255 “一般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自由派的政治经济评论,1844—1943年在杜宾根出版,中有间断。1875年5月31日洛贝尔图斯给瓦格纳的信,曾载于上述杂志第34卷阿·瓦格纳的“略论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Einiges

- von und über Rodbertus-Jagetzow))一文中。——第411页。
- 256 K. Marx. 《Das Kapital》. 2. Aufl., Bd. I, Hamburg, 1872, S. 36 (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8—39页)。——第412页。
- 257 马克思所指的注释载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页)。——第413页。
- 258 K. Marx. 《Das Kapital》. 2. Aufl., Bd. I, Hamburg, 1872, S. 15 (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页)。——第413页。
- 259 V. Rost. 《Deutsch-Griechisches Wörterbuch》. Abt. I, A—L, Göttingen, 1829, S. 359.——第416页。
- 260 恩·舒耳采“哥特语辞典”[1848年]马格德堡版第411页(E. Schulze. 《Gothisches Glossar》. Magdeburg, [1848], S. 411)。——第416页。
- 261 阿·威曼“实用中部高地德意志语辞典”1838年克韦德林堡和莱比锡版第634—635页(A. Ziemann. 《Mittelhochdeutsches Wörterbuch zum Handgebrauch》. Quedlinburg und Leipzig, 1838, S. 634—635)。——第417页。
- 262 K. Marx. 《Das Kapital》. 2. Aufl., Bd. I, Hamburg, 1872, S. 171 (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00页)。——第418页。
- 263 马克思在这里和在上面引证的是1872年在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2版第1卷(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98页)。——第422页。
- 264 鲁·耶林“罗马法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精神”1874年莱比锡第3版第2部第2册第234—259页(R. Jhering.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3. Aufl., Th. II, Buch II, Leipzig, 1874, S. 243—259)。——第 423 页。
- 265 托·图克和威·纽马奇“1848—1856 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这是从 1792 年到现在为止的价格史的第五和第六两卷”1857 年伦敦版第 5 卷第 1 部。“论 1847—1856 年的粮食价格”(T. Tooke and W.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In two volumes; forming the fifth and sixth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V, London, 1857, Part I. 《On the prices of corn from 1847 to 1856》)。——第 426 页。
- 266 A. Böckh. 《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 Bd. I, Buch I, Berlin, 1817, S. 84—107. ——第 426 页。
- 267 指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 50 亿赔款对德国经济状况影响的结果。——第 427 页。
- 268 圣彼得的迪纳里——罗马教皇每年向天主教徒征收的捐税(最初是在圣彼得节日向每户征收迪纳里)。至今仍为罗马教廷用于进行反动的天主教宣传的重要收入来源。——第 429 页。
- 269 A. Cournot. 《Recherches sur les principes mathématiqu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 Paris, 1838, p. 7. ——第 429 页。
- 270 见注 166。——第 430 页。
- 27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771—772 页(参看“资本论”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963 页)(文中的差别见注 67)。——第 430 页。
- 272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经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过程的研究”1877 年伦敦版第 552 页(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 p.552)。——第 432 页。
- 273 亨·萨·梅恩“东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 年伦敦版 (H. S. Maine. 《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London, 1871)。——第 433 页。
- 274 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 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 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 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 436 页。
- 27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770—771 页 (参看“资本论”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962 页) (文中的差别见注 67)。——第 442 页。
- 276 1785 年 4 月 21 日颁发的给俄罗斯帝国各城市的权利和利益的文件中反映了叶卡特林娜二世建立行会组织的意图, 文件中包括详细确定行会组织的手工业特别条例。各城市手工业者必须在行会中登记, 禁止非行会手工业。——第 443 页。
- 277 卡·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一文大概的写作日期是 1881 年底—1882 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利用了官方公布的材料, 以及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关于一八六一年改革的札记”与专门研究俄国资料的其他手稿不同, 马克思不是写在笔记本上, 而是写在单页纸张上, 其中有题目和章节, 标明数字和字母。除了引用收集在许多笔记中的材料外, 还引用已经系统化的实际资料, 对俄国 1861 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最重要的结论。马克思的手稿于 1952 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12 卷上。——第 453 页。
- 278 马克思引自本人的读书笔记, 其中有阅读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 (1870 年圣彼得堡版) 一书时所作的笔记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 年俄文版第 11 卷第 119—138 页)。——第 453 页。

- 279 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莱比锡版)(《Die ländliche Verfassung Russlands》. Leipzig, 1866)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52年俄文版第12卷第36—37页)。——第453页。
- 280 马克思在此处和下面都是引自他根据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写的“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这篇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8—20页)。——第454页。
- 281 舒瓦洛夫和帕斯克维奇一方面赞成农民的人身解放,同时希望为地主保留全部土地,而使农民只有权使用份地以代替赋役。——第454页。
- 282 马克思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110—114页)。——第455页。
- 283 马克思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第1卷(1862年莱茵河岸波恩版)和阿·阿·戈洛瓦乔夫“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1872年圣彼得堡版)二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29—35页和第115—117页)。——第457页。
- 284 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1868年莱茵河岸波恩版)第4卷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35—36页)。——第458页。
- 285 引自尤·埃·扬松“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39—148页)。——第458页。
- 286 “修订税制最高委员会报告书”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22卷第3册第1部分第6—7页。
马克思所引的数字是用计算的方法得来的。——第464页。
- 287 这里引证的是尤·埃·扬松的“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第466页。

- 288 弗·恩格斯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手稿,同和它有关的“法兰克时代”手稿一样,是在1881—1882年按照统一计划完成的巨著。恩格斯拟订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计划证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多年专门研究日耳曼尼亚和西欧历史的结果。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在作者生前未曾发表过。根据手稿后面所附的恩格斯的最初计划来看,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四章。第二部分作者打算列为第一部分的“注译”——史科学、民族学和语言学性质的补充。

在写作过程中,原来拟定的计划有了改变。例如,在第一章结尾,恩格斯写道:“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手稿中没有这一章。显然,恩格斯把这一材料用到法兰克时代一文的第二章(“区制度和军事制度”)中去了。本文第二部分只有第二章。恩格斯计划中标题为“法兰克方言”的第三章,被他移到关于法兰克时代的研究中去了。

各章的顺序以及第四章的标题,是编辑部根据恩格斯的计划拟定的。——第478页。

- 289 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及其在第三纪的地位”1880年伦敦版(W. B. Dawkins. 《Early Man in Britain and his place in the tertiary period》. London, 1880)。——第478页。
- 290 见注195。——第480页。
- 291 指1878年12月21日鲁·微耳和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会会议上的报道。见“民族学杂志”1878年柏林版第10卷(《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Bd. X, Berlin, 1878)发表的“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社辩论”1878年年卷第418—424页(《Verhandlungen der 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 Jahrg. 1878, S. 418—424)。——第480页。
- 292 指沙弗豪森在德国人类学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道,该会在1877年9月24—26日在康斯坦察举行。见“德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学会报道”1877年慕尼黑版第11期(《Correspondenz-Blat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 und Urgeschichte》№ 11, München, 1877)。——第 480 页。
- 293 关于皮提亚斯旅行记的资料,恩格斯引自约·列列韦尔的著作“马赛
皮提亚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地理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Pythéas de
Marseille et la géographie de son temps》. Bruxelles,
1836)。——第 482 页。
- 294 卡·弥伦霍夫“德国考古学”1870年柏林版第1卷第479页(K.
Müllenhoff. 《Deutsche Alttertumskunde》. Bd. I, Berlin,
1870, S.479)。——第 483 页。
- 295 普卢塔克“比较传记”。艾米利乌斯·保罗传第12章。——第 483 页。
- 296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5卷第10章。——第 484 页。
- 297 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和第6卷第22章。——第 486 页。
- 298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7卷第1章。——第 488 页。
- 299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489 页。
- 300 凯龙斯·普林尼·塞孔德“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4卷第14章。——
第 491 页。
- 301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4卷第33章。——第 494 页。
- 302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5卷第6章。——第 496 页。
- 303 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罗马史”二卷本,第2卷第97章。——第
496 页。
- 304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8章。——第 499 页。
- 305 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罗马史”二卷本,第2卷第117章。——第
499 页。
- 306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8章。——第 499 页。
- 307 这一段话和上一段话,恩格斯引自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的“罗马
史”第2卷第118章。——第 502 页。

- 308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 56 卷第 19 章。——第 502 页。
- 309 恩格斯引自塔西佗“编年史”(《Annales》)第 1 卷第 61 章。——第 503 页。
- 310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 4 卷第 4 章。——第 505 页。
- 311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 7 卷第 1 章。——第 505 页。
- 312 约克将军,曾在 1812 年在俄国指挥拿破仑军队的普鲁士辅助军,1812 年 12 月 30 日他同俄国指挥部订立了陶罗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他必须在两个月内不参加对俄军的军事行动。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当俄、奥、普、瑞士联军同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在莱比锡战斗的时候,在拿破仑军队中作战的萨克森军,突然在战斗方酣时转到敌人方面,并掉转炮口打法国人。——第 505 页。
- 313 指哈耳施塔特古墓,该墓在 1846 年在奥地利西南部哈耳施塔特城附近发现,因而称为哈耳施塔特文化(约公元前 1000—500 年)。——第 509 页。
- 314 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1880 年伦敦版第 466—472 页(W. B. Dawkins. 《Early Man in Britain》. London, 1880, p. 466—472)。——第 510 页。
- 315 卡·弗·维贝尔格“希腊人和罗马人通过北方商路同北方交往的研究”1861 年耶夫勒版(C. F. W. iberg. 《Bidrag till Kännedomen om Grekerna och Romarnas förbindelse med Norden och om de nordiska Handelsvägarne》. G. efle, 1861)。约·梅斯托尔夫从瑞典语译成德语为:“古典民族通过商业对北方各国的影响”1867 年汉堡版(《Der Einfluss der klassischen Völker auf den Norden durch den Handelsverkehr》. Hamburg, 1867)。——第 510 页。
- 316 塔西佗“编年史”第 2 卷第 62 章。——第 510 页。
- 317 耶·雅·阿·沃尔索“当时文献中的北方各国古代史”。德译者约·梅斯托尔夫,1878 年汉堡版(J. J. A. W. orsaae. 《Die Vorgeschichte

- des Nordens nach gleichzeitigen Denkmälern》. In: *Deutsche übertragen von J. Mestorf*. Hamburg, 1878). —— 第 512 页。
- 318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23 章。—— 第 513 页。
- 319 在托勒密的“地理学”第 2 卷和第 3 卷中,谈到了日耳曼尼亚。—— 第 524 页。
- 320 指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1837 年慕尼黑版(K. Zeuss. 《Die Deutschen und die Nachbarstämme》. München, 1837)和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48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J. Grim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Bd. I—II, Leipzig, 1848)。—— 第 526 页。
- 321 凯撒城的普罗科皮阿斯“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第 8 卷(“和哥特人的战争史”)第 4 分册第 5 章第 5 节。—— 第 527 页。
- 322 F. C. Dahlmann. 《Geschichte von Dänemark》, Bd. I, Hamburg, 1840, S. 16—— 第 528 页。
- 323 格·瓦茨“德国国家制度史”1844—1878 年基尔版第 1—8 卷(G. Waitz.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 I—8, Kiel, 1844—1878)。—— 第 530 页。
- 324 “法兰克时代”是弗·恩格斯在 1881—1882 年写的手稿;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手稿一样,本文也是研究日耳曼尼亚历史的专门著作的一部分(见注 288)。—— 第 539 页。
- 325 保·罗特“从上古到十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 年厄兰根版(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ins Zehnte Jahrhundert》. Erlangen, 1850)。—— 第 543 页。
- 326 爱因哈德“查理大帝生平”第 2 章。—— 第 543 页。
- 327 恩格斯引用的是图尔的格雷哥里的著作“法兰克人史”第 6 册第 46 章(《Historia Francorum》)。—— 第 544 页。

- 328 敕令——中世纪早期(八到九世纪)国王的立法诏书和命令。亚琛敕令指出了教会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大规模夺取农民土地的事实,它是关于法兰克王国历史的最重要资料之一。——第545页。
- 329 恩格斯列举的这些数目字摘自九世纪编制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收入登记册)。这个登记册第一次是由法国历史学家盖拉尔做了一些注释出版的,名为:“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1844年巴黎版第1—2卷(《Polyptyque de l'abbé Irminon》, t. I — II, Paris, 1844)。——第546页。
- 330 契约程式——是把各种各样有关财产和其他性质的契约和协定在法律上固定下来的具体文书的标准样式。流传到现在的几本契约程式集,使我们能够了解六世纪末至九世纪末法兰克王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
- 恩格斯引用的这个契约程式是收在名为“西尔蒙通俗叙述的图尔契约程式集”(《Formulae Turonenses vulgo Sirmondicae dictae》)这个集里的。恩格斯显然是从上述罗特的书中第379页上引来的。——第555页。
- 331 指关于卡罗林帝国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之一——“贝坦年鉴”(《Annales Bertiniani》)。这个年鉴因法国圣贝坦修道院而得名。它包括了830—882年这段时期,分为三部分,都是不同的作者所写。贝坦年鉴是列在著名的“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从书中出版的。——第557页。
- 332 斯特林加(直译是:“古法之子”)是841—842年在萨克森发生的自由农民和半自由的萨克森人(半农奴)反对法兰克贵族和萨克森贵族的暴动,暴动者力求恢复封建社会以前的旧习俗。——第563页。
- 333 “法兰克方言”——恩格斯写于1881—1882年;在关于法兰克时代的手稿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提纲的草稿中,恩格斯把这研究著作叫做“注释”。但是,“法兰克方言”有完全独立的科学意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范例。

“法兰克时代”没有写完,在恩格斯生前没发表过。1935年第一次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用俄文发表。文章用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并列刊印。——第 564 页。

- 334 古福音诗 是古代萨克森语言文学的文献(属九世纪);是把福音书大大压缩了和日耳曼化了的转叙本;古福音诗的作者,据推测是鲁尔河岸韦尔登的修道院的一个修道士。

古福音诗的手抄本保存下来的有两个,一个是慕尼黑手稿(属九世纪),一个是柯顿手稿(因古代文物搜集者英国人柯顿而得名),属十到十一世纪。手稿的名称是德国语言学家施梅里尔在 1830 年加的,直译是:“救主”。古福音诗第一次是在 1866 年由摩里茨·海奈出版。——第 564 页。

- 335 威·布劳涅“法兰克方言和高地德意志辅音音变的研究”,载于“德意志语言文学史资料”杂志,1874 年萨利河岸哈雷版第 1 卷(W. Braune. 《Zur kenntnis des fränkischen und zur hochdeutschen lautverschiebung》.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Bd. 1, Halle a/S., 1874)。——第 564 页。
- 336 亨·凯伦“‘萨利克法’注解和萨利克法兰克人的语言。德意志语言史”1869 年海牙版(H. Kern. 《Die Glossen in der Lex Salica und die Sprache der salischen Franke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n》. Haag, 1869)。——第 565 页。
- 337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在盎格鲁—弗里西安方言和萨克森方言中,第三人称复数直陈式由于第三人称词尾中齿音的(n)脱落,而同第二人称相同。这种相同大概就是这两种方言中所有三种人称现在时直陈式复数之间的差别消失的起点。——第 566 页。
- 338 指对尼德兰语文学家尤斯图新·利普西乌斯从赞美诗逸稿(九世纪)中抄下的不清楚的词的注解。利普西乌斯注解由摩里茨·海奈发表在 1867 年帕德波恩出版的“古代低地德意志小文献”(Kleinere altniederdeutsche Denkmäler). Paderborn, 1867)中。——第 567 页。
- 339 P. J. 科瑟伊恩“古代西萨克森语语法”1883 年海牙版(P. Cosijn. 《A l-

- twestsächsische Grammatik》. Haag, 1883)。——第 568 页。
- 340 指弗雷肯霍斯特修道院赋税登记册(九到十一世纪初)。——第 568 页。
- 341 指十到十一世纪的帕德波恩文件,——德国历史学家保尔·维干德在 1831—1832 年出版的地方文献,载于他所出版的第 5 卷“威斯特伐里亚历史和考古学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humskunde Westphalens》)和第 2 第 3 两卷“威斯特伐里亚的帕德波恩和克尔佛两个公爵领地方法”(《Die Provinzialrechte der Fürstenthümer Paderborn und Corvey in Westphalen》)。——第 569 页。
- 342 指魏森堡的修士奥特弗里德在 863 和 871 年之间做的对福音书的转述。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是古代德意志文字的最初文献之一。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的语言被认为是莱茵—法兰克方言的南部土语之一。——第 569 页。
- 343 指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的手稿,是洗礼誓(《Taufgelöbniß》)的程式。——第 570 页。
- 344 指布鲁塞尔的古老喷泉中的小孩雕像,是十七世纪佛来米的雕塑家杜肯努阿的作品。——第 575 页。
- 345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 年哥达版第 153 页(W. Arnold. 《Deutsche Urzeit》. Göttingen, 1879, S. 153)。——第 576 页。
- 346 “下莱茵历史档案”1831 年杜塞尔多夫德·约·拉康布累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1 篇(《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Niederrheins》. Hrsg. von T. J. Lacomblet, Abt. I, Bd. I, Heft 1, Düsseldorf, 1831)。——第 582 页。
- 347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 年哥达版第 140—141 页(W. Arnold. 《Deutsche Urzeit》. Göttingen, 1879, S. 140—141)。——第 583 页。
- 348 指起初为丹·哥·莱曼后来为其他一些人出版的地图,名为“莱曼所编日耳曼尼亚、瑞士、东法兰西、比利时、尼德兰和波兰的地形特别图”格

洛高版(《Reymann's topographische Spezial-Karte von Deutschland, Schweiz, Ostfrankreich, Belgien, Niederlande und Polen》.Glogau)。地图分为若干正方形(地段),以主要居民点为名,因此,恩格斯在往下的引证中,提到了地段的名称和号码。——第584页。

- 349 “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经过泰·门克博士重新修改的卡·冯·施普鲁奈尔博士的常用地图的第3版。1880年哥达版(《Hand-Atlas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 3. Aufl. von Dr. K. v. Spruner's Hand-Atlas, neu bearbeitet von Dr. Th. Menke, Gotha, 1880)。

恩格斯在自己这一研究著作中各处引用地理资料,主要是摘自三十二图(Deutschland's Gaue. II [德意志区 II])。——第584页。

- 350 弗·约·蒙奈“七世纪末以前的巴登地方古代史”。第1卷:“上莱茵边区的罗马人”1845年卡尔斯卢厄版(F. J. Moné. 《Urgeschichte des badischen Landes bis zu Ende des siebenten Jahrhunderts》. Bd. I: 《Die Römer im oberrheinischen Grenzland》, Karlsruhe, 1845)。——第588页。
- 351 弗·博伊斯特“苏黎世州小历史地图集”1873年苏黎世版(F. Beust. 《Kleiner historischer Atlas des Kanton Zürich》. Zürich, 1873)。——第588页。
- 352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41页(W. Arnold. 《Deutsche Urzeit》. Gotha, 1879, S. 141)。——第589页。
- 353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56页(W. Arnold. 《Deutsche Urzeit》. Gotha, 1879, S. 156)。——第591页。
- 354 路·白尔尼“巴黎去信”1832年汉堡版第1—2分册;1833—1834年巴黎版第3—6分册(L. Börne. 《Briefe aus Paris》. 1.—2. Theile, Hamburg, 1832; 3.—6. Theile, Paris, 1833—1834)。——第598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75年3月—1883年5月)

1875

- 1875年3月—1876年 恩格斯继续写1873年已经开始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他写这本著作的目的,是对理论自然科学的成就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批判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1875—1876年他写完了两章(“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写了许多笔记和片断。
- 3月18—28日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这两个德国工人组织准备合并,恩格斯在致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奥·倍倍尔的信中,以他个人和马克思的名义,尖锐地批判了妥协性的纲领草案,批判了纲领草案中拉萨尔派教义的整体体系、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点和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观点。
- 4月28日 马克思给亲自校订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写了跋。
- 5月5日 马克思寄给威·白拉克一封信,信中附有寄给爱森纳赫派整个领导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评意见,后来这些批评意见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这一著作,给拉萨尔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论证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

- 政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科学地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规律，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 5月8日 马克思通知俄国革命者彼·拉·拉甫罗夫，他已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同俄国通信的秘密地址。
- 5月20日—8月 马克思作了多次计算，以便说明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的差别。他所做的这项工作，以后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的基础。
- 6—12月 马克思同拉甫罗夫经常见面，并和他通信。
- 6—9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法国、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和美国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有关这些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的消息。
- 6月18日 马克思特别重视德国化学或和生理学家摩·特劳白关于制造人造细胞的试验；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他指出这种试验对解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 6月21日 恩格斯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同总委员会（会址已迁往纽约）经常保持着联系。这时他接到总委员会关于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这些通告是要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各个支部散发的。
- 8月初 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修订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约·莫斯特所著“资本和劳动”一书，准备出第二版。该书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概述，于1876年在克姆尼次（卡尔·马克思城）出版，1878年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
- 8月12日左右 马克思离开伦敦，到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治病。
- 8月13—14日左右 马克思赴卡尔斯巴德途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逗留；

- 他访问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并同编辑列·宗内曼进行长谈。
- 8月13日 恩格斯向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明他分送关于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所采取的措施和有关欧洲国家国际支部的情况。
- 8月15日—9月11日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和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经常见面。
警察对马克思实行了秘密监视。
- 8月下半月—9月22日左右 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 9月11日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返回途中，去布拉格会见德国民主派政论家麦·奥本海姆。
- 9月20日 马克思返回伦敦。
- 9月20日以后—10月 马克思又开始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花费许多时间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在阅读1875年柏林出版的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代表人物尤·费·萨马林、亚·伊·柯舍列夫、康·德·卡维林的书籍时，马克思做了详细的札记。
- 10月9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国际米兰支部的领导人恩·比尼亚米的一项建议，在他所出版的“社会主义丛书”中刊印一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 10月11日和12日 恩格斯在给白拉克和倍倍尔的信中声明，他和马克思像以前一样对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抱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不准备公开反对这个纲领，因为工人是把它作为共产主义的纲领来理解的，因为他们希望真正的共产主义宣传在工人中获得成功。
- 10月15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强调必须密切注视俄国的

- 事态,因为俄国人民群众的处境、俄国政府的政策和革命运动的状况,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俄国将是第一个爆发革命的国家。
- 10月下半月—11月6日 恩格斯同夫人因家庭事务去海得尔堡。他顺便在雷瑙逗留,会见了自己的熟人化学家鲍利。在返回途中,去宾根和科伦,并经奥斯坦德返回伦敦。
- 11—12月 马克思研究了有关农业化学(尤其对亚·尼·恩格尔加尔特的“农业的化学基础”一书做了详细的摘要)、物理学、政治经济学的专著,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专著。阅读了伊·伊·帕特拉夫斯基的“1700—1762年俄国金融市场”一书和恩格尔加尔特的“俄国农业问题”一文,同时研究了俄国总参谋部于1871年出版的“军事统计汇编”第四编,并做了详细的札记。
- 11月12日 恩格斯根据拉甫罗夫的请求,读了拉甫罗夫于1875年9月15日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读后,恩格斯写信给拉甫罗夫,说出自己对达尔文学说的态度,揭穿了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的反科学立场,并对拉甫罗夫本人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 11月末 马克思亲自校订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分册出版。在该书的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法文版和原文版一样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将法文版最后一分册寄给许多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出版“资本论”俄文版的发起人和译者格·亚·洛帕廷、尼·弗·丹尼尔逊,以及拉甫罗夫和柯瓦列夫斯基。
- 1875年12月—1876年2月 马克思研究从俄国丹尼尔逊那里得到的10卷“征税委员会报告”和“省农民事务厅意见汇编”;他打算在最后校订“资本论”第三卷时能利用他所做的笔记。
- 12月17日 马克思通知拉甫罗夫说,由于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

篇幅很大，他不能发表他编写的法文版主题索引。

1 8 7 6

- 1月22日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恩格斯这篇演说于2月15日登在拉甫罗夫在伦敦出版的“前进报”上。
- 2月 恩格斯写“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文中揭露了普鲁士的容克是德国一切反动力量的堡垒。该文载于2月25、27日和3月1日“人民国家报”，并出了单行本。
- 2月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立三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发表演说。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了德国第一批无产阶级组织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所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则。
- 2月中 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第三卷的问题时，写了一段不长的说明：“级差地租和地租仅只是合并在地内的资本的利息”。后来恩格斯把这段说明编入“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四章。
- 3—5月 马克思研究了马·施莱登、约·兰克和路·海尔曼的许多生理学著作。
- 4月初 马克思收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工人运动的成就，并说有必要在美国工人中传播“共产党宣言”。为此，他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审阅一下海·迈耶尔的“共产党宣言”原有译本。
- 4月4日 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他为了写作“资本论”，打算研究美国农业、土地关系和信贷方面的资料，并请他寄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书目。

-
- | | |
|-------------|--|
| 5—6月 | 马克思研究公社所有制形式；读了德国历史学家格·路·毛勒的著作。 |
| 5月20日左右—6月中 | 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
| 5月24日左右 | 马克思收到原巴黎公社委员，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列·弗兰克尔从布达佩斯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有一些关于匈牙利土地所有制的资料。 |
| 5月24—26日 | 考虑到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中间得到流行，影响日益扩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必须在报刊上批判杜林的观点。 |
| 5月28日 |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拟定了他批判杜林的著作的大纲和性质。 |
| 5月底—8月底 | 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并着手为批判杜林的观点收集材料。为此，他读了杜林的以下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 |
| 6—11月 | 恩格斯写“威廉·沃尔弗”一文，这是一位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的生平事业概述。沃尔弗传作为一组文章于7月1日到11月25日连载在威廉·李卜克内西主编的社会主义杂志“新世界”上。 |
| 6月中—6月30日左右 | 恩格斯由于家庭事务呆在海得尔堡。 |
| 7月18—23日 | 马克思看望正在布莱根治病的妻子。 |
| 7月24日—9月1日 | 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
| 8月16日—9月15日 |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 |

- 1876年9月—1877年1月初 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这组文章发表在1877年1月3日至5月11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
- 9月16—22日 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返回伦敦途中，在布拉格拜访了奥本海姆，在列日拜访了原国际俄国支部积极活动家尼·伊·吴亭。
- 1876年9月23日—1877年8月 马克思和白拉克通信，谈出版普·利沙加勒“公社史”德文版问题。马克思认为传播这一著作是党的一件重要事情，他亲自校订该书译文。
- 10月21日 马克思事先通知拉甫罗夫，有一批俄国反动文人准备在伦敦出版杂志，向英国人介绍俄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拉甫罗夫把马克思这封信的摘要，刊登在11月1日的“前进报”上。
- 11月初 马克思将有关格莱斯顿政策的材料寄给英国激进主义者查·科勒特，以供“外交评论”（《Diplomatic Review》）利用。
- 11月20日 恩格斯在给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约·菲·贝克尔的信中，表示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意见，即国际的全体积极活动家应该努力的不是恢复以前的国际组织，而是建立和巩固各国群众性的工人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定的科学工作，以加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方面。
- 12月 马克思读格·汉森、费·德梅利奇、奥斯特罗日钦斯基—乌提舍诺维奇关于公社所有制的著作、弗·卡尔德纳斯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著作和L·克雷马齐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
- 12月上半月 马克思经常同柯瓦列夫斯基会晤。

- 12月18日 恩格斯在给他的弟弟海·恩格斯的信中，分析了在巴尔干造成的形势，并得出俄土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 12月21日 恩格斯在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批判了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以及工联领袖在自由资产阶级面前的谄媚行径，报告了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情况，转达了7月在费拉得尔菲亚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

1877

- 1—12月 马克思继续研究俄国改革后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除其他著作外，还阅读了亚·伊·瓦西里契柯夫的“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第1—2卷，米·瓦·涅鲁切夫的“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巴·亚·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
- 1月9日 恩格斯把“反杜林论”关于哲学的第一编的最后一部分寄给李卜克内西，以便在“前进报”上发表。
- 2—3月初 马克思指示英国记者原国际会员马·巴里，要他撰文揭露格莱斯顿的对外政策。巴里的文章于3月初在一些保守派的报纸上发表。
- 2月初 恩格斯写了“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1870年10月30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并把它寄给该书的作者利沙加勒。
- 2月13日 恩格斯写信给比尼亚米，谈到德国1877年的选举情况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恩格斯的信在2月17至18日米兰举行的意大利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2月26日在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上发表。

- 2月20日左右—
3月14日左右 恩格斯因妻子生病居住在布莱顿。
- 3月5日 马克思把“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第一部分寄给恩格斯，这一部分批判了杜林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
- 3月6—14日之间 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写了“意大利的情况”一文，该文叙述了意大利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情况，指出这一切为建立意大利工人党创造了前提。该文发表在3月16日的“前进报”上。
- 3月16日 马克思请拉甫罗夫编写关于俄国诉讼和行政处分的综合材料，以便把这份材料转给爱尔兰人下院议员凯·奥克莱里，让他在议会中发言时利用。拉甫罗夫满足了马克思的请求。
- 3月底 马克思又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
- 5—12月 恩格斯在俄土战争时期记录了俄国军队的员额和部署。
- 6—8月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这组论文先后发表于7月27日至12月30日“前进报”的附刊上。
- 6—7月 恩格斯写了“1700—1870年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一文。
- 6月中 根据白拉克的请求，恩格斯为“人民历书”写了卡尔·马克思传略。传略于1878年发表。
- 7—8月 马克思阅读了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伊·伊·考夫曼的著作“价格波动论”、“论货币和信贷学说”第一分册和卡·克尼斯的著作“货币。货币基本学说论”。
- 7月4日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几天。

- 7月11日—8月28日 恩格斯同患病的妻子在兰兹格特休养。
- 7月23—29日左右 马克思常同从巴黎来会见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希尔施见面。希尔施告诉马克思有关法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状况的许多事实。
- 1877年8月—
1878年4月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一编（“社会主义”）。这组论文先后发表于1878年5月5日至7月7日“前进报”的附刊上。
- 8月8日 马克思把“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的第二部分寄给恩格斯。
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爱琳娜赴诺伊恩阿尔（德国）治病。
- 9月5—21日左右 恩格斯和妻子在苏格兰休养。
- 9月27日左右 马克思回到伦敦。
马克思写信告诉左尔格，他正在根据俄国原文资料研究俄国的局势，说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革命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
- 10月19日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寄给左尔格，以便译成英文，并指出在准备出美国版的时候对正文应该作哪些修改。美国版没有出成。
- 10月19日和23日 马克思在给左尔格和白拉克的信中，评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指出该党由于同拉萨尔派、杜林派，同上层阶级出身的人妥协而开始“发出霉味”，尖锐地批评了“未来”杂志和出版该杂志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者、“出钱买进”社会民主党的卡·赫希柏格。马克思指出，该杂志的主要倾向，是以“正义”等等词句偷换唯物主义的認識。马克思也批评了“前进报”编辑部，因为该编辑部让一些对理论一窍不通的、同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占用篇幅。

1877年11月—
1878年7月

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章的付印准备工作。

约11月

马克思写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对俄国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作了答复。马克思在信中就俄国是否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封信没有寄出。该信于1886年在日内瓦发表，1888年又在俄国的合法报刊上发表。

11—12月

马克思研究了罗·欧文的一系列著作。

1878

1878—1882年

马克思努力地系统地钻研代数学，研究并摘录拉克鲁瓦、马克费林、欧勒、波茨等人的论文，做了许多专门笔记。在代数学中或在（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限量分析中，马克思研究了分析无穷小的概念和运算的基本数学原形。继续钻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研究并摘录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格等人的著作。写了微分史大纲。

1878年初

恩格斯写了“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后来他把该文编入“自然辩证法”。

1月11日

恩格斯在给贝克尔的信中，对组成瑞士工人党表示满意；他分析了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中的错误。

1月12日

恩格斯在给比尼亚米的信中，分析了德国、法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特别关切俄国业已成熟的革命形势所造成的国内时局。比尼亚米于1月22日在“人民

- 报”上发表了恩格斯这封信的摘要。
- 2月4日和11日 马克思就东方问题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在3月初出版的“论东方问题”小册子第二版的附录中，刊载了这些信的摘要。
- 2月9日左右 马克思得到希尔施自巴黎寄来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希尔施谈到出版社会主义报纸“平等报”的困难，并请恩格斯为该报写稿。
- 2月中—3月中 恩格斯写了“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文，说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状况，证明无政府主义教条和策略的失败，以及国际政治路线的完全胜利；国际所奠定的国际无产阶级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原则，仍然在各国业已成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得到贯彻。该文在纽约社会主义报纸“劳动旗帜”3月3、10、17、24和31日这五期上发表。
- 3月底—5月 马克思阅读了考夫曼的“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做了详细的摘要，同时写了自己的大量意见。
- 4月15—2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内西会面。
- 5—6月初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一版单行本序言初稿。后来恩格斯把这个初稿当做“自然辩证法”的材料（“‘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 5月21日—5月底 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摘录了从美国收到的“劳动统计局第一年度报告”。
- 5月底—6月 马克思继续加紧对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研究，阅读了朱克斯、约翰斯顿、科佩等人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 6月11日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一版单行本序言定稿。
- 6月12和27日 马克思给“每日新闻”和“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写了声明，揭露俾斯麦的信徒洛·布赫尔。声明于6月13日

- 和 29 日发表。
- 7 月初 马克思写了“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揭露豪威耳虚假的论断，强调指出，世界各国正在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无时无刻不在实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思想。该文发表于 8 月 4 日的“世俗纪事”杂志。
- 7 月 8 日左右 莱比锡出版了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的第一个单行本，该书一方面批评了杜林的“观点”，同时又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
- 7 月 19 日 马克思收到左尔格的来信，该信报道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的活动，阐述了美国的工人运动和总的政治形势。
- 8 月 恩格斯在写成了“反杜林论”以后，打算着手系统整理“自然辩证法”的材料，为此他拟订了这一著作的总计划草稿。
- 9 月 4—14 日 马克思在马耳韦思治病。
- 9 月 12 日 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逝世。
- 10—11 月 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阅读了保·罗特、A. 奇孔奈、卡·迪·休里曼、L. 柯萨、查·A. 曼、A. 沃克等人关于银行和货币流通史的著作，做了摘记，并写了批评意见。
- 10 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已经被通过，建议李卜克内西在瑞士出版党的秘密机关报。
- 11 月上半月 马克思从住在伦敦的柯瓦列夫斯基那里，得到“资本论”在俄国报刊中引起争论的消息。

- 11月15日和28日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些修改意见,说明这些修改在准备出版新的俄文版本时必须加以考虑,并请他注意美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垄断组织的增长和英国的工业危机。
- 11月下半月—12月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土地关系史料,其中有汉森、斯·亚契尼的著作,有“1870年土地管理总局委员会年度报告”,还阅读了许多有关法国历史的著作。
- 11月26日左右 恩格斯从定期秘密前往俄国回来的洛帕廷那里,得到了有关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国内状况和革命民粹派活动的消息。
- 1878年12月—
1879年1月 马克思继续仔细地研究金融和银行业,做了大量摘录和笔记,阅读了奥·吉斯特—达贝尔、约·路·莱伊、雅·维·崩纳、约·加西奥等人的著作。
- 12月 马克思阅读了奥·卡斯帕里和艾·杜布瓦—雷蒙关于莱布尼茨的著作以及笛卡儿关于物理和数学的论文。

1879

- 1—12月 马克思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俄国和美国的文献资料。
- 2月底 马克思阅读了他请丹尼尔逊编写的关于过去十五年中俄国财政和财政政策的状况的介绍。
- 3月16日以后 马克思阅读柯瓦列夫斯基发表在俄国科学和文学政治杂志“言语”上的“评保加利亚宪法草案”一文。
- 3月21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了题为“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一文,向意大利工人介绍德国工人运动的成就和俄国革命的在成熟。该文发表于3月30日。

- 不迟于 4 月 马克思接到法国社会主义者茹·盖得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当时他正在积极为建立法国工人党而斗争,他在信中声明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向马克思报告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表示希望会见马克思。
- 4 月 马克思在给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提出自己对重农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的看法(在评论尼·伊·卡列也夫的“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一书的时候)。
- 4 月 10 日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解释延期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理由,说明欧洲和美洲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后果,并谈到铁路的发展其对资本积聚、对外贸易增长和人民群众状况的影响。
- 6—7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准备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中央机关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 6 月中—9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批评莫斯特领导的“左派”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批评莫斯特在他编辑的“自由”周报上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全部活动,特别是攻击该党对国会讲坛的利用。
- 6 月中—8 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德国保守派政论家鲁·迈耶耳的“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一书(该书在德国被列为禁书,是作者送给他们的),并做了摘录和札记。后来,恩格斯写“俾斯麦先生和社会主义”一文时利用了这些笔记。
- 6 月 17 日 恩格斯在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英国工联放弃参加任何政治斗争,并把他们的全部活动局限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罢工斗争。
- 1879 年下半年—
1880 年 11 月 马克思对已出版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一书

- 提出批评意见。马克思表述并发展了“资本论”中所阐述的一系列价值论原理。
- 8月 马克思从美国收到马萨诸塞劳动局局长莱特寄来的1874—1879年的报告和左尔格寄来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马萨诸塞劳动局的统计资料。
- 8月初 马克思接到丹尼尔逊寄去的附有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关于俄国财政和农业状况的详细报道。
- 8月4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他和马克思拒绝为准备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因为该报将由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斯坦机会主义集团领导，将成为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喉舌。
- 8月5—27日左右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8月8日左右—9月17日左右 马克思在泽稷岛和兰兹格特疗养。
- 8月14日左右 马克思读了威·卡尔顿的“关于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特写和报道”一书；在8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他对该书及其作者的评价。
- 不早于9月 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这一章。
- 9月9日 恩格斯写信通知马克思关于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内容，其中赫希柏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合写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其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自行招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民主运动应当具有完全和平的和改良的性质，领导这个运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有教养的”）分子。恩格斯建议立即反对机会主义者。
- 9月10日 马克思收到恩格斯关于赫希柏格集团活动的报道以后，回信表示赞同立即反对这个集团。

- 9月17日 马克思回到伦敦。
- 9月17—18日 恩格斯以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信中抗议领导方面对党内赫希柏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领导的机会主义派别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尖锐地批评自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性。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坚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消除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党机关报的任何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纠正自己的立场，打击了机会主义者。
- 9月19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左尔格，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赫希柏格、伯恩斯坦、施拉姆及对发表无政府主义言论的莫斯特的态度，并把他和恩格斯通函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事通知左尔格。
- 大约1879年10月—
1880年10月 马克思为了专门研究地租问题和整个土地关系问题，仍然十分注意有关公社的资料和文献。他阅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做了关于公社的性质、关于公社在各时代各民族中的地位和社会经济作用的详细摘记。
- 马克思编写了“印度历史大事记”（664—1858年）。他特别注意英国人征服和奴役印度的历史。马克思所搜集的实际资料，主要是取自R·泽韦耳的著作“从古代至1858年消灭尊严的东印度公司止的印度历史分析”和蒙·埃耳芬斯顿的著作“印度史”。
- 10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美国收到工人运动活动家泰·库诺的来信，请求他们影响住在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因为他们对美国工人运动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
- 11月14日和24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抹杀社会民主党任务的阶级

性质的发言,以及他们在保护关税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为此,恩格斯规定了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必须遵循的一基本原则,即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的任何措施,并且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原则性的论点。

1879年底—1880年初

马克思阅读了尼·伊·柯斯托马罗夫的“历史专题论文和研究”。阅读时做了有关斯切潘·拉辛起义的摘录,并加了评注。

1880

1880—1881年

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三章(“运动的基本形态”、“运动的量度。——功”和“潮汐摩擦”)以及一系列的札记和片断。

1—12月

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他重新写第二卷的第三编,马克思阅读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土地所有制,地租、农业和财政问题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1—3月上半月

为了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应法国社会主义者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改编成独立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书用法文(由拉法格翻译)发表在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后来又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

2月底

恩格斯为法国工人党机关报“平等报”写“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揭露俾斯麦政府的所谓“社会措施”(实行关税率和把全部铁路集中到帝国政府手中)的真正实质。文章于3月3日和24日在该报发表。

- 1880年3月底—
1881年6月初 马克思常常受到俄国民意党人革命家列·加特曼的访问。
- 3月底 马克思为“平等报”发表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写前言。前言作为编辑部的按语，发表在4月7日的报纸上。
- 4月上半月 马克思应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编写“工人调查表”，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劳动和斗争条件。“调查表”刊登在1880年4月20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单独印了25000份，在全法国散发。
- 5月初 在恩格斯住所和盖得举行了会议，盖得为了讨论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而来到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拉法格参加了这会议。马克思给法国工人党纲领写出了理论性的导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整个纲领的制订工作，该纲领发表在6月20日的“平等报”、7月10日的“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和7月20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11月，这个纲领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
- 5月4—5日左右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版单行本写导言。恩格斯的著作和马克思的导言于5月底出版。
- 5月21日以后 马克思校订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宣言”一文的原稿。
- 6月27日 马克思在给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多·纽文胡斯的信中，支持他准备用荷兰文通俗地叙述“资本论”第一卷的意图。
- 7月22日和8月5日 恩格斯在答复俄国社会活动家敏·卡·哥尔布诺娃—卡布鲁柯娃的请求时，答应帮助她寻找关于英美技工学校的书籍，向她介绍了英国国民教育的情形，叙述了

- 西欧和俄国的手工业状况，也叙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解体的情况。
- 8月—9月13日 马克思全家住在兰兹格特；会见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约·斯温顿，和他谈论了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情况。
- 8月中—9月19日 恩格斯在兰兹特和布里德林顿休养。
- 8月24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俄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尼·阿·卡布鲁柯夫那里，收到他本人的著作“土地私有主经济概论”。
- 约9—11月 马克思阅读俄国自由主义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在俄国科学政治文学杂志“欧洲通报”上发表的回忆录“美妙的十年”，并且在页边上记下了自己的意见。
- 9月12日 马克思在答复丹尼尔逊请他为俄国的一份杂志写一篇论述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文章时，建议丹尼尔逊自己发表他所收集的有关俄国改革后经济发展的统计材料，并且同意丹尼尔逊利用马克思给他信中的内容。马克思在信中分析了英国经济危机的特点，指出在农业危机的影响下农民情况的恶化。
- 9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和前来伦敦的李卜克内西讨论党内问题，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从李卜克内西那里，他们了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组织改组，这种改组为改善党的各方面工作提供了可能。
- 1880年10月—约1881年5月 马克思数次会见英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亨·海德门（他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行为的文章，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对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提出了建议。
- 1880年10月—1881年3月 马克思继续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大量官方文件（蓝皮书）和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文献。

- 10月3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希尔施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谈到准备在里昂出版“解放报”（《Emancipation》），谈到破坏法国工人党统一的边·马隆及其支持者（可能派）的立场。
- 11月4日 马克思请求纽约的斯温顿在美国筹集经费，援助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受害者。
- 11月5日 马克思向左尔格介绍了法国和德国工人党的状况，谈到必须给在受残酷迫害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经济援助。马克思还提到“资本论”在俄国所获得的成就，评述了民粹主义的政党——“民意党”和“平分土地”。马克思请求左尔格供给他关于加利福尼亚经济状况的内容丰富的材料，以便研究在那里飞快进行的生产的资本主义集中的过程。
- 11月6日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写信给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科学著的意义以及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关心，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请求马克思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英美舆论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情，特别是帮助列·加特曼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 11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弗·列斯纳联名给11月2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大会寄去了一封贺信，信中希望波兰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同俄国工人联合行动。该信用波兰文于1881年在日内瓦发表。
- 12月初 为了会见马克思而从日内瓦来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尼·亚·莫罗佐夫两次访问了马克思。他向马克思介绍了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情况，“土地和自由党”分裂的原因，并且代表“民意党”请求马克思对在日内瓦印行“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一事给予合作。

- 12月9—16日左右 倍倍尔、伯恩斯坦及以后的保·辛格抵达伦敦，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党的事务和加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
- 1880年底 马克思阅读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作品“芒烈波避难所”。他特别注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和俄国农村中阶级斗争的表现。

1881

- 1881—1882年 恩格斯研究德国史，收集资料并写研究著作“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这两部著作，在科学地阐明日耳曼民族和欧洲其他民族的历史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在他生前未曾发表。作者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在概述日耳曼人的氏族和日耳曼人国家的形成的有关章节中，曾经部分地利用了这些专题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反映在恩格斯于1882年年底所写的“马尔克”这一著作中。
- 恩格斯写了“自然辩证法”中的两章（“热”和“电”）和许多短评及片断。
- 1—6月 马克思研究有关俄国改革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料汇编、专题论著和研究著作。阅读了亚·伊·斯克列比茨基、阿·阿·戈洛瓦乔夫、斯卡尔金、尤·埃·扬松、尼·弗·丹尼尔逊的著作和其他书刊，并做了笔记。在重新研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的基础上，马克思写了这些信的内容概要，题为“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
- 1月 马克思受到俄国经济学家尼·伊·季别尔教授和尼·阿·卡布鲁柯夫教授的访问。
- 1月中—2月 马克思从纽文胡斯收到“资本和劳动”（对“资本论”第

- 一卷的概述)一书以后,开列该书再版时应该更动的地方。
- 2月18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她在信中以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请求马克思谈谈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特别是对俄国农民公社命运的看法。
- 2月19日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以俄国为例,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停滞性质和收成的周期性问题、铁路建设同英美国债制度的关系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积聚的增长问题;谈到印度的状况,英国统治阶级对印度国民财富和人民的惊人剥削。
- 2月底—3月初 马克思根据查苏利奇的请求,概括他所研究的有关俄国农民公社的资料,写了回信的四个草稿,内容是关于农业生产集体形式及其在俄国实现的条件的结论。
- 3月—约4月 马克思读P. F. 阿里索夫的小册子“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和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的小册子“俄国的残暴屠杀”,并写了批语。
- 3月8日 马克思寄信给查苏利奇,谈到他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意义,谈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起点。
- 3月12日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路线表示满意,指出应当如何利用编辑部得到的资料,以提高在地下工作的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情绪。
- 3月2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斯拉夫人为纪念巴黎公社十周年在伦敦举行的大会写信表示祝贺。
- 4—5月 马克思读亨·乔治的“进步和贫困”一书,在给斯温顿和左尔格的信中,说明该书在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掩饰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

- 4月8—11日左右 马克思十分注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洛夫斯卡娅等人的案件。
- 4月11日 马克思在给女儿燕·龙格的信中，说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是一些“普通的、能干的、勇敢的”人。对沙·龙格在激进派的报纸“正义报”上写关于格莱斯顿的爱尔兰土地法文章作了指示，说明格莱斯顿对爱尔兰的政策是对大地主有利的剥夺政策和暴力政策。
- 1881年5月—
1882年2月中 为了研究原始公社制度问题，马克思对摩尔根“原始社会”一书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摘要，并附有自己的许多评语和结论，还读了其他有关原始文化史的著述，其中包括亨·梅恩、鲁，佐姆、太勒以及其他等人的作品，并且做了摘录和评注。
- 5月1—2日 恩格斯开始为英国工联在伦敦出版的周报“劳动旗帜报”撰稿。他写了一篇题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文章，5月7日在该报发表。这一篇和以后各篇，都没有署名而是作为社论刊登的。
- 5月15—16日 恩格斯写“雇佣劳动制度”一文。该文发表在5月21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5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写“工联”一文，号召英国工人不要局限于维持一定水平的工资，而要继承宪章运动的战斗传统，建立自己的阶级政治组织，使无产阶级争得政治统治权。该文发表在5月28日和6月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6月 马克思研究美国大工业的发展，除其他资料外，还阅读了波士顿出版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中关于“美孚油公司”、美国丝织工业和童工等方面的文章。
- 6月初 马克思同海德门断绝了一切关系，后者为了达到沽名

- 钓誉的野心家的目的，想成为觉醒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首领，而同马克思接近并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决裂的直接原因，是海德门那本希望成为他所建立的民主党人联盟的纲领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从“资本论”上抄来的（却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极严重的歪曲。
- 6月4日 马克思收到苏格兰社会主义者罗·班纳的信，该信通知他苏格兰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即将召开，并请求他和恩格斯在组织社会主义党方面给予指示。
- 6月下半月 恩格斯写了“对法国的通商条约”、“两个模范地方议会”、“美国的食物和土地问题”这三篇论文；文章刊登在6月18、25日和7月2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6月底—7月20日左右 马克思和妻子在伊斯特勃恩。
- 7月初 恩格斯写“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一文；该文刊登在7月9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7月中 恩格斯写“工人党”和“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这两篇文章，号召英国无产阶级成立独立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利用德国工人阶级在政府和警察经常迫害的条件下继续顺利进行斗争的经验。两篇文章都发表在7月23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7月26日—8月16日 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燕妮在阿尔让台（巴黎附近）。
- 7月28日—8月22日 恩格斯在布里德林顿沙洲（约克郡）。
- 7月底—8月上半月 马克思写关于土地私有制、手工业、行会、财政和法国农民在1789—1794年革命前夜的状况的笔记，做爱·弗略里的“1789年三级会议的选举”一书的摘录。
- 7月底 恩格斯写“棉花和铁”一文；该文刊登在7月30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约 8—9 月 马克思对殖民地人民的发展史和处境感到很大兴趣，从 G·马尼的“爪哇”、约·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两部著作中做了许多摘记，并加了评注。
- 8 月 1—2 日 恩格斯写“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该文使英国工人阶级得出一个结论，即没有资本家阶级，他们自己能够把国家的生产力管理得很好；该文发表在 8 月 6 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8 月 3 日和 8 日之间 马克思在巴黎；会见拉甫罗夫和希尔施。
- 8 月 8 日和 9 日 马克思从拜访他的法国社会党人沙·雅克拉尔和利沙加勒那里，得知关于法国政治事件和工人党状况的消息。
- 8 月 10 日和 15 日 恩格斯在给“劳动旗帜报”编辑乔·希普顿的信中声明，由于该报的机会主义趋向，他不再为该报撰稿。
- 8 月 17 日 马克思回到伦敦。
- 8 月 17—18 日 恩格斯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在给他的信中，对他发现的微分法给予很高的评价。
- 约 8 月底—9 月 马克思开列他所有的俄国书籍和资料清单（主要是关于 1861 年后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阅读并摘录埃·雷·于克的“中华帝国”一书。
- 10 月 13 日左右—
12 月上半月 马克思患重病。
- 10 月 24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汉堡出版者奥·迈斯纳准备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建议。
- 10 月 25 日 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的态度和法国工人党内以马隆和布鲁斯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详细告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清楚地

说明马克思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 11月30日 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在估价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例行选举时指出，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心转到大工业城市是件好事情。
- 12月2日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逝世。
- 12月4日 恩格斯写纪念燕妮·马克思的悼文，该文发表在12月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12月5日 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安葬时发表墓前悼词；该悼词发表在12月11日“平等报”上。
- 12月29日 马克思前往英国南部海岸文特诺尔（威特岛）疗养。
- 约1881年底—
1882年底 马克思研究世界通史。研究的成果，是“编年大事记”这一著作，该著作扼要评述了欧洲的历史事件（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马克思最注意的，是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 在编写“编年大事记”时，马克思所利用的实际材料主要取自施洛塞尔的十八卷本“世界通史”，其次是博塔和科贝特的著作，卡拉姆津的“俄国国家史”，凯利的“俄国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历史”以及其他资料。马克思的手稿有4个笔记本，约105印张。
- 1881年底—1882年 马克思写“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这是有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他所研究的关于俄国的资料和文献的开始。继续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料。

1882

- 1—12月 马克思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关于俄国社会经济关系方

- 面的文章,阅读瓦·伊·谢美夫斯基的“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的农民”第一卷,安·伊萨也夫的“俄国的劳动组合”,格·米纳伊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农村土地公社”,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等书籍。
- 1月16日 马克思返回伦敦。
- 1月2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格·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写序言。2月5日该序言的俄译文发表在“民意”杂志上。
- 1月25日 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些所谓“领袖”作了评述,揭示了造成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原因,指出同他们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工人群众是党的最可靠的支柱。
- 2月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库诺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了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成员中顺利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宣传的情况。
- 2月9—16日 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见到阿尔及尔去治疗,中途在阿尔让台大女儿处停留。
- 2月10日 恩格斯在给贝克尔的信中指出,尽管国际停止活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由于各国工人党之间的联系而仍然保持着;恢复国际时机尚未成熟。
- 2月中 马克思在巴黎同盖得、加·杰维尔和霍·梅萨会晤,同他们讨论法国工人党的状况。
- 2月20日—5月2日 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马克思常与当地民事法庭法官费默(他曾被波拿巴放逐)会晤,从他那里了解了对阿尔及尔阿拉伯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制度的情况。

- 4月10日 恩格斯审阅“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校样后，把它寄给拉甫罗夫。“宣言”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一种于5月底在日内瓦出版。
- 4月下半月 恩格斯写“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科学地阐明了基督教的起源和实质问题。该文载于5月4日和1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5月2日 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见，离阿尔及尔经马赛和尼斯赴蒙特卡罗，在那里住一个月。
- 5月3日 恩格斯写“论美国资本的积聚”一文，该文发表在5月1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5月14日 恩格斯同德国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辛格尔会晤，向辛格尔说明他和马克思对保护关税、铁路国化和其他类似措施的看法，指出这些措施完全不超出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 1882年6月—
1883年1月 马克思研究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
- 6月3日左右 恩格斯从拉甫罗夫那里收到刚刚在日内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
- 6月3—5日 马克思从蒙特卡罗赴阿尔让台，顺路在坎恩停留三天。
- 6月6日—8月22日 马克思住在阿尔让台自己女儿燕妮·龙格那里，并在此进行了一个疗程；马克思常同拉法格会晤。
- 6月20日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告诉左尔格，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作了评述。
- 6月21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答应他和马克思支持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的斗争，告知倍倍尔法国工人党内部发生分裂。
- 7月25日 恩格斯通知流亡德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阿·赫普

- 纳，说他和马克思允许赫普纳在美国用铅版翻印他们的著作。
- 7月31日 恩格斯对拉甫罗夫寄来俄文版“共产党宣言”表示谢意。
- 8月2日 马克思在巴黎的梅萨那里同杰维尔、盖得和拉法格会晤。
- 8月11日—9月8日 恩格斯在亚马斯海滨休养。
- 8月23—27日 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在洛桑。
- 8月27日—9月25日 马克思住在斐维。
- 9—10月 马克思阅读亚·尼·恩格尔加尔特的“1872—1882年十一封农村来信”一书，并在页边作了批语。
- 9月初 恩格斯把“布雷的牧师”一诗从英文译成德文，并写关于该诗对德国的政治意义的说明；译文和对该诗的说明载于9月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 9月12日 恩格斯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表述了他对殖民地问题的看法，无产阶级得政权后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政策的观点。
- 9月14日 恩格斯着手进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的准备工作。他决定为该版写一篇关于马尔克的专门论文，以便让社会民主党了解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而使党注意到把农业工人和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必要性。
- 9月下半月—
12月上半月 恩格斯为了写作“马尔克”，又重新阅读毛勒的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和“日耳曼尼亚的马尔克制度史”，做了摘录，并加了评注；把毛勒的资料同其他材料加以比较。

- 9月21日 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正文的准备工作后,写该版序言。该著作于1882年底问世。
- 9月26日 在离开瑞士之前,马克思在日内瓦访问约·菲·贝克尔。
- 9月28日—10月初 在回伦敦途中,马克思在阿尔让台住了几天。
- 10—11月 马克思研究原始文化史,阅读并摘录了约·拉伯克的“文明的开始和人的原始状况”一书;了解英国在埃及的财政政策;阅读迈·乔·马耳霍耳的“埃及的财政”和艾莫斯的“对埃及人的掠夺”等著作,并写提要。
- 10月20日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谈到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和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和党内两种倾向——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做了一系列总结。
- 10月28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评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说明了他对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观点,分析了法国工人党内部的事件。
- 1882年10月30日—
1883年1月12日 马克思住在文特诺尔。他在从事“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
- 10月30日—11月3日 恩格斯力求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定期交换报纸,以使每个编辑部都能正确认识德国和法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 10月底 恩格斯写“品特是怎样造谣的”一文,揭穿了俾斯麦的报纸“北德总汇报”对社会民主党的毁谤,该文刊载在11月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11月 马克思密切注视马·德普勒所作的电能远距离传送的

- 试验,要恩格斯也注意这些试验并征询恩格斯的意见;阅读 L. 奥斯皮塔利埃的“电的基本应用”一书。
- 11 月 4 日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宣称,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拟议的修改党纲的运动是不适时宜的(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前)。
- 11 月 11—23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法国工人党状况交换了意见,对盖得和拉法格在同可能派的斗争中所犯的策略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 11 月 23 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打算很快就写完“自然辩证法”,他时断时续地写这部极其重要的理论著作已将近十年(在此期间已写完 10 章和近 170 个札记和片断)。
- 12 月 8 日 马克思通过恩格斯,建议德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揭穿瓦格纳—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利用普鲁士国家矿场对待工人的材料为开端。
- 12 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完“马尔克”一文,并在付排前寄给马克思校审。
- 12 月 17 日 马克思阅读“马尔克”手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对该文给以很高的评价。“马尔克”作为 1883 年 4 月出版的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发表,该文于同年(3—4 月)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以“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为标题出版了单行本。
- 1 8 8 3**
- 1 月 12 日 马克思获得自己女儿燕妮·龙格于 1 月 11 日去世的消息后返回伦敦;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
- 1月13日 恩格斯写纪念马克思女儿的悼文：“燕妮·龙格（马克思）”。悼文刊载在1月1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2月8日和10日 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解释交易所在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方面的作用。
- 3月1日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指出电能对进一步发展工业和最终消灭城乡对立的巨大意义。
- 3月14日（2时45分） 卡尔·马克思逝世。
- 3月14—15日 恩格斯把马克思逝世的消息通知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贝克尔和左尔格等），说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
- 3月17日 卡尔·马克思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发表了墓前悼词，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理论遗产和实际革命活动的世界历史意义。
- 3月18日左右 恩格斯写“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一文，该文发表在3月2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4—5日 恩格斯放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着手整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文献和手稿；阅读“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继续进行马克思做过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准备工作。
- 4月28日和5月12日 恩格斯写“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报道了马克思的后期生活和世界各国发来的电唁。该文发表在5月3日和1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人 名 索 引

三 画

万德比特, 威廉·亨利 (Vanderbilt, William Henry 1821—1885)——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第 337 页。

口吃者路易二世 (Louis II, le Bègue 846—879)——867 年起为阿奎丹国王, 法兰克国王 (877—879)。——第 569 页。

四 画

韦莱 (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 (Gaius Velleius Paterculus 公元前 19—公元 31)——罗马历史学家; 曾参加远征日耳曼尼亚、班诺尼亚和达尔马威亚。——第 496、497、499—501、504、525 页。

牛顿, 伊萨克 (Newton, Isaac 1642—1721)——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古典力学的创始人。——第 223、224 页。

比尼亚米, 恩利科 (Bignami, Enrico 1846—1921)——意大利政论家, 加里波第领导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 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的编辑。——第 107 页。

丹尼尔逊, 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

1918) (笔名尼古拉—逊 Николай-он)——俄国经济学家, 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 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 (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第 474、477 页。

戈克, 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 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6 页。

戈洛瓦乔夫, 阿列克塞·阿德里安诺维奇 (Головачев, Алексей Адрианович 1819—1903)——俄国社会活动家和自由派政论家; 特维尔省农民解放委员会活动家之一; 曾参加拟定废除农奴制草案, 草案的很大一部分成为 1861 年 2 月 19 日“法令”的基础。“1861—1871 年的十年改革”、“俄国铁路事业史”以及其他著作的作者。——第 457—459 页。

毛勒,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 (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社会制度的研究者; 在研究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 353、433、448、560 页。

-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元帅, 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 (1857—1871) 和帝国总参谋长 (1871—1888), 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 393—394 页。
- 巴贝夫, 格拉古 (Babeuf, Gracchus 1760—1797) (真名为弗朗斯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法国革命家, 杰出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平均派”密谋的组织者。——第 207 页。
- 巴特比, 易塞尔姆·波利卡尔普 (Batie, Anselme-Polycarpe 1828—1887)——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1871 年国民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人民教育部部长 (1873), 1876 年起为参议员。——第 133 页。
-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 8、13、110—112、134、141、143、165、325、385 页。
- ## 五 画
- 汉泽曼, 大卫 (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和银行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8 年 3—9 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贩卖政策。——第 115、193 页。
- 古耳德, 杰伊 (Gould, Jay 1836—1892)——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和金融家。——第 337 页。
- 甘必大, 莱易 (Gambette, Léon 1838—1882)——法国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的成员 (1870—1871), 各省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 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 (1881—1882)。——第 392—394 页。
-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07、209、212、223、347 页。
- 加勒特, 约翰·约克 (Garrett, John York 1820—1884)——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 银行家。——第 338 页。
- 皮提亚斯 (Pytheas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旅行家和天文学家; 公元前 325 年左右曾航行到欧洲西北海岸。——第 483、488 页。
-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 (1762—1796)。——第 442 页。
-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f 1828—1909)——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国际的积极会员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86 页。
- 兰斯科伊, 谢尔盖·斯切潘诺维奇 (Ланской, Серг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787—1862)——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分子, 内务大臣 (1855—1861); 参加过 1861 年实行的农民改革。——第 455 页。
- 尼禄 (Nero 37—68)——罗马皇帝 (54—68)。——第 332—333、512、518 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65)

- 俄国皇帝(1825—1855)。——第39—40、157、265页。
- 白拉克,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之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还不够彻底。——第6、10、13、110、172、190页。
- 白尔尼,路德维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写有向德国人民介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598页。
- 龙格,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3—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后来加入法国工人党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第370、376页。
- 龙格,燕妮(Longuet, Jenny 1844—1883)——卡尔·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运动的运动家;1872年起为沙·龙格的妻子。——第370—371、382页。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第206、208、219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16、259页。
- 瓦拉·努蒙尼乌斯——见努蒙尼乌斯·瓦拉。
- 瓦茨,格奥尔格(Waitz, Georg 1813—1886)——德国资产阶级的中古史学家。——第530页。
-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 Adolph 1835—1917)——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396—404、407—415、418、419、421—423、425、428、429页。
- 瓦鲁斯(普卜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 公元前53左右—公元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叙利亚总督(公元前7),后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公元7—9),日耳曼部落起义时在条多堡森林会战中阵亡。——第499—505、535页。
-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阶级,追随托利党;1848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208、312页。
- 卡罗林王朝——法兰克王朝,751年起统治法兰西(到987年)、日耳曼尼亚(到911年)和意大利(到887年)。——第528、539、543、550、553、554、555、564页。
- 卡尔多尔夫,威廉(Kardorff, Wilhelm 1828—1907)——德国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1868—1907);“自由保守”党(“帝国党”)创建人之一,保护关税派,支持俾斯麦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第43、51—52、54、56—57页。
- 弗路朗斯,古斯塔夫(Flourens, Gustave 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

- 1871年4月被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第371页。
- 弗洛尔(鲁齐乌斯·安奈·弗洛尔)(Lucius Annäus Florus 二世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论七百年战争概要前后书”的作者。——第495—496页。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117页。
- 弗兰克尔,列奥(Frankel, Leo 1844—1896)——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36页。
-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将军,普鲁士反动军阀的主要代表之一,1848年11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参加者。——第70页。
- 弗里布尔(Fribourg, E.E.)——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165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115、239、265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39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员,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拥护俾斯麦。——第159—162页。
- 布劳涅,泰奥多尔·威廉(Braune, Theodor Wilhelm 1850—1926)——德国日耳曼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德语史方面的著作。——第564、567、581页。
- 布朗基,阿道夫(Blanqui, Adolphe 1798—1854)——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248页。
- 布朗基,奥古斯特(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曾多次被判徒刑。——第260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大臣。——第302、312页。
- 布莱希勒德,格尔森(Bleichröder, Gerson 1822—1893)——德国金融家,柏林大银行经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机倒把活动的经纪人。——第193、197页。

六 画

- 安(Ann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第341页。
- 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

- 英国国王(1714—1727)。——第342页。
- 西尔蒙, 雅克(Sirmond, Jacques 1559—1651)——法国历史学家, 耶稣会教徒, 中世纪初期文献的出版者之一。——第555页。
- 华盛顿, 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北美殖民地独立革命战争时期的总司令(1775—1783); 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第265页。
- 朱厄特, 休·贾奇(Jewett, Hugh Judge 1812左右—1898)——美国银行家和企业家, 百万富翁, 好几家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美国国会议员。——第338页。
- 迈耶尔, 鲁道夫·海尔曼(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保守党人, 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 以及“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和“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第419页。
- 考斯丘什科, 塔杰乌什(Ko ściszko, Tadeusz 1746—1817)——杰出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1776—1783年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参加者; 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第265页。
- 吉芬, 罗伯特(Giffen, 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财政问题专家; “统计协会通报”发行人(1876—1891), 贸易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第244页。
- 吉约姆, 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 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的拥护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113页。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222、234、335、346、372、374页。
- 达尔曼,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写有丹麦史和德国史方面的著作。——第528页。
- 毕舍, 菲利浦(Buchez Philippe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6、29页。
- 毕洛夫-库梅洛夫, 恩斯特·哥特弗利德·格奥尔格(Bülow-Cumm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1775—1851)——德国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普鲁士容克的代言人。——第76页。
- 托伦, 昂利·路易(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 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 被开除出国际; 后为参议员。——第164页。
- 托勒密, 克罗狄乌斯(Ptolemaeus, Claudius 二世纪)——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 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第509—510、512、515、519、524—527、529、535、536页。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 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奴

- 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 219、401 页。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18)——俄国皇帝 (1855—1881)。——第 155—157、272、440、453、455、457、459、468 页。
- 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Philo of Alexandria 约公元前 20—公元 54)——亚历山大里亚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第 328—330 页。
- 伊林沃思 (Illingworth, A.)——1881 年英国议会议员。——第 287 页。
- 伊尔米农 (Irminon 约死于 826 年)——法国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院长 (812—817)。——第 562 页。
- 伊壁鸠鲁 (Epikouros 约公元前 341—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哲学家,无神论者。——第 334 页。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6、267、379 页。
-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 68 页。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曾参加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为波兰流亡者民主派的领袖之一。——第 266、483 页。
- 艾内恩,恩斯特 (Bynern, Ernst 1838—1906)——德国政活动家和商业家,1879 年起为普鲁士下院议员,民族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的残忍敌人。——第 346 页。
- 艾瓦德,格奥尔格·亨利希 (Evald, Georg Heinrich 1803—1875)——德国东方学家,圣经的研究家和评论家。——第 330 页。
- 多里沙尔,罗仑兹 (Dolleschall, Laurenz 生于 1790 年)——科伦警官 (1819—1847);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第 115 页。
- 多米齐安 (梯特·弗拉维·多米齐安) (Titus Flavius Domitia 51—96)——罗马皇帝 (81—96)。——第 508 页。
- 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 (鲁齐乌斯·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 (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 死于 25 年)——罗马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一世纪初曾数次远征日耳曼尼亚。——第 484、497、498 页。
- 米凯尔,约翰 (Miquel, Johann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86 页。
- 米勒斯,茹尔·伊萨克 (Mirès, Jules-Isaac 1809—1871)——法国银行家和几家报纸的所有人。——第 197 页。
- 米尔斯,达赖厄斯·奥格登 (Mills, Darius Ogden 1825—1910)——美国银行家,百万富翁。——第 337—338 页。
-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民粹派的著名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社会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俄国纪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编辑之一。——第 126、129、130 页。

七 画

- 秃头查理(Charles le Chauve 823—877)——西法兰克王国国王(840—877),法兰克皇帝和意大利国王(875—877)。——第551页。
-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 Karl 1834—1892)——德国大有机化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79页。
- 君士坦丁(Constantin 274左右—337)——罗马皇帝(306—337)。——第328、517页。
- 利普西乌斯,尤斯图斯(约斯特·利普斯)(Lipsius, Justus (Joost Lips) 1547—1606)——尼德兰大语文学家,拉丁语学家,曾在耶拿、科伦、卢汶、来顿等地任教授。——第567页。
-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398、404、407、410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115页。
- 努蒙尼乌斯·瓦拉(Numonius Vala 死于公元9年)——昆提利乌斯·瓦鲁斯的次子,曾指挥骑兵,在条多堡森林罗马人溃败逃跑时阵亡。——第503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第129页。
- 麦基佛(Maclver, D.)——柏肯海德的英国议会议员(1881年)。——第287页。
- 麦凯,约翰·威廉(Mackay, John William 1831—1902)——美国企业家和银行家,银矿主。——第337页。
-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是教师,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1、63—70、72—80、83—85、87、88、90—93、96—99、101—106页。
- 沃尔索,耶恩斯·雅科布·阿斯木森(Worsaae, Jens Jacob Asmussen 1821—1885)——丹麦考古学家,曾证明存在青铜时代;写有斯基的那维亚古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74—1875年任教育大臣。——第512页。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第260页。
- 沙弗豪森,海尔曼(Schaffhausen, Hermann 1816—1893)——德国人类学家和生理学家。——第480页。
- 伯克,奥古斯特(Böckh, August 1785—1867)——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古希腊罗马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第426页。

- 伯恩施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1881—1890); 叛徒, 恩格斯逝世后大肆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第 175、177、178、181 页。
- 伯恩施太德, 阿达尔贝特 (Bornstedt, Ade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7—1848), 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 年 3 月被开除出盟。——第 260 页。
- 杜林, 欧根·卡尔 (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 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 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 是个形而上学者。——第 51、263、345 页。
- 杜诺瓦耶, 沙尔 (Dunoyer, Charles 1786—1862)——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248 页。
- 杜克罗, 奥古斯特·亚历山大 (Ducrot, Auguste-Alexandre 1817—1882)——法国将军; 1872—1878 年间参加旨在推翻共和制度的保皇党人密谋。——第 133 页。
- 李希特尔——见赫希柏格。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6、280、400、421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国际会员; 国会议员 (1867 年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10、13、172—179、349、377 页。
- 狄龙, 悉尼 (Dillon, Sidney 1812—1892)——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和金融家。——第 338 页。
- 狄龙, 约翰 (Dillon, John 1851—1927)——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爱尔兰全国土地同盟领导人之一, 1880 年为英国议会会议员; 八十年代曾多次被捕入狱。——第 309 页。
- 狄奥·卡西乌斯 (卡西乌斯·狄奥·科克策扬) (Cassius Dio Cocceianus 约 155—235)——罗马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元老院贵族的代表人物, 曾用希腊文写了一部八十卷的“罗马史”。——第 484、496—499、502、504、527 页。
-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的领袖,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219 页。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322)——杰出的古希腊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 奴隶民主制的拥护者。——第 416 页。
- 希尔施, 卡尔 (Hirsch, Karl 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 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 1879 年夏天居留巴黎, 并在那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第 172—181 页。
- 希罗多德 (Herodotos 约公元前 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第 416、481 页。

- 希耳佩里克一世 (Chilperic I 死于 584 年)——墨洛温王朝的纽斯特里亚(法兰克国家的一部分)国王(561—584)。——第 544 页。
- 希尔德布兰 (Hildebrann 八世纪)——法国奥顿附近的帕特里西阿克(佩西)庄园主。——第 550 页。
- 希尔德布兰德, 汉斯·奥拉弗 (Hildebrand, Hans Olof 1842—1913)——瑞典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和古钱学家, 写有瑞典古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第 515 页。
- 贝塞麦, 亨利 (Bessemer, Henry 1813—1898)——英国发明家, 曾发明新的经济炼钢法。——第 196、426 页。
-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见迪斯累里·本杰明。
- 贝列尔或贝列拉, 艾米尔 (Péireire, Émile 1800—1875)——法国银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议员; 1852 年与其弟伊萨克·贝列尔一起创办股份银行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第 193、197 页。
- 贝列尔或贝列拉, 伊萨克 (Péireire, 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议员; 1852 年与其兄艾米尔·贝列尔一起创办股份银行 Crédit Mobilier。——第 193、197 页。
- 贝克尔, 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拉萨尔分子, 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14 页。
-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在瑞士和德国的支部组织者,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 “先驱”杂志的编辑 (1866—187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59 页。
- 贝克尔, 海耳曼·亨利希 (“红色贝克尔”)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der «rote Becker»))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 5 年徒刑;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70 页。
- 克洛维一世 (Clovis I 465—511)——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国王 (481—511)。——第 583 页。
- 克伦格耳 (Krenzel)——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涅辛村村长 (在东普鲁士)。——第 75 页。
- 克拉左门 (小亚细亚) 的阿那克萨哥拉 (Anaxagoras of Klazomenae 公元前 500 左右—428)——古希腊哲学家, 唯物主义者。——第 205 页。
- 克虏伯, 阿尔弗勒德 (Krupp, Alfred 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 供应欧洲许多国家火炮和其他军火的军事冶金工厂厂主。——第 195、196 页。
- 克罗克, 查理 (Crocker, Charles 1822—1888)——美国铁路企业主, 百万富翁。——第 337 页。
- 克罗狄乌斯 (Claudius 公元前 10—公元前 54)——罗马皇帝 (41—54)。——第 506 页。
- 克吕泽烈, 古斯塔夫·保尔 (Cluseret, Gustave Paul 1823—1900)——法国政治活动家, 国际会员, 追随巴枯宁派, 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 (1870) 的参加者, 巴

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1871年4月),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第166页。

克吕格尔,丹尼尔·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Krüger, Daniel Christian Friedrich 1819—1896)——德国法学家和外交家,1873年为汉堡和不来梅的联邦参议会议员。——第54、55页。

八 画

门克,亨利希·泰奥多尔(Menke, Heinrich Theodor 1819—1892)——德国地理学家,曾改编施普鲁奈尔的“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第584页。

弥伦霍夫,卡尔·维克多(Müllenhoff, Karl Viktor 1818—1884)——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古迹、神话和中世纪德意志文学的研究者。——第483页。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他不懂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一直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上。——第400页。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eon 1822—1891)——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119页。

佩特罗尼乌斯(凯尤斯·佩特罗尼乌斯·

仲裁人)(Gaius Petronius Arbitrator 死于66年)——罗马作家,据说是“萨蒂里孔”这部小说的作者,小说中描绘了尼禄统治时期罗马社会的腐化。——第331页。

林耐,卡尔(Linné, Karl 1707—1778)——杰出的瑞典自然科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法的创始人。——第224页。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实现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意味着转用革命的方法来进行战争;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165页。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167、391页。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332页。

帕斯凯维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Паскевич,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23—1903)——侍从武官长,反动分子,1859年起为“关于解除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法令”草案编纂委员会委员。——第454、457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

-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6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70、119页。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抨击了李嘉图的货币论。——第426页。
- 图拉真(马可·乌尔皮·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 53—117)——罗马皇帝(98—117)和统帅。——第517页。
- 图尔的格雷哥里(格雷哥里·弗洛伦修斯)(Grégoire de Tours(Gregorius Florentius) 538—594)——图尔的主教(573年起);“法兰克人史”一书的作者,该书是研究五至六世纪法兰克人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第544页。
- 欣丁顿,科利斯·波特尔(Hintington, Collis Potter 1821—1900)——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第337页。
- 欣克马尔(Hinkmar 830—882)——郎城(法国)主教。——第551页。
- 欣克马尔(Hincmar 806左右—882)——845年起为兰斯城(法国)大主教,“贝坦年鉴”第三部分(861—882年)的作者。——第545、560页。
- 罗特,保尔·鲁道夫(Roth, Paul Rudolph 1820—1892)——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西欧封建制度起源问题的著作。——第543、544、545、546、552、553、559页。
- 罗伊特,弗里茨(Reuter, Fritz 1810—1874)——德国幽默作家,所谓地方色彩派的代表,用低地日耳曼方言写作,1833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判处死刑,后改为三十年徒刑,1840年遇赦。——第65页。
-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约生于1824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79页。
- 罗什弗尔,昂利(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八十年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营。——第370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112页。
- 罗斯特,瓦伦亨·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Rost, Valentin Christian Friedrich 1790—1862)——德国语文学家,“希德辞典”编者。——第416页。
- 罗斯托夫策夫,雅柯夫·伊万诺维奇(Ростовцев,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1803—1860)——俄国国家活动家,侍从武官长,1857年起为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后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员,1859年起为“关于解除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法令”草案编纂委员会主席。——第456—457、468页。
-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1845—1911)——卡尔·马克思的二女儿,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第370、371页。
-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

- 191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 267、345、370、371、379 页。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律师,1848—1849 年曾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5、6、9、14、17、18、25—29、159、183、192、248、346 页。
-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48 年任外交部长,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第 39、387 页。
-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摆脱康德独立地发展了并且精确地证明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说。——第 223、346 页。
-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国际会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前进”杂志(1873—1876)和“前进报”(1875—1876)编辑。——第 377、380、384 页。
- 拉康布累,德奥多·约瑟夫(Lacomblet, Theodor Joseph 1789—1866)——德国历史学家,杜塞尔多夫档案室主任;原系法国人。——第 583 页。
- 阿德里安(普卜利乌斯·艾利乌斯·阿德里安)(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罗马皇帝(117—138)。——第 509 页。
- 阿格利巴(马可·维普萨尼亚·阿格利巴)(Marcus Vipsanius Agrippa 公元前 63 左右—12)——杰出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公元前 21 年起是奥古斯都的共同执政者。——第 493—496 页。
- 阿里奥维斯特(Ariovist 公元前一世纪)——日耳曼族苏维汇人的酋长,曾抗击凯撒。——第 484、485 页。
- 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Anastasios I 430 左右—518)——拜占庭皇帝(491—518)。——第 517 页。
- 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约 332—400)——罗马历史学家,“历史”一书的作者,该书包括公元 96 至 378 年的罗马历史。——第 540 页。
- 阿非利加的利奥(哈桑·伊本-穆罕默德·阿尔-瓦赞)(Leo Africanus (Al-Hasan ibn Mohammed al-wazzan) 1495 或 1496—约 1550)——阿拉伯学者和旅行家;游历过北非、中非和西亚,所著“非洲游记”一书内有地理学上重要的材料。——第 524 页。
- 阿斯特,威廉(Astor, William 1829—1892)——美国百万富翁,大铁路企业主。——第 338 页。
- 阿斯普雷涅斯(路齐乌斯·诺尼乌斯·阿斯普雷涅斯)(Lucius Nonius Asprenas 约公元前 28—公元 30)——罗马国家活动家和统帅,曾参加对日耳曼人的历次战争。——第 501、503 页。

- 阿尔伯特 (Albert 1828—1902)——萨克森国王 (1873—1902)。——第 107 页。
- 阿尔诺德, 克里斯托弗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Arnold, Christophorus Friedrich Wilhelm 1826—1883)——德国法学家、国民经济史和文化史专家; 著有“德意志的古代”。——第 564、576、583、585、589—593 页。
- 阿尔米纽斯或阿尔明 (Arminius 公元前 17—公元 21)——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酋长, 曾领导各日耳曼部落抗击罗马人, 并于公元 9 年在条多堡森林击溃了他们。——第 501—505、508 页。
- ### 九 画
- 范-派顿, 菲力浦 (Van Patten, Philip)——美国资产者, 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1876 年起是合众国工人党全国书记, 而自 1877 年起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 1883 年弃职逃跑, 当了国家官员。——第 384 页。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07、209、214—216、259、347 页。
- 耶林, 鲁道夫 (Jhering, Rudolf 1818—1892)——德国资产阶级法学家, 大资产阶级观点的体现者, 曾领导资产阶级法律学派的“实证”和“实用教条”派别。——第 423、426 页。
- 洪堡, 亚历山大 (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德国大学者, 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116、319、322 页。
- 柯顿, 罗伯特·布鲁斯 (Cotton, Robert Bruce 1571—1631)——英国古代手稿、书籍、钱币等的搜集家; 柯顿图书馆的创建人, 该馆于不列颠博物馆创立时 (1753) 被转赠博物馆。——第 565、566 页。
- 革拉苏 (马可·李奇尼乌斯·革拉苏)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公元前 115 左右—53)——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 公元前 71 年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 曾两次任执政官。——第 484、489 页。
- 济贝耳, 亨利希 (Sybel, Heinrich 1817—1895)——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民族自由党人, 所谓小德意志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的许多著作充满着反动的普鲁士主义和沙文主义气味。——第 346 页。
- 若特兰, 律西安·列奥波特 (Jottrand, Lucien Le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 68 页。
- 品特, 艾米尔 (Pindter, Emil)——普鲁士枢密顾问, 1865 年起为编辑, 1872 年起为政府报纸“北德总汇报”的主编。——第 348 页。
- 品德尔, 尤利乌斯·海耳曼 (Pinder, Julius Hermann 生于 1805 年)——普鲁士官吏,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任西里西亚总督,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第 80 页。
- 迪耳克, 查理·温特沃思 (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自由党激进派领袖之一, 外交副大臣 (1880—1882), 地方自治事务大臣 (1882—1885)。——第 287 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

- 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首相(1868和1874—1880)。——第285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107、140、270、308、310页。
-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特利尔的政府顾问,燕妮·马克思夫人的父亲。——第319、322页。
- 勃鲁美,卡尔·威廉·海耳曼(Blume, Karl Wilhelm Hermann 1835—191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394页。
-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伯爵,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反动内阁的首脑(1848—1850)。——第96页。
- 柏拉图(Plato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416页。
- 柏修斯(Perseus 公元前212—166)——最后一个马其顿国王(公元前179—168)。——第483页。
- 柏西阿斯(奥鲁斯·柏西阿斯·弗拉克斯)(Aulus Perrius Flaccus 34—62)——罗马讽刺诗人,曾斥责当时罗马社会的堕落风气,斯多葛派哲学的追随者。——第333页。
- 科累卓(Correggio 约1489或1494—1534)(真名为安东尼奥·阿勒格里Antonio Allegri)——著名的意大利写生画家。——第52页。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299—302、312页。
- 科瑟伊恩(Cosijn, P.J.)——荷兰语文学家,日耳曼语专家。——第568页。
- 哈赛尔曼,威廉(Hasselmann, Wilhelm 生于1844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871—1875年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9页。
-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1871—1875年是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第3、9页。
-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时制方面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126页。
- 查理曼(Charloman 715—755)——法兰克宫相查理·马尔泰尔的儿子;奥斯特拉西亚、阿勒曼尼亚和绍林吉亚的执政者(741—747)。——第570页。
- 查理大帝(Charlemange 742左右—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第360—362、540、543、544、545、548、549、554、555、557、559—563页。
-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第340页。
- 查理·马尔泰尔(Charles Martel 688左右—741)——法兰克宫相,715年起是

- 法兰克王国的实际执政者。——第 543、548、550、553 页。
- 查苏利奇, 维拉·伊万诺夫娜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劳动解放社”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家,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第 268、269、430、446、447 页。
-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220 页。
- 洛克菲勒, 约翰·戴维逊 (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1839—1937)——石油大王, 美国财政寡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第 337 页。
- 洛里亚, 阿基尔 (Loria, Achille 1857—1943)——反动的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的贗造者。——第 386 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翰·卡尔 (Ro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 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 396、411、412、413、417、419、420 页。
- 约克, 汉斯·大卫·路德维希, 瓦滕堡伯爵 (York von Wartenburg, Hans David Ludwig, Graf 1759—1830)——普鲁士将军, 1821 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 505 页。
- 约尔丹 (Jordanis 约生于 500 年)——哥特历史学家,“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一书的作者。——第 513 页。
- 约尔南德——见约尔丹。
- 约翰 (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12 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 70、102、103 页。
- 约翰 (Johann 1801—1873) (笔名斐拉雷特 Philaret)——萨克森国王 (1854—1873), 曾翻译过但丁的作品。——第 115 页。
- 约翰八世 (Johann VIII)——罗马教皇 (872—882)。——第 546 页。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 67 页。
-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Karl August)——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改良主义者,“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者之一; 曾批评过马克思主义, 八十年代退党。——第 177、179 页。
-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1864—1867 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1872 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 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 182 页。
- 施佩耶尔, 卡尔 (Speyer, Karl 生于 1845 年)——细木工, 六十年代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 1872 年起为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后为美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36 页。
- 施奈德尔, 雅科布 (Schneider, Jacob

1818—1898)——德国考古学家,写过许多德国古代史方面的著作。——第508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人物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年以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328页。

施滕策尔,古斯塔夫·阿道夫 (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第99页。

施普鲁奈尔·冯·麦茨,卡尔 (Spruner von Merz, Karl 1803—1892)——德国历史学家和制图家,曾编过许多历史地图集和写过许多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584页。

十 画

虔诚者路易 (Louis le Pieux 778—840)——法兰克皇帝 (814—840)。——第549、550、558、562、563页。

宾茨,卡尔 (Binz, Karl 1832—1913)——杰出的德国医生和药理学家,波恩药理学院的创办人 (1869)。——第47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59页。

贡特朗 (Gontran 525—593)——勃艮第国王 (561—593)。——第544、549页。

俾斯麦,奥托 (Bismar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 (1862),普鲁士首相 (1862—1871),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1878)。——第9、25、57、132、139、140、159—161、168、170、171、179、180、182、185、191、194—198、200、239、290、304、308—310、343、348—350、359、360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施工,第一国际会员;国会议员 (1867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3、8、9、10、13、172、310页。

哥尔茨男爵,泰奥多尔 (Goltz, Theodor, Fteiherr von der 1836—1905)——德国农学家;“德意志帝国农业工人状况”一书的作者。——第53页。

伦纳德,安得列阿斯 (Renard, Andreas 1795—1874)——伯爵,西里西亚地主,反动分子。——第84页。

摩尔诺,安都昂·奥古斯丹 (Cournot, Antoine-Augustin 1801—1877)——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主观主义流派的前辈之一;在他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中企图用数学方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第429页。

爱因哈德 (爱金哈特) (Einhard (Eginhart) 770左右—840)——法兰克历史编纂学家,查理大帝传记的作者。——第543页。

埃尔拉赫,弗兰茨 (Erlach, Franz 1819—

- 1889)——瑞士军官,军事著作家;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为驻德国大本营观察员。——第393页。
-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提昂诺维奇 (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他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击。——第126页。
-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111、329页。
- 海奈,摩里茨 (Heyne, Moritz 1837—1906)——德国日耳曼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德语史方面的著作,出版过古德语和哥特语文献;格林兄弟主编的第一部德语史辞典的编纂者之一。——第564、565、575页。
- 乌朗特,路德维希 (Uhland, Ludwig 1781—186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101、103页。
- 乌尔卡尔特,戴维 (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土耳其)仇俄分子;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第159页。
- 格林,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家,写有许多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 1852年与其弟威廉·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语辞典”。——第492、525—530、531、532、536、563、564、569、571、588页。
- 格莱斯顿,罗伯特 (Gladstone, Robert 1811—1872)——英国商业家,资产阶级慈善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堂弟。——第32页。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的拥护者,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领袖;曾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56、287、310、370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211、239、288、367、393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31、102、119、153、154、312、505页。
- 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
- 纳瓦罗 (Navarro, J.D.)——美国百万富翁。——第338页。
- 纳德勒,卡尔·克利斯提安·哥特弗利德 (Nadler, Karl Christian Gottfried 1809—1849)——德国诗人,用普法尔茨方言写作。——第596页。
- 纳集莫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Назим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02—1874)——俄国将军,维尔纳军事总督和格罗德诺、明斯克和柯夫诺的总督(1855—1863)。——第455页。
- 恩格尔,恩斯特 (Engel, Ernst 1821—1896)——著名德国统计学家, 1860—1882年任柏林普鲁士王国统计局局长。——第315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材料)。——第 8、13、36、37、39、63、69、71、100、105、116、117、171、190、234、248、259、260、263、345—347、353、374、377、380、384—387、492、525、584 页。
- 恩格耳哈尔特, 赫尔维希·康拉德·克里斯提安 (Engelhardt, Helvig Conrad Christian 1825—1881)——丹麦考古学家, 弗伦兹堡北部古物博物馆馆长。——第 518 页。
- 特罗胥, 路易·茹尔 (Trochu, Louis-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侵占阿尔及利亚 (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和意大利战争 (1859) 的参加者, 国防政府的首脑, 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 (1870 年 9 月—1871 年 1 月), 背叛地破坏城防,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第 391、394 页。
- 特耳克, 卡尔·威廉 (Tölcke, Karl Wilhelm 1817—189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3、9 页。
- 特赖奇克, 亨利希·冯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834—1896)——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1886 年被任为普鲁士国家的历史编纂家,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1—1888), 反动的普鲁士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德国向外扩张政策的思想家和宣传家。——第 346 页。
- 特森多尔夫, 海耳曼·恩斯特·克利斯提安 (Tessendorff, Hermann Ernst Christian 1831—1895)——普鲁士检察官, 1873 年为柏林市法院法官; 1885 年为柏林最高法院刑庭庭长, 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第 108 页。
- 马可·奥里略·安敦尼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121—180)——罗马皇帝 (161—180), 斯多葛派哲学家。——第 512、515 页。
- 马丁, 博恩·路易·昂利 (Martin, Bon-Louis-Henri 1810—1883)——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多卷的“法国史”作者,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共和党人; 1876 年起为参议员。——第 164 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64 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 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 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 146 页。
- 马布利, 加布里埃尔 (Mably, Gabriel 1709—1785)——卓越的法国社会学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207 页。
- 马利乌斯, 凯尤斯 (Marius, Gaius 公元前 156 左右—86)——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曾任执政官 (公元前 107、104—100、86)。——第 483、506 页。
- 马罗博杜斯 (Maroboduus 死于 41 年)——日耳曼族马可曼尼人的酋长 (公元前 8—公元 19), 在莱茵河沿岸地区建立了日耳曼部落联盟, 曾与罗马作战。——第 486、497、498、504 页。
- 马尔齐安 (Marcianus 约五世纪)——希腊地理学家, 曾撰写北海沿岸的游记。——第 512 页。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

-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5、27 页。
- 马克里努斯 (Macrinus 164—218)——罗马皇帝 (217—218)。——第 518 页。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传记材料)。——第 5—10、13、14、39、63、69、100、115—126、163、165、167、190、227、228、230、235、248、249、259、260、268、319—323、372—388 页。
- 马克思, 燕妮 (父姓是冯·威斯特华伦 geb. von Westphalen) (Marx, Jenny 1814—1881)——卡尔·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 116、319—323、372、374、381 页。
- 马克思, 爱琳娜 (杜西) (Marx, Eleanor (Tussy) 1855—1898)——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 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84 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第 380、383 页。
- 马克思, 弗兰契斯卡 (Marx, Franziska 1851—1852)——马克思的女儿。——第 319、323 页。
- 马克思, 埃德加尔 (“穆希”) (Marx, Edgar (Musch) 1847—1855)——马克思的儿子。——第 319、323 页。
- 马克思, 亨利希·格维多 (Marx, Heinrich Guido 1849—1850)——马克思的儿子。——第 319、323 页。
- 十 一 画**
- 威曼, 阿道夫 (Ziemann, Adolf 1807—1842)——德国语文学家, 日耳曼学家, 写有许多德语史方面的著作。——第 417 页。
- 笛卡儿, 勒奈 (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二元论者,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 219 页。
-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内务大臣 (1832、1834), 首相 (1836、1840), 政府首脑 (内阁总理) (1871),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150、154、391 页。
- 措伊斯, 约翰·卡斯巴尔 (Zeuß, Johann Kaspar 1806—1856)——德国语言学家, 曾编写过克尔特语的详细的比较著作。——第 525—528、532 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9、166 页。
- 培根, 弗丝西斯, 维鲁拉姆男爵 (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 自然科学家, 历史学家。——第 220 页。
- 培伦涅特-汤普逊——见汤普逊。
- 勒洛, 弗兰茨 (Reuleaux, Franz 1829—1905)——德国学者, 德国机械论学派的创始人, 1876 年为参加费拉得尔菲亚国际展览会的德国政府专员。——第 194 页。
- 勒南, 厄内斯特·约瑟夫 (Renan, Ernest-Joseph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因写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 167、327 页。
- 莫尔, 约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 年 7—9 月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在牟尔克河

- 战役中牺牲。——第 71 页。
- 莫斯特, 约翰 (Most, Johann 1846—1906)——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 1878 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公布后流亡英国; 1880 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1882 年侨居美国, 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第 272、384、385、386 页。
- 基恩, 詹姆斯·罗伯特 (Keene, James Robert 1838—1913)——美国金融家, 百万富翁。——第 338 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116 页。
-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唯心主义者,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213、223、346、347 页。
- 康普豪森, 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银行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8 年 3—6 月任普鲁士首相, 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 39、115 页。
- 曼托伊费尔, 爱得文 (Manteuffel, Edwin 1809—1885)——男爵, 德国将军, 1873 年起为元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 后为第一军团和南方军团司令, 驻法国的德国占领军总司令 (1871—1873)。——第 394 页。
-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 (1848—1850), 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0—1858)。——第 72、73、96 页。
- 盖布, 奥古斯特 (Geib,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 党员; 1872 年起为党的财务委员;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4 年起)。——第 13 页。
- 盖拉尔, 本杰明·阿德姆·沙尔 (Guérard, Benjamin-Edme-Charles 1797—185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法国中古史方面的著作。——第 546、562 页。
- 盖尔马尼库斯 (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 公元前 15—公元 19)——罗马统帅, 曾数次远征日耳曼人。——第 489、503、507 页。
- 朗姆, 海耳曼 (Ramm, Hermann)——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875 年为“人民国家报”编委。——第 10 页。
-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新康德主义者, 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第 27、396 页。
- 朗凯斯特, 雷伊 (Lankester, Rey 1847—1929)——英国学者, 生物学家。——第 379 页。
- 梅恩, 亨利·詹姆斯·萨姆纳 (Maine,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家史家; 作为印度省督所属参事室参事 (1862—1869) 和印度事务国家秘书处参事室参事 (1871 年起), 积极参加制定英国的地方立法和实行对印度的殖民奴役。——第 433、448 页。

-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霍赛 (Mesa y Leompart, José 1840—1904)——著名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解放报”编委 (1871—1873), 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 (1872—1873), 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 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 (1879), 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 36、377 页。
-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239 页。
- 梅斯托尔夫, 约翰娜 (Mestorf, Johanna 1829—1909)——德国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考古方面的著作, 翻译了许多斯基的那维亚考古学家的著作。——第 515 页。
- ## 十二画
- 扬松, 尤利·埃杜阿尔多维奇 (Янсон, Юл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1835—1893)——俄国进步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 彼得堡大学教授, 曾任彼得堡市政委员会统计处处长 (1881 年起); 写有许多统计学理论和统计学史方面的著作。——第 458—462、466、469 页。
-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07、209、212、213、236、237、238、347 页。
- 敦克尔, 弗兰茨 (Duncker, Franz 1822—188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 119 页。
- 闵采尔, 托马斯 (Münzer, Thomas 1490 左右—1525)——伟大的德国革命家, 宗教改革时期和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农民和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 他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 207 页。
- 富尔德, 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849—1867 年曾多次任财政大臣, 后任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 (1852—1860)。——第 193 页。
- 汤普逊, 托马斯·培伦涅特 (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1783—186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的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论者。——第 302 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205、206、213、219、223—226、327、346、347 页。
- 斐拉雷特——见约翰。
- 森提乌斯·萨土尔尼努斯 (Sentius Saturninus 一世)——罗马统帅, 曾参加远征日耳曼人。——第 497 页。
- 费尔, 詹姆斯·格莱安 (Fair, James Graham 1831—1894)——美国资本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 1881—1887 年为参议员。——第 338 页。
-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 主观唯心主义者。——第 347 页。

- 提耳登, 赛米尔·琼斯 (Tilden, Samuel Jones 1814—1886)——美国政治活动家, 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 法学家, 纽约州州长 (1874—1876)。——第 338 页。
- 提比利乌斯 (Tiberius 公元前 42—公元 37)——罗马皇帝 (14—37)。——第 332、496、497、507、518 页。
- 菲力浦二世 (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 (1556—1598)。——第 506 页。
- 菲勒克, 路易 (Viereck, Louis 1851—192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 1884—1887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 1896 年侨居美国, 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第 175、176、179、181 页。
- 菲尔德, 赛勒斯·威斯特 (Field, Cyrus West 1819—1892)——美国百万富翁, 在美国和英国之间铺设水底电讯电缆的大西洋电讯公司的创办人。——第 338 页。
- 舒尔采, 恩斯特 (Schulze, Ernst)——德国语文学家。——第 416 页。
- 舒瓦洛夫, 彼得·巴甫洛维奇 (Пушлов,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生于 1824 年)——伯爵, 彼得堡省贵族会会长 (1851—1863), 准备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彼得堡贵族委员会主席; 在编纂委员会中维护设法“解放”无地农民的大土地贵族的利益。——第 454、457 页。
- 舒瓦洛夫, 彼得·安得列也维奇 (Пушлов,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827—1889)——伯爵, 俄国将军和外交家, 宪兵长官和皇帝办公厅第三厅厅长 (1866—1873), 驻英大使 (1874—1879)。——第 168 页。
- 莱宾, 茹尔 (Lépine, Jules)——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书记。——第 377 页。
- 莱曼, 丹尼尔·哥特洛普 (Reymann, Daniel Gottlob 1759—1837)——德国制图家, 德国和邻国的特种地形图的编制者。——第 584、585、587 页。
- 莱昂哈特, 格尔哈特·阿道夫·威廉 (Leonhardt, Gerhard Adolf Wilhelm 1815—1880)——德国法学家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汉诺威司法大臣 (1865—1866) 和普鲁士司法大臣 (1867—1879)。——第 360 页。
- 普林尼 (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罗马博物学家, “博物志” (三十七卷) 的作者。——第 416、489—492、509、513、525—530、532—536 页。
- 普富尔, 恩斯特 (Pfuel, Ernst 1779—1866)——普鲁士将军, 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 3 月为柏林卫戍司令, 5 月曾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 1848 年 9—10 月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第 70 页。
- 普赫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Puchta, Georg Friedrich 1798—1846)——德国法学家, 反动的法的历史学派代表。——第 423 页。
- 普卢塔克 (Plutarchos 约 46—125)——古希腊作家, 道德论者, 唯心主义哲学家, 古希腊和罗马的杰出活动家传记的作者。——第 483 页。
- 普罗布斯 (马可·奥里略·普罗布斯) (Marcus Aurelius Probus 232—282)——罗马皇帝 (276—282)。——第 522 页。
- 凯伦, 扬·亨德里克 (Kern, Johan Hen-

- drik 1833—1917)——荷兰著名语文学家、东方学家和梵文学家。——第 565、570、574 页。
-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æ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著名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和作家;著有“高卢战纪”一书。——第 329、353、355、433、448、478、482—490、493、505、506、513、522、531—535 页。
- 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阿斯(Procopius of Cæsarea 五世纪末—约 562)——拜占庭最著名的史学家;曾以维利萨里统帅顾问和秘书的身分参加了许多军事远征,他在“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八卷)中描写了这些远征;他反映了不满查士丁尼皇帝的专制政策的奴隶主贵族的观点。——第 527 页。
- 凯泽尔,麦克斯(Kayser, Max 1853—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帝国国会议员(1878 年起),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右翼。——第 179—181 页。
- 凯腊特里伯爵,艾米尔(Kératry, Émile, comte de 1832—1905)——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1870 年任巴黎警察局长(9—10 月),后领导组织布列塔尼新编的地方武装力量;上加龙省省长(1871),1871 年 4 月在土鲁斯镇压过公社。——第 371、393 页。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400 页。
- 斯隆,赛米尔(Sloan, Samuel 1817—1907)——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第 338 页。
- 斯拉格(Slagg)——1881 年为曼彻斯特的英国国会议员。——第 287 页。
- 斯坦福,利兰德(Stanford, Leland 1824—189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铁路企业主,百万富翁;属于共和党;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861—1863);参议员(1885—1891)。——第 338 页。
- 斯巴达克(Spartakus 死于公元前 71 年)——罗马角斗士,公元前 73—71 年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第 332 页。
- 斯卡尔金(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笔名)(Скалдин, Федор Павлович) 1828—1902)——俄国作家和政论家,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闻名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作者。——第 453、455、458—462、466 页。
- 斯特拉本(Strabon 约公元前 63—公元 20)——古希腊最著名的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488、489、504、523 页。
-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第 219 页。
- 斯维托尼乌斯(凯尤斯·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约 70—160)——罗马历史学家,写了一部“十二凯撒传”(从尤利乌斯·凯撒到多米齐安),主要内容尽属皇帝的私生活。——第 495 页。
- 斯克列比茨基,亚历山大·伊里奇(Скребит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27—1915)——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的作者。——第 468 页。

十三画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

- 西 伦)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120)——罗马最著名的史学家和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活动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的作者。——第 332、355、356、433、448、478、486、489—492、500、506、507—515、517、519、521—527、530、532、535、588 页。
- 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 714—768)——法兰克官相(741—751),卡罗兰王朝的第一个国王(751—768),——第 546、548—550 页。
-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英国国王(1685—1688)。——第 340 页。
- 微耳和,鲁道夫(Virchow, Rudolf 1821—1902)——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写有人类学方面的著作,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第 480 页。
- 雷姆克,哥特利勃(Lemke, Gottlieb 1844 左右—1885)——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 374 页。
- 道斯,戴维(Dows, David 1814—1890)——美国金融家,百万富翁。——第 338 页。
- 道金斯,威廉·博伊德(Dawkins, William Boyd 1837—1929)——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写有关于欧洲原始居民方面的著作。——第 478、510 页。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佣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102、103、119 页。
-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第 308、310 页。
- 蒙克,查理(Monk, Charles 生于 1824 年)——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合并主义者,议会议员(1859 和 1865—1885)。——第 287 页。
- 蒙奈,弗兰茨·约瑟夫(Mone, Franz Joseph 1796—187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尼德兰的历史和古代文献方面的著作。——第 588 页。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 29、32、322 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伦敦路透通讯社的创办人(1851)。——第 159 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中设有银行。——第 337 页。
- 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Lucius A naeus Seneca 公元前 4 左右—公元 65)——罗马哲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所谓新斯多葛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伦理学学说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有过影响。——第 328、330—332 页。
- 塞吉美尔(Segimer 一世纪)——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酋长,阿尔米纽斯的父

- 亲。——第 501、502 页。
- 塞格斯特 (Segestes 一世纪)——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酋长, 拥护罗马人。——第 502 页。
- 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 (鲁齐乌斯·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 (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46—211)——罗马皇帝 (193—211) 和统帅。——第 515、517、518 页。
- 奥艾尔, 伊格纳茨 (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改良主义者; 职业是鞍匠,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 多次被选为国会议员。——第 13 页。
- 奥雷耳·德·帕拉丹, 路易·让·巴蒂斯特·德 (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 1804—1877)——法国将军, 教权主义者, 普法战争时期任卢瓦尔军团司令, 1871 年 3 月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第 392—394 页。
- 奥古斯都 (Augustus 公元前 63—公元前 14)——罗马皇帝 (公元前 27—公元前 14)。——第 329、484、486、493、496、497、504—507、512、514、516 页。
- 奥罗修斯, 保罗 (Orosius, Paulus 约 380—420)——罗马历史学家, 原系西班牙人; 世界史概要“反多神教徒七书”的作者。——第 495 页。
- 奥顿诺凡·罗萨, 耶利米 (O' Donovan Rossa, Jeremy 1831—1915)——爱尔兰芬尼亚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865 年被捕, 被判处无期徒刑, 1870 年获特赦, 不久就侨居美国, 在那里领导芬尼亚社; 八十年代脱离政治生活。——第 370 页。
- 奥尔洛夫,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公爵, 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 外交家, 曾任国家参议院议长和大臣委员会主席 (1856 年起), 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 残暴的农奴主。——第 455 页。
- 奥维狄乌斯 (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 (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 43—约公元 17)——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505 页。
-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 (1672—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341 页。

十四画

-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27、228、415 页。
- 豪威耳, 乔治 (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9), 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 (1871—1875)。——第 163—168 页。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7、116、217、248、249 页。
- 赫德尔, 麦克斯 (Hödel, Max 1857—1878)——莱比锡的帮工; 1878 年谋刺德皇威廉一世未遂, 政府借此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160、167 页。
-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47年侨居国外，在伦敦建立了俄国自由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第126页。

赫希柏格，卡尔(Höchberg, Karl 1853—1885)(笔名路·李希特尔 L. Richter)——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儿子；187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创办了许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杂志，并供给经费。——第172、178—180、182页。

赫拉克利特(Heraklit 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219页。

维干德，保尔(Wigand, Paul 1786—1866)——德国法学家，写有许多关于西日耳曼各地区的法学史方面的著作。——第569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军方面。——第260页。

维耳克，克利斯提安·哥特洛普(Wilke, Christian Gottlob 1786—1854)——德国神学家，曾从事圣经语文学和历史的研究。——第328页。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215页。

维贝尔格，卡尔·弗雷德里克(Wiberg, Carl Frederik 1813—1881)——瑞典历史学家，写有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古代史

方面的著作。——第510、513页。

维尼齐乌斯，马可(Vinicius, Marcus)——罗马统帅，执政官，曾参加班诺尼亚和日耳曼尼亚的战争。——第497页。

维尔穆特(Wermuth)——汉诺威警察厅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与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67页。

维尔琴盖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 死于公元前46年)——高卢领袖，高卢人反对罗马统治总起义的首领(公元前52—51)。——第505页。

十五画

墨洛温王朝——五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第362、539、543、547、552、554、558页。

摩莱里(Morelly 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第207页。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 Louis Henry 1818—1881)——杰出的美国学者，人种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432页。

摩尔根，爱得文·丹尼逊(Morgan, Edwin Denison 1811—188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属于共和党，1858—1862年任纽约州州长，1863—1869年为参议员。——第338页。

德穆特，海伦(Demuth, Helene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383页。

德普勒，马赛尔(Deprez, Marcel 1843—1918)——法国物理学家和电气技师，研究远距送电问题。——第375页。

德鲁苏斯(尼禄·克罗狄乌斯·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 公元前38左右—9)——罗马统帅;于公元前12—9年率领军队远征日耳曼人。——第493—498、507页。

德尔布吕克,马丁·弗里德里希·鲁道夫(Delbrück, Martin Friedrich Rudolf 1817—1903)——普鲁士和德意志国家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76年以前是俾斯麦的亲信之一;国会议员(1878—1881),曾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政策。——第54、56页。

十六画

穆尔,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与艾威林一起将“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87页。

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见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327、328、330、331页。

诺布尔,约翰(Noble, John 1827—1892)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写有许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著作。——第300—302页。

诺比林,卡尔·爱德华(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878年谋刺威廉一世未遂,政府借此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160、167页。

十七画

赛治,拉塞尔(Sage, Russell 1816—1906)——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美国国会议员(1853—1857)。——第338页。

谢夫莱,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1—1903)——德国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宣传放弃阶级斗争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合作。——第396、399、402、403、422页。

十八画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第217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五画

印格或印哥——古代德国神话中曼努斯(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第526页。

八画

易斯克或易斯科——古代德国神话中曼努斯(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第526页。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第 332 页。

拉撒路——“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的名字。——第 332 页。

阿特乃——见雅赫维。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第 329 页。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 51 页。

九 画

耶和华——见雅赫维。

神学家约翰——圣经中“启示录”一书的传说中的作者。——第 330、335 页。

十 画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 346 页。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第 346 页。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据上的条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下一磅肉。——第 9 页。

纳塔斯——据塔西佗说，是古日耳曼人的女农神。——第 527、530 页。

埃卢（蒂乌、齐乌）——古日耳曼人的战神。——第 587 页。

十一 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 328、329、330、331 页。

曼努斯——据塔西佗说，是古日耳曼人信奉的图伊斯科神的儿子，他有三个儿子，即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相传由他们三人产生了三个主要的日耳曼部落——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第 526 页。

十二 画

雅赫维（耶和華）——犹太教中的主神。——第 330 页。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众神那里盗走了火，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山巅，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第 236 页。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把旅客诱来后强使躺卧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第 581 页。

十四 画

玛门——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在基督教经文中，玛门是恶魔，是好利贪财的化身。——第 317 页。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打铁业的保护神。——第 236 页。

赫明或赫明诺——古代德国神话中曼努斯（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第 526 页。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出版。——第163、168页。
- “人民报”（《Das Volk》）——伦敦出版。——第119页。
- “人民报”（《La Plebe》）——洛迪、米兰出版。——第37、109、112、113、134、171页。
-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不伦瑞克出版。——第125页。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莱比锡出版。——第4、14、41、263页。

三 画

- “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L'Atelier, organe spécial de la classe laborieuse, rédigé par des ouvriers exclusivement》）——巴黎出版。——第29页。

五 画

- “未来”（《Die Zukunft》）——柏林出版。——第188页。
- “平等报”（《L'Egalité》）——第200、249、264、324页。

- “正义报”（《La Justice》）——巴黎出版。——第370、373页。
- “白厅评论”（《The Whitehall Review》）——伦敦出版。——第337页。
-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莱比锡出版。——第8页。
-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里子、伦敦出版。——第259页。
-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出版。——第26、161、348—350页。
- “世纪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164页。
- “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The Secular Chronicle, And Record of Free-thought Progress》）——伦敦出版。——第169页。

六 画

- “先驱”（《Der Vorboter》）——日内瓦出版。——第159页。
- “灯笼”（《Die Laterne》）——布鲁塞尔出版。——第175、178—179、181—182页。
- “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90页。
- “自由”（《Freiheit》）——伦敦出版。——第178、272、386页。

“自由通讯”(《Liberale Correspondenz》)
——第350页。

七 画

“抗议报”(《O Protesto》)——里斯本出版。——第146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出版。——第159—162、167、272、308、380页。

“劳动旗帜”(《The Labor Standard》)——纽约出版。——第135页。

“劳动旗帜报”(《The Labour Standard》)——伦敦出版。——第276、279、286、291、292、295、298、299、303、307、310、314、318页。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里昂、巴黎出版。——第201、258、259、345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柏林出版。——第249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苏黎世、伦敦出版。——第321、336、339、344、345、349、350、371、374、379—381、388页。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苏黎世出版。——第172、182页。

八 画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159页。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第4、162页。

九 画

“钟声”(《Колокол》)——伦敦、日内瓦出版。——第325页。

“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杜宾根出版。——第411、417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第162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43、55、115页。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佛罗伦萨、罗马出版。——第387页。

“前进报”(《Вперед!》)——伦敦出版。——第40页。

“前进报”(《Vorwärts!》)——巴黎出版。——第375页。

“前进报”(《Vorwärts!》)——莱比锡出版。——第114、160、162、181、263页。

十 画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巴黎出版。——第370页。

“纽约人民报”(《New-Yorker Volkszeitung》)——第339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119、375页。

十二画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74、159、161、162页。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见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伦出版。——第 115、319、322、375 页。

十 三 画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 des Economistes》)——巴黎出版。——第 248 页。

“新社会”(《Die Neue Gesellschaft》)——苏黎世出版。——第 188 页。

“新世界”(《Die Neue Welt》)——莱比锡出版。——第 61、79 页。

“新时代”(《Die Neue Zeit》)——斯图加特出版。——第 11 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118 页。

“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见“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里子,伦敦出版。——第 259 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 39、69、71、74、76、78、79、83、85、88、90—93、99、103、117、118、260、375 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伦敦,汉堡出版。——第 260 页。

十 五 画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 116、259 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第 68、117、260、375 页。

地名索引*

二 画

丁斯拉肯——第 586 页。
丁克尔斯比尔——第 509 页。

三 画

上巴门(乌培河谷—上巴门)——第 582 页。
士瓦本——第 365、521 页。
凡尔赛——第 394 页。
土里——第 394 页。
土拉省——第 470 页。
大西洋——第 265、291 页。
大圣伯纳德山口——第 493 页。
小亚细亚——第 482 页。
小喀尔巴阡山——第 498 页。
小圣伯纳德山口——第 493 页。

四 画

牛津——第 565 页。
云纳河——第 394 页。
太晤士河——第 291 页。
不来梅——第 49 页。
不伦瑞克——第 44、107、110、138 页。
扎耳堡——第 494 页。
扎特兰德——第 528 页。

比奇——第 593 页。
比德里赫——第 584 页。
比利牛斯山脉——第 370—371、479、543 页。
文洛——第 576、577 页。
文特诺尔——第 382 页。
文威累尔——巴伐利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584 页。
日内瓦——第 159、164、165、265、345 页。
日内瓦湖——第 382 页。
日德兰半岛——第 483、488 页。
什莱湾——第 487 页。
什莱登——第 576 页。
什列斯维希——第 483、512、516 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 107、138、365、515 页。
厄兰岛——第 515—517 页。
厄兰海峡(卡耳马海峡)——第 515 页。
厄勒海峡(松德海峡)——第 515 页。
厄尔士山脉——第 485、495 页。
韦尔——第 392 页。
韦尔登——第 564、565、567、577、588 页。
韦尔切利——第 484 页。
韦雷河——第 511 页。
韦特劳——第 494、498、508、583 页。
韦斯特林山——第 592、594 页。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 巴登——第 100、104、117、367、588 页。
巴黎——第 7、36—37、69、70、100、116—118、151—154、177、193、209、212、259、270、319—320、322、345、370、371、375、377、380、391—394、546、562 页。
巴门——第 596 页。
巴门—爱北斐特——见爱北斐特—巴门。
巴塞尔——第 119 页。
巴德高——第 524、532 页。
巴涅尔-德-吕雄——第 371 页。
巴伐利亚——第 100、365、367、521、543 页。
巴德维克——第 524 页。
- ### 五 画
- 平兹省——第 470 页。
左斯特——第 588 页。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第 462 页。
汉堡——第 49、50、55、56、67、107、118、119、138、260、309、510、515 页。
汉诺威——第 44、46、97 页。
皮蒙特——第 114 页。
皮耳劳(巴耳提斯克)——第 516 页。
卢森堡——第 570、584、585、589、590、592—595 页。
卢瓦尔河——第 392 页。
尼诺夫——第 587 页。
尼斯特尔河——第 594 页。
北海——第 483、488、491、495、507、512、514、516、521、523、528、536、571、580 页。
北布拉班特——第 572 页。
北耳宾吉亚(霍尔施坦)——第 487、536 页。
加龙河——第 481 页。
加特契纳——第 326 页。
加利福尼亚——第 376 页。
瓦林——第 511 页。
瓦瑟河——第 394 页。
瓦尔塔河——第 527 页。
瓦拉几亚——第 521 页。
圣哥阿尔——第 584 页。
圣奥梅尔——第 587、590 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270、380、384、454 页。
圣特罗伊登——第 587、590 页。
兰河——第 492、494、508、511、589、593、595 页。
兰格斐特——第 582 页。
兰德施土尔——第 584 页。
兰根施瓦耳巴赫(兰根泽芬)(施瓦耳巴赫浴场)——第 594 页。
卡累尔-阿斯坦(阿斯坦)山——第 564 页。
卡尔农特——第 509 页。
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第 381 页。
卡斯特罗普(卡斯特罗普-劳克塞耳)——第 586 页。
卡特加特海峡——第 483、514—515、516 页。
弗里希-加弗——第 491 页。
弗里斯兰省——第 528、587 页。
弗兰德——历史区。——第 528、563、570、587、590 页。
弗兰肯施坦——第 64 页。
弗雷肯霍斯特——第 568、569 页。
布雷——第 340、341 页。
布雷(在灵堡)——第 590 页。
布伦——第 590 页。
布吕耳——第 589 页。
布达佩斯——第 149 页。
布鲁塞尔——第 63、67—69、114、116、117、147、259—260、266、319、322、375、575、590 页。

布列塔尼——第 118 页。
 布累金格——瑞典的一个地区。——第 516 页。
 布勒斯劳(佛罗茨拉夫)——第 64—66、99、101、105、138、308 页。
 布莱得弗德——第 287 页。

六 画

华沙——第 265 页。
 迈纳——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第 332 页。
 地中海——第 481 页。
 伐佛尔——第 590 页。
 汝拉山区——第 143 页。
 伏尔姆斯——第 485 页。
 达尔马威亚——第 511 页。
 伊尔恩津克——巴伐利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509 页。
 米兰——第 114 页。
 米尔腾堡——第 508 页。
 艾塞耳河——第 495、508、588 页。
 艾费耳高原——第 585、589、592—594 页。
 色当——第 139 页。
 色雷斯——第 484、489 页。
 色雷斯半岛——第 482 页。
 亚琛——第 565、566、570、583、585、589 页。
 亚德湾——第 572 页。
 亚尔萨斯——第 57、365、583 页。
 西兰岛——第 515 页。
 西兰省——第 528、572 页。
 西西里岛——第 480、510 页。
 西里西亚——第 52、64、69、73、74、78、79、81—84、93—96、98、99、192、363、365、510、519、527 页。
 多农山——第 593 页。

多瑙河——第 353、481—486、488、493、497、504、509、518—520、523、526、537、564 页。
 多伊茨——第 498 页。
 多尔斯滕——第 586 页。
 多拉尔特湾——第 572 页。

七 画

灵堡——第 577、592 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 512 页。
 劳恩堡——第 529 页。
 别恩堡——第 584 页。
 努瓦荣——第 394 页。
 佐林根——第 138、381 页。
 沙特尔——第 392—394 页。
 佛日山脉——第 593 页。
 那不勒斯——第 51、142 页。
 汪达尔山——见巨人山。
 伯罗奔尼撒——第 332 页。
 吕特策耳施泰因(拉-普提特-比埃尔)——第 593 页。
 苏道(阿德利格-苏道)——第 525 页。
 苏格兰——第 214 页。
 苏黎世——第 104、172—178、589 页。
 麦茨——第 391、394 页。
 麦士河——第 485、496、572、577、580、586、590 页。
 杜斯堡——第 586 页。
 杜尔克海姆(杜尔克海姆浴场)——第 72 页。
 辛克法耳——第 528 页。
 辛比尔斯克省——第 470 页。
 利珀河——第 492—498、508、523、531、565 页。
 利斯河——第 563 页。
 利伏诺——第 51 页。
 利普施塔特——第 495 页。

- 克列维——第 576 页。
 克散滕——第 576、586、589 页。
 克莱德河——第 291 页。
 克拉科夫——第 266 页。
 克耳海姆——第 509 页。
 克雷弗尔德——第 580 页。
 里海——第 481 页。
 里昂——第 225 页。
 里夫兰——第 515 页。
 里奥哈——第 51 页。
 里普利安——历史区。——第 577、578 页。
 里克斯赫夫特角——第 516 页。
 贝尔格——第 498、565、569、570、574、577、580 页。
 贝尔格区——第 46—48、356 页。
 贝尔格地区——第 588、592 页。
 贝奇瓦河——见马尔赫河。
 贝克海姆——第 584 页。
 贝萨拉比亚——第 467 页。
- ### 八 画
- 图尔——第 392、546 页。
 刻赤——第 520 页。
 易北河(拉巴河)——第 44、49、53、58、98、484、487、489—491、495—498、509、512、519、523—524、528、529、532、588 页。
 芬宁(芬)岛——第 520 页。
 林特恩——第 504 页。
 昔勒尼——古希腊在非洲北部海岸的殖民地。——第 510 页。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直布罗陀——第 480 页。
 些耳德河——第 588 页。
 帕德波恩——第 495、565 页。
 奈木尔——第 394 页。
 奈梅根——第 589 页。
 罗马——第 131、167、331—334、340、342、423、426、497、498、500、504、505、512、513、518、545 页。
 罗马尼亚——第 146 页。
 明登——第 587 页。
 明兴-格拉特巴赫——第 580 页。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99、100、596 页。
 法兰克尼亚——历史区。——第 365、508、543、564 页。
 波河——第 482 页。
 波洪——第 195 页。
 波恩——第 47、115、496、498、582 页。
 波士顿——第 119 页。
 波兹南——第 45、52、77 页。
 波罗的海——第 483、491、492、512、514—517、527 页。
 波美拉尼亚——第 45、52、76、77、365 页。
 波尔多——第 51、370、371 页。
 波尔图——第 146 页。
 波希米亚——见捷克。
 波希米亚(捷克)森林——山脉。——第 485 页。
 阿得瑙——第 576 页。
 阿速夫海——第 520 页。
 阿格尔河——第 586 页。
 阿利埃省——第 293 页。
 阿瓦耳高——历史区。——第 577 页。
 阿道夫塞克——第 508 页。
 阿勒曼尼亚——历史区。——第 550 页。
 阿姆斯特丹——第 564、599 页。
 阿奎丹尼亚——历史区。——第 543 页。
 阿耳梅河——第 495 页。
 阿耳特马尔克——历史区。——第 52 页。
 阿尔河——第 564、589、595 页。
 阿尔让台——第 370、382、383 页。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第 382 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 8、479—482、504 页。
 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第 466 页。

九 画

耶拿——第 367 页。
 幽里希——第 585 页。
 临克宾——第 483 页。
 柯夫诺省——第 455 页。
 洪斯吕克山——第 586、593 页。
 欧佛赖塞耳——第 572 页。
 洛林——第 57、579、584、589、590、593—595 页。
 洛迪——第 37 页。
 美因河——第 482、485、494、509、511 页。
 美因兹——第 494 页。
 柏林——第 53、69、70、107、108、115、119、134、137、159、176、185、192、193、245、270、308、309、313、327、349、424、429 页。
 柏肯海德——第 287 页。
 迪耳河——第 531、589 页。
 迪克斯莫伊德——第 587 页。
 施特廷(兹杰辛)——第 49 页。
 施佩萨尔特——第 564 页。
 施魏德尼茨(斯维德尼察)——第 64 页。
 勃艮第——第 521 页。
 勃兰登堡——第 44、45、52、70、76、77、363、365、487、511、532 页。
 勃罗姆堡(贝德哥什)——第 510 页。
 勃腊尼博尔(勃兰登堡)——第 487 页。
 济克河——第 492、498、508、531、589、595 页。
 济克兰德——第 569、577 页。
 济克马林根——第 103 页。
 济耳特岛——第 528 页。

哈瑙——第 508 页。
 哈耳(哈雷)——第 590 页。
 哈默伦——第 504 页。
 哈塞耳特——第 587、590、592 页。
 哈斐尔兰德——第 528 页。
 科伦——第 69—72、99、115、117、118—119、260、496、570、583、585、589、594 页。
 科芒特里——第 293 页。
 科布伦茨——第 582、583、584 页。
 科尔巴赫——第 592 页。
 科尔贝克(科洛布热克)——第 75 页。
 威悉河——第 489、491、494、495、502、523、535 页。
 威特岛——第 382 页。
 威尔士——第 317 页。
 威尼斯——第 114 页。
 威塞耳——第 485、576、577、593 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 138、192、356、508、536、566、568、569、577、580、581、586、588 页。

十 画

宾根——第 594 页。
 根特——第 143、147、573 页。
 高卢——第 332、433、448、481—484、490、493、496、504、506、536、542—547、560、562 页。
 涅辛(涅任)——第 75 页。
 热那亚——第 51 页。
 茹瓦尼——第 394 页。
 敖德萨——第 381、384 页。
 班诺尼亚——历史区。——第 493 页。
 郎卡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82、317、574 页。
 郎布耶——第 394 页。
 贡比泉——第 394 页。

- 贡岑豪森——第 509 页。
 翁纳——第 588 页。
 翁施特鲁特河——第 564 页。
 夏龙(马尔纳河岸夏龙)——第 391 页。
 夏托登——第 392 页。
 纳埃河——第 593—595 页。
 纳赫耳恩——第 511 页。
 伦敦——第 3、10、13、36、67、104、107、
 117—120、132、159、160、162、163、166、
 170、193、260、266—268、272、285、291、
 319—322、326、347、371、375、380、382、
 383、387、388 页。
 伦巴第——第 114 页。
 爱丁堡——第 196 页。
 爱北斐特——第 260 页。
 爱北斐特—巴门——第 46、107、308 页。
 哥特兰岛——第 512、515—517 页。
 哥本哈根——第 518 页。
 哥尔若维策——第 520 页。
 库耳米埃——第 393 页。
 库耳维耳——第 392 页。
 库尔斯克省——第 470 页。
 恩吉安——第 382 页。
 恩格伦——第 568 页。
 恩格尔斯——第 525 页。
 恩格尔斯高——第 524 页。
 乌培河——第 498、508、582 页。
 乌培河谷——第 46 页。
 乌得勒支——第 572 页。
 乌尔利希施坦——第 44 页。
 纽约——第 36、118、193、296、337、384
 页。
 纽伦堡——第 107、138 页。
 纽沙特尔——第 113 页。
 纽法尔瓦塞尔(新港)——第 516 页。
 特瑙特——第 587 页。
 特利尔——第 115、319、322、570、584、
 589、595 页。
 特利尔专区——第 433、448 页。
 特斯黑林岛——第 495 页。
 特雷布尼茨——第 511 页。
 马赛——第 481、482 页。
 马宰克——第 577、590 页。
 马德里——第 36 页。
 马斯特里赫特——第 566、577、585 页。
 马尔克——第 498、508、565、569、577 页。
 马尔摩——第 70 页。
 马尔赫(摩拉瓦)河——第 509、511 页。
 马尔美提——第 585、589 页。
 格丹(乌丹)——第 394 页。
 格腊蒙——第 590 页。
 格洛高(格沃古夫)——第 511 页。
 格律德——第 525 页。
 格耳德恩——第 576、585 页。
 格吕宁根——第 508 页。
 格布尔河(马里乍河)——第 484 页。
 格罗斯特——第 287 页。
 格罗德诺省——第 455 页。
 埃森——第 195、196、568、577 页。
 埃克斯——第 483 页。
 埃林根——第 509 页。
 埃耳森——第 495 页。
 埃布罗河——第 51 页。
 埃德尔河——第 487 页。
 埃利佐河——第 494 页。
 埃姆斯河——第 492—494、498、507、508、
 523、528、531 页。
 埃格山脉——第 569 页。
 埃捷尔(萨烈马)岛——第 510 页。
 埃弗利亚——历史区。——第 577 页。
 十一画
 捷克——第 149、169、483、486、497、509、
 511、524、532 页。

崩高——历史区。——第 577 页。
 梁赞省——第 470 页。
 理森山(克尔科诺舍山)——第 482、484、498、527、564 页。
 绍林吉亚——第 365、564 页。
 陶努斯山脉——第 492、496、508、594 页。
 莫斯科——第 380、381、384 页。
 莫拉维亚——第 511 页。
 基尔湾——第 487 页。
 基普芬堡——第 509 页。
 梅特曼——第 586 页。
 梅克伦堡——第 67、97、107、511、512 页。
 勒文(鲁文)——第 587、590 页。
 勒威亚——历史区。——第 493、511 页。
 勒斯廷(埃斯廷)——第 549、570 页。
 曼特——第 392 页。
 曼都亚——第 386、393 页。
 曼海姆——第 100、310 页。
 曼彻斯特——第 105、214、259、263、287、299 页。
 符律恩——第 576 页。
 符利兰岛——第 495 页。
 符利辛根——第 587 页。
 符拉尔丁根——第 587 页。

十二画

斐维——第 382 页。
 闵斯德——第 44、568、574、599 页。
 汤格恩——第 587、590 页。
 须德海——海湾。——第 495、572 页。
 提耳蒙(提楠)——第 587 页。
 琥珀海岸——第 482、483、509 页。
 敦基尔欣(敦克尔克)——第 564、599 页。
 费拉得尔菲亚——第 36、37、194 页。
 凯尔斯劳顿——第 593 页。
 鄂斯纳布鲁克——第 569 页。
 黑海——第 481、507、520、523 页。

黑森——第 564、584、592、594、598 页。
 喀山省——第 469 页。
 喀尔巴阡山脉——第 486、537 页。
 博让西——第 392、393 页。
 博洛尼亚——第 142 页。
 博恩霍尔姆岛——波罗的海上的岛屿。——第 515 页。
 斯卡晏——第 516 页。
 斯图加特——第 103、104 页。
 斯特拉斯堡——第 485 页。
 斯拉耶耳塞——第 515 页。
 斯摩棱斯克省——第 462 页。
 普鲁士——第 39、40、45、46、50、53、57、58、59、64—66、72、76—78、81、88、97—100、119、158、171、197、270、310、365、367、482、584 页。
 普鲁士萨克森——第 44 页。
 普瓦提埃——第 562 页。
 普罗凡斯——第 483 页。
 普法尔茨——第 72、365、571、583、584、596—599 页。
 普里格尼茨——第 529 页。
 莱茵河——第 353、354、357、363、364、367、480、484—488、491—498、501、504、507—509、518、519、523—526、531—536、565、567、570、572、576、577、583、584、595 页。
 莱茵省——第 76—78、97、118、508、577 页。
 莱茵高——第 365、531 页。
 莱茵普鲁士——第 192 页。
 莱茵布罗耳——第 589 页。
 莱茵贝尔格——第 584、589 页。
 莱茵普法尔茨——地区。——第 355 页。
 莱比锡——第 119、138、178、263、309、345、505 页。
 莱夫费尔舍伊德——第 576 页。

十三画

滑铁卢——第 212、590 页。
 顿奈斯山——第 593 页。
 枫丹白露——第 394 页。
 新喀里多尼亚岛——第 371 页。
 塞纳河——第 394 页。
 塞尔维亚——第 149 页。
 蒙塔包尔——第 508 页。
 蒙特卡罗——第 382 页。
 福尔巴赫——第 595 页。
 福格耳贝克林山——第 564 页。
 塔尔瑙(塔尔努夫)——第 64 页。
 塔姆沃思——第 287 页。
 塔夫利达省——第 462 页。
 雷斯——第 576 页。
 雷姆斯河——第 509 页。
 雷察特河——第 564 页。
 奥诺——第 394 页。
 奥顿——第 550 页。
 奥得河——第 509、510、511、523、527、530、532、536 页。
 奥耳珀——第 577 页。
 奥尔良——第 391、392 页。
 奥尔丹——第 317 页。
 奥登林山——第 356 页。
 奥格斯堡——第 510 页。
 奥斯特河——第 512 页。
 奥斯特法利亚——历史区。——第 568、569 页。
 奥斯宁格山脉(条多堡森林)——第 499、504、535、569 页。

十四画

臧林山——第 593 页。
 寥拉赫——第 588 页。
 豪斯贝尔格——第 504 页。

聚德布腊卢普——第 518 页。
 赫尔松省——第 462 页。
 赫金豪斯——第 582 页。
 赫耳韦格——第 586 页。
 赫耳德兰——尼德兰的一个省。——第 572 页。
 维道——第 528 页。
 维德河——第 589 页。
 维也纳——第 40、70、134、149、511 页。
 维斯拉河——第 491、510、511、513、515、516、526、527、536 页。
 维尔纳省——第 455 页。
 维尔腾堡——第 100、508—509 页。
 维埃尔宗——第 392 页。
 维拉库布勒(韦利集-维拉库布勒)——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93 页。

十五画

慕尼黑——第 70 页。
 摩塞尔河——第 355、564、569、570、584、585、589、593—595 页。
 摩纳哥公国——第 382 页。
 鲁贝——第 292 页。
 鲁尔河——第 492、495、498、508、531、565—569、577、588、592 页。
 鲁尔蒙特——第 577 页。
 鲁日伊策——第 44 页。
 鲁罗尔特——第 586、593 页。
 德勒——第 394 页。
 德勒斯顿——第 107、118、137、308、310 页。
 德涅泊河——第 510 页。
 德涅斯特河——第 510 页。
 德特莫耳特——第 504、505 页。

十六画

默尔斯——第 576 页。

锡塔特——第 577 页。
 霍布根——第 386 页。
 霍姆堡(霍姆堡浴场)——第 494 页。
 霍尔施坦——第 512 页。
 霍赫施派耶尔——第 593 页。
 霍赫瓦尔特山脉——第 355、592—593、594 页。
 诺定昂——第 587 页。
 诺里克——历史区。——第 493 页。
 诺伊斯——第 498、580 页。
 诺伊豪斯——第 512 页。
 诺依维特——第 498、508、524 页。
 诺特豪森——第 44 页。
 诺夫哥罗德省——第 463、470 页。

十七画

缪尔海姆——第 577 页。

十八画

萨利河——第 511、564 页。
 萨克森——第 52、107、137、192、508、532、564、565、569、577、578、588 页。
 萨马拉省——第 470 页。
 萨拉托夫省——第 470 页。
 萨尔河——第 584 页。
 萨尔堡——第 593 页。
 萨尔茨堡——第 168 页。
 萨尔鲁伊——第 585 页。
 萨尔布吕肯——第 138 页。
 萨尔茨维德尔——第 319、322 页。

二十画

藻厄兰山——第 569、577、592 页。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一文中 引用的拉丁文地名

A

A erdelingen——第 590 页。
 A hrweiler——第 585 页。
 A mstenrade——第 577 页。
 A ndernach (A ntunnacum)——第 584 页。
 A ningera-lò——第 569 页。
 A rdinghen——第 590 页。

B

B acharach——第 584 页。
 B allenge——第 590 页。
 B auler shoven——第 587 页。
 B enninghofen (Benninghof)——第 586 页。

B erghofen——第 586 页。
 B evingen——第 590 页。
 B iebrich——第 593 页。
 B ingelrade (Bingelraede)——第 577 页。
 B isterscheid (Bisterschied)——第 593 页。
 B ödingen——第 589 页。
 B ogenhoven——第 587 页。
 B ommer shoven——第 587 页。
 B onninghen——第 590 页。
 B oswinningen (Boswinning)——第 590 页。
 B ovelingen——第 590 页。
 B reitscheid——第 593 页。
 B remscheid——第 592 页。
 B rett nach——第 584 页。

Britlinga (Brietlingen)——第588页。
Büderich——第593页。
Buisingen——第590页。
Büllingen——第589页。
Buvingen——第590页。

C

Crastlingi (K rassum)——第587页。
Crettnach——第584页。
Curange——第590页。

D

Dallenbroich——第577页。
Daspich——第593页。
Destelbergen——第573页。
Desteldonck——第573页。
Destrich——第593页。
Droenhoven——第587页。

E

Echternach——第584页。
Edingahùsun (Edemissen)——第568页。
Ehingen——第588页。
Eibertingen——第589页。
Ellingen——第589页。
Engelmanshoven——第587页。
Eppinghofen——第586页。
Ereshofen (Ereshoven)——第586页。
Eschweiler——第585页。

F

Flissinghe (V lissingen)——第587页。
Fühlingen——第589页。

G

Garzweiler——第585页。
Gellik——第577页。

Genderingen——第588页。
Gerdingen——第590页。
Gey stingen——第590页。
Ghyverinckhove——第587页。
Gippershoven——第587页。
Gobertang——第590页。
Gravelingen (G ravelines)——第590页。
Grimmersingen——第590页。
Grinningen——第590页。
Gripilinga——第588页。
Gussenhoven——第587页。

H

Hardingen——第590页。
Haspelscheid (Haspelschiedt)——第593页。
Hatingen——第590页。
Hattingen——第588页。
Heerlinkhove——第587页。
Heisingen——第588页。
Helshoven——第587页。
Helsprich (Hilsprich)——第593页。
Herbinghen——第590页。
Herdange——第590页。
Hermelinghen——第590页。
Hibrich——第593页。
Hirzenach (Hirschenbach)——第584页。
Hirzenowe (Hirschenau)——见Hirzenach。
Hobbelrade——第577页。
Hocquinghen——第590页。
Holzweiler——第585页。
Höningen——第589页。
Hönningen——第589页。
Horsadal (Roß tal)——第568页。
Huckingen——第588页。
Hundelingen——第590页。
Hünningen——第589页。

Husingen——第589页。
Huysinghen——第590页。

I

Irmenach——第584页。
Iveldingen——第589页。

J

Juliacum——第584页。
Julich——见 Juliacum。

K

Kanach——第584页。
Karninschesberg (Kaninchenberg)——第595页。
Kellinghofen——第586页。
Kemplich——第593页。
Kerprich——第593页。
Kessenich——第577页。
Kinckhoven——第587页。
Kintzich——第593页。
Kippingen——第589页。
Konings-Hoven——第587页。
Köttingen——第589页。
Kreuznach——第584页。
Kruisberg——第577页。
Krützenberg——第577页。

L

Langenscheid——第593页。
Langscheid——第592页。
Lantremange——第590页。
Leichlingen (Leigelingon)——第589页。
Leubringhen——第590页。
Leulinghen——第590页。
Libertange——第590页。
Lirich——第593页。

Lottinghen——第590页。
Louvrenge——第590页。
Lüttingen——第589页。

M

Magathaburg——第568页。
Marspich——第593页。
Martis villa——第586页。
Mederiacum (Brück)——第584页。
Medernach——第584页。
Melderich——第593页。
Mellinghofen——第586页。
Melschede——第592页。
Merzig (Messancy)——第593页。
Meschede——第592页。
Mettecoven——第587页。
Mettlach——第584页。
Metzelschwand——第584页。
Millingen——第589页。
Montenach——第584页。
Mopertingen——第590页。
Mürringen——第589页。

N

Niederhofen——第586页。
Nieuwenhove——第587页。
Nieuwenhoven——第587页。
Noderange——第590页。
Nyswiler——第585页。

O

Odange——第590页。
Oderinge——第590页。
Ophoven——第587页。
Ordange (Ordingen)——第590页。
Ortrange——第590页。
Ottinga (Ottingen)——第588页。

P

- Penserich——第593页。
 Peuplingue——第590页。
 Phladirtinga (V laardingen)——第587页。
 Pollinchove——第587页。

Q

- Quettingen——第589页。

R

- Raepertingen——第590页。
 Ramscheid——第592页。
 Ratingen——第588页。
 Reckheim——第577页。
 Redingen——第590页。
 Reekhoven——第587页。
 Revelinge——第590页。
 Rixingen——第590页。
 Roclange——第590页。
 Roclenge——第590页。
 Röcklingen——第589页。
 Rodlach——第584页。
 Rödinger——第589页。
 Rübenach (Ribiniacus)——第584页。
 Rümningen (Romaninchova)——第588页。
 Ruykhoven——第587页。

S

- Schalkhoven——第587页。
 Scheidwald——第593页。
 Schuerhoven——第587页。
 Schwanden——第584页。
 Selschede——第592页。
 Sentzich——第593页。
 Silva Caesia——第589页。

- Smarinchova (Schmerikon)——第588页。
 Snotingaham (Nottingham)——第587页。
 Sodingen——第588页。
 Soetrich——第593页。
 Solingen——第589页。
 Stedieraburg (Steterburg)——第568页。
 Stockheim——第577页。

T

- Tiberiacum——见 Ziewerich。
 Tolbiacum——见 Zulpich。
 Törnich (Toernich)——第593页。

U

- Ummingen——第588页。

V

- Velinghen——第590页。
 Vytingen——第590页。
 Volkerinckhove——第587页。

W

- Wageningen——第588页。
 Wahenges——第590页。
 Waldrach——第584页。
 Wallach——第584页。
 Walscheid——第593页。
 Walwiller——第585页。
 Wandhofen (Wandhoven)——第586页。
 Wasenach——第584页。
 Waterscheid (Waterscheyd)——第592页。
 Wehofen——第586页。
 Wellinghofen——第586页。
 Wernerà-Holthùson——第568页。
 Wesselingen——第589页。
 Westhofen——第586页。
 Wichlinghofen——第586页。

W illebringen——第590页。
W immertingen——第590页。
W inethäusen——第568页。
W intershoven——第587页。
W olvaradingahusun——第587页。
W orringen——第589页。
W ulverdinghe (W olvaradinges-husun)——

第590页。

Z

Ziewerich (Civiraha)——第584、593页。
Zollinchovon (Zollikofen)——第588页。
Zonhoven——第587页。
Zülpich——第584页。

度量衡和货币名称表

重 量

1磅	453.592克	1夸特	12.700公斤
1普特	16.38公斤		

长 度

1斯达第(古希腊长度)	约192米	1里(1872年以前的德意志里)	7420米
1里(古罗马长度)	约1472.5米	1俄里(旧俄长度)	1066.78米
1里(英国法定长度)	1609米		

面 积

1俄亩(旧俄面积)	1.92公顷	1平方尺	929平方厘米
1胡菲(古德意志面积)	20—40摩尔根	1平方里(德意志平方里)	
1摩尔根(普鲁士摩尔根)	25.532公亩		5.063平方公里

容 量

1奥姆	约150升	1舍费耳(普鲁士容量单位)	约54.9升
1奥克斯霍夫特	约200—240升	1俄石(旧俄容量单位)	209.91升
1夸脱	1.15升	1夸特(英国容量单位)	约291升

货 币

1美元= 100分	1辨士= 4法寻
1法郎= 100生丁	1卢布= 100戈比
1基尼(英国金币)= 21先令	塔勒(古德意志银币)
1英镑= 20先令	格罗申(中古世纪后期的一种铸币)
1先令= 12辨士	

译 后 记

本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3月至1883年5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马克思在本卷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较之过去的“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制度的重要原理，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本卷第31页）。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列宁）考察了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一次概括地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按照劳动分配消费品；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卷第23页）。

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批判了机会主义“自由国家”口号的超阶级性质，指出“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

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本卷第7页)。列宁曾把恩格斯的这段话称颂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最精彩的论述之一。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著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指出马克思因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遂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本卷第227页),从此它“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本卷第226页);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本卷第247页),“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本卷第247页)。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本卷第26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取消工人政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放弃阶级斗争,一味追求“走合法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机会主义“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本卷第18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明确地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

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本卷第189页）。

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的几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对于参加工人政党的其他阶级分子，“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本卷第189页），“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本卷第284页）。在党内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必须坚持原则，决不可“拿原则来做买卖”（本卷第14页）。

* * *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九卷（1961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其中“给奥·倍倍尔的信”、“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章，是根据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德文版第二卷译校的，译校时参考了俄、英等译文和有关的中文译本。“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等文章，是在刘潇然的译本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德文版第19卷重新校订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一文是在张广达等译校本的基础上校订的。恩格斯在“劳动旗帜报”上发表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联”等十一篇文章，译校时参考了刘潇然和吴文焘的译本。其他文章都是按照俄文版译校的，有的参考了德文原文。本卷增加了一个“度量衡和货币名称表”，以便读者查阅。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岑鼎山、孙岷、姜其煌、毕克、杨兴锐、谢宁、王治平、张慕良、宋洪训、张企、宋书声、顾锦屏、陆梅林、周亮

勋、荣敬本、陈立敬、董荣卿、彭卓吾、夏新英、盛同、周秀凤、蔡恺民、洪佩郁、刘丕烈、郑厚安、毕世良等。参加资料工作的有钱文干、郭值京、冯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